可持续安全论

ON THE SUSTAINABLE SECURITY

刘江永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可持续安全论

刘江永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围绕"可持续安全"概念、内涵，以及"可持续安全战略"构建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能性进行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探讨，并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时代大背景与国际格局新变化等不同角度加以论述，提出了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倡导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形成和平合作的"海陆和合论"，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探索新的安全战略理论与路线图。

本书部分论文是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审批号 09JZD0040-2）、教育部社科司中共"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持续安全论/刘江永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0371-5

Ⅰ. ①可…　Ⅱ. ①刘…　Ⅲ. ①国家安全—研究　Ⅳ. ①D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001 号

责任编辑：袁　帅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1　　**字　　数**：39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产品编号：062028-01

自　　序

笔者有关“可持续安全”的思想，最初产生于对 2001 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思考，并受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启发。2003 年 3 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后遗症，进一步促进了笔者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

本书是 2004 年笔者首次系统提出可持续安全概念后，10 余年来撰写和发表的相关论文构成的。这是笔者在自身学术专业领域日本研究以外，形成的又一独立学术体系。以下是笔者关于可持续安全研究与写作的思想轨迹。呈一家之言，供八方评议。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七章，除删除了其中略有重复的部分以外，保留了原有论文的内容，并按照本书每一章的内在逻辑做了重新编辑。这样可以使有兴趣的读者了解笔者有关可持续安全理论形成的思想脉络，并可以通过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对笔者的观点作出验证。目的是更好地探寻有利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决策的新思路、新路径。

本书第一章“可持续安全与当今时代特征”中的核心观点，形成于 1986 年笔者完成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试论我们所处的时代》。时代问题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也要从中长期国际战略全局和世界潮流角度看。它与科学发展史意义上的时代概念并不一样。30 年来，笔者一直注意从时代角度关注世界的发展变化，思考中国国家战略决策与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后，虽然邓小平生前曾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主要课题)，这对于中国政府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是，从理论高度和全球范围现实来看，这并不等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那么，究竟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这个问题迄今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者于 1986 年曾提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的竞争可能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中国的改革不是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而是国家模式转型、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改革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

同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超越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与世界各国发展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时代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简称“共存与竞争的时代”。

30 年过去了，今天回眸审视，尽管有些情况早已时过境迁，而笔者当年提出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2009 年，笔者在中国国际关系理事会上谈到相关看法，并得到吉林大学《史学集刊》主编刘德斌教授的肯定与重视。承蒙德斌主编约稿，笔者在《史学集刊》2009 年第 6 期发表了《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一文（见本书第一章）。与这篇论文形成姊妹篇的是应邀为《河南社会科学》撰写的论文，题为《中国未来 30 年的路该怎么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发表在该刊 2008 年第 11 期（见本书第四章）。在这些文章中，笔者论述了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作为未来 30 年中国国家战略子系统的“和平与安全战略”，即“可持续安全战略”，概述了国防安全、外交战略、国内稳定、国家统一等四大战略系统。

笔者关于可持续安全的主要思想，形成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近 10 年间。2003 年秋，笔者结束了在中国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 5 年的任期，应邀到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任教。过去的研究经历开阔了笔者的国际视野；大学里自由与宽松的研究环境最初甚至令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能与众多教授直言不讳地讨论学术问题，也使笔者获益良多。

笔者在 2004 年第 1 期中国《亚非纵横》（现为《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战略构想》（见本书第六章），首次提出可持续安全概念。同年，笔者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7 期发表《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构建——关于 21 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见本书第一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内涵，并明确提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可持续安全。”

其后，笔者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8 期发表了《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见本书第五章）。该文对国际上流行的多边主义做了分析，提出两种不同的多边主义的概念：一是以美国为首多国部队发动局部地区战争并改变别国政权的“暴力的多边主义”；二是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合作的“和平的多边主义”。在此基础上强调，“和平的多边主义”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安全。

该文还对传统的国际体系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进行了解析，指出国际恐怖组织的网络化将导致“非传统国际体系”与“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形成。“非传统国

际格局”的特点之一是，非主权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与美国等国形成冲突与战争的“两极对抗”。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与矛盾激化，有可能缓解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大国关系。2015 年“11・13”事件发生后，法俄关系迅速接近，甚至连美国同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也受到微妙的影响，即是例证。

可持续安全理论需要借鉴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智慧。在这方面，笔者涉猎不深，而《管子》一书对笔者启发最大。本书第二章收录了笔者在《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8 期发表的论文《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以及在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杂志 2008 年第 3 期的论文《〈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

可持续安全理论需要批判和借鉴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理论。2005 年，笔者便意识到伴随中国推进亚洲区域合作，必定会遇到一些国家从“海权论”或“陆权论”等传统地缘政治学说角度妄议中国意图并制造障碍。因此，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如今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亟须提出符合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新概念、新理念。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是笔者在 2006 年出版的《亚洲区域合作路线图》中的部分内容。其中论述了中国地缘战略观念的变迁，提出地缘政治经济新概念“海陆和合论”，并指出了其基本内涵、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和中国的定位等。

笔者对日本及东亚地区研究较多，自然更多地关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可持续安全的探索。在本书第六章集中收录了笔者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和其他专著中相关章节的内容。例如，笔者发表于中国《外交评论》杂志 2010 年第 2 期的论文《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该文提出，在 2015 年东盟十国形成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在这三大领域推进“10＋3”合作，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保障共同体、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在这一“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的基础上，与东亚峰会、APEC 等更大范围的多边合作机制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文中还建议，“10＋3”就贸易投资、地方交流、观光旅游、铁路公路、能源合作等领域建立彼此相通的区域合作网络。这与当前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路一致。

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与中日韩三国合作密切相关。笔者在本书第六章收录了《中日共同参与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金正恩接班后的朝鲜半岛局势》《安倍政治走向与中日韩关系》《共谋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等论文。其中有些是在 2015 年末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稿，强调在中东、欧洲安全局势动荡的形势下，中日韩共谋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是当务之急，并提出相关的具体建议。

中国于 2014 年 1 月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兼任国安会主席。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

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①]

这一中国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可持续安全概念中所涵盖的综合安全观。国家的总体安全也必须具有“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一点在2015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明确提及。

笔者高兴地看到，可持续安全理念已得到中国政府的采纳，成为中国政府倡导的亚洲安全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发表主旨发言，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②]这一主张得到亚信会议成员国的一致赞成，其主要内容写入本次亚信峰会(CICA Summit)发表的《上海宣言》。

2015年9月28，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③]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可持续安全观，从而使这一新安全理念具有全球意义。

根据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CICA Summit)上主旨讲话的精神，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笔者撰写了《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见本书第七章)，发表于中国《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作为其姊妹篇，又在《中国军事科学》2014年第4期发表了《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见本书第七章)。笔者在文中指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可以概括为“可持续

---

① 《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一版。

② 《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一版。

③ 《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二版。

安全思想原则”。它或许与中国1954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笔者还指出，邓小平30年前提出世界两大课题是和平与发展。这虽仍然不容忽视，但伴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上升，现在国际上的两大问题似乎已演变为安全与发展。安全的概念既包括和平，也包括和平状态下不受威胁。如今全球真正带有战略性的大问题一是可持续安全；二是可持续发展。

如今，可持续安全已被提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议事日程。2015年1月23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在审议通过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时提出，“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需要法制保障。有鉴于此，本书在第七章《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与国家安全法》全文引述了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这部法律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包括拥有可持续安全的能力。

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如何把可持续安全的理论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发展、完善，再针对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中的难题，探寻解决的路径和方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以上是笔者相关研究体系形成的过程，一孔之见，难免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中国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司长期以来的支持与指导！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袁帅、责任校对王荣静等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刘江永

2015年岁末

前　　言

世界正面临安全危机

2015 年 11 月 13 日晚，法国首都巴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130 多人丧生，350 多人受伤。遇袭场所包括巴黎的体育场、音乐厅、餐馆等多处人员聚集的地方。这是法国经历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法国总统奥朗德立即宣布“法国被卷入战争”，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命令“戴高乐”号航母参与轰炸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IS)组织的据点和运油车队，并呼吁各国共同参与打击 IS。值得注意的是，策划袭击的嫌犯是摩洛哥裔的比利时公民，而非最近涌入欧洲的难民。

与此同时，对叙利亚境内的 IS 发起空中打击的俄罗斯也遇到麻烦。2015 年 10 月 30 日一架俄民航机在埃及西奈半岛遭到恐怖分子暗算而爆炸；11 月 24 日一架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 F16 战机击落，俄土关系骤然紧张。针对这一战后以来首次北约成员国击落俄战机事件，俄政府立场异常强硬。普京总统指责土耳其有人通过购买石油为 IS 提供资金，并在俄罗斯打击恐怖组织时在背后被恐怖组织的帮凶捅刀。同月 28 日，普京总统下令制裁土耳其，停止俄公民赴土旅游，禁止俄公司录用俄境内的土耳其侨民，在进口土耳其农产品方面严加限制，并继续对谋求加入北约的乌克兰政府保持压力。此事令美国和法国感到左右为难。

以打击 IS 为由头，英国也派出战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据点；德国决定派出战后最大规模的 1200 人赴中东参与打击极端组织；美国的特种部队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执行清剿任务。大规模空袭过后，参与打击 IS 的各国地面部队有可能大举开进叙利亚、伊拉克。俄罗斯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合作则可能进一步加强。旧的矛盾未解决而新的对立又发生，将导致该地区长期动荡，成为一些大国的军事角逐场。

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分子驾驶民用航空飞机撞毁的“9·11”事件以来，美国宣布进入反恐战争。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布什政府于 2003 年 3 月 21 日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府。其下一个目标就

是拿下伊朗和叙利亚，以利于美国打通从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到叙利亚这一从南亚到西亚北非的战略通道，并遏阻俄罗斯通过伊朗向海湾拓展势力的潜在可能。

然而，14 年过去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打击 IS 的名义，一举加强了与叙利亚、伊朗及伊拉克的关系，顶住了北约通过土耳其向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施加的压力，并可获得对南下波斯湾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反过来很可能使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试图通过“大中东民主化”建立的势力范围得以复失。

与此同时，2015 年 12 月 2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又爆发大规模枪战，14 人遇难、21 人受伤。当场被击毙的作案嫌疑人是极端组织的追随者、美国出生的南亚裔年轻人和他的巴基斯坦裔妻子。这种暴力恐怖事件今后还可能在美国等国不断发生。

上述事实说明，21 世纪的国际安全、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现出的新特点之一是：在国际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国际恐怖组织出现网络化，并向美国等国开战，从而形成一种“非传统国际体系”或“非传统国际格局”。它与 17 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形成的传统国际关系体系根本不同。在非传统国际体系内，不存在冷战、竞争、合作，由国际恐怖组织、极端势力所形成的“隐形一极”，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只有流血、冲突、战争。

2014 年以来，在叙利亚境内迅速形成 IS 成建制的军事行动，已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自爆型或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行为，而带有类似国家的国际政治战略意图和军事行动能力。在这一背景下，2015 年发生在巴黎的“11・13”恐怖袭击事件有其必然性。它标志着非传统国际体系似已形成。在非传统国际体系内，这种安全危机今后还可能以某种形式再度发生。

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内的“两极”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原有传统国际体系内大国利益趋同与反恐合作，从而暂时缓解以主权国家为本位的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对抗因素。一些原本对立的大国在针对极端组织联合或单独的军事行动中，谋求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并实现各自的安全利益与地缘战略利益诉求。2015 年 10 月，俄罗斯获得叙利亚政府同意发起对叙境内的 IS 据点的大规模空袭，随后法国、英国、德国的陆续参与，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联手打击极端组织，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内的竞争与抗衡并未止息，特别是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理论的诱惑下，彼此之间的战略矛盾反而可能在打击极端组织取得胜利后而更为加深，而恐怖组织、极端势力则又会乘隙而入，东山再起。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不仅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安全，甚至可能滑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冲突与战争。暴力多边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在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彼此对撞，有可能形成安全局势的螺旋式下降，跌入越来越危险的战争深渊。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客观现实：伴随科学与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21 世纪世界军事科学技术、武器系统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然而指导各国国家安全、国际战略的社会科学理论则相对滞后。面对上述非传统国际体系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形成，来自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似已失去解释力。以如何应对 IS 为例，最为流行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难以解释如何针对 IS 形成可持续的控制力和遏制力，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理想主义理论也无法解释如何与 IS 形成相互依存，从而缓解矛盾，实现和平与安全；建构主义理论同样无法论如何使基督教世界与 IS 形成共有知识与相互认同，反而陷入所谓“文明冲突”。另外，国际安全领域中传统的核威慑理论、地缘战略理论等，针对 IS 也均告失灵。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形成新的国际安全理论和观念，为正确决策服务。

国家安全概念最早产生于中国

对中国来说，在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领域，与其更多地强调“中国特色”，不如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向“地球村”提供可供参考、复制、共享、共创的战略精神产品。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有 5000 多年的文明史，早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在国家安全方面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留下取之不尽的至理名言和智慧结晶。

“安全”二字，在中国古代原为“安”与“全”两个字。“安”表示“平安”，例如，《周易》所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汉代《司马法》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而“全”字主要指“保全”，例如，《孙子兵法》所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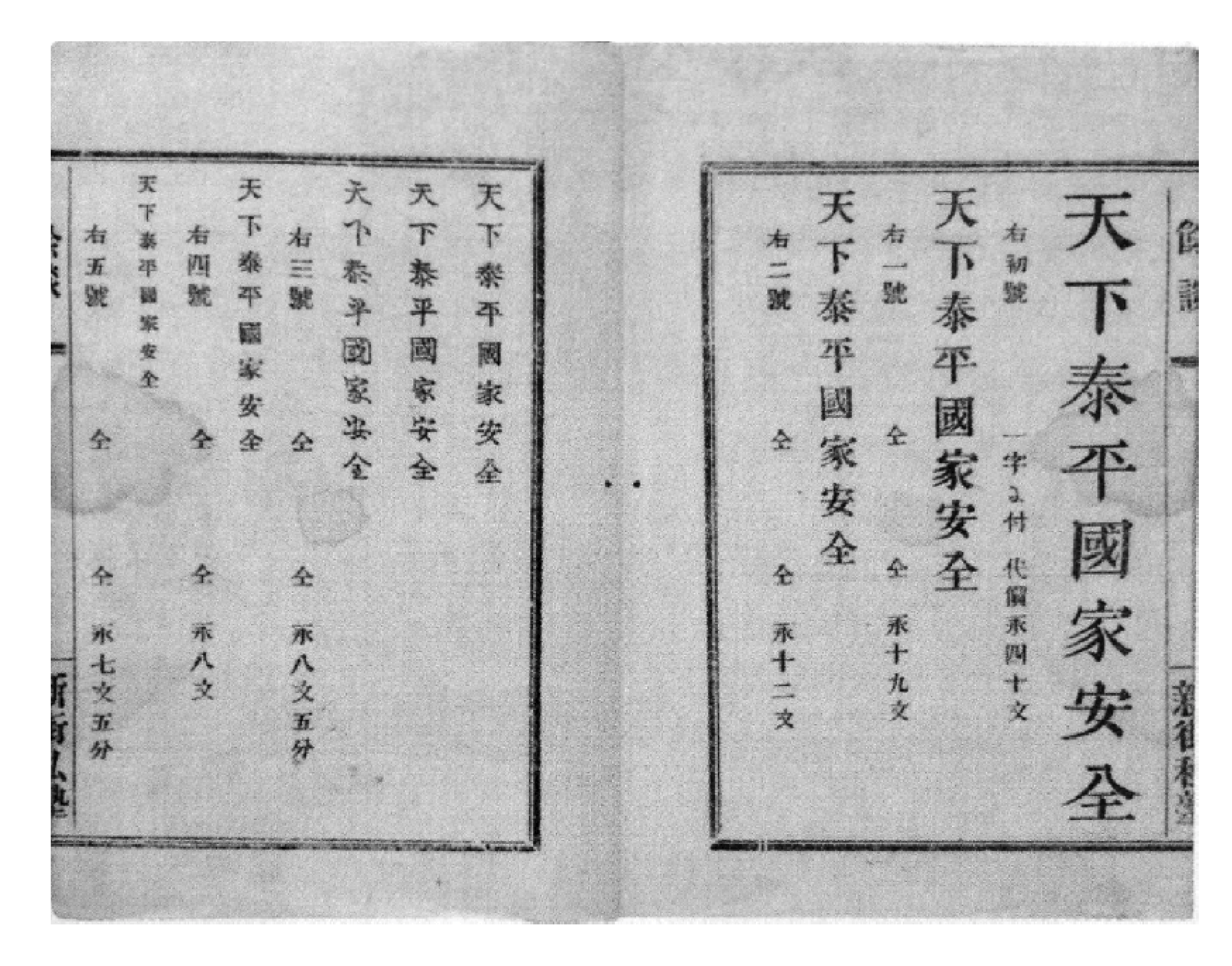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在 1990 年出版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词的出现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是一个美国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3 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①]一书。俄罗斯学者也承认，“在当今文献中，将那些与危险和安全有联系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里。‘国家安全’是从美国引入的概念。”[②]西方学者认为，直到“二战”后，“国家安全”才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常用的概念。[③] 迄今，中国学者大体也持同样的看法。

①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Pockets, New York, 1943.

② [俄]沙瓦耶夫等：《国家安全新论》，魏世举、石陆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第 21 页。

③ 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

但据笔者初步考察发现，所谓美国人最先提出“国家安全”的说法并非事实。其实，中国早在明朝(1368－1644 年)，就曾使用“国家安全”这四个字。2012 年笔者在参观日本东京的一家“印刷博物馆”时发现，日本最早的印刷字号标准手册上印有六种不同字号的汉字“天下泰平 国家安全”。这是明治五年(1872 年)在长崎出版的《新街私塾余谈》中出现的(见附图影印件)，作者是本木昌造。在展览的说明中指出，这些字是“明朝体”。由此可见，世界上首创“国家安全”一词的也许当属中国。如果中国人在明朝使用的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至少比美国人李普曼要早 300 年。也就是说，在人类经历了 3 个世纪之后，“国家安全”一词才成为国际政治和国家关系中常见的词汇。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右初號 一字ニ付 代價永四十文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右一號 仝 仝 永十九文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右二號 仝 仝 永十二文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右三號 仝 仝 永八文五分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右四號 仝 仝 永八文
天下泰平國家安全
右五號 仝 仝 永七文五分

本木昌造 1872 年出版的《新街私塾余谈》所使用的中国明朝字体附图影印件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吸引海外投资、管理经验和先进设备，经济取得长足进展；“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管理经验和先进设备。同样，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现象。中国作为最早提出“国家安全”概念的国度，也有理由从借鉴世界各国相关理论的阶段，逐步进入边借鉴吸收、边创新输出的新阶段。

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的创新

理论决定政策，它来源于实践，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

领域也不例外。它主要体现在以安全观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体系。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符合普世价值。作为可复制、可通用的国际安全新理念，不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突出“时代特色”与“各国共识”；不宜过度强调本国安全，而应突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

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5 月 21 日在亚信峰会（CICA Summit）提出可持续安全观，便是中国原创并得到与成员国一致赞成的安全新理念。然而，一些人却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只字不提“可持续安全”这一新安全观，反而刻意把讲话中有关“亚洲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民维护”这句话，解释为其目的是为对抗海洋大国美国，显示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存在。[1]

由此可见，中国还需要就习近平主席亚信峰会讲话的核心观点，在国际社会加强后续解释和说明，以免被人断章取义地曲解。这篇重要讲话通篇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而面对与会的亚洲各国首脑，倡导自己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可持续安全观并非与美国或任何海洋国家对抗，而是主张“海陆和合”，中美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安全。

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交叉概念。从主权国家角度看，国家安全是核心，国际安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及外部环境；从国际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是根本，世界命运共同体是由各个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全所构成的。笔者认为，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可持续安全观两者侧重不同，相辅相成，构成 21 世纪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总概念。

2015 年 7 月 1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其中包括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安全不受威胁。

该法第三条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任务所作的规定是：“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很明显，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确保中国国家安全为宗旨的。

与其相比，可持续安全这一新安全观，不仅是站在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也是站在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安全的立场所提出的科学安全观。它包括国内安全与

① ［日］武贞秀士：《亚洲的动乱》，东京，角川书店，2015 年，第 37～52 页。

国际安全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旨在构建国家与国际总体安全，谋求的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是可持续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安全涵盖本国安全、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合作安全需要通过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合作、政府各部门合作，以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综合安全包括使用综合手段和路径维护国家与国际的总体安全；可持续安全既包括国家总体安全也包括国际社会总体安全的可持续性的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也是包容性最强、普适性最强的新安全观。

可持续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若能获得成功，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安全思路与安全模式。可持续安全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其内涵与外延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笔者希望拙著的出版能为此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持续安全是人类永恒的课题，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目　　录

第一章
可持续安全与当今时代特征

第一节 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①]

一、时代观与国家方略

大国领导人在引领国家的时候都不能不从时代的高度看问题。无论正确与否,时代观都构成了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与行动指南。2009 年 9 月 23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希望开辟与全世界进行接触的新时代";"置身于这个时代,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权力不再依从你死我活的法则","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或应该试图主宰另一个国家。任何将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置于他人之上的世界秩序不可能获得成功。强权的均势也不可能得到维持。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传统地以南北方区分国家的方式已经毫无意义;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情况下,国家按照冷战的裂隙归类的格局也不再有意义"。"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建立有助于消除旧的分歧的新同盟——由不同信仰和信念组成的同盟","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虽然中国学术理论界对时代问题的看法不一,但基本上一致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治国方略。尽管遇到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中国没有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展成为硬道理。然而,在思考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时,不能不认清中国和世界处在怎样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历来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识时代特点,同时也十分重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恩格斯曾经预言:

① 本文发表于《史学集刊》,2009 年 11 月第 6 期。

② 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 9 月 23 日出席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讲话。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根据白宫发布的记录稿。摘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2009 年 9 月 28 日,第 10~11 页。

“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①]这里，恩格斯提出了“现时代”这个与历史大时代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时代概念。

列宁1918年曾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②]列宁充分估计到历史大时代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强调要根据客观形势制定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他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写道：“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③]与此同时，列宁把当时的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789—1871年为第一个时代，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1871—1914年为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1914—?为第三个时代，是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列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④]

由此可见，列宁的时代观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发展史意义上的大时代。它决定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大方向，但并不能据此制定某一时期的具体政策。二是这一大时代所处的现阶段，即当今时代。它决定了现阶段可取的战略与策略，但为防止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而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不认清历史的大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述两个层次对我们所处时代进行的理论解析并不多见。从理论思考的倾向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中国主要是从第一个层次看时代，缺乏对时代阶段性变化及规律性的认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开始从第二个层次看时代，但更多地流于对中长期形势的判断，因而难以取得共识和思想深邃的理论成果。未来30年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上述两个层次把握时代前进方向和客观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为理论研究与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

①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26～552页。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255页。

③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143页。

④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143、144页。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是建立在世界殖民地被列强瓜分完毕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其逻辑推理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期的帝国主义为重新分割殖民地，争夺霸权，必然发动战争。这一论断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战后广大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独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伴随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原有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战争扩大殖民地的时代，即列宁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的时代已告终结。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残余——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在“冷战”中又胜出的世界超级大国。战后迄今，局部战争与冲突从来就没有止息，而其中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自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多次宣布，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是长期战争状态。即便是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仍然看不到美国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迹象。因此，从全球角度看，我们还不能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二、当今时代特征：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论述社会发展形态问题，并指出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指向性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描述出共产主义的蓝图和怎样实现的方略。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也主要是从社会发展形态的角度理解时代问题。但是，又似乎仍有一个理论盲区，即国家发展形态及其与社会发展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探讨。而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理论环节，人们就难以把大时代与时代的现阶段，即当今时代做“理论衔接”。

其实，关于历史大时代的阶段性更替，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也就是说，列宁已经意识到，在历史大时代中各个时代阶段演进的历史衔接点是国家的类型。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点燃这一小簇星星之火，来照亮时代理论前行的未来。

笔者认为，国家的类型的定义是指国家发展形态，而国家发展模式是相对稳定并具有一定感召力的国家发展形态，主要是指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或发展道路。国家发展形态通常是由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各个方面所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与社会发展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发展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

国家发展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国家发展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这一重要思想提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时代的变化时，要重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尤其要关注国家发展形态，即国家模式问题。它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国家兴衰和时代前进的某些客观规律。

从社会发展形态和国家发展形态两个视角观察当今时代，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的历史大时代的进程中，当今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相互竞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本国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将对世界大时代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命题是笔者 1986 年在硕士论文《试论我们所处的时代》中正式提出的。写作的初衷就是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失败难以避免，中国应当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加以重新审视，提出新的时代观，并通过改革开放谋求新的发展模式。如今我欣喜地看到，《中国模式论》①等有关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中国模式》周刊和“中国模式”专题网站②，有关当代国家形态的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基本态势看，20 世纪 90 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两种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保持着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不过，苏联解体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失败，不如说是苏联国家发展形态的失败。

尽管苏联模式的失败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进入 21 世纪反而出现新的发展生机。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结合本国实际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博采各国众长。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国家来说构成了多重意义上的挑战，因而中国自然会成为西方打压和抑制的主要对象。另外，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其成功之处，但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等强权政策与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和模式感召力。拉美国家甚至出现了所谓“左倾化”趋势，与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恰成对照。

由于世界各国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各不相同，所以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各国彼此不同、各具特色的国家类型越来越多。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世界多样性和各国自主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决定的，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

① 沈云锁、陈先奎主编：《中国模式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② “中国模式”网，http://wxw.zhongguomoshi.com。

特征。

在近代历史上，一些国家虽然也采取了不同发展形态，但因主权国家数量有限，所以还谈不上发展模式多样化。18 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曾根据政府形式，把国家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类，这对欧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则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把历史上的国家分为四种：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归类为“专制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种概念又使一些国家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视为“专制国家”，把所谓的“民主化”作为对华战略目标，从而引发了同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矛盾。

现代史发展进程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既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即便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发展模式也不相同。例如，美国是以股票金融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模式；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没有先例可循，一些国家曾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解体后，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世界上有些国家目前很难说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状态，有些国家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道路，被称为转轨国家。国家类型更加复杂化，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观察：

关于国家结构，通常分为两种：单一制与复合制；复合制又有联邦制和邦联制之分。前者是相对独立的各州加盟而联合起来的国家；后者是国家之间的联合。亚洲国家多数是单一制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国是联邦制国家，而邦联国家的例子很少。中国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

关于国家政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议会君主立宪制，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西班牙、加拿大、日本、泰国、澳大利亚等国。二是议会共和制，如意大利、德国、冰岛、印度等国。三是总统制，如美国、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国。四是委员会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联邦委员会，如瑞士。

关于国家权力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二元制国家是由议会和政府分掌政权的政治制度，政府由元首控制而不对议会负责。它又分为两种：国家元首为君主的是二元君主制，国家元首为总统的是二元共和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但其形式也各不相同，作为立法机关，各国议会制度大体分为两种：一院制和两院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实行一院制的国家有 114 个，实行两院制的国家有 71 个。美、英、法、德、日、加、俄等国为两院制，而韩、

朝、越、瑞典、乌克兰、沙特阿拉伯、冰岛等国为一院制。各国议会的议事制度和选举制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实行总统直选，有的实行间接选举。美日两国领导人都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美国是首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选举总统；日本是由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首相。

关于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一党制分为两种：一是只存在一个政党；二是虽存在几个政党但实际上是一党执政。两党制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但实际上是两党轮流执政，最典型的是美国。多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三个以上的政党，各党在竞争中轮流坐庄，或由一些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联合执政。例如现在的法国、德国、日本等。中国不是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关于发展战略，更是多种多样。美国和苏联都曾采取以发展军工产业带动经济的军产复合体模式；欧盟各国是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日本、韩国是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立国、科技立国发展模式；中东、拉美、非洲各国则是依靠能源资源及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出口与内需并重，实行科教兴国战略。

关于对外战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谋求全球称霸型，即美国。二是多边军事集团型，如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三是双边同盟型，如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四是地区合作型，如欧盟、独联体、东盟、非盟成员国。五是独立自主型，如中国及广大不结盟国家。六是混合型，既与美结盟又参与地区合作组织，如泰国等。

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个性。作为人类社会，各种发展模式之间也其有共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而各国之间应尊重别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两种社会制度和多种国家模式将长期共存，可以在良性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三、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与大国的兴衰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纵观1840年以来，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四国兴衰的历史过程，笔者发现，在社会制度、地理自然条件、民族构成等诸多要素没有根本变更的情况下，国家的兴衰与国家发展模式是直接相关的。

从总体上看，优先发展科技与教育、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国家发展模式，比较符合当今时代潮流，有利于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反之，则不然。这是客观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存在两种社会制度，但这两种社会制度又各自有多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即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任何一种

社会制度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国家的兴衰，甚至社会制度的兴衰，均与多种国家发展模式有关。一个国家要全面持久发展，就要选择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正确的国家发展模式。战后迄今，中、日、美、苏(俄)四大国的兴衰史便说明此点。为节省文字赘述，作者通过表 1-1 描述的方式，描述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及国家发展模式变迁与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

表 1-1　从国家发展模式看中、日、美、俄发展轨迹

(1840—2049 年)

	1840—1945	1949—1978	1979—2009	2010—2049
中国	鸦片战争、半殖民地、半封建	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	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日本	明治维新到军国主义、侵华反美	依靠美国经济优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依靠美国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经济下滑	—
美国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冷战”政策、谋求世界霸权	追求单极世界与金融危机的爆发	—
俄罗斯	从帝国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苏联	“冷战”政策、谋求世界霸权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的复兴	—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后迄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情况下，中、日、美、苏(俄)四大国在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中，都出现过一些最具典型的失败案例。

(一) 中国模式的成功来之不易

2009 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如果从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可分为两大阶段：前 30 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模式。前 30 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模仿“苏联模式”到批判“苏联模式”都没有使中国走向辉煌，反而伤了元气。在“冷战”时期，中国因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十年“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后 30 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模式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从 1978 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历经了 30 年的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特有的国家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苏联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重大历史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与当今时代前进的

符号。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地区），由于个人经济收入不平衡，所以城市街区建筑水平参差不齐，城市的规划、开发和建设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和麻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有一个创造：从农村到城市，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剥离，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而土地的使用权则落实到个人。这种做法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又防止了土地的私有垄断；既可以在国家或社区统一规划时统筹合理地利用土地，迅速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又可使拥有土地、房产使用权的个人充分享受自身生产、生活的权利，确有其优越性。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通过加强法制，防止一些人在土地问题上利用不正当甚至非法手段牟利的腐败行为。

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当今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国家发展模式。未来中国的发展，还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进行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既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又要树立可持续安全的科学安全观。

（二）苏联解体源于国家模式失败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彻底失败。1917 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 1922 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严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立的世界超级大国。

然而，其后苏联国家形态——苏联模式的失败却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除了高层决策失误以外，苏联的内外政策与国家发展模式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矛盾。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与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苏联模式虽然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方面与美国模式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采取优先发展军事的国家发展战略，与美国争霸世界，对外扩张，使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发展、资源能源空耗。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解体的助推器。结果，经营了 70 年的所谓苏联模式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直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

俄罗斯放弃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因而被称为转型国家，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观察。或许存在几种可能性：一是长期维持现状，游离摇摆，私有

化与非私有化趋势反复交替出现；二是彻底改变社会发展形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伴随实力强大逐步恢复苏联式的强军扩张国家发展模式；三是“否定之否定”，批判性地恢复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但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和完善新的国家发展模式，走上类似中国的道路——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日本摆脱危机有待模式转型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多年间，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后，日本正欲摸索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即鸠山由纪夫首相所说的“平成维新”。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但最终遭到惨败。战后日本采取了“对美一边倒”的“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国家模式转型，采取了依靠美国的“政治大国”发展模式。然而，这次模式转型则是失败的，同时也为自民党两次下野埋下了隐患。

早在1998年，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了这一点：日本“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战后以来日本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日本背离了‘二战’后以来‘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对日战略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国内决策。日本能否摆脱危机，为21世纪开辟一条新路，关键要看日本政府能否重新调整国家发展模式，优先恢复、发展经济，解决银行坏账，防止国会因审议‘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等，引起政局动荡，导致小渊内阁翻船，经政危机进一步深化”。如果这种复合型危机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的前景之一是：一旦提前举行大选，自民党可能败北，甚至再度沦为在野党。届时，民主党将在各在野党支持下，出面组阁。[①]

笔者当时便指出：“要从更高的视野观察日本这场总危机，就要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性和内在规律。符合客观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必败无疑。国家兴衰，概莫能外。战后以来，列宁描绘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

① 刘江永：《日本全面危机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第19～20页。

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的时代’。这个‘共存与竞争’的时代经历了冷战与冷战后两大阶段。21世纪人类仍将长期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状态，同时可能创造出新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个时代的主题、主流或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其本质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避免世界大战；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在相同社会制度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普遍展开，并决定国家兴衰，促进社会发展。”①

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日本正经历国家模式转型期的阵痛。这次日本国家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有可能是：争取在保持对美亚关系平衡、扩大内需与出口协调发展中采取“经济优先、民生优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转型能否成功也许还需要10年以上才能做出判断。

（四）美国金融海啸的震源在于美国模式失败

2008年9月美国陷入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这标志着美国模式的失败。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曾为此而弹冠相庆。这一结果，使美国有关“历史的终结”的预言家名声大噪。②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在全球大力推广自由金融资本主义和所谓民主的政治模式，甚至不惜对别国使用军事力量。然而，“冷战”后曾经趾高气扬地标榜全球进入“单极世界”的美国，其国家发展模式却孕育着巨大的危机。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③ 华尔街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集团也被并购。继而美国最大的储蓄存款银行——华尔街互助银行倒闭。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曾经叱咤全球金融市场的华尔街五巨头目前只剩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是50年一遇，甚至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④

---

① 刘江永：《日本全面危机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第20页。

② 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1989年在美国《国家利益》期刊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又出版《历史之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其核心观点是，历史演进过程已近完成，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并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这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选择。

③ 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二季度报亏28亿美元，三季度亏损39亿美元，为该公司史上最大亏损，导致当年该公司股价暴跌80%以上。9月14日，美国财长保尔森、证交会主席考克斯和花旗集团等高层讨论雷曼兄弟拯救计划，但随后英国巴克莱银行宣布，由于美国政府不愿提供财政支持而撤出对雷曼兄弟的竞购，美国银行也放弃雷曼兄弟公司转而讨论并购美林公司。15日，雷曼兄弟公司被迫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申请破产保护。转引自佚名：《金融动荡加剧雷曼美林轰然倒下！》，《中国证券报》，2008年9月17日。

④ 中国经济网，2008年9月16日，www.ce.cn/xwzx/gjss/gdxw/200809/16/t20080916_16810256.shtml。

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决定拿出相当于其本国 GDP 5%的 7000 亿美元投入到金融市场，并连续降息，以避免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然而，华尔街的这场金融风暴迅速席卷欧洲，席卷亚太，席卷全球，各国股市不断下跌。其影响远远超过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如图 1-1 所示，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不得不对国家模式做出急剧调整。美国政府不仅出面干预金融市场——注资、降息救市，并准备将部分濒临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于是竟有人表示，美国应将国名改写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①] 人们开始质疑美国鼓吹和推广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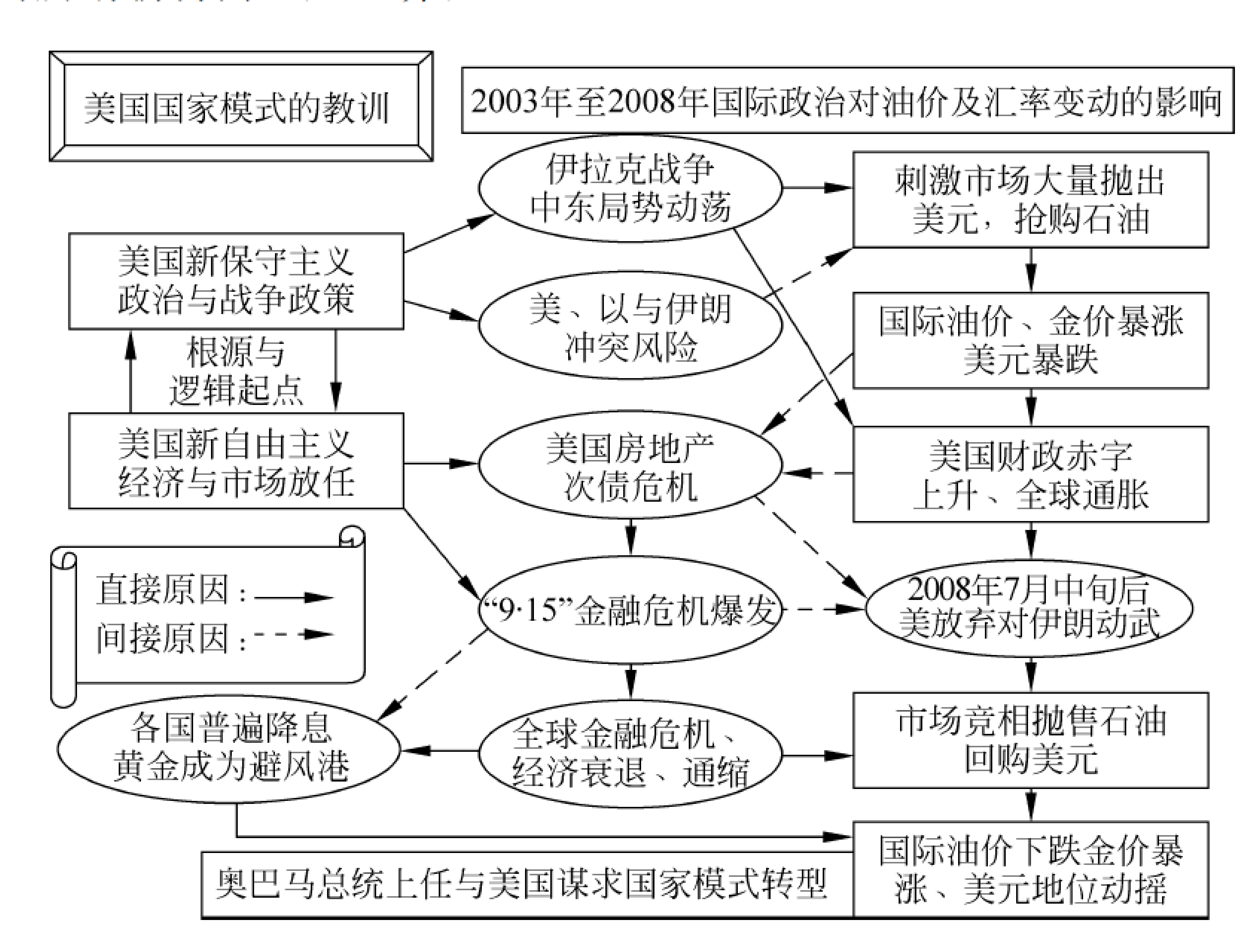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国家发展模式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联系

① 转引自《环球时报》记者撰写的《世界质疑美国式资本主义》一文，见 2008 年 10 月 7 日《环球时报》。

② 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原理。古典自由主义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在 18 世纪创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经济自由。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的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曾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美国总统里根的青睐。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必须放松对经济的干预，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同时，出现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结果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早在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曾采用凯恩斯主义[①]，对经济实施国家干预并宣告“自由市场终结”。直到1979年，由弗里德曼[②]主张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才再度抬头受宠。2008年，从次贷危机爆发到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美国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国家金融安全危机，若不及时采取救市等危机管理措施，很可能导致股市大崩盘，从而严重打击包括楼市在内的所有消费市场，造成实体经济的大萧条，引发证券公司和银行倒闭的“多米诺”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美国不仅自己曾实行自由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曾企图把它作为一种控制别国金融命脉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泰国和韩国都在美国的建议与压力下，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放宽本国的资本市场。结果，大量国际热钱涌入造成投机泡沫，随着热钱的撤出，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资金的条件是：受援国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放任房市股市下滑、开放市场，推行美式自由市场政策。然而，一些亚洲国家则担心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若政府放任本国股市下跌，将意味着本国资产的大贬值，而此时开放金融市场等于让境外“热钱”入市抄底，本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资产瞬间便大量外流，甚至可能使本国丧失对金融命脉的控制权。

旨在推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曾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称为“新殖民主义发展模式”。实行货币准美元化，丧失了金融政策的自主权；实行金融自由化，严重依赖外债，酿成金融危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和中下阶层的贫困化；部分国家财富落进了

---

① 约翰·海纳德·凯恩斯(1884—1946)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宏观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因此，他主张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就业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②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是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货币主义大师，他以对抗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坚持经济自由，强调货币作用，认为在社会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具有达到充分就业的自然趋势，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所以要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可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就将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阻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或加剧经济的动荡。他还批评凯恩斯所倡导的财政政策，认为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增加开支将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将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从而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货币政策才是一切经济政策的重心。弗里德曼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访华，其经济思想影响了一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其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

少数人的腰包；经济收入和财富被大规模转移到了跨国垄断资本手里；国内市场萎缩，许多中小企业陷入破产。从而形成恶性贫困循环：社会贫困化—国内市场萎缩—经济结构失衡—贫困化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更加萎缩—经济结构更加失衡。[①] 因此，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首的一些拉美国家掀起了对抗美国经济模式的浪潮。

美国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一些公司经营不善，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发展形态的严重失败。造成这种失败的根源之一是，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②] 即，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改变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③] 1929 年大萧条后，美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主要是由于美国开始并未直接卷入战争。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美国处于长期"反恐战争"过程中发生的，美国深陷自己发动的战争泥潭。这绝非偶然。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 2003 年 3 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无论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搞霸权扩张，都会自食恶果。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同样流行，而当时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低通胀、低失业率和较高增长的 8 年繁荣。除了以信息科技创新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拉动和周期因素外，美国经济形势好转与克林顿执政期间顺应"冷战"结束，大幅削减军费，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民用投资，扩大产品出口，充分享受"和平红利"是分不开的。而那时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和隐患是美国股市泡沫的膨胀。因此，也许不能把目前金融危机的产生仅仅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监管问题。这场危机实质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新保守主义政治综合征引发的一场复合型危机。伊拉克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必然产物。然而，美国搬起的这块巨石太重，最终砸在了

---

① 董正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中国网 2003 年 8 月 7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381046.htm。

② 新保守主义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美国总统里根、小布什均推崇新保守主义。"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重新得势。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旗帜周刊》社长克里斯托称，新保守主义就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主张把军事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其特点是，不惜采用单边主义战争政策推行本国价值观，先发制人打击"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基地组织，更迭别国政权，推进中东"民主化"。

③ 2003 年 2 月 26 日，布什总统在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称："你们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些大脑"，"我的政府录用了你们当中的二十来个人"。《纽约时报》社论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写道："如果一年半之前把我所知道姓名的那 25 个人流放到一个荒岛，就不会有伊拉克战争。"转引自马为民：《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及其政治哲学》，http://www.people.com.en/GB/guoji/1030/2224761.html。

华尔街金融股市大盘上。

布什政府执政期间,“9·11”恐怖袭击事件摧毁了曼哈顿的世贸大厦,但华尔街依然保持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又不顾国内外的反对而入侵伊拉克,则使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陷阱。美国每月要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费 150 亿美元。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计,美国将为伊拉克战争支付 3 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军费、国债、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皆创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军费 2007 年度高达 5468 亿美元;[①]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 10 万亿美元,其中一部分是靠外国注资购买来维系;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 2008 年度高达 4380 亿美元[②],7000 亿美元金融救市计划使 2009 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 1.42 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③]2006 年美国外贸赤字达创纪录的 7636 亿美元。[④] 缺乏监管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积蓄起大量金融泡沫。这些因素无形中似乎把美国变成了“金融泥足巨人”。

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遗症严重的情况下,又把战略矛头指向伊朗、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并在中亚和中南欧地区推进“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结果产油国地区地缘政治的痉挛性紧张导致石油成为国际投机家炒作的对象,国际油价脱离实际供求关系而节节攀升,2008 年 7 月一度高达每桶 147.27 美元。国际粮价也随之高涨,从而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和美元地位大滑坡。2009 年 10 月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 10%以上,而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手段则因高财政赤字和高国债而受到极大限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内政治凝聚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2009 年 11 月 5 日美国胡德堡陆军基地内发生的枪击案,或许堪称是美国陷入尖锐国际矛盾“国内化”的一个缩影。伴随“9·15”金融风暴的来临,华尔街宣告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终结,而凯恩斯主义的复兴能否成为美国模式的救世主还很难说。搞得不好,贸易保护主义的狂潮还可能从美国兴起,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美国面临的深刻矛盾也许只有从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外交等总体国家模式的转型中才能找到出路。

---

①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08 年度报告称,2007 年美国军费开支为 5468 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 45%。2001 年到 2007 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幅达 59%。新华网斯德哥尔摩 6 月 9 日电:《统计显示美国去年军费开支占全球总数 45%》。

② 美国国会预算局 2008 年 10 月 7 日公布的月度评估报告数据。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ViewSummary.aspx?docid=1815825&leafid=4185。

③ 新华社电:《美国财政赤字已高达 1.42 万亿美元 创二战后纪录》,http://news.sohu.com/20091018/n267458528.shtml。

④ 中国航贸网,http://www.snet.com.cn/95/2007_2_14/3_95_156527_0_0_1171429784217.html。

与上述失败案例相对照，21世纪初全球范围国家发展模式竞争出现的另一个新现象是：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中国国家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美国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这明显损害了我们一直在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①

四、国际格局演变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21世纪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进入历史的新阶段。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世界格局和历史的进程。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制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政策多边协调合作的新平台。G20峰会机制同样折射出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特征。它告诉世人："冷战"后的两制并存是相互依存中的并存，金融危机后的国家发展模式竞争是彼此合作中的竞争。这种趋势的健康发展，有可能成为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进步的新动力。G20峰会机制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背景下诞生的，而美国这场百年罕见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模式的失败。与此同时，中国模式的成功则是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必然结果。尽管目前G20峰会机制还有待巩固和完善，但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开始发生新变化。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上升，作用明显增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G8成员国成为重灾区，难以自保。于是，G20峰会这一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协调机制便一举取代G8，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G20国集团成员国人口占全球的62%，GDP占世界经济的78.2%，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60.7%。自2008年11月以来，G20举行了三次峰会：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伦敦峰会和同年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成为促进全球金融、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之一。G20峰会机制的形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发言权大幅提升。匹兹堡峰会的《领导人声明》表示，今后要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至少增加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从G8到G20，标志着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日欧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宣告结束，发展中国家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与发达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规则的国际新秩序将趋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示了其特有的优越性，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无视或拒绝中国。G20峰

①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8年9月26日发表吉姆·洛贝撰写的文章《金融危机威胁美国的影响力》，转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2008年10月7日，第7页。

会机制应运而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各国领导人走到一起，共同谋划全球经济、金融大事，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的基调是国际协调与合作。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经济大萧条，曾经是法西斯政府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经济背景。那么，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会否将对未来国际局势产生同样的影响？回答或许是否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了。当年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为重新分割殖民地，通过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土地、资源、市场，扩大本国“生存空间”。因而帝国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战争。当今时代，殖民地体系早已瓦解，不存在后起大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因此，当今时代的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相比之下，这次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和平力量。在非殖民主义时代、“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已带来金融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更趋加深。美国仍具有国家模式的自我调整能力，在应对金融、经济危机方面世界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可以协调合作①，不存在通过战争摆脱或转嫁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未来30年，在“两制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第三，国际格局趋向多元共存，而非多极对抗或少数大国决定一切。国际上有人称G20机制实际上是“中美G2”共治。不过，这恐怕既不符合客观现实，又不符合中国的政策取向。2009年8月“韩半岛先进化财团”与《朝鲜日报》对G20所作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得69.15分、中国得54.73分，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但美国得分比中国高出10分以上，说明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13个具体测评领域中，美国在国防、经济、科技、教育、信息、外交、宏观变化应对能力等7项排名第一。中国则在政治、文化、社会资本实力等3个软实力领域排名第一。② 其实，撇开军事力量的绝对落差外，2008年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7.23%和23.44%，美国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3倍。当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

① 2008年9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同时采取降息措施，维持本国金融、经济稳定；七国财长开会协调应对之策；为了预防外汇危机，中日韩等国拟建立总额为8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2008年9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时说：“我以为面对当前的危机，最为重要的是三点。第一，各国要加强合作。有关国家都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只有合作才能有力地应对危机。第二，当金融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信心尤为重要，人民的信心尤为重要，国家领导人的信心也尤为重要。我刚才讲了，这时候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贵重。第三，我以为中国能做的也就是保持住中国强有力的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态势，不出现大的起落，这就是对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9/27/content_10122441.html。

② 林晨音：《G20国力榜　美中日成为第一方阵》，转引自《法制晚报》网站原创，http://www.fawan.com/Article/ShowArticle.asp? Arti cleID=236692。

仅居世界第98位。中美两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7%和13.9%，美国的进口市场容量是中国的2倍以上。即便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表决权，目前中国的份额也只有3.72%，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份额则分别为16.77%，6.02%，5.88%，4.86%。这种局面亟待改变，否则中国难以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中国政府认为，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G20只是其中之一。温家宝总理对G2的提法说"不"，同时他认为"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①] G20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多边合作恰好反映出这种国际格局多元共存的新特点。

第四，世界发展不平衡可能加剧，国际格局与和平发展还会面临严峻挑战。某些失败的国家模式仍可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可能威胁世界经济回升。变动中的国际格局仍具有复杂性：(1)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多元共存"局面，而从总体上看，世界格局仍是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元化的国际力量并存的结构，即"一极多元"格局。在军事、金融领域美国及美元地位仍居世界之首，但美国这"一极"在弱化，"多元"力量在发展，其中包括全球或地区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诸如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在这种"一极多元"格局下，地区一体化趋势、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力将增大。(2)大国关系格局"一超多强"局面尚无根本改变。美国综合国力最强，仍保持"一超"地位，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金融力量和软实力与影响明显削弱，"金砖四国"等"多强"走强。(3)地区格局出现不同趋势：一是在欧洲、东亚等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不断加强，形成多元并存、协调发展局面；在亚太地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地缘差异，谋求和平合作则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二是在欧亚大陆结合部、东北亚等地，"冷战"时期遗留的地缘战略矛盾依然存在。三是在中东、南亚等地区，原有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化，呈现局部地区"多极"对抗局面。某些地区热点仍难以消失，甚至可能加剧，其根源在于国家发展模式落后造成的经济贫困与落后。作为主要国际矛盾之一，美国"一极"与国际恐怖主义"隐形一极"之间的较量如何演变值得关注。世界格局要从多元共存走向多元一体，还需付出长期努力。

第五，中国将继续完善国家发展模式并取得更大发展。未来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形态或国家形态。各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下发展各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即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国家发展模

① 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人民日报》，2009年2月3日。

式。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都将普遍展开。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也许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国家发展模式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变化,并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兴衰。各国人民有权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美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4年乃至更长时期内将面临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需要。这种国家模式转型的成败将决定未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消长。未来30年,中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善与发展时期,按目前速度发展,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将继续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前提下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是立足现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第六,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是社会形态进化的推进器。未来30年,腐朽社会形态的残余、先进社会形态的萌芽都可能超越国界,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成功的国家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将继续增大,特别是成功防止腐败及确保生态环境的国家发展模式将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成为先进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共产主义的萌芽将超越国界不断萌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并继续成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例如,现金货币可能退出未来主要消费和流通市场。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超市中随意购物的时候,那种各取所需的快感或许是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难以想象的。伴随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工作将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生快乐的选择。"志愿者"精神、慈善精神作为大众化的雷锋精神,将改变人们对社会奉献与回报的观念,赋予人们一生中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自我良心认知。世界各国、中国各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自愿向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提供无私的捐赠,就充分体现出这种人类共同的大爱。地区经济一体化将降低国家之间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门槛。

第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相互借鉴,将成为普世价值。因此,21世纪初的中国领导人提倡:"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①]"要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源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形成符合自己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机制。保持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对世界经济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十分重要。我们要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从自身实际出发完善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促进世界不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不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①]如果有心的读者对照本文开头引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那段演讲内容，也许不难看出，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时代观难道不也是心有灵犀吗？

总之，未来 30 年，中国将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与不同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平等交往与合作，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① 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加强全球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2005 年 10 月 16 日。

第二节 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

——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①]

美国“9·11”事件发生两年半后，西班牙又发生“3·11”恐怖袭击事件。“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局势依然动荡。伊拉克什叶派仍在与美军激烈交战，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首都相继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爆炸事件。一场从北美蔓延到欧、亚、非地区的全球性非对称战争似已拉开帷幕。伊拉克战争不仅未给美国带来安全，反而使国际反恐形势更加复杂而严峻。人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安全困境，获得“可持续安全”。

一、“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同经济增长一样，安全也是有其“极限”的。超过这个看不见的“极限”，就会发生“安全异化”现象，即出现旨在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的理想、措施、投入等，反而造成新的不安全或安全环境恶化，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化”所下的定义是：“1.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2.哲学上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②]所谓“安全异化”，是笔者引用哲学中“异化”这一术语来揭示人们获取安全的能力或努力反而威胁或损害自身安全利益的矛盾现象。只有深刻认识“安全异化”现象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才能理解“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人们之所以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质上是发现并承认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异化”现象，并力图解决人类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与能源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维系发展与环境的协调性。

当前，巴以冲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都出现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血的事实证明，盲目依靠增强或使用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反而可能引发更多、更强烈的反抗，从而使本国变得更不安全。即使某一方可凭借军事优势获得一时的安全，也难保持久而稳定的安全，甚至会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人类将继续面对

---

①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92页。

一种极其荒唐和不公平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众多国家在虔诚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甚至要忍受限制自身发展之苦；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却既不受限制地享用能源资源，又任意发动战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如果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现实威胁，对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势必大为下降。因此，当人们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需要树立“可持续安全”这样一种科学安全观，并以此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普世性理念。联合国不仅应当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且需要研究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迄今，人们往往把争取持久和平作为最神圣的安全目标。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世人：和平绝不等于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它们是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和平是安全的基本要求，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条件下就必然安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既无和平可言更无安全可言。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人类的“可持续安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威胁迅速上升，有些还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这就使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凸显。如何实现“可持续安全”，是摆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谋求“可持续安全”与争取持久和平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安全”概念超出了争取持久和平这一传统安全理念的框架，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是谋求摆脱安全战略困境的一种全方位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事领域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一般是指军事领域以外对公共安全、国家综合安全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或威胁的安全领域及相关问题。它涉及经济、金融、能源、资源、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包括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问题，具有明显的跨国性、可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转化等特点。

情况显示，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不仅可能来自敌对国家，也会来自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主体以及跨国生态环境问题。例如，据2004年2月22日英国《观察家报》报道，五角大楼在向布什总统递交的一份绝密报告中警告指出，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会在很多方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应当立即引起重视”。报告预测，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候变暖、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将锐减，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威胁，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①] 其实，上述内容毫无“绝密”可言，美国学者早就发出过类似警告：每

① 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04年2月23日。

一个环境因素可以成为经济混乱、社会紧张和政治对抗的一个根源。[①] 克林顿政府也曾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布什政府上台后拒绝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表明,美国在这方面明显倒退。

面对现实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安全威胁,人类必须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走一条“可持续安全”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目标,从根本上避免“安全异化”现象的蔓延,捍卫世界人民的基本人权。

二、“安全异化”——美国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困惑

在国际安全领域,“安全异化”现象在20世纪已经相当严重,现在又有所发展。大量研究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及实践关系密切。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受到国际关系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其突出特点是“迷信军事实力的作用,相信和重视军事手段解决其遇到的问题,包括非军事的问题”。[②] 美国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之间的战争、军备竞赛,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会对包括本国在内的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1991年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石油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因石油燃烧而排放的有毒气体,导致海湾地区民众死亡率升高了10%。1992年科威特就有大约1000人死于大气污染所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另外,美军在伊拉克南部地区投下了大量贫铀弹,致使这一地区白血病等恶性癌症以及其他疑难病症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6倍。[③]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在南联盟投掷的贫铀穿甲弹爆炸后,放射性物质不仅导致污染地区肿瘤、心血管及神经系统疾病患者的增加,而且还影响居民的遗传机能,如引起造血障碍、生育能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等病症。[④] 炼油厂被炸后,多瑙河上出现了长15公里、宽400多米的石油污染带,对动植物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⑤] 这对当地甚至欧洲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2001年阿富汗战争使原本已贫瘠荒芜的阿富汗再度饱受战争摧残。全国绿地植被面积进一步缩小。美军对山区使用的钻地重磅炸弹,成为引发当地地震的诱因。自然和资源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牺牲品,水源危机、物种消失、森林减少、土地沙化乃是战争的必然结果。

---

① [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

② 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3页。

③ 曲国斌:《伊战引发严重生态灾难》,http://news.tom.com,2003年4月3日。

④ 《环球时报》,1999年5月28日。

⑤ 《人民日报》,1999年6月7日。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据有关专家称，战争造成的油井大火把污染物抛向空中，并随风力扩散到世界各地，不仅会使中东地区的环境恶化，而且还会造成全球性大气污染。石油燃烧对生态环境乃至人体健康都会造成极大危害。

军备竞赛也具有同样巨大的危害。“冷战”期间美苏制造了大量核弹头和核潜艇，现在有些又要销毁。军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滥用，对不可再生能源造成的浪费和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恶劣影响，绝不亚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损害，既不利于“可持续安全”，也有损于可持续发展。

核能的和平利用可以造福于人类，而核战争、核扩散、核泄漏则将对人类安全及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核灾难。未来的危险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核扩散。极端势力或国际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搞核恐怖活动。二是美国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性。美国已提出用新一代小型核武器补充核武库，瞄准那些“好斗的小国”；在反恐战争的新时代加快研制新式核武器，使其有能力摧毁深埋地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参议院已放宽在内华达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的限制。随着美国核弹头向小型化、实战化方向发展，未来战争将对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造成更大破坏。

第二，一国谋求所谓“绝对安全”的结果可能物极必反，增加对其他国家安全的威胁，从而引发军备竞赛或国际安全形势紧张，使本国陷入难以自拔的“高成本、低安全”的安全困境。

美国的进攻性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为确保安全都将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通过获得比敌手更强大的实力来寻求安全。但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实际上“国家的战略策略越接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困境的问题就越突出”。[①]要使和平与安全长期延续，仅靠增强本国或盟国的军事力量是难以做到的。盲目依靠增强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或陷入一种“高成本、低安全”的战略困境。

事实证明，企图通过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及加强军事同盟作战能力，对别国形成遏制力或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可能造成本国安全成本上升而安全系数下降的局面。所谓国家安全成本，是指某一国家用于维护国家安全所投入的军事支出等各项国家安全支出的总和。国家安全系数则包括国家总体安全状态和持续的时间以及国民的安全感。即便庞大的军事力量能使某一国增加安全感，但同时可能增加别国的不安全感，引起别国的戒备或对抗，反过来削弱本国的安全感。超强的军事实力和对这种实力的过度自信，反而可能成为破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96 页。

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它尤其无助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甚至会制造出更多麻烦，造成本国安全水平的下降。

炫耀绝对军事优势并不等于获得实际安全优势。目前，美国正陷入一种罕见的“高成本、低安全”的困境，一种国家安全成本不断升高而国民安全感不断下降的怪圈。据预测，2010 年之前美国国防费用可能突破 5000 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①] 然而，美国并未因此而得到相应的安全。美国投入巨资建立的核武库和导弹防御系统，不仅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能为力，甚至可能沦为遇袭的目标。如果真正从维护美国人安全的角度考虑，无论在美国境内或境外其实是同等重要的。而如今，美国人在伊拉克已成为活靶子；从南亚到北非，一个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事件多发地带正在形成；世界各地针对美国的恐怖势力“消而不灭”。这些很难令美国人民相信反恐战争使他们更加安全了。

事实证明，以反恐为名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即便可以凭借高科技武器迅速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也难以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安全”，甚至使本国更不安全。战争虽然可以摧毁一国的政权，但一旦在民众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弱者对付强者的手段必然是自杀性的、血腥的。在力量对比极度失衡的情况下，以暴易暴引发的恐怖袭击将有增无减。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只是入侵别国的战略，而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反恐战略。反恐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否则，任何军事打击都将适得其反。伊拉克战争一年多来，美国在当地付出惨重代价，激起伊斯兰世界民众的反美情绪可能影响几代人。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 2003 年 10 月 16 日的备忘录中哀叹：“我们是赢得还是输掉了全球反恐战争?”战争的“成本效益比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花费的金钱以数十亿计，而恐怖分子的开支只有数百万美元”。“联军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胜利，但进展将是漫长和艰难的。”[②]对美国来说，更麻烦的问题在于伊拉克战争的性质一直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质疑。美英联军以反恐和清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这场战争，但至今既未发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之间有何联系，也未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在这种背景下，被占领国家人民反抗占领军的行为与恐怖主义究竟如何区分？美国及其盟国长期驻军伊拉克是否合法？美国及其盟国的民众再度发起反战示威游行，要求从伊拉克撤军，或许便是一种回答。

第三，美国在国际上以武力推行“民主”，已造成国际关系领域极不民主的“民主异化”现象。

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主张，为维护美国的安全，要用武力改变“无赖国

① 郭斯仁：《美大幅提高军费究竟意欲何为》，http://army.tom.com，2003 年 6 月 9 日。

② http://chinanews.com/n/2003-10-22/261/html-17k，2003 年 10 月 22 日。

家”的政权，实现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在全球推行“民主”，但却面临许多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困境。

(1) 尽管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毫无秩序和规则，《联合国宪章》等战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存在即说明这一点。无视甚至践踏这些原则，以武力改变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不能不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世界超级大国在要求别国国内实行“民主”的同时，自己却在国际上搞超级独裁。

(2) 美国宣扬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国家领导人直接选举，但在伊拉克政治重建过程中又不得不竭力避免直接选举。因为伊拉克人口中60%以上是什叶派穆斯林，一旦实行直选，很可能出现一个对美不利的什叶派伊拉克政权。很显然，如果让美国选择是在伊拉克谋求形式上实现美式“民主”，还是建立一个亲美政权，美国将选择后者。

(3) 美国标榜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给中东带来“民主、自由与人权”，而美军的虐囚事件则激起世界人民的普遍厌恶。尽管布什总统为此道歉，但美军的丑陋暴行无疑增加了世人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质疑。很显然，美国为榨取情报而采取的虐囚手段，与它宣扬的尊重人权的价值观是自相矛盾的。

(4)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获得部分盟国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包括美国在内，各国人民掀起反战浪潮，并可能引发政府更迭。以“导弹加民主”推翻别国政府的政府，终将在“反战加民主”的浪潮中被本国人民所唾弃。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在“3·11”爆炸事件后的选举中惨败，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一旦反战民意化为选战选票，是否会形成美国及其盟国更换政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值得关注。

三、探索新的安全之路——建构“可持续安全战略”

上述分析表明，21世纪初“安全异化”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决策的必然结果。

即便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对封建专制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所谓“先进的民主国家”对所谓“落后的独裁国家”发动战争，仍然不具备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样会产生“安全异化”，而且暴力的作用力越大，带来暴力的反作用力也会越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归根结底是伴随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是主权国家人民的自主选择，而不是外部暴力可以强加的。在21世纪，人类需要“可持续安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安全，国际社会应该确立并认同“可持续安全”的普世性共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安全范式。最关键的是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要更新战略观念，将无与伦比的战略能量运用到正确的方向，而不是相反。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范式，笔者仅在此就“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出一些基本思路

供探讨：

——从本质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是谋求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可以长期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绝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战略问题。其基本特点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从目标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保持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一是要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保持世界和平，二是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长期加强双边及多边国际合作。“可持续安全战略”追求的就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争取使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维护人类安全。

——从理念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以人为本，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它要求不得用战争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与军备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

——从内容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所采取的措施应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上述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在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利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联合国应发挥重要作用。

——从途径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国家间实行非暴力的多边主义。50 年前诞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8 年前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都体现了这种“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的精神；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都实践了这种“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体现亚洲特色的安全模式，它不赞成单边或多边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从格局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是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基础之上的。21 世纪头 20 年，世界格局将是一极多元结构，即美国“一超”与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的“一极多元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可能性，而推行单边主义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

——从范围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国家之间恪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前提。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全球安全。

——从根本上讲，“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安

全”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就好似一部双轮车的两个轮子，缺少哪一个，都会变成独轮车而不稳定，甚至难以前行。为争取“可持续安全”，作为发达国家，应高度重视解决南北问题，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从而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美国应大幅削减军费，要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那样，限制或禁止“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武器”的研制和使用，而将节省下的资金用于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这将有助于消除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源，减少有关国家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方面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第三节　新兴大国的可持续安全战略

——“中国梦”视野下的新安全观①

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国家亦然。重视安全谋发展则昌，忽视安全谋发展则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周易・系辞下》告诫人们：“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左传》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吴子・料敌第二》曰：“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如今，重温这些古训尤为必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可持续安全既是中国现实和长远的核心利益，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其基本内涵是：通过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尽量以和平方式和较低成本，实现和维护较长时期国际和平安宁与国内长治久安。本文立足“中国梦”，综览古今中外，认为中国需要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一、可持续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

人类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形势正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中国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没有发生逆转，但战略机遇期潜在的战略风险却在增大。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不时出现“痉挛性”紧张，日本在军事上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上升，中国岛屿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在发展变革进程中，各种矛盾交织，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的风险在增大。在新形势下，如何确保可持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已摆在我们面前。展望未来 30 年乃至整个 21 世纪，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需要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模式、发展模式失败，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政治与社会危机，其全球战略被迫收缩，但针对中国的“多方牵制”的一面反而上升。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社会矛盾加剧，而英法等国却武力介入利比亚战争，与美国一起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必受其累。中东、北非地区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激化，接连发生多米诺式的街头流血政治、政权更迭与内战冲突，民族、宗教对立加深。俄罗斯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和北约东扩地缘战略压力，更加重视与中国在亚洲加强合作。中国周边地区相对稳定，但围绕领

---

① 本文发表于《学术前沿》，2013 年第 6 期（上），系教育部社科司“十八大精神理论研究课题”初步成果。

土、海洋权益之争出现多方企图联手的苗头，美日军事合作矛头指向中国的一面明显。随着中国经济、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的延展，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员在海外生命财产安全等海外涉华安全利益日益突出。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的严重核污染有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并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长远影响，核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超过核能发展的迫切性。全球核电发展减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将面临新挑战。

*从中国国内形势看，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继2010年国内总产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又战胜国内外重重困难，取得许多可喜的新成就，但国内安全问题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不容忽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伺机破坏。伴随国际石油价格、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国内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出口阻力同时增大，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风险上升。社会腐败、丑恶现象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群体事件频发。自然灾害与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抢速度、谋增收而忽视安全等人为疏失，造成“豆腐渣”工程的楼倒桥塌，高铁追尾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惨祸。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谋发展，导致有法不依、监管不力，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矿难事故、雾霾天气、环境生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在信息化社会，上述国内外不安全因素不断积累，久而久之就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彼此叠加，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复合型威胁。纵观中国历史，无内忧则外患难至，外患至则内忧更甚。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内忧外患并发，海陆两面受敌。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富而以民为本，强而与邻为善，安而有备无患；最大之教训之一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弱而官僚腐败，乱而压内媚外，战而有患无备；最值得注意的规律之一是大乱后必有大治，大治后易出大乱。鉴于此，可持续安全问题应适时提上国家安全的议事日程。

事实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没有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也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角度思考中国的治国战略，十分必要。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国家发展仍不平衡；需要继续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的崛起国，中国必然会被霸权国视为挑战者而进一步受到打压。故此，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的告诫：“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因为一旦丧失主权与安全，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不亚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确保安全是未来一切发展的大前提。

二、可持续安全理念是安全观的新发展

可持续安全堪称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对迄

今安全观新发展的阐释。

持久和平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一般而言，持久和平是可持续安全的前提，但和平不等于安全。即便在长期和平条件下，国家与公民仍会受到来自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而可持续安全概念恰恰涵盖这两大领域。在特殊情况下，只要能做到战则必胜、胜且能保，非和平状态未必绝对不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堪称是可持续安全的“终极守护神”。

迄今的新安全观并未包含国内安全。2002 年 7 月，中国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坚持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是建立在世界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然而，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内安全更显重要。可持续安全战略肩负国内长治久安与不受外部战争威胁两方面的维安任务，是新时期国内新安全观与国际新安全观的总和。在国内长治久安方面，国内新安全观要求实现公平、正义、法治、民主，加强文化道德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

迄今的综合安全观不太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最早是日本的大平正芳内阁提出的，旨在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防止和应对战争冲突、能源危机、自然灾害等多种安全威胁。“冷战”后，联合国倡导“全面包容型安全”。1992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接受了 1972 年“罗马俱乐部”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从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人身、社区和政治安全七大领域，全面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然而，联合国迄今尚未提出可持续安全理念。中国应当在这个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议题上有所贡献。事实证明，依靠战争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必然会导致安全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碳排放增加、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

迄今的安全观难以弥合主权与人权之争的对立。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观往往倾向于维护主权，但国内矛盾激化难免损及部分人权；发达国家的安全观则强调所谓人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可能被滥用。可持续安全理念不仅重视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而且重视公民安全。可持续安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强调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要求一国政府对内重视改善民生、防止腐败、尊重人权、健全法制；对外营造和平、合作、开放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干

涉别国内政，尤其反对侵犯他国主权的战争行为。

迄今某些大国或强国的安全观不大重视经济和社会成本。伴随经济增长、财政宽裕而适度加大国防投入是必要的，但过度军备竞赛加速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美国安全成本升高与安全程度下降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战争碳排放问题极其严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从安全成本角度反思伊拉克战争。他指出，这种成本有三：一是作为“志愿国联合”一员的盟国参与战争的直接成本，二是波及世界经济和特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成本，三是引起“文明冲突”的成本。不计成本的安全是难以持续的，美国付出巨大的安全成本反而增大了本国的安全风险。故此，人类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综合成本角度，思考安全的可持续性与科学性问题，而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安全观。

可持续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非难以实现的理想。可持续安全是相对的，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握，以宏观全局为重，但也不能忽视局部对全局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关键因素之一是得益于自 1979 年以来没有卷入对外战争；自 1989 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国内动乱，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安全状态。未来 30 年，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可持续安全，中国的综合国力就有机会出现新的更大跃升。正因如此，一些敌对势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制造和利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破坏和干扰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是中国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观念。

三、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内涵与特点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政府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能力与艺术，旨在确保国家和平与安全状态不被迫中断。可持续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大系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子系统、国内和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以及在这个总纲下的若干细目。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通过本国努力与国际合作，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确保世界和平与本国不受侵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效维护本国自身安全与各国共同安全。所谓低成本，并不意味单纯节约安全开支，而是综合意义上而言的安全代价、战略代价。可持续安全战略首先要确保安全状态不被破坏，其次是在安全状态一旦受到难以避免的损害或被迫中断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可持续性的自我再造与续建。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特点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协调性。为此，在增强国防力量的同时，要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巧用公共外交。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国内安全利益与国际安全利益的总体平衡。

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要继续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合作与和平融合，进一步促进港澳的繁荣发展。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应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本质是和平与非暴力性。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要靠实力与王道，而非霸道。在国际上，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政治磋商、外交对话、国际协调等和平方式，缓和与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以破坏别国安全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都是和平的多边主义实践；而暴力的多边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构成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外部军事威胁。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实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与合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所有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原则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它强调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的情况下，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特殊的安全利益与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渗透，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任何地区安全合作都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利益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是维护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基础。《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确保各国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国际准则。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违反这些准则而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或损害。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中国在加强国内道德、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法、国际规则制定与完善的进程。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各国发展与安全的同步性。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应同步推进。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以利发展中国家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通过国际制裁，加剧社会动乱，颠覆别国政权，不仅无助于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可能制造“越穷越打、越打越穷”的恶性循环，到头来必定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可持续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靠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有关国家可以在反

恐、反走私贩毒、反海盗、防治跨国传染病、维护生态环境等跨国安全问题上，加强长期合作。这有利于各国增强政治互信，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要确保国际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完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可持续安全方面的功能与机制建设。为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一环，可建议在联合国安理会下设“可持续安全委员会”，加强国际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

*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地缘政治概念具有创新性。*迄今，无论是“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还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都是为西方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实际上，这些地缘战略学说并不具有普世性价值，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仿效，只会引起新的地缘争夺甚至冲突与战争。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亚太地区由内陆国家、海洋国家、半岛国家、群岛国家、海陆兼备国家所组成，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着有利于合作的地理空间与复杂的相互制衡。要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就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创造性地妥善处理领土与海权争议。

*可持续安全战略具有普世意义。*鉴于可持续安全观念与西方“霸权主宰和平”的传统观念相左，必定会遇到来自霸权国的抵触，但其普世性价值终究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占据国际安全的道义制高点，有助于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因篇幅所限，有关中国如何制定可持续安全战略，以及如何以可持续安全理念为指导妥善处理中国面对的国内外安全问题，将另辟文探讨。

第二章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①]

中国古代虽未正式使用“国家安全”一词[②]，但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体现在诸多文献之中，且多用一个“安”字来表示，如“国泰民安”“安邦定国”“居安思危”“长治久安”，等等。其中包蕴了许多深刻的哲理，是中华文明宝贵的历史遗产和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内容。我们要取其精华，古为今用。中国在历史上既有独占世界鳌头的鼎盛时期，又有蒙受外敌入侵的民族危机。其中的经验教训今后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纵横各家便提出许多安邦治国的精辟思想和至理名言，几千年来流传至今，形成中华民族有关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人心向背，以民为本

中国古人早就提出：“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③]《战国策》称：“善为国者，顺民之意。”[④]孟子千古流传的佳作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

---

① 本文发表于《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8 期。

② 据笔者考证，在中国，“国家安全”一词的出现，有可能始于中国的明朝。其根据之一是，1872 年日本印制的字号样板书中便出现“天下泰平　国家安全”字样，并注明此为明朝体。

③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

④ 刘向：《战国策·齐策》。

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①]《史记》总结历史经验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②]《管子》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③]

中国传统治国安民之道之一是提倡"国以民为本"[④]，"治国有常，利民为本。"[⑤]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也说明以民为本，国方能稳；以人为本，统而难分。《尚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⑥]《孔子家语》提醒当政者："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一警世箴言尤其受到汉唐统治者的重视。孟子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将民置于国君之上。[⑦] 西汉政论家贾谊强调："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为智。"[⑧]《汉书》道："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⑨]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当时古人又提出"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约择人；三约从时。"[⑩]意思是，为政之道有三：一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需要从事；二要选贤任能；三要顺应时势。《淮南子》曰："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⑪]唐朝宰相魏徵进谏唐太宗："以隋亡为鉴"，"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⑫]"民存则社稷存，人亡则社稷亡。"[⑬]明朝朱元璋当政后也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天生民而立君，君为民而立命。"[⑭]他曾下令斩首当时延误发放赈灾粮的户部主事赵乾和"视民不如犬马"的县令高翼，以示爱民。《资治通鉴》断言："人心不摇，邦本自固。"[⑮]

这里顺便提一下，"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是两个既相近又有所不同的概念。"以民为本"是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重要的治国思想，为历代贤哲所推崇。如今，"以民为本"的观念主要是解决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干群关系范畴的问题。从国家安全特别是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看，贯彻"以民为本"理念至关重要。因此，

---

① 《孟子注疏》。
②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③ 《管子・牧民》。
④ 《老子西升经》。
⑤ 《文子・上义》。
⑥ 《尚书・五子之歌》。
⑦ 《孟子・尽心下》。
⑧ 《新书・大政上》。
⑨ 《汉书・郦食其列传》。
⑩ 刘向：《说苑・尊贤》。
⑪ 刘安：《淮南子・主术训》。
⑫ 魏徵：《群书治要・政论》。
⑬ 魏徵：《群书治要・申鉴》。
⑭ 朱元璋：《明太祖集》卷六。
⑮ 《资治通鉴・唐纪》。

党中央特别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古亦有之。例如，为废除秦汉奴婢制度，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下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毛泽东 1949 年也提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国外，“以人为本”是 14 世纪至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人文主义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先进思想。它向当时欧洲的封建神权发出挑战，提出人是世界的中心，宣扬以人为本，提倡个性解放，推崇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权反对神权，对欧洲的文明进步产生过积极影响。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如今，“以人为本”的观念主要适用于解决人与社会及自然界关系方面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包括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能源开发、产品设计和生产等一切社会活动，都应提倡“以人为本”。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上升，在安全领域引入这种观念也将是顺理成章的。

（二）牢记有备无患，居安思危

《周易》提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①后人将其概括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②《庄子》指明：“安危相易，祸福相生。”③《尚书》提出：“惟事事乃有其背，有备无患。”④《墨子》道：“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⑤《左传》留下名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⑥“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⑦《封禅文》告诫：“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⑧《荀子》进一步主张：“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患之患为之豫，豫则祸不生。”⑨在古汉语中“豫”即“预”之意。《南史》提出：“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⑩《战国策》强调：“治之其未乱，为之其未有。”⑪李白有诗云：

① 《易・系辞下传》。
② 《大戴礼记・武玑铭》。
③ 《庄子・则阳》。
④ 《尚书・说命中》。
⑤ 《墨子・七患》。
⑥ 《左传・襄公王》。
⑦ 《左传・成公九年》。
⑧ 司马相如：《封禅文》。
⑨ 《荀子・大略》。
⑩ 《南史・陈暄传》。
⑪ 刘向：《战国策・楚策》。

"居安思危,防险戒逸。"[①]这些主张都突出了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中国古代兵书和谋士更是把有备无患的思想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危的高度。《吴子》说:"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②]《司马法》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③]《说苑》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④]"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⑤]《盐铁论》主张:"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⑥]"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⑦]这进一步告诫人们要赢得主动,防止被动,关键在于是否有备。宋代的欧阳修则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预可以亡身。"[⑧]明朝开国重臣刘基曾提出"固国莫大于保民,保民莫切于备患"[⑨]的主张,对朱元璋安邦定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人还从量变到质变、渐变到突变、无形到有形等事物演变的规律,为世人敲响警钟。《汉书》提出,欲"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就须深知"安者非一日之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⑩]魏徵曾对唐太宗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以伐根而求茂木,塞源而欲流长也。"[⑪]武则天认为"忧患生于所忽",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故柳宗元提醒世人:"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瘠。"[⑫]宋朝人提出:"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急";[⑬]"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⑭]清代人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古人大业成,皆自忧患始。"[⑮]这说明,我国历代先哲早就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国家安危相互转化的辩证规律。

(三)主张上兵伐谋,止戈为武

"止戈为武""多行不义必自毙"[⑯]等观点,是《左传》中提出的。《孙子兵法》有

---

① 李白:《大猎赋序》。
② 《吴子·料敌第二》。
③ 《司马法·仁本第一》。
④ 刘向:《说苑·说丛》。
⑤ 刘向:《说苑·指武》。
⑥ 桓宽:《盐铁论·世务》。
⑦ 桓宽:《盐铁论·固险》。
⑧ 欧阳修:《五代史记·伶官传序》。
⑨ 刘基:《春秋明经》。
⑩ 《汉书·贾谊传》。
⑪ 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⑫ 柳宗元:《敌戒》。
⑬ 许洞:《虎钤经》。
⑭ 吕祖谦:《东来集》卷七。
⑮ 刘岩:《赠人》。
⑯ 左丘明:《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句名言："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①]而人们最为推崇的还是孙子所说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②]

中国一些古代思想家还主张兼爱非攻。《墨子》有"非攻"一文，反对动辄发动战争，主张"兼相爱，交相利"[③]，即国家间应相互爱戴，互惠互利。老子《道德经》主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④]《管子》认为："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⑤]《史记》强调："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⑥]杜甫在《前出塞》诗中写道："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古人不仅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⑦]，而且提出"天下虽兴，好战必亡"[⑧]，强调"以和为贵"，不以强凌弱。

上述这些古人的至理名言，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爱好和平的。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思想，主要是立足于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及安全方面的威胁做好必要的准备，以确保国泰民安，而绝不赞成先启战衅，进攻别国。尽管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封建暴君或类似元朝统治者那样的对外兴兵之举，但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仍属于支流，而且是受到谴责的。

（四）强调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在中国历史上，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法家坚持法治，儒家主张德治，双方争执不下。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宜双管齐下，法德并举。以战国时期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根据"人皆自为"且难改的观点，提出"不务德而务法"的治国之道。韩非提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⑨]，"法败则国乱"；[⑩]提倡"法不阿贵，绳不挠曲"；[⑪]"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⑫] "清其吏"意为使其官员保持廉洁，依法从政。《商君书》也强调："不以私害法，则治。"[⑬]这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

① 《孙子兵法·计篇》。
② 《孙子兵法·谋攻篇》。
③ 《墨子·兼爱下》。
④ 《老子道德经·三十一章》。
⑤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⑥ 《史记·伯夷列传》。
⑦ 《汉书·息夫躬传》。
⑧ 《白居易集·策林三》。
⑨ 《韩非子·有度》。
⑩ 《韩非子·难一》。
⑪ 《韩非子·有度》。
⑫ 魏徵：《群书治要·刘广别传》。
⑬ 《商君书·修权》。

国人便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汉代《盐铁论》认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①]，强调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后汉人王符所著《潜夫论》断言：“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而“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②]，主张执法必严。

儒家经典则教诲世人：“重积德，则无不克。”[③]《尚书》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④]孔子指出：“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⑤]古人早已认识到，即便是强盛大国也须遵法守德，否则国家仍不安全。《管子》便留下箴言：“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倘若“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强调：“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则民离畔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⑥]诸葛亮也提倡：“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⑦]宋朝人认为：“国家存亡，在道德之深浅。”[⑧]

而早在汉朝，古人便提出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和“道生法”的命题，认为“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⑨]贾谊主张法德并用，处理激化的矛盾时用“法”；化解“积渐”中的矛盾以“德”。《后汉书》称：“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⑩]《史记》指出：“非兵不强，非德不昌。”[⑪]实际上，儒家并不反对依法治国，只是反对像秦朝那样施行暴政，反对“苛政猛于虎”。而法家强调秉公执法，其中自然含有“德”的思想成分，甚至堪称是提倡“以德执法”。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在中国古代，这种精神自律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守礼戒贪。古人早就懂得“贪利者害己，纵欲者戕生”[⑫]的道理，并提出“公生明，廉生威”[⑬]，即公正出英明，廉洁生威望。

---

① 桓宽：《盐铁论·申韩》。
② 王符：《潜夫论·述赦》。
③ 《老子》。
④ 《尚书·尧典》。
⑤ 《孔子家语·王言》。
⑥ 《管子·形势解》。
⑦ 《诸葛亮集·答惜赦》。
⑧ 《宋史·苏轼传》。
⑨ 《经法·道法》。
⑩ 范晔：《后汉书·崔寔列传》。
⑪ 司马迁：《史记》。
⑫ 《格言联璧·悖凶》。
⑬ （清）李煜：《西沤外集·冰言》。

（五）主张国富兵强，亲仁善邻

中国古代历来高度重视同邻国的关系，提倡“以宾礼亲邦国”。[①] 邻国在地缘安全方面具有“辅车相依，唇亡齿寒”[②]的利害关系，可以互为安全屏障。故《左传》提出“天子守在四夷”，意思是从周边做起确保自身安全。

《管子》在这方面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它首先强调：“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接着指出：“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最后要达到的境界是：“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③]

关于如何做到亲仁善邻，《孟子》认为“交邻国有道”，即“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④]意思是说，惟有仁爱为怀的君主才能做到大国侍奉小国，而惟有充满智慧的国君才能做到小国侍奉大国。这样双方便可敦睦相处。《老子》说：“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人，小邦不过欲事人。夫两者欲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⑤]其大意是，大国对小国谦下，可取小国信任；小国对大国谦下，可获大国宽容。大国不想过分控制小国，小国不想过分奉承大国，双方便可实现各自愿望。大国尤宜谦下。这是“怀远以德”外交思想的一种体现。

另外，古人还主张与邻国共同对付天灾，而不能以邻为壑，即所谓“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国之道也。”[⑥]同时，睦邻并不等于放弃戍边。唐代政治家陆贽曾说：“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⑦]清末外交家黄遵宪提出“寸寸山河寸寸金”的口号。屯垦戍边，保家卫国，历来是中国国防之要务。

二

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明君大多注意汲取前车之鉴，励精图治，促使经济发展、

① 《周礼·大宗伯》。
② 左丘明：《左传·僖公五年》。
③ 《管子·形势解》。
④ 《孟子·梁惠王下》。
⑤ 《道德经·六十一章》。
⑥ 《史记·卷三十九》。
⑦ 《陆宣公奏议·卷二》。

国运昌盛；而几代人之后则往往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最终在内乱外患中改朝换代。

汉唐、明清等历代统治者政权稳定后，一般都比较注意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对内“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对外采取睦邻政策，遂成“国泰民安”“近悦远来”之盛世。例如，汉代出现的“文景之治”和唐朝出现的“贞观之治”。但即便是这些朝代，到后期也往往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导致天下再复大乱。西汉末年的王莽、隋朝末年的隋炀帝等，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动辄用兵，最终都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魏徵在总结隋朝灭亡教训时，特别指出其“不能怀以文德，剧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①]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堪称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期间，唐朝出现文治武功空前强盛的“贞观之治”。唐太宗认为“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②]，并提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他反对“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对少数民族较为平和，较少发动战争，因而境外部落纷纷内附，中外交往大为发展。公元630年，唐平定东突厥，解除了北方的边患，为唐与西域诸国的友好往来开辟了道路。公元627—649年，波斯王朝曾多次遣使来唐，中亚诸国使者接踵而至。玄奘西游天竺，促进了唐与南亚次大陆的交往。公元641年，唐太宗外嫁文成公主入藏，通过和亲增进了汉藏交往，维护了祖国统一。当时，唐与南海诸国往来增多，与朝鲜、日本来往更加密切。日本第一批遣唐使于公元630年到达长安，揭开日本遣唐使来华的序幕。唐太宗在位期间，唐朝对内开明，对外开放，国力强盛，开创了国泰民安的鼎盛时期。

宋太宗赵匡义（公元939—997）采取“守内虚外”政策，是个失败的例子。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后，宰相赵晋认为，唐末乱局的原因在于“方镇（地方势力）太重，君弱臣强”。于是，宋太祖接受了赵晋的建议，将军、政、经大权集中归中央。但其后，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激烈，始于唐末的农民起义不断，抵御辽、夏并立政权侵掠屡告失败。公元991年，宋太宗提出“守内虚外”政策。他对臣下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此后，“守内虚外”成为宋代后世皇帝遵循的“祖宗之法”。[③] 所谓“守内”，是指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和防止武将专权；所谓“虚外”，是指对辽、夏、金、蒙等中国少数民族并立政权采取消极防范政策。其结果是导致北宋于1127年灭亡。

针对北方民族的入侵，宋代虽有不少文臣武将反对苟安妥协，但终因“守内虚外”政策和朝政腐败而受挫。精忠报国的一代名将岳飞在沙场屡建战功，却被投降

① 魏徵：《隋书》。

② 魏徵：《贞观政要·卷九》。

③ 转引自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04页。

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结果导致中原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宋廷被迫偏安于江南以致最后于1279年被蒙古大军所灭。

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一度对外扩张，后又采取怀柔之策修复同周边邻国的关系。忽必烈沿用大蒙古国的“招谕”策略，遣使告谕各国入元朝贡。周边邻国感到蒙古扩张的威胁，不愿服从，高丽、日本等国甚至发生杀害元使臣的事件。于是元朝蒙古大军先后出兵征讨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国，严重损害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下诏罢战，元与日本、高丽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逐渐恢复。元公主曾与高丽王子和亲，不少高丽人还在元朝做官。

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28—1398）实行非患勿讨的睦邻政策，可圈可点。公元1371年，明太祖告谕群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他认为，耗费人力、物力出兵外国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强调，“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外国非侵中国不得用兵”。这一告谕载入朱元璋自编的《皇明祖训》，成为明代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①]

明成祖即位后，主张“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华夷一家”“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倡导“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准许各国私商来华贸易，频频派遣使臣出访。1405年至1433年，郑和使团七次下西洋，访问了近40个国家，“外交盛况虽汉唐盛世所不及也。”[②]即便如此，明朝仍有人写了副对联“莫待临涯失马收缰晚，只恐船到江心补漏迟”[③]，提醒世人防患于未然。明太祖特别强调：“练兵保民，在历代之必先”，“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④]但其后人执行不力，为防倭寇袭扰，明朝被迫实行锁国政策。

清代前期整治边疆，闭关自守，有功有过；后期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教训深刻。前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改变了唐代以来对边疆地区的羁縻做法，直接派官吏监督，实行有效管辖。清对周边弱小国家延续“厚往薄来”的做法，为维护“天朝”尊严耗费大量财力。而此时，西方列强开始大举殖民扩张，俄从陆上，葡、西、荷、英从海上入侵骚扰中国。清政府严加防范，抵御了沙俄的入侵。但作为防范侵略的手段实行海禁等闭关锁国政策，并坚持以君臣之礼处理同包括西方列强

---

① 转引自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23～225页。

② 同上书，第223、435、436页。

③ 《牧羊记·小逼》。

④ 朱元璋：《明太祖宝训》卷六。

在内的国际关系，则落后于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后，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统治者被迫抛弃了“华夏蛮夷”的传统观念，传统的朝贡体制彻底瓦解。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把太平天国当作“心腹之害”，把西方列强视为“肘腋之忧”，主张采取“外敦信睦”“借师助剿”；“联合外夷，共灭发捻”的方针。对内把镇压农民起义列为首要任务；对外主张“守定和议”“中外相安”，把遵守不平等条约作为苟安之策。1874年日本在美国怂恿下出兵中国的台湾，李鸿章妥协退让，与日本签订中日北京专约，纵容了日本吞并琉球、染指台湾的野心。1894年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李鸿章避战求和，醉心于“以夷制夷”，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调停”，训令在朝鲜的中国将领循守“万国公法”，静守勿动，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动境地。战败后，他以全权代表身份赴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割地赔款的巨大损失。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力主镇压义和团，谋求与列强“和解”，1901年9月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国家安全和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古代谋求国家安全的要领之一是“政善于内，兵强于外。”[①]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个含义深刻的寓言《罴说》。这个寓言的结论是：“今夫不善其内而恃外者，未有不被罴之食也。”不幸的是，晚清政府恰恰是柳宗元所说的“不善其内而恃外者”。

国民党政府抗战时期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抗战胜利后又依靠美国等外国势力的支持打内战，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沉痛教训。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通电》中首次提出这一政策。1934年12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被写进《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宣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认为日本侵华是次要的，革命力量和异己势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集中力量进行剿灭革命和消灭异己的“安内”战争，然后才能“攘外”抗日。这种对日不抵抗政策，给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提供了可乘之机。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这一政策才有所改变。而汪精卫之流则始终坚持“抗战必亡”的谬论，1940年与日本签署所谓“基本关系条约”，规定“两国政府要互助敦睦，密切合作，共同防共”。这种仰仗国外势力的卖国行径，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依靠美国和日本军阀残余势力发动内战，妄图借外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其失败后逃往台湾，一度企图仰仗美日反攻大陆并以高压手段统治台湾，结果不仅造成海峡两岸长期对峙，骨肉分离，而且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滋长，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这一历史错位如何才能以和平的方式矫

① 桓范：《政要论·兵要》。

正,中国何时才能实现完全统一,是对海峡两岸中国人智慧的一大考验。

三

纵观中国历史,在国家安全方面最大挑战往往是内忧外患同时并发;最成功的经验是富而以民为本,强而与邻为善,安而有备无患;最大的教训是弱而朝政腐败,乱而压内媚外,战而有患无备。

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安邦定国的思想,却难免发生严重的内忧外患。这主要是由于,在封建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动荡恰恰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且落后就要挨打,外患列强总是借内乱国弱而至,从而引发中外对抗性矛盾的爆发。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①这句话很有道理。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它为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发展和统一起到过重要作用。有关国家安危兴衰的经验教训更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汲取。

中国古代兵书汗牛充栋,但大多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难免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武器及武器技术重视得相对不够。《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富有哲理,但也不能说尽善尽美。《孙子兵法》十三篇,不可能论述现代化战争中高科技武器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中国古代军事家对"器",即武器的重要性及其发明、创造的研究比较欠缺。例如,《孙子兵法》谈到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时提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②但是,在热兵器时代特别是现代化战争中,只考虑和依靠"道""天""地""将""法"这五大要素论胜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器",即谁的武器更先进,更有效,谁的将士更善于使用和驾驭先进的武器装备。

中国在军事上重视人的因素无疑是正确的,但还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弱项"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器不如人"。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经历过惨痛的失败,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民族牺牲,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实力

① 《新唐书·魏徵传》。
② http://www.shulu.net/gd/szbf.htm。

弱,武器装备落后。火药本来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14 世纪初才从阿拉伯传入西欧。然而,在中国,火药并未不断引发火器的创新,而在西欧则带来整个作战方式的变革。其后,经过 300 多年特别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可以装备步兵的步枪,后来又出现了英国的铁甲舰。结果,大清帝国败在洋枪洋炮之下后,还要向列强购买武器。100 多年过去了,中国现在依然要向俄罗斯、欧盟购买先进武器,而美国还在从中作梗。中华民族血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就是要高度重视"器",必须制造并拥有先进的军事利器,不断增强支撑它的经济科技力量。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明确指出:"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综合国力明显跃升。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国防事业正加快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但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矛盾难以避免;国际上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依然存在。因而要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仍须有忧患意识,正视和切实解决前进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妥善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可以相信,新时期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必定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家安全思想,积累新的历史经验。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05、206 页。

第二节 《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①]

管仲(公元前719—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颍上人,春秋初期曾担任齐国的宰相,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被齐桓公尊为"仲父"。他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管子》一书是介绍管仲思想及其从政经历的一部传世之作,其中融汇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家流派的思想,并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例如,"诚信者,天下之结也"[②],"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③]该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促使齐国成为春秋霸主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贤哲有关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智慧,值得后人借鉴。

本文所述管仲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主要是依据对《管子》一书中相关论述的整理而成。[④]《管子》一书非管仲一人所著,但书中包含的哲理和政治思想仍堪称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一大宝库。[⑤]

一、对于国家实力的认知

齐桓公继位之初,齐国刚经历过一场严重内乱,国力衰落。作为齐国宰相,管仲上任后的第一要务是提升齐国国力,为日后称霸中原打下物质基础。《管子》主张以农为本、国富兵强、重视军备。在《管子》有关国家富强的概念中,"富"和"强"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富"要以农为本,"强"则要靠军队,两者相辅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因为,在管子看来,只有国富而无兵强,则国富难保;只有兵强而无国富,则兵强难维。

(一)农业乃富国之本

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农耕民族的特点,历来认为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在管

---

① 本文发表于《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

②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③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④ 《管子》一书最早相传有389篇,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多亡佚,后经西汉刘向审校并删除重复者后定为86篇,但有10篇在唐代之前便已遗失,现仅存76篇。孙波注释:《管子》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

⑤ 有人推测,《管子》可能是齐桓公设立的所谓"稷下学宫"集体编撰的,也有人认为本书只不过是挂了管仲名字的"伪作"。另外,书中一些篇章的行文像是一部描述管仲治国思想与实践的史书,很可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由别人续写的。

仲看来，强兵必先富民，富国必先兴农，即所谓“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粟者，王之本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①]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优先的国富兵强之路。

《管子》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②]这是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③]《管子》认为，富国富民都要靠农业，“粟多，则国富”，“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④]，“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⑤]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⑥]若没有粮食，城是守不住的。

管仲认为，富国富民都要靠农业。他指出：“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盛则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他认为，农民要以农为本，“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民众、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这里管仲所说的“末作”和“奇巧”是指农业以外的生财之道。那些与农业这个“本”相比，只不过是“末”而已，明君要禁止本末倒置，偷奸取巧。因为“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也矣。”[⑦]

管子认为，粮食是国家实力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粮食的多少决定了人口的多少，粮多则人口增加，粮少则人口减少。而人口多少决定了军事实力的大小。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扩大土地面积，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管子认为民富仅是国家实力地位的基础，但民富并不等于国家富强。因为国家实力地位是指国家总体能力，而非人均财富的多少。

相反，若“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于是，便“命之曰寄生之君”，即君王短命即将灭亡，“寄生”为“暂寄为生”之意。作为警世枢言，《管子》称：“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粟。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

①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②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③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④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⑤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⑥ 《管子·权修第三》。
⑦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①]

（二）军队乃强国之基

在管仲看来，无论在稳定国内地方势力还是抵御外敌，都要增强国家和军队的实力。因为“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再有，“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②]“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同样，“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③]；“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④]这里，管仲把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讲得相当全面，不仅有对外职能，也有对内职能，核心是维护本国安全，强调国家安全的根本莫过于军队。

《管子》认为，地广是国富的必要条件。在农业社会时代，农业技术不能大规模地提高单位产量，增加国家财富总量的唯一方法是扩大土地面积，而确保和扩大土地面积只能靠军事力量。因此管子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在管仲的眼中，评价一国之君的功过得失，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看国家是否富强。《管子》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国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⑤]

国家强大的标志是军队战无不胜，即“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⑥]因而国君必须要增强军队的实力，否则就会“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再有，“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⑦]显然，管子将军事实力视为国家安全的根基。

①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② 《管子·七法第六》。
③ 《管子·重令第十五》。
④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
⑤ 《管子·重令第十五》。
⑥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⑦ 《管子·七法第六》。

《管子》认为兵器乃战争中制胜的关键。《孙子兵法》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用兵靠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但孙子兵法没有讲“器”，似有其局限性。与《孙子兵法》不同的是，《管子》非常强调军队武器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①]《管子》指出：“器械功，则伐而不费”；“审器而识胜”。[②] 因此他主张“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③]，提倡掌握最先进而精良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管仲是唯物主义者，管子兵法是对孙子兵法极好的补充。

（三）以德为核心的软实力乃王者必备

管仲认为，国称霸以兵，为王以德；国可以力谋霸，但要以德称王。管仲主张巧妙运用“力”“德”“信”所构成的综合国力，先建立齐国霸业，最终复兴周室王权。《管子》指出，“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④]这句话表达了管仲对王权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方面的基本价值判断，即作为享有王权地位的国家，对遵守共同道德规范的诸侯国友好相处而不攻取；国之所以要争天下，就是要以自身权威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不过，当时的所谓“天下”，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世界或国际体系，而是指诸侯并立的中国周朝天下。正如《管子》所云，“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故要“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⑤]

那么，何为德？何为道呢？《管子》称：“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⑥] 进而言之，对人民“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⑦] 可见早在2600多年前的中国，道德就被视为一种无形的巨大感召力和成就王业的必备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今天国际上常谈论的“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所谓“软实力”概念，即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⑧]

---

①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
② 《管子·兵法第十七》。
③ 《管子·幼官第八》。
④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⑤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⑥ 《管子·正第四十三》。
⑦ 《管子·正第四十三》。
⑧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用《管子》的话说，“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二者，圣人之所则也。”[①]这里的“独明”即独具慧眼的正确判断；“独断”即独具一格的正确决策。这二者是圣人所要具有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也曾提出国家力量中政治与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他从外交角度指出，政治力量是看“一个国家能否使他国对本国政策心悦诚服，能否将他国团结在本国目标之下，能否他国将自身利益服从本国利益”。而文化力量则指“一国能否激发他国仿效的思想、钦佩其成就和使用其语言”。[②] 与美国人的想法所不同的是，《管子》提倡的道德力量，似乎主要是强调霸权国领导人——国君的人格力量及其对民众和诸侯国的感召力。

二、如何建立霸业与王权

管仲认为，天下主导国有霸权和王权两类国家；一国也有霸权或王权两种选择，以及从建立霸业到实现王权的不同发展阶段。当时管仲进谏齐桓公：当今周天子幼弱，而诸侯强悍，不朝拜、不进贡。主公应削弱强悍的诸侯，延续灭亡的小国，率领诸侯复兴周王室。这就是管仲建立齐国霸业的政治目标，但他并不认为齐桓公能在称霸后取代周朝称王。

（一）《管子》关于霸业与王权的概念

在春秋时期的国家间政治中，成就霸业和王业，或许是各诸侯国追求的共同目标。《管子·霸言第二十三》首先就“霸”和“王”两个不同的概念做出界定和区分：“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③] 也就是说，能使国家强盛者称为“霸”（霸业），而能匡正天下者称为“王”；能控制天下一半者为“霸”，能得到全天下拥戴者为“王”。“霸”的本质是强权与硬国力；“王”的本质是在硬实力基础上同时兼有强大的软国力，即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亲和力与凝聚力。《管子》认为，凡是获得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以力服人难得人心，以实力为后盾且以德服人才能使天下归之。

《管子》所说的“天下”，实际上是周朝所辖的整个中国；所谓“王”就是他所推崇的“先王”周文王所开创的王朝；所谓“霸”就是做天下各诸侯国的盟主。另外，《管子》中所谓“霸”的概念还有两重性：一是作为超群实力地位的优越性；二是作为政策选择的偏差性。而“王”的概念则是强大实力与崇高道义两者合一，即管仲

①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②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刘晓红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2～13 页。

③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复兴周王室的终极国家目标。

虽然在管仲的战略思想中,“霸”与“王”有不同,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实际上两者有互相衍生的关系,即“霸”是“王”的基础,“王”是“霸”的发展。故《管子》经常将霸、王并称。例如,书中称,所谓“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①]但《管子》同时强调:“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也就是说,王权不能只靠霸主地位或实力,而必须按天道行事,若“失天之道,虽立不安”。[②]

这个天之道,就是道德、道义与客观规律。在管仲看来,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先争谋,争形,争权”。这是因为,“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形,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③]而获得优势后,就应恩威并用。根据《管子》的论述,似可将管仲的霸王战略及策略运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多强并立时不宜过早称王,而应联强攻弱,后发制人。《管子》认为,“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在这一阶段,对“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形危之”。即,对近处不服的国家靠占地威压;对远处不服的国家以强势威慑。这一点,与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论点颇为相似。摩根索认为:“我们在讲到权力时,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控制力。”这种影响源于三个方面:“对利益的期待、对损失的恐惧、对领袖或制度的景仰和爱戴。”[④]英国在19世纪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它颇具匠心地设计了这样一种政策:使别国意识到与英国为敌太危险又无必要。其实,这也正是管仲所追求的国家间政治的心理效果。当群雄争霸时,若不增强实力而先讲仁义道德,可能会被列强吞食,所以必须先求生存壮大。

第二阶段,强国减少时应先发制人,联小攻大,但不搞霸权。《管子》提出:“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⑤] 这是因为,在强国林立争霸时,要建立霸业而非王道方可求生图存;强国少时却要借机称霸则不可取,反而应率先实行王道,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如果相反,便不能称霸为王。因为当只有少数强国并存时,要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就不能对别国搞霸权,而要以德称王,否则会为渊驱鱼,导致本国

---

①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② 《管子·形势第二》。

③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④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⑤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孤立。在这一阶段,《管子》主张,“二尔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①]即,对有二心谋反者讨伐,是武;对服从者宽容,是文。文武兼备,是德。

在齐桓公看来,“霸”与“王”也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权力等级范畴。他完成霸业后也曾想升级完成王业。据《管子·小问第五十一》记载,齐桓公曾问管仲:“我想成就霸业,靠的是你等几位贤臣之功。现在我又想完成王业,你看能行吗?”管仲未答而请鲍叔牙作答,鲍叔牙又请宾胥无回答。宾胥无直言道:“古代成就王业的都是君主德高,而大臣的德较低,现在则是您的大臣德高。”齐桓公听罢承认儿子不如自己,自己不如贤臣,所以注定难成王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王权基于霸业又高于霸权。王权对明君圣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甚至需要几代明君的努力才能实现。

(二)如何建立霸业王权

《管子》一书中称,“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②]其意为,所谓王者,就是要拥有霸王的优势地位,在实力、道义、智谋、军事、地势、行为等方面胜过别国。“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这是管子所谓霸王之道之箴言。关于如何获得霸权和王权,作为战略家的管仲在总体原则、时机选择和具体做法上有一整套自己独到之处。

1. 纵横捭阖,顺势而为。在霸权争夺战中,管仲认为,“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这是指,要战胜对手制霸,首先要善于建立本国的大、强、重的优势,造成对手小、弱、轻的劣势。

管仲主张,霸者要以小制大,以弱胜强;王者要扶弱抑强,以德服人。《管子》认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③]这里,管仲强调了国家之间纵横捭阖的几种态势,即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略,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态势。以邻国诚服来强化同远方国家的关系,是王者的态势;联合小国攻大国,是针对敌国的态势;以靠海之国攻靠海之国,是中原国家的态势;低头服从强国以免遭惩罚,是小国的态势。

《管子》认为,国家大小、强弱的态势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管子还提出如何以弱胜强,促成强弱态势转换的某些规律。“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代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

---

①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②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③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弱矣。"[1]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再好的宝马良驹，如果用百匹马轮番与其比赛，也会把它累垮；即便是一个时代最强的国家，如果天下各国都攻击它，该国也会衰弱。善用国力与外交权谋者，面对大国、强国，可以借对方之势，缩小、削弱和矮化对方。因为国家强弱态势不仅取决于力量对比，还取决于关系的组合。合则弱可变强；孤则强可变弱。

2. 审时度势，善抓时机。管仲认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圣人能辅（捕捉）时，不能违时"。[2] 管仲指出，军事行动要"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他认为，"自古以至今，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败者也"。故"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3]

这里所谓时机有"谋霸"与"称王"两层含义：一是指谋霸要"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兵举。"管子认为："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二是指称王者须知"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4]在管仲眼中，本国政通人和而别国无道乃是建立霸王之业的机遇期。本国平时要有道德素质和软力量的积累，不断提升道德修养，而一旦别国发生不当之举或战略决策失误，那么即是迅速提升本国地位的可资利用之机。

《管子》指出，"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5]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下发生战乱则对圣王有利。国家发生危机，圣人就会知晓。先王之所以能称王，就是善于利用邻国的失误。同样，自己举措不当，则会使邻近敌国得意起来。

为能做到审时度势，善把时机，要靠宰相智囊，即"知盖天下，断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6]管仲指出靠谋略制胜，一要有备；二要善抓机遇。这样便可"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全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震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7]

3. 运筹经贸，不战而胜。管仲通过非军事手段降服一些诸侯国的方法是，在

①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②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③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④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⑤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⑥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⑦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战略和战术方面成功地运用经济手段。《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便详细记载了管仲向齐桓公献策，以经贸手段降服各诸侯国的经过。如表2-1所示，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议，通过贸易、货币和价格手段，欲擒故纵，使鲁国、梁国、莱国、莒国、楚国、代国、衡山国为获利而增加对齐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当这些国家农业削弱而在粮食贸易上对齐国产生严重依赖时，齐国突然通过限制进口和粮食出口，使这些诸侯国陷入粮食危机，民众大多投奔齐国，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君最终也不得不归顺齐国。

表2-1　管仲以经贸手段迫使其他诸侯国三年内降服归顺的案例

案例	降服的诸侯国	经济特点	欲擒故纵	对方反应	限制手段	措施结果
1	鲁国、梁国	织绨业较兴旺	齐桓公带头穿绨，高价购绨	为获利而弃农织绨	一年后封闭关卡禁止贸易	粮价暴涨，鲁、梁顺服
2	莱国、莒国	盛产茈草可做染料	大量造币，高价够茈草产品	为获利而弃农产茈	两年后封闭关卡禁止购茈	粮价暴涨，莱、莒顺服
3	楚国	山中有鹿	齐国高价购买出国的鹿	为获利而弃农猎鹿	三年后封闭关卡禁止购鹿	粮价暴涨，楚国顺服
4	代国	产白狐皮	高价购买代国的白狐皮	为获利而弃农猎狐	代国弱而招致离枝国入侵	代国求救，归顺齐国
5	衡山国	兵器制造较擅长	高价大量购买衡山国兵器	为获利而弃农造器	一年半后停购兵器不卖粮	该国不敌齐鲁而降

材料来源：根据《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内容整理而得。

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举其中一个案例。管仲进谏齐桓公："鲁、梁两国的百姓历来以织绨为业。您可带头穿绨做的衣服，令左右也穿，百姓就会跟着穿。您再接着下令齐国不要织绨，必须从鲁、梁进口，这样鲁国、梁国就会放弃农业而都去织绨了。"齐桓公照办，管仲又告诉鲁国、梁国的商人说："你们为我采购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于是，鲁、梁两国就让其百姓织绨。十三个月后，管仲又对齐桓公说："您可以改穿帛衣，带动百姓不再穿绨。封闭关卡，不与两国通使往来。"十个月以后，鲁、梁两国的民众相继陷于饥饿，鲁、梁两国赶紧下令百姓转而务农。但粮食不可能在三个月内生产出来，鲁、梁两国的粮食每石一千钱，而齐国的粮食每石才十钱。两年后，两国十分之六的百姓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两国的国君也请求顺服。

上述案例对我们的启示是：利用造币、价格制定权和贸易禁运等手段，有时可以达到战争所难以达到的目的；国家间经济制裁的有效实施必须首先造成严重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即别国对本国严重的单边依赖；国家间经济制裁的有效实施必须抓住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例如粮食或能源资源等；如果过分追

求眼前的巨大利益，一个国家的强项和特点反而可能变成弱点和陷阱；粮食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物资要牢牢掌握在本国手中，保持足够的自给率，而不能因受到外部巨大诱惑而放松经营。

直到今天，粮食仍被列为国家权力要素中自然资源部分的第一位。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便把粮食视为国家各种资源中“最基本的资源”。他明确提出：“粮食自给自足永远是巨大力量的源泉”；“相反，粮食的长期匮乏是在国际政治中永远软弱的根源”。[①] 遗憾的是，摩根索没有读过《管子》一书，所以他只能引用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等国的例子做比较。如果他能了解《管子》中的上述精彩案例，或许会拍案叫绝的。

不过，管仲的经济谋略和伎俩虽可得手于一时，却难保别国长久归顺，更谈不上称王，甚至还会埋下祸根，因而要维系霸权还须恩威并重，对待归顺的诸侯国更宽厚仁慈才行。

4. 以人为本，以德和人。《管子》认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②]管仲强调：“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③]“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④]

管仲强调，“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钧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管子认为获取天下并不是吞并别国，而是让所有诸侯国愿意服从周朝之礼，遵从齐国，相安无事。《管子》主张：“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⑤]，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⑥]总之，“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⑦]

---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125页。

②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③ 《管子·牧民第一》。

④ 《管子·牧民第一》。

⑤ “诎”同“屈”，“信”通“伸”，“有所诎，有所信”是说有屈有伸。

⑥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⑦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三）如何维系霸业与王权

《管子》认为，“霸王国”如同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那样，新老交替改朝换代，为天下创建制度，给诸侯排序分封，受四海宾服，顺应时代潮流匡正天下。世界中心转移是一种客观规律，即霸权和王权不是固定在某个或某几个国家而永恒不变的，不过霸权和王权维持的时间长短却不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维持王权或霸权的政治能力。由于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政治领导能力不同，因此维持王权或霸权的时间长短就不同。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王权国家或霸权国家变更政治领导人后，王权或霸权开始衰败。管子认为，霸权或王权的转移，是由于统治者起了骄心，导致国内政策失调，继而失道寡助，最后导致失败。

1. 兴不忘衰，胜不可骄。管仲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强大到顶峰时便潜伏着衰落的危机。《管子》指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所以，霸、王之国要特别注意防止暴虐、骄傲、奢侈、放纵和懈怠，即“若夫地虽大，而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①

2. 顺乎民意，遵规受礼。《管子》认为，要想维持王权就必须保持争取人心的政策，以保证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而要保持它们的支持，就得有一项长久的正义的事业，光凭武力是无法长期维持王权的。他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②

《管子》要求王权国家通过实行王道来维持其地位。所谓王道，就是王权国家建立的一套合乎道德的礼制。只有各国都遵守礼制，王权秩序才能得以维持。管仲认为，最关键的是王权国家要带头遵守这套国家间的礼制规范，给其他国家作出表率。他说：“王道非废也，而天下莫敢窥者，王者之正也。衡库者，天子之礼也。……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③甚至后来的孔子也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但有例外，即“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可不行也”。④

管仲认为，不仅维持王权需要带头遵守国家间的礼仪规范，维持霸权也离不开

① 《管子·重令第十五》。
② 《管子·五辅第十》。
③ 《管子·七法第六》。
④ 孙钦善译著：《论语注释》，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8页。

带头遵守国家间的礼仪规范。他认为，霸权国家通过律己才能成为他国的表率，才能让其他国家接受本国的盟主地位。例如，据《国语·齐语》记载，在葵丘之会上，周天子派使节慰劳齐桓公，允许桓公在面见使节时"不必下跪"，而这是违反周礼的，意味着齐桓公拥有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管仲劝齐桓公以臣子之礼跪见天子使节，得到诸侯国的一致称赞，从而最终奠定了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

《管子》认为齐桓公鼎盛时期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武事立，文事胜，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①]只有霸权国家带头守礼，其他国家才会自觉跟上。形成一种"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的理想状态。[②]

3. 励精图治，自主自强。《管子》认为，国家兴衰存亡并不在于国家大小，人口多寡，而在于内外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管子》用对比的方法指出："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③]《管子》还发出警告："天下皆治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④] 此三者，亡国之征也。"[⑤]作为国家"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

《管子》认为，如果一国君不明、将不贤、地不耕，该国就不保，即便是人多地广兵强的大国也会衰亡。《管子》指出三满为患，即"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为武满。三满不止，国非其国也"。也就是说，"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⑥]上述"三满"若得不到控制，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国家就安危难保了。《管子》以此来警示

---

① 《管子·小匡第二十》。

② 《管子·幼官第八》。这段话的意思是，君主有所行动，各国无不跟从；君主静守无为，各国无不随同。兴举事业，必据礼数，处事循礼，必有所得。保持和好，互不仇视，贵贱相安，不兴狱讼，这样，意外之事将被阻塞防止。

③ 《管子·法法第十六》。

④ 邻国都团结而唯本国孤立，邻国都有备难攻而本国易攻，国家就难保了。

⑤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⑥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齐国上下励精图治而不懈怠，同时反对只靠武力扩张领土谋霸而丧失民心。

管仲虽辅佐齐桓公建立起齐国的霸主地位，但不主张分别与其他诸侯国结盟。其理由是："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①]这句话是说，先王不受约束、不结盟。受到约束便会分手，结盟则可能断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以友好关系不必靠彼此约束和结盟。管仲还认为，先王不靠财物结交和割地结盟的方式统治天下，而只有顺乎潮流，合乎道义，才能得到天人相助，即"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

三、睦邻、慎战、和谐

管仲认为，国家的存亡兴衰都与邻国有关。《管子》一书中称："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②]这句话是说，讨伐所憎恶的国家而把利益归己，邻国就不会亲近。以实力和权威打击作恶的国家而少取利归己，就会强大。专破一国，使后世强大可称王；专破一国，使邻国强大则会亡。

（一）修近睦邻乐施王道

《管子》提出："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③]这一至理名言堪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睦邻政策思想与安国良方，对今天的当政者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它告诉人们：要使民众喜悦就要乐于施舍；要得民众拥戴就要除去私心；要使远方宾客前来就要修好近邻；要避免灾祸就要消除别人之怨恨；要谋求长治久安就要任用贤才；要安然处于高位就要与民同利。

《管子》还提出："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悦）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④] "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境），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

---

①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②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③ 笔者认为，《管子・版法第七》这段话可视为管仲时期所作。《管子》一书中另外专门有一篇对《版法第七》加以解释引申的文章，即《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这疑似为后人所作。若均系后人所作，恐无须特意分成两篇。

④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

国亲，则举当矣。”[①]他强调：“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②]

由此可见，管仲在本质是反对霸道而主张王道的，制霸的目标是为王。即便国富兵强，获得霸王之本，作为王者对外也要坚持不扩张兼并，不傲慢无理，不结盟，不靠滥用武力，以道义、礼节、体谅相待，远和近亲。把邻国是否亲近作为对外举措是否得当的标准之一。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已成为今天中国周边外交的方针。笔者认为，时至今日，睦邻之道仍如君子之交，要彼此做到“邻厌我避；邻乐我喜；邻困我帮；邻恶我防；邻好我学”。

（二）至善不战有备无患

《管子》主张“慎战”，认为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至善不战”。这是因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③]《管子》指出：“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④]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战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辅佐王业和成就霸业的工具。但当今用兵的人却把工具当作目的，所以不懂得用兵必须权衡得失。于是他们发动战争造成国内贫穷，与敌交战没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士兵阵亡过多，夺得土地国家元气大伤。这样一来，国家就有灭亡之危了。因此，发动战争就得设法避免上述四种不利情况。

《管子》同时强调，国家备战要做到“器成教施”“教器备利”，即做到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其目的在于，一旦战争难以避免时能做到一战必胜。《管子》认为：“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⑤]这些话的意思是：屡战，士卒就会疲惫；屡胜，国君就会骄傲。以骄傲的国君驱使疲惫的士卒作战，国家怎么能不危险？所以最好是不战而

①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②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③ 《管子·法法第十六》。
④ 《管子·兵法第十七》。
⑤ 《管子·兵法第十七》。

胜，其次是一战而胜。攻破大国，战胜劲旅，这是一战而胜的典范。扰乱敌军不靠权变，凌犯敌军不靠诡计，战胜敌军不靠诈谋，这是一战而胜的实力。征服近敌要靠实力，征服远敌要靠号令，力量不可估算，强度不可测出，气概无可限量，德望不可衡量，这是一战而胜的源泉。兵增多时有如时雨，兵减少时有如飘风，这是一战而胜的终极表现。《管子》在主张慎用兵的同时指出，在战争中要做到“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①

《管子》还主张师出要有名，即“兵不义不可”②，“勇而不义伤兵”，“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③《管子》不赞成对有实力、讲道义的国家用兵，即“千乘有道，不可侵也”；但同时认为，对于商纣王那样的昏君，搞得民不聊生，就要“恶得伐”；当诸侯作乱而国家失控时要及时出手相救，否则难以称王，即“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④

管仲认为，霸王之国要讲信义，善待邻国而不宜扩张远征；小国则不宜图谋坐大而徒劳争名。正所谓“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国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犹有争名者，累哉是也”。因此，“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必因天地之道，使其内无使其外，使其小无使其大”。⑤

在政治实践中，管仲力主齐桓公做中原霸主，但并不赞成先强兵动武，而应先考虑民生。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前五年，齐桓公不听管仲劝谏，屡战屡败。管仲则以国为重，反复进谏，阻止战争，并最终说服齐桓公以外交获得各诸侯国的亲近。这并非君臣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两条对外战略之争。齐桓公的战略是通过增强军备，发动战争，征服近邻，争做霸主。管仲的对外战略则是通过优先发展国内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对邻国采取怀柔敦睦的政策，争取各国拥戴，共同抵御周边狄蛮。实践的结果是齐桓公最初刚愎自用，但处处碰壁，只能靠管仲挽救危局，最后只能对管仲言听计从。⑥

（三）御外敌先谋内和

管仲认为，要取得御敌战争之胜利，首先要形成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管子》兵法中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⑦这是中国古典中最早论及“和谐”的一段话，其大意是：用道来促使人

---

①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②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③ 《管子·法法第十六》。
④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⑤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⑥ 相关记载请见《管子·大匡第十八》。
⑦ 《管子·兵法第十七》。

们致富，民就和睦；用德来培养人们心智，民就合作。衣食足而有道德，就能和平合作。和睦合作就能和谐，和谐就能齐心协力。尽力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抵御任何敌人的伤害。

管仲强调，要做到以上要求，国君就要“质信极仁，严以有礼”，因为“信也者，民信之；仁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具体说来，“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①]作为统治者，管仲还告诫齐桓公“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一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因为“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②] 管仲对内强调和谐，对外主张以利惠人、以德和人，形成了当时齐国巨大的软国力，加之齐国国富兵强的硬实力强大，两者循道而用，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四、结语与启迪

从表面上看，《管子》的“霸王学”与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似有相通之处。例如，两者的共同点是：人的本质是重视利益的；都认为利益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必须重视利益；都认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就是谋求、保持、增加、运用或显示权力；都强调拥有和使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建立霸权的重要手段等。

然而，管仲的战略思想和理念，在本质上与当代西方现实主义流派有明显区别。首先，西方权力政治理论中没有王权的概念和王道的思想，只谈到霸权。而《管子》则对霸权与王权作出明确区分。其次，管仲实现霸业王权的途径和方法与其说是接近现实主义，不如说更具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色彩，与中国孙子、孟子、墨子等有关不战非攻的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在春秋初期几乎每年都发生新战争的情况下，管仲却能辅佐齐桓公不用兵车武力而成为诸侯国拥立的盟会之主，与其慎战、睦邻、和谐的指导思想和成功实践密不可分。另外，管仲不仅重视加强农业、军事等硬实力，而且强调发挥德与道义的软实力，并率先遵守国家间关系的规则，不谋一己之私，使各国心悦诚服。《管子》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国21世纪加快和平发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管仲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恃强凌弱，而扶弱济贫等战略文化底蕴。管仲强调，“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③] 大国君主谦

---

① 《管子·小问第五十一》。
② 《管子·小问第五十一》。
③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卑,小国才愿亲近;大国君主处事如公仆,小国才高兴地视其为父母。这样不用武力就能得到天下。实际上这是一条成功的以硬国力为后盾、软国力为先导的外交方略。管仲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没有忘记叮嘱齐桓公将来放弃占领楚国的土地,以免引来祸患。遗憾的是,齐桓公未遵照管仲遗嘱行事,结果引来杀身之祸。

《管子》一书与其说是为普通人而写的,不如说是留给后世当政者的一部执政典籍。“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①]这些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力。《管子》一书留给现代人的重要启迪还包括:举长治乱、和内御外;国富兵强、兴农为本;利民亲民、上下和谐;推崇道义、亲邻睦邻;以人为本,治乱在上;以德和人,一统天下;善于谋略,以备待机;重视守备,防患未然;审时度势,见机而作。这些对当代和未来中国领导人经营内政外交,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① 《管子·版法第七》。

第三章
国际格局演变与可持续安全

第一节　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①]

1989 年至 2009 年被称为“冷战结束后的 20 年”。在这 20 年中，苏联解体，欧盟扩大，日本沉沦，美国危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起，世界格局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化。本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回顾这 20 年内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并从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展望未来国际格局演变前景和中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格局演变及未来大趋势

所谓国际格局，即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结构，主要是指由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组合所构成的国际战略态势。国际格局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若干彼此联系、根据各自规则互动的子系统所组成。如果从地域和影响程度看，国际格局通常可分为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三个层次。从不同领域观察，国际格局可以分为国际政治格局、军事格局、经济格局、贸易格局、金融格局等子系统。美国学者还把国际系统划分为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和国际社会文化系统。[②] 对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子系统做综合分析固然重要，而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影响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增大。因此，大国关系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观察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依据。

---

① 本文发表于《日本学刊》，2010 年第 1 期。

② 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年，第 27 页；方柏华：《国际关系格局——理论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 页。

国际格局除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变性之外，还具有客观性与可塑性。国际力量对比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状况，而国际关系组合则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国对外战略博弈予以塑造的。早在公元前318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便成为各诸侯国塑造外交与军事格局的战略选择。“合纵”即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秦国；“连横”即某几国追随强国秦国攻打兼并弱国或挑战国。[①] 在西方，“对势力均衡系统的理论思考始于16世纪”，“权力均衡是一个国家联盟的保护性手段，其成员渴望维持自己的独立，反对另一个国家谋求建立世界统治，即以前所谓普世君主制的企图”。[②]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体系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莫顿·卡普兰，曾把国际格局描绘成“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牢固的两极系统、全球性国际政治系统、等级国际政治系统、以全面核扩散为标志的单位否决国际政治系统[③]等六种模式，但都难以说明当前的国际格局。

事实上，“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并没有直接演变为多极格局，而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形成“两极多元格局”，自苏联解体后演变为“一极多元格局”并持续至今。最先明确意识到这一世界格局变化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他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说称：“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世界也不再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中心力量将决定世界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前途”。[④] 基于这一判断，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大门。

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极”是指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极”与“极”之间具有鼎立甚至相互对立的性质。有学者把多极格局解释为：“有三个以上的力量中心，存在多个实力大体相当的国家，我们称之扩散了的力量分布。”[⑤]他认为，世界力量分布在一个复杂的“三维国际象棋棋盘”上：顶层是军事格局，美国可维持单极；中间层是经济格局，出现了多极结构，美国与欧洲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底层是政治格局，除了主权国家以外，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也具有政治发言权，力量分布更为复杂。现在的世界体系是由这三个层次各不相同的力量中心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单纯考察哪一个方面来论述国际格局都是错误的。

1990年邓小平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

---

① 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③ 参见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125页。

④ 方柏华：《国际关系格局——理论与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⑤ ジヨゼフ·S·ナイ·ジユニア『国際紛争 理論と歴史[原書第6版]』、有斐閣、2007年、49頁。

怎么样也算一极。”[①]“极”主要是就人口、面积、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而言的。但是，近 20 年来世界军事力量发展失衡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当前的国际格局具有较大的复杂性与流动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军事领域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拥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多极化既不现实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二是在经济、贸易。金融、环境领域，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各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全面对抗性，彼此竞争也非绝对的“零和”游戏。三是一些中小国家虽然永远难成“一极”，但通过多边协调与地区合作仍可以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构成相对独立的“一元”。另外，在全球化、信息化社会，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影响在增大，从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对国际格局中“极”与“元”的概念做出界定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未来有可能出现“多元共存的后霸权体系”。

在国际格局中，综合国力要素的多样性不容忽视，既包括经济、军事等在内的硬实力，又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软实力。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笔者也提出了“软国力”概念。“软国力”主要包括四种无形的国家能力：国家及时获取准确信息的情报能力、正确决策能力、对内掌控能力与对外影响能力。如今，这四种能力也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系统整合能力与国际环境塑造能力。综合国力竞争包括“硬国力”和“软国力”的竞争，将在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展开。“软国力”以“硬国力”为物质基础，但有时其能量则远超出“硬国力”，两者未必成比例。大国强国会因“软国力”的“短板”而自毁。弱国小国利用大国矛盾“四两拨千斤”，改善国际格局，靠的就是“软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明君贤相、今天的智囊库都是“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软实力则是产生这种“软国力”的精神与智慧土壤。

笔者认为，鉴于国际格局的复杂性，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全球与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共性与个性，从“极”与“元”的复合视角审视各大领域国际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的变化。如图 3-1 所示，上面三环相连表示从世界、地区及大国关系角度对国际格局所做的观察，下面三环相连则是从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对国际格局所做的描述。

世界格局总体上是“一极多元”格局，即美国唯一超级大国与多元化的国际力量并存的结构。美国即便爆发了金融危机，其在军事、金融领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美国“一极”有明显弱化，“多元”力量加速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5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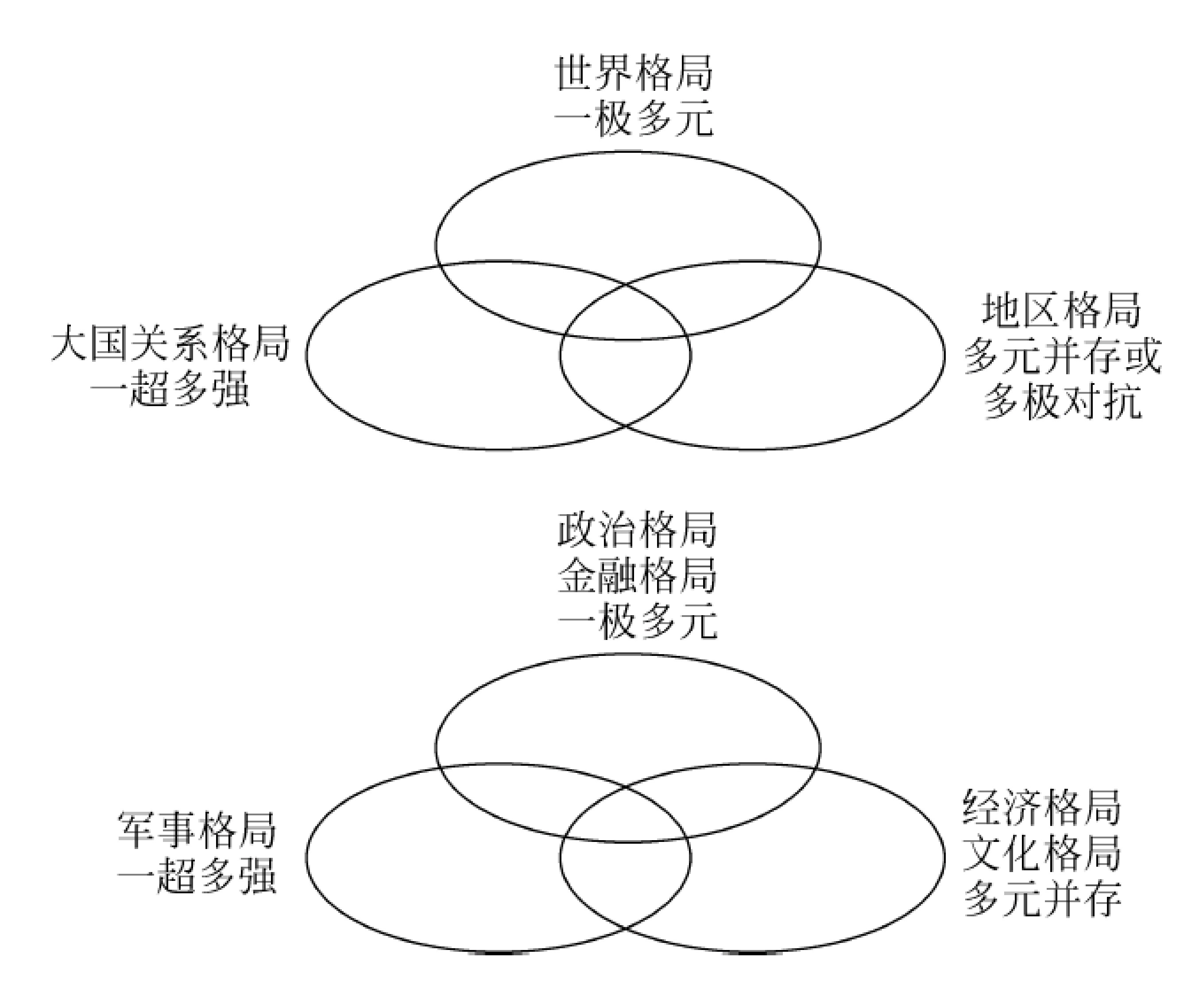


图 3-1 从范围和领域两个视角观察复杂的国际格局

展，其中包括全球或地区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生成，最典型的是二十国集团(G20)[①]、"金砖四国"[②]的兴起，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已呈现"多元共存"局面。

大国关系格局"一超多强"态势尚无根本改变，但未来10～20年可能被打破。目前，美国综合国力仍保持"一超"地位，但在经济、金融等领域"一超"的影响明显下降，"多强"则发展不平衡。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美国难免继续衰落，而邦联化欧盟的实力与影响则可能逐步超过美国。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将逐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影响力也将随之增大。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经济增长减速。如果美国按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无核世界"主张大量削减核武器和军费开支，未来世界就可能进入"无超世界"。面对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气候变暖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对抗相对减弱，而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在上升。与此同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则反映出"多强"与"一超"之间以及"多强"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利益之争和规则之争尚难调和。

地区格局出现了一体化与分散化的不同趋势。一是在欧洲、东亚等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不断加强，多元并存格局将走向"多元一体"。例如，《里斯本条约》后开始走向邦联的欧盟，以及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二是在欧亚大陆接合部、东

① 二十国集团(G20)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和澳大利亚、南非、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和土耳其。

② "金砖四国"指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2008年"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的12.8%。

北亚等地笼罩着核扩散的阴影，冷战时期遗留的地缘战略矛盾依然存在。如果一些国家的外部威胁得不到缓解，那么中小国家"拥核自保"或"先军政治"的国家发展模式就难以得到改变，从而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核扩散等国际军事领域的多极化。三是在中东、南亚等地，原有民族、宗教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恐怖袭击不断，呈现出复杂的局部地区多极对抗局面。国际原油、金融市场也会随之剧烈动荡。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作为"隐形"的一极，将与美国一极长期对抗。

二、国际格局演变与战争和平的关系

（一）过去十年大国力量对比最大变化是"美降中升"，但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美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和综合意义上的"一极"，但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美国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3年约占35%的峰值回落到目前的24%左右。与美国衰落恰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兴起。1978—2008年，中国GDP总额从2282亿美元升至4.49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十位升至第三位。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以上，预计不久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面对有人提出的所谓"中美G2"共治，中国领导人并不赞成。"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同时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①

从综合国力看，中国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军费约占世界军费总额的42%，2010年度达6363亿美元，在中国国防费10倍以上。2008年，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7.23%和23.44%，美国经济规模约是中国的3倍。同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仅居世界第98位。中美两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7%和13.9%。美元作为基础货币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的64.6%。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截至2009年9月高达2.27万亿美元，但黄金储量为1054吨，居世界第五位，在本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只占1.9%，低于日本的2.3%，更低于德国的69.2%、法国的70.6%和美国的77.4%。② 在国际货

① 《温家宝说：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8/content_12485552.htm。

② 『日本經濟新聞』2009年11月26日。

币基金组织(IMF)的表决权中,中国的份额也只有3.72%,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份额则分别拥有16.77%、6.02%、5.88%、4.86%。这种局面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很不相称。

与此同时,由于中美经贸、金融相互依存关系的结构与日美关系相似,中美两国虽然未必会"一荣俱荣",却会"一损俱损"。2005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目前,国际社会迎来了自17世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最好的机遇,让我们建立一个大国间和平竞争而不必持续备战的世界。"尽管美国警惕大国的崛起,但"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关系的发展将带来更大希望"。①

(二)"单极格局"并不稳定,国际格局严重失衡容易引发战争,军事领域多极化不可取

由于各国的战略利益与战略认知不同,国际上对于究竟怎样的国际格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的看法不一。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并在外交上积极推进多极化。它们认为,多极化是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美国国内的看法则不尽相同。"冷战"后,"单极稳定论"一时盛行。例如,1990年美国保守派学者查尔斯·克劳特哈默撰文称,"冷战"后世界不是多极的,而是美国独占鳌头的"单极世界"。因为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力量,在世界任何冲突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② 1997年,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称:"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③1999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威廉·沃尔弗斯提出"单极稳定论",宣扬冷战后出现"美国主宰和平的时代",美国强大到不能被抗拒的"单极格局"将是和平、持久和稳定的。④ 2003年,美国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公开反对多极化,指责多极世界是"阻止战争必需的恶魔,但它不能促进和平"。"多极世界是一种竞争的理论","我们以前尝试过创建'多极世界',但它却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多极化是"不道德的",应"放弃对众多新'极'的追求"。⑤

---

① 参见杨晖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2003—2005年)》,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年,第446页。

②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1991, Vol. 70, No. 1.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④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9, Vol. 24, No. 1.

⑤ http://www.macrochina.com.cn/fzzl/zlsl/20050418071267.shtml/。

然而，事实则与美国"单极稳定论"完全相反。"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次高科技局部战争，都与多极化暂时受挫、美国"一极"独大有关。第一次是1990年美国动员多国部队发动的海湾战争；第二次是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第三次是2001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第四次是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些都是在局部地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美国获得了战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爆发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小泉内阁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加剧了局部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与此相反，在国际力量对比尚未严重失衡的地区，美国则难以发动战争。例如，小泉内阁在伊朗、朝鲜问题上并未支持美国采取"外科手术"等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客观上有利于促成伊朗核问题六国会谈和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

（三）当今时代多极化总体有利于世界和平，但中国需防止国际格局剧变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

针对所谓"多极时代不稳定"的提法，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田中明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世界曾因多极力量之间的对立而分裂为两个阵营，并最终爆发了大战，但21世纪则很难想象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国际体系中其他因素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一是20世纪后半期，核武器等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大国之间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已无意义；其二是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其三是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假说；其四是国际恐怖主义、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威胁上升，迫使主权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因此，21世纪的多极格局有可能形成"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体制"。[①]

总体来看，田中明彦的观点较接近于21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有关"民主国家和平论"的解释比较牵强。因为那些受到军事威胁的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完全不同。"二战"结束后迄今，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与解放，对推动世界多极化、防止大战爆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情形加以比较。当时世界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必然通过战争掠夺殖民地土地、资源和市场。因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法西斯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协调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基调，世界并不存在导致大战的可能。其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殖民地体系早已瓦解，后起大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当今时代的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

---

① 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9年、98—106頁。

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上一股重要的和平力量。伴随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在应对金融、经济危机方面，世界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可以协调合作，因此，通过战争摆脱或转嫁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就不存在了。[①]

但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面临以下战略风险：首先，中国势必被一些美国人视为其霸主地位最有力的“挑战者”，从而增大了中国发展壮大的战略阻力。失败的国家模式也可能向其他国家转嫁国内危机，引发强烈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中国的出口产业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压。伴随中国美元资产的上升和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国际风云变幻给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带来的风险也将上升。另外，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局部地区的动荡、冲突和突发事件随时可能爆发。面对迅速兴起的中国，美国必然希望中国更多地像日本那样分担美国的国际责任，分担国际风险。例如，在阿富汗等问题上，美国希望中日两国提供支援等。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苏联与日本都是在 GDP 接近美国 65%左右的情况下，沦为失败的挑战者。鉴于此，中国在未来 30 年必须格外谨慎，既要坚决捍卫本国核心利益，也要尽量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既要避免造成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锋芒毕露的印象，又要防止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被“忽悠”进无形的战略陷阱；既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又要防止狭隘过激的民族主义抬头。

三、日本国家模式转型与国际格局转型

大国兴衰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根本原因何在？苏联和日本为何沦为失败的挑战者？关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 1970 年到 2008 年，美国、日本、中国、苏联（俄罗斯）四大国中 GDP 升幅最大的是中国，起伏最大的是苏联（俄罗斯），走下坡路的是日本，维系领先地位的是美国。[②] 如何分析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国家模式转型与大国兴衰关系密切

纵观 1840 年以来中国、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四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也许不难发现，在社会形态、自然条件、民族构成等诸多要素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综合国力消长、国家兴衰这一因变量，主要受到自变量——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的影响。国家发展模式，简称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范畴。国家模式作为独立的系统，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国家政体、经济体

---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9/27/content_10122441.htm。

② 根据联合国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9 年 10 月公布数据整理，http://baike.baidu.com/view/97.htm。

制、发展模式、对外战略、文化模式。

国家模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简称社会形态,例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同一概念,而是相互关联的交叉概念。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模式;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相同或近似的国家模式;同一个国家在社会形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采取不同的国家模式。

1840 年迄今,中、日、美、苏(俄)四大国的兴衰都与国家模式发展变化有关。在不同历史时期,四大国在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中都出现过一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呈现出国力上升与下降的曲线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国在社会形态并未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形态则给同一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二)日本目前正经历明治维新以来的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

以下以日本为例,对其国家模式的发展进行分析。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来的 140 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模式转型。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伴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久便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的国家模式,但最终惨遭失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始于战后,日本采取了"对美一边倒"的"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和平发展使日本于 1968 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第三次国家模式转型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称为"第三次远航",日本开始采取仰仗美国的"政治大国"发展模式。然而,这次国家模式转型终因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行"右倾"化的大国路线而告失败,同时也为自民党再次下野埋下了伏笔。第四次日本国家模式转型从 2009 年民主党执政开始,鸠山由纪夫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要进行一场"不流血的平成维新"①。

1993 年日本自民党第一次下野时的政局巨变是一场"平成保守维新",是日本保守势力谋求政治改良过程的一个开端。日本的平成年号是从 1989 年明仁天皇继位时算起的。这次巨变只是日本新老保守势力的政权轮替,故也可以称为"平成保守维新"。时任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的榊原英资也曾痛批时弊,强调实行"平成维新"的日本型改革。其核心观点是:(1)日本在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美国化"过程中,产生了"系统腐败与制度疲劳",要彻底改革;(2)不能实行"美国型自由竞争意识形态的改革方案",因为那不会成功;(3)"'平成维新'并不只是政治、行政改革,还要迫使日本人的意识结构、价值观、世界观变革,将所有这些都统一为一个概念——'确立生活者主权'",即建立民生优先价值体系。②

---

① 『朝日新聞』2009 年 10 月 27 日。

② 榊原英資『文明としての日本型資本主義——「富」と「權力」の構図』、東洋經濟新報社,1993 年。

其后，自民党于1995年联合社民党再度执政。日本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日本背离了“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对日战略关系密切相关，但主要取决于日本国内决策。日本能否摆脱危机，为21世纪开辟一条新路，关键要看日本政府能否重新调整国家发展模式，优先恢复、发展经济。

（三）日本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的初始特点

国际格局和国际潮流的变化，是日本政局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国内政局和政治思潮的变化，在受到国际格局变化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日本对外关系，也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近20年来国际格局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而恰巧日本国内也几乎同时发生了两次自民党政府倒台的政权更迭。第一次，正如1993年首次取代自民党执政的八党派联合政府首相细川护熙所说：“以美苏两大国为两极的东西方对立的时代业已结束，国际社会正在摸索取代原有体系的国际新秩序。”[①]第二次，正如取代自民党执政的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首相所指出的，伊拉克战争失败和美国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单极独霸时代告终”，“世界正由单极走向多极化”。[②] 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民主党执政后开始摸索日本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其基本方针是：争取在对美国和亚洲保持平衡中采取“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

鸠山的执政理念与变革思想是“脱美入欧”。他尤其推崇“友爱”，即博爱政治哲学，并称它是“辨别政治方向的指南、决定政策的标准，是支撑我们所面向的‘自立与共生时代’的精神支柱。”[③]他表示，日本要“建设一个共存的友爱社会”，在国际上要排除极端民族主义，开展“友爱”外交。[④] 这与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比较契合。在经济体制方面，鸠山内阁彻底否定了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重视就业以及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发展模式方面，鸠山内阁把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内需，减少政府财政开支浪费，发展低碳经济。在政治体制方面，日本发生了两大保守势力的政权轮替。作为保守势力温和派的民主党政府，主张打破原有“政、官、财”铁三角和“官僚统

① 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② 鸠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③ 鸠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据鸠山由纪夫称，“友爱”一词，最早是其祖父鸠山一郎翻译欧洲一体化启蒙思想家、奥地利人库典赫夫·克里尔格的著作《与集权国家对抗的人》时，把“博爱”翻译为“友爱”的。鸠山一郎深受克里尔格思想影响，主张排除左右两翼极端思想，建立开明的民主社会和独立自主的文化国家。

④ 鸠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治”，还政于民，强化国会中执政党的决策权。在对外战略方面，鸠山内阁谋求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和东亚共同体。鸠山倡导“友爱外交”，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这是对前首相麻生太郎提倡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的彻底否定。在安全保障方面，由于目前美国仍然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在军事上保持绝对优势，因此日本民主党政府仍将维系日美同盟，并把它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与此同时，鸠山内阁又推迟修订防卫大纲，反对向海外派兵支援美军作战，不赞成日本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

日本未来理想的发展是成为非军事“国际贡献国家”，这不仅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本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转型不会一帆风顺，也难以十分彻底，并伴随政权更迭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夭折或转向。例如，未来日本经济恢复、驻日美军基地部分撤离后，日本是否有人会主张重新制定宪法，增强独立的防卫力量等，仍值得关注。

四、未来的国际格局与中美日关系

（一）日本国家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美国因素与日美关系

迄今，日本国家模式的四次转型都与日美关系直接相关。明治维新与1853年美国佩里率领的“黑船”迫使日本政府开放国门有关；1945年战败后，日本在美军单独占领下实现了民主化改革，制定了和平宪法，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敦促与支持下分担防务责任，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争取成为政治大国；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也有关联。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利用某些日本政客的虚荣心，以日本感觉“舒服”的方式诱导日本战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以削弱日本在经贸领域对美国构成的强有力竞争与挑战，更多地把日本的能量吸引到美国全球战略最需要的方向。日本一些政客也有意利用来自美国的“外压”改变战后国家发展模式，不断突破禁区。在美国要求下，日本负担了驻日美军3/4的费用，海湾战争时提供总计130亿美元的支援，向印度洋派遣自卫舰队只为美国等多国部队供油，日本陆上自卫队战后首次打着日本国旗进驻伊拉克。

为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美国在促使日本购买美元国债使资金回流美国的同时，与欧洲联手强迫日元升值。1985年西方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了促使日元升值的所谓“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4年的238∶1升至1988年的128∶1。结果，按日元计算的日本对美出口从1978年至1984年增长了98.6%，而1984年至1991年则只增长了0.5%。这期间，日本对美出口占日本出

口中的比重从37.6%降至31.7%。[①] 日本只好依靠向海外投资，攻占当地市场或转而出口到美欧市场。大批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形成“曲线”对美出口，从而又开始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继续演绎着日美经济竞争。伊拉克战争引发的高油价和美国金融危机，则导致“日本出口立国模式崩溃”[②]。

正因如此，鸠山由纪夫当选首相前曾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所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目前，‘友爱’是纠正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对在传统中培育出来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理念。它意味着我们要向保护国民生活与安全免受市场至上主义伤害的方向转变政策，建设共生的经济社会。”[③]

（二）中美日三国力量对比与相互依存关系的未来

2009年末，日本政府提出未来10年经济增长战略基本方针：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2%～3%，到2020年日本GDP总额将达650万亿日元，若按90日元兑换1美元，将为7.2万亿美元。[④] 若中国未来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按目前汇率计算，2020年中国GDP将达10.2亿美元，2038年中国将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GDP有可能达到日本的4倍以上。当然，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仍处在世界较低的水平。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从227美元升至3266.8美元，居世界第98位。据测算，2038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3万美元，接近日本目前水平。

日本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一极，在国际政治中谋求发挥更大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日本不会完全摆脱美国搞核武装或成为军事大国。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基本点是与美国为伍，通过与美、澳、印的“连横”，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建立美日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这在客观上是美日捆绑在一起的“1.5”极化，而非真正的多极化。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企图扭转日本外交倾向，谋求与美国对等的同盟关系，但遇到了巨大阻力。2009年12月鸠山首相会见到访的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表示：“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也要加强安全保障以外的关系，但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有良好的日美关系，日中才能保持良好关系。”[⑤]

从中长期看，美日两国都将更加重视同中国增进关系，中美日关系有可能在新

① 内閣府政策統括官室(經濟財政分析担当)『世界經濟の潮流2007年秋』、2007年12月、187頁。
② 野口悠紀雄『世界經濟危機　日本の罪と罰』、グイヤモンド社、2009年、20頁。
③ 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④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091230/plc0912301656010-n1.htm。
⑤ 『読売新聞』2009年12月15日。

的基础上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取得更大发展。2009 年 10 月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CFR)的调查显示：认为未来中国重要的会员占 58%，比 2005 年上升了 27%；认为日本重要的占 16%，比 2005 年减少了一半。[①] 几乎同时发表的中国《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受访者认为，在经济方面今后对日本重要的国家是中国的占 46%，认为是美国的占 28%；中国受访者认为未来美国重要的占 52%，认为日本重要的仅占 6%。[②] 这些民意调查结果，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格局的快速变化。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出口额不久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美国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对象国。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也会受到美日高度重视。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在国际贸易领域“脱美入中”迈出三大步：第一步，2002 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进口最多的国家。2009 年上半年在日本进口中，中国占 22.3%，美国占 11.3%。第二步，2006 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外贸对象国。2009 年上半年在日本外贸总额中，中国占 20.4%，美国占 13.7%。第三步，2009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市场。在日本同期外贸出口中，中国占 18.5%，美国占 16.1%。鸠山首相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实质是要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为日本谋发展。

（三）中美日三边关系相对平衡发展需要彼此尊重核心利益

日本有人主张建立“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这主要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而言的。鸠山内阁在外交上主张美中并重，在美中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日本尚不会改变结盟的对外战略模式，在军事和安全方面难以形成“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未来，相对良好而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地区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今后，中美日关系要形成非对抗性的相对均衡三角格局，首先需要彼此了解和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西藏和新疆等涉及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克服金融危机、经济困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日本的核心利益包括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迄今，美日两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制造麻烦，挑起事端；而中国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基本采取合作态度，与日本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区域经济、金融、环境合作方面有较多共同利益。中日之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务实合作找到解决的办法。由此看来，中美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能否受到美

① http://www.nikkei.co.jp/senkyo/2009shuin/elecnews/20091206AS3S0600U06122009.html。

② 『読売新聞』2009 年 12 月 8 日。

日两国的尊重。如表 3-1 所示，日本国家模式对中日关系会产生直接影响，今后只要日本和平发展、优先民生，中日就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表 3-1　国际格局、国家模式与中日关系

	1868—1945	1945—1983	1983—2009	2009—
国际格局	帝国列强多极 军事争霸	美苏两极“冷战” 对战争霸	“冷战”结束 一极多元	格局转换 多元并存?
日本国家发展模式	军国主义 武力扩张	依靠美国优先 发展经济	靠美谋求 政治大国	美亚平衡 民生优先?
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 侵略战争	从“冷战”到 邦交正常化	在矛盾中 谋求发展	在合作中 谋求发展?

（四）未来国际格局的理想目标模式：多元一体

国家模式竞争与国际格局演变会形成某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如图 3-2 所示，未来 30 年，作为国际格局的一种理想模式，有可能从目前的“一极多元”“一超多强”结构演变为多元并存，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新格局。这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只有在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相互依存，各大洲实现经济一体化并保持彼此相对开放的条件下才可能形成。推动这一进程的逻辑起点即自变量，正是多种国家模式的竞争。它首先可能引起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并最终导致国际格局转型。国际格局大变动又会反作用于某些国家模式的转型，而大国国家模式转型的方向又可能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的性质产生新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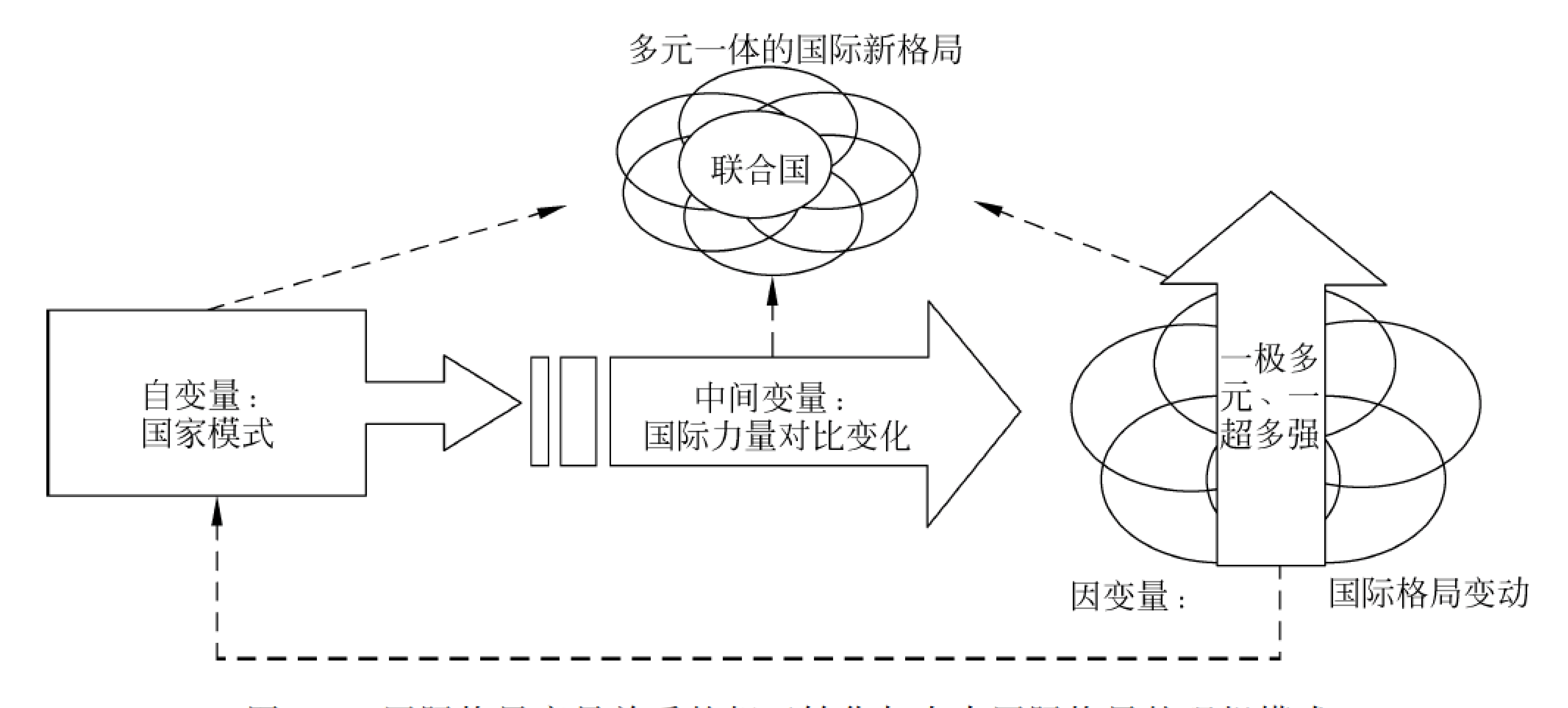


图 3-2　国际格局变量关系的相互转化与未来国际格局的理想模式

上述国际格局的远景并非空想。正如温家宝所说：“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

互影响中多元共存。”[①]在多元共存的国际格局下，各种力量和平共处，各种文明彼此尊重。它与历史上的多极格局不同，是建立在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弱肉强食、后起的强国为谋求重新分割世界、为进行国际政治权利再分配而相互对抗或军备竞赛的历史重演。多元一体是在多元共存国际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以联合国为主体、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彼此合作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国可以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出发，与包括美日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争取实现多元共存的国际格局，一起迈向多元一体的全球体系。因此，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如何构建更为理想的国家发展模式、地区合作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是所有负责任大国领导人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作为世界前三强，中美日关系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走向的关键因素。

① 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2009 年 2 月 2 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

第二节　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周边安全[①]

所谓国际格局，即由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组合所构成的国际战略态势和国际关系结构。研究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战略研究，是判断国际形势不可缺少的重要视角。本文拟从实现可持续安全战略目标的角度，探讨如何认识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一、有关国际格局的不同看法

由于立场、视角和使用的概念不同，研究者不仅对于国际格局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看法与表述不同，而且对塑造怎样的国际格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美国倾向于认为，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和美国主宰下的和平比多极世界稳定，世界多极化可能会削弱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然而，中国、俄罗斯等国则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认为世界多极化是必然趋势，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则不利于世界的稳定。这一经常遇到而又得不到深入的学术探讨与沟通的重要问题，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想隔阂与障碍。

在中国官方文件对于国际形势的描述中，"世界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固定的说法。然而，对于不同时期"多极化"具体内涵和特点的分析则相对少见。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部分国际关系学者曾经针对苏联一极的衰落和美国"一极独大"的局面提出，世界格局出现"一超多强"。不过，这一说法从来没有被中国政府有关国际形势论述的正式文件所采纳。另外，从实际情况看，"一超多强"只反映出一个时期大国或世界主要强国之间力量对比的状态，并不能扩大为解释世界格局。因为当今世界除了大国、强国以外，还有许多中小国家和弱国、穷国，"一超多强"显然难以概括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世界。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看，中小国家联合自强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国外交也历来反对少数大国、强国主宰世界。但是，从学术逻辑严谨性角度探讨，假设世界多极化意味着可能出现一些非核国家谋求成为核国家，国际军事领域的这种多极化是否会更不安全？一些地区的宗教、民族冲突导致多极对抗是否会威胁世界和平？那么对于中国、美国乃至世界来说，有利于可持续安全的国际格局的理想模式

①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6 期。

究竟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关于“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是否形成，中国学界看法不一、莫衷一是，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从本质上去总结、描述国际格局的最新变化。这是由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与研究领域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根本变化，如果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美国的兴衰作为观察国际格局的主要坐标，自然会认为国际战略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接下来的逻辑就必然是：既然美国的“一超”地位未变，多极世界的国际新格局就没有形成，所以世界格局还处在向多极化过渡的时期。

然而，如果说“冷战”后二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新格局却一直没有形成，这似乎又难以成立。之所以产生这种观察国际格局方面的认知困境，主要是有意无意之中总是围绕美国来看国际格局。美国的确很重要，研究者需要客观地看待美国的兴衰与调整恢复能力，更需要扩展视角，看看这个世界在美国之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出当今国际格局中真正的变与不变。

从系统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国际关系体系是由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构成的一个整体。从系统结构的角度看，国际格局通常可分为经济、政治、军事格局三大领域以及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三个层次。其中，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的影响最大，具有全局意义。因此，也可以把大国关系格局视为国际战略格局。国际格局虽然可以塑造，但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及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相互交织、影响的复杂性。21 世纪初，世界多极化格局呈现以下复合型结构的特点。

从世界格局总体看，“一极多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军事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及亚太双边军事同盟在加强；在金融领域，美元仍可维持基础货币地位。但是，美国这“一极”在弱化，“多元”力量在发展，其中包括地区组织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

从大国关系格局看，“一超多强”、在竞争中求合作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综合国力最强，仍保持“一超”地位，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明显削弱；金砖国家等“多强”则进一步走强，并开始打破过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务的主导。

从地区格局看，出现了不同趋势：欧洲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难，但欧盟不会解体。日本与邻国政治关系恶化不利于中日韩自贸区形成，但东亚多元并存的区域合作进程不会中止。在欧亚大陆结合部、东北亚等地区，“冷战”时期遗留的地缘战略矛盾依然存在，不时出现紧张局势与核扩散危机。在中东、南亚等地区，原有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化，呈现局部“地区性多极对抗”局面。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确保可持续安全，

有必要深入研究。

二、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再认识

研究国际战略格局变化规律，是国家战略分析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它需要受到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历史启迪，并以系统和辩证的逻辑分析作为支撑。

（一）对国际格局演变性质的判断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关于世界多极化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离开了对时代背景及其变化的了解，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因为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时代，无论世界格局是两极还是多极，都是不稳定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列宁曾做过系统而准确的论述。列宁指出，这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一，世界已经被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①]

然而，在“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的非殖民主义时代，不存在后起的列强为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对宗主国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因而世界多极化在总体上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与发展。既然战后的德国、日本都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当然也可以，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应该有疑问的。但是，有些人对未来的中国似乎充满担忧，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时代背景的巨大变化，不真正了解中国对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自身悲惨经历的感受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取向。

站在美国的立场，如果无视当今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先入为主地把和平发展的中国视为“二战”时的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就会犯严重的时代误判错误。而正确认识时代背景的变化，就不难理解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为什么能够群体和平崛起。同样，中国也应该看到，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因而超越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符合时代潮流与中国国家利益。但是，殖民主义时代给国家之间遗留下来的领土争议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并可能引发新的争端；少数在殖民主义时期战争中没有尝到战败之苦的国家，仍然本能地希望利用武力与强权建立或维系本国的霸权地位。

纵观历史，从 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格局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

①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810 页。

第一个阶段：1904年至1945年的多极对抗格局与两次世界大战。这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世界殖民体系被英、法、俄、美等老牌帝国主义瓜分完毕后，德、日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并引发俄国十月革命。

第二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以美苏冷战为主要标志的两极对抗格局。“二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时代进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的时期。美国与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它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战略方面彼此对抗，但对外战略模式却有相似之处，世界范围内出现一系列美苏代理人战争和国际危机。

第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多极化趋势与两极多元格局。伴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世界殖民地体系彻底瓦解。与此同时，西欧与日本和平崛起，中国成功地走自己的道路，各种地区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兴起，世界各种力量在相互依存中出现多元化发展，彻底冲破了美苏两极体系的束缚。

第四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一极多元格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出现对美国有利的倾斜。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多元力量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冷战”后局部地区和一些国家内的冲突、对抗、内乱、热战却不断发生。

第五个阶段：21世纪出现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的局面。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是指国家之间力量对比消长与国际关系组合所形成的国际关系结构与战略态势，而非传统国际格局则是某些国家及国家集团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对抗所形成的国际现象。遍布全球的“基地”组织网络正在形成“隐形的一极”，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这种“隐形的一极”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信息传递方式的便捷化、跨国化在客观上为国际恐怖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引起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往往是“世界老二”的易位

战后以来的国际格局演变进程表明，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变化，不如说是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①] 因为美国地位的变化是相对的，而“世界老二”地位的变化是绝对的。

“二战”后，导致国际格局第一次重大变化的是战后第一个“世界老二”苏联的

① 刘江永：《中国未来的主要战略风险与规避之策》，载《学术前沿》，2012年8月下，第6页。

“和平解体”。“冷战”时期,从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全面抗衡的世界老二是苏联。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和势力范围,建立了仅次于美国的核武库,国际战略格局形成美苏两极体制。伴随20世纪70年代世界多种经济力量中心的出现,美苏两极开始瓦解,世界出现“两极多元”结构。世界经济上出现美欧日三极主导,国际政治领域中中国成为重要的力量中心。然而,引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最大变化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日本取代苏联成为世界老二,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国际格局变为“一极多元”结构。

引起国际格局第二次重大变化的是战后第二个“世界老二”日本“和平衰落”,中国取而代之。中国必然受到更多的关注、期待、猜疑甚至误解。尽管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外交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自我宣称与美国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但它并没有摆脱作为世界老二而受到来自美国的打压的命运。美国曾经一度在内部把日本视为“冷战”后最大的经济威胁,压制日元升值,在贸易摩擦方面敲打日本,诱导日本国家模式、企业模式转型,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道路。结果,1994年经济规模已达美国80%以上的日本,现在却不到美国的40%。

自2010年以来,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转折性变化。2010年,按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战后以来第三个“世界老二”。据统计,2010年中国GDP升至58786亿美元,超过同年日本GDP总额的54742亿美元,[①]大体相当于同年美国GDP总量的40%;2012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日本的1.4倍,但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日本的约1/10,排在世界第76位。尽管如此,中日两国力量对比以2010年为拐点,开始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中日两国GDP之比:2010年为5.9∶5.4,2012年为8.3∶5.9。2013年由于日元大幅贬值,中日GDP总量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照此发展下去,未来三至五年内,中国经济总量将是日本的一倍。

在国际贸易方面,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1年日本的进出口分别占世界贸易的4.6%和4.5%,居世界第四位;中国则占9.5%和10.4%,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在军事防务方面,据各国公布的国防费开支,日本防卫费居世界第六位,中国国防费居第二位。从总量上看,中国似乎已开始具备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实力。但是,中国经济的质量、科技水平还有待提高,人均GDP还较低,中国国内外还面临许多挑战与困难。因此,未来30年,中国可持续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或许还不是争当世界老大,而是如何不成为战后以来第三个失败的世界老二。

① 《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新网,2011年2月14日,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1-02-14/100225474.html;《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21%》,《中国日报》网,2013年3月2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gjcj/2013-03-27/content_8611097.html。

（三）改变未来国际格局的真正力量是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

“二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彻底改变了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格局。21世纪真正改变国际旧格局的重要力量，有可能不再是世界老二的兴衰与易位，而是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其典型代表是金砖国家（BRICs）。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经济一片萧条，而金砖四国（BRICs）经济增长强劲。为应对金融危机，2009年6月16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正式会晤。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四国首脑峰会。金砖五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国土总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27%。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超过10亿，巴西和俄罗斯也都超过1亿，五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43%。2012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21%，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5%，全球外汇储备的75%。[①]

伴随金砖国家的兴起，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相对下滑。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为31.8%，2011年降至21.6%。[②]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美国在全球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12.3%降至2011年的8.1%，进口额比重也从19.2%降至12.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未来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金砖国家GDP总额2013年将超过美国，2016年占全球GDP比重将达到23.7%。[④] 中国在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特点是，新兴国家并不是以军事对抗的方式而是以和平合作为主的方式与传统大国打交道。新兴大国的群体和平崛起是21世纪初最突出、最耀眼的国际新事物。它有可能使国际格局朝着多元并存、多元一体的方向前进，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关于这一点，二十国集团（G20）的出现或许可以证明。

G20最初是1999年建立的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金融峰会于同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G20峰会机制由此应运而生，此后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会议。美国认为，G20的兴起，彰显了在当前全球秩序中，传统主要经济体与新兴“影响力中心”之间

---

① 《金砖国家加速崛起助力全球经济复苏》，载《金融时报》，2011年4月13日。

② 转引自《美国经济衰落的40个惊人事实》，中财网，2013年5月28日，http://www.cfi.net.cn/p20130528001937.html。

③ 《金砖国家加速崛起助力全球经济复苏》，载《金融时报》，2011年4月13日。

④ 转引自吉佩定：《金砖国家推动世界格局重塑》，载《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4月22日，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26856。

的关系正向更加合作的方向转变。根据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谓新兴“影响力中心”，即新兴大国“凭借不断增长的经济与稳定的政治，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全球与地区影响力，并正在改变着国际合作的局面。为实现一个公正、稳定的秩序，保护共同安全与繁荣，我们正不断加深与新兴力量的伙伴关系，鼓励它们在强化国际准则、发展共同利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①]

G20的GDP总量约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超过了八国峰会的作用。这改变了自1976年以来国际经济、政治议事主要由七八个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G20峰会机制的形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上升，国际协调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导面。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时代大背景中得到启示。当今时代已不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不存在争夺殖民地而引发大战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空前加深；不存在排他性贸易集团和侵略性军事集团；核武器对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遏制作用；信息化的发展减少了国家因信息沟通不足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安全机制相对健全；战争对各国安全利益都会造成损害，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流。

（四）中美俄日四大国关系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格局性变化

在亚太地区形势影响最大的是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的关系。战后以来，这四大国关系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格局性变化，主要表现在四国之间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性质的变化方面。总体而言，中美俄（苏）日四大国关系所构成的战略格局曾发生以下主要变化：

20世纪50～60年代，中苏同盟对抗美日同盟；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分裂并继续与美日抗衡；1964—1973年，抗美援越战争；20世纪70～80年代，中美日关系改善，同时抗苏；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20世纪80～90年代，中美日保持相对友好，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但不结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美日与俄关系改善，日美贸易摩擦、中美政治摩擦、中日矛盾上升，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1世纪头十年，美日同中国相互依存加深的同时，同中俄矛盾增多，中俄关系增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日矛盾突出，中俄合作加强，美国与日本保持同盟的同时，避免同中俄形成全面战略对抗。

上述四大国关系的变化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第一，这四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成功的国家模式和国家道路会使国家的生产力

---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失败的国家模式和国家道路会导致国家由兴转衰。[①] 第二，外交战略模式的稳定性决定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性。所谓外交战略模式，即指对外战略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在上述四大国关系中，美日关系是最为稳定的，战后以来其结盟模式迄今未变是重要因素和标志之一。第三，国际战略格局变化与各大国外交战略调整直接相关，而相关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有可能给国家内外政策带来变化的契机。因为国际矛盾变化和各国决策层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会有不同。除日本以外，中、美、俄三国领导人换届大都在8～10年左右。这与四大国关系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调整变化似有较强的关联性。

2013年，中、美、俄、日四国领导人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结束，预示着在未来十年内将产生新一轮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美国重返亚太必然对此产生重要影响，但相比之下，日本的动向更引人注目。因为事实上，中日关系正成为四大国关系中对立最为严重、矛盾最为突出的情况，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第一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开始明显调整。这主要表现在2010年12月日本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它具有国家对外战略性质，把中国定位为主要防御对象，日本未来防卫力量的重心将转向西南诸岛，明显针对钓鱼岛。日本对华战略的基调发生改变，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以警惕和防范为主。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在对华政策上的必然反映。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没有改变。在外交上，安倍内阁并不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是开展针对中国的所谓“战略外交”，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在中国周边地区拉拢有关国家形成共同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安倍选择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冷落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主要是出于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战略思维，日本同中、韩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也直接影响了三国间的经贸关系。

安倍认为，由于中国壮大，单靠日美两国难以应付，因而试图建立“日美＋1”的合作框架，加强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合作，甚至联手菲律宾和越南，共同牵制中国。安倍再次执政后开展了异常活跃的出访外交，2013年1～5月出访了十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美国、蒙古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缅甸等国，甚至派遣特使出访朝鲜。这些无疑是针对中国的外交布局。麻生太郎副首相与安倍晋三首相在半年内先后到访缅甸显得很不寻常，表明日本今后将下大气力拉拢缅甸。2013年5月，麻生太郎访问印度后不久，印度总理辛格应邀访日，日本利用中印边界矛盾，构筑日印对华战略格局的意向明显。从中国的角度看，日本似乎正在扮演冷战时期美国遏制中国、20世纪70年代苏联对外扩张时期围堵中国的角色。

---

① 刘江永：《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与大国兴衰》，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3期，第59页。

（五）国际战略格局演变通常与两年内发生的两个重大国际事件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标志是 1937 年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和 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这导致世界格局出现了法西斯轴心国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战后国际格局的形成与 1943 年的《开罗宣言》和 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迫使德意日法西斯投降直接相关。“冷战”格局的终结以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为历史性标志。

21 世纪头十年，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及中国战略机遇期与以下两大事件相关：2001 年的“9・11”事件与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发动了反恐战争，国际关系体系出现“非传统国际格局”。“9・11”事件以来，“基地”组织在全球蔓延，初步形成网络化的“隐形一极”。它不是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一种跨国的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的行动网络。2008 年度美国国务院报告称，“基地”组织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恐怖威胁。① 当今世界恐怖袭击仍十分猖獗。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及国际风险开始上升与以下两大事件相关：一是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二是金砖国家、G20 出现。美国再度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从伊拉克撤军，放弃单边黩武，但开始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即由北约主导军事打击利比亚，同时在传统国际格局与地缘战略方面开始强化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钳制。日本企图在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谋求单方获益，突破战后国内“禁区”与国际秩序，并主动诱导美国形成联手抗衡中国的东亚格局。

（六）国际格局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容易带来战争风险

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只剩下北约军事集团，而且北约仍在不断扩大、强化，成为可以在全球联合作战、具有进攻性的军事同盟。不仅过去华沙条约成员国纷纷加入北约，而且独联体的一些成员也开始“弃俄入约”，允许在其本土部署美军。2004 年，北约东扩吸纳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七国加入。美国决定在波兰等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北约还在加强与中亚、外高加索国家的关系，长期在阿富汗驻军，并加强同日本的安全关系。正是在这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冷战”后，美国发动了五场高科技局部战争，分别是 1991 年的海湾战争、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和 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这五场战争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实施军事打击的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

① 《美国务院报告称“基地”仍为美最大恐怖威胁》，新华网，2008 年 5 月 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01 /content_8084694.htm。

团；第二，被打击对象国都处于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态和绝对军事劣势；第三，被打击对象国都曾面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或内战，为外敌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反观朝鲜半岛，只要朝鲜和韩国不误判形势，先启战衅，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就不大。其原因之一是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俄罗斯都坚决反对使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美国、日本、韩国不能不有所顾忌。大国关系的相对平衡，抵消了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从而确保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状态。这一点与利比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朝鲜若能明白这一点，或许就会重返“六方会谈”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的战略平衡作用需要继续保持，这也符合韩国和美国的利益。2013 年 5 月 24 日，金正恩特使崔金龙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朝方愿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六方会谈”等多种形式的对话协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朝方愿为此采取积极行动。[①]

（七）非传统国际格局出现是决定未来“一超”与新兴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国成为世界老二，是否意味着中美对立不可调和？答案是否定的。从传统的大国关系格局看，中美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美国战略本能决定它不会善待世界老二，甚至可能以对付苏联和日本的全部手段对付中国。但是，我们要看到，自 2001 年“9・11”事件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并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的特点是国家与国家、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的较量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则是国家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较量与非对称战争。

2001 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社会信息化与恐怖活动全球化、网络化已经形成“隐形的一极”。其与传统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热战持续至今，没有因为伊拉克战争结束和本・拉登被击毙而终结，相反，“基地”组织又从南亚蔓延到西亚北非地区。非传统安全格局改变了传统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政府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特征，是变化所带来的希望与危险并存。和平民主阵营有所扩大，核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除，主要大国和平共处，全球经济实现增长，商业往来把各国命运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主宰自身命运。与这些进步并存的是挥之不去的难题：意识形态战争已让位于由宗教、种族和族群认同所引发的战争；核威胁在扩散；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有所加剧；环境和食品安全遭到破坏、公共卫生遭受威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新技术既可用于建设，也可用于

① 《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特使崔龙海》，新华网，2013 年 5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24/c_115901416.htm?prolongation=1。

破坏。"[1]这一形势判断基本正确。美国也认为,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美国领土上的最致命的袭击,揭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要求我们采取强有力和持续有效的措施来保卫国家"。[2]

奥巴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正处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大国间和平共处成为可能。然而,全球化也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致命技术的扩散、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等,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国家与遍布各地的暴力和仇恨网络处于战争状态。伊拉克战争虽已结束,我们的军队又奉命再次以阿富汗为重点,完成瓦解、摧毁和击败'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的承诺……面对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失败国家等构成的多样化威胁,我们将保持军事优势"。[3]

美国既要维持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地缘战略优势,又不能不从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应对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严峻挑战。一旦国际恐怖组织获得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核材料,美国的核威慑理论将失灵。伴随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韩合作不断深化,美国为确保其霸主地位,提出并实施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2011 年 10 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强调美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4] 2011 年 1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似乎要把重点重新转移到传统国际格局的大国博弈与地缘战略争夺方面,并通过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2+2"会谈和东盟相关论坛释放出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向。

然而,美国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挑战才是现实的安全威胁。正当美国上下对国内反恐颇为自信的时候,2013 年 4 月 15 日的波士顿马拉松恐怖爆炸事件再度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这给了奥巴马政府一个同俄、中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与拉近关系的机会。美国深知,近年来中美贸易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在国际反恐、地区防扩散领域,中国不仅不是美国安全的威胁,而且是必须合作的伙伴。另外,当今世界并不是中国异军突起,而是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在中俄关系中便可看到。

---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 whitehouse, gov/.../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 pdf.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 whitehouse. gov/.../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 pdf.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 whitehouse. gov/.../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 pdf.

④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 189, 2011, pp. 57-63.

三、国际格局与中国周边安全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并未处于矛盾旋涡的中心，没有面临现实而紧迫的军事威胁。但是战略风险在增大，在西北边陲有“东突”恐怖势力威胁，在黄海、东海、南海有海上领土、海洋权益之争，国际格局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依然存在，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一）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战略格局会产生复杂影响

中美关系总体表面稳定，但战略矛盾可能加深。台海局势趋缓有利于中美关系减少战略风险。但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仍会对中美关系发展造成障碍，今后美国仍会在贸易、人民币汇率、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必然会遇到来自霸权国美国越来越多的打压。2010 年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开始两个重点转移：一是战略布局重点转向传统的大国战略格局较量；二是军事部署重点从朝鲜半岛转向印度的海上弧形地带，针对中国的一面上升。

美国重返亚太与“再平衡”战略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如图 3-3 所示，美国重返亚太，在经济上除了要使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成倍扩大，还要推进排除中国的 TPP，把日本拉入美国设定的自由贸易体系，迟滞中日韩自贸区及东盟＋中日韩（“10＋3”）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美国对亚太经济的主导。在政治上，美国将参与东亚地区所有多边政治、安全对话协调机制，发挥美国的所谓领导力量。在军事上，美国将继续保留并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军事存在，在 2020 年之前，美国海军 60％的力量将部署到亚太地区。美国过去曾占有越南的金兰湾和菲律宾的苏比克、克拉克军事基地，如今美国利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的矛盾，设法重返这些地区，并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地保持美军存在，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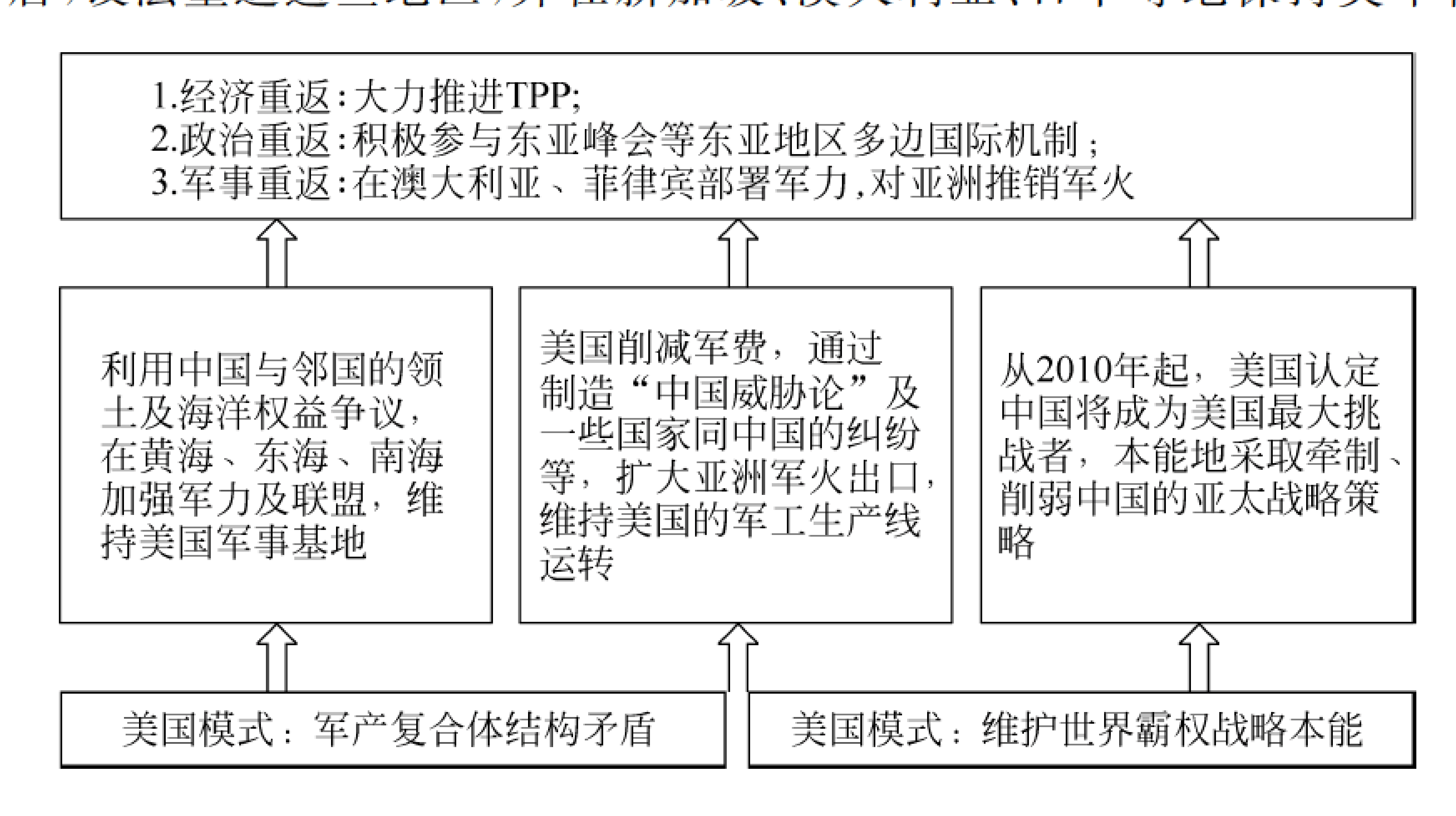


图 3-3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特点与动因

化与这些国家的同盟关系。

在美国国防开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美国为维持国内军工生产线并向其盟国推销军火，必将在中国周边继续制造和利用紧张局势。2006—2010年美国出口武器的买家中，韩国名列榜首，年均10.5亿美元。2011年，美国军售订货总额达348亿美元。2012年，美国利用中日钓鱼岛争议带来的紧张获得了来自日本42架F35战斗机的大订单。若未来十年美国军费年均减少450亿美元，势必会谋求扩大武器出口。因此，美国在未来十年将继续制造地区紧张，挑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矛盾，渲染"中国威胁论"。这些是由美国军产复合体的国家模式、国家安全战略本能以及美国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决定的。

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的四项长期国家利益分别是：(1)安全，即美国及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2)繁荣，即处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能提供良机、促进繁荣的强大、创新和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3)价值观，即美国及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得到尊重；(4)国际秩序，即在美国领导下，世界各国通过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并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①

如图3-4所示，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美国会继续视中国为主要对手。但是，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美国将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这反映出美国全球战略的两个重要侧面：一方面，伴随中国继续发展壮大，美国会本能地对中国是否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国际秩序怀有担心，日本等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也会主动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另一方面，美国重返亚太并非要与中国直接展开军事对抗，而是要竭力避免卷入冲突。美国会在背后支持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较量，但表面上在岛礁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上则保持中立或暧昧立场。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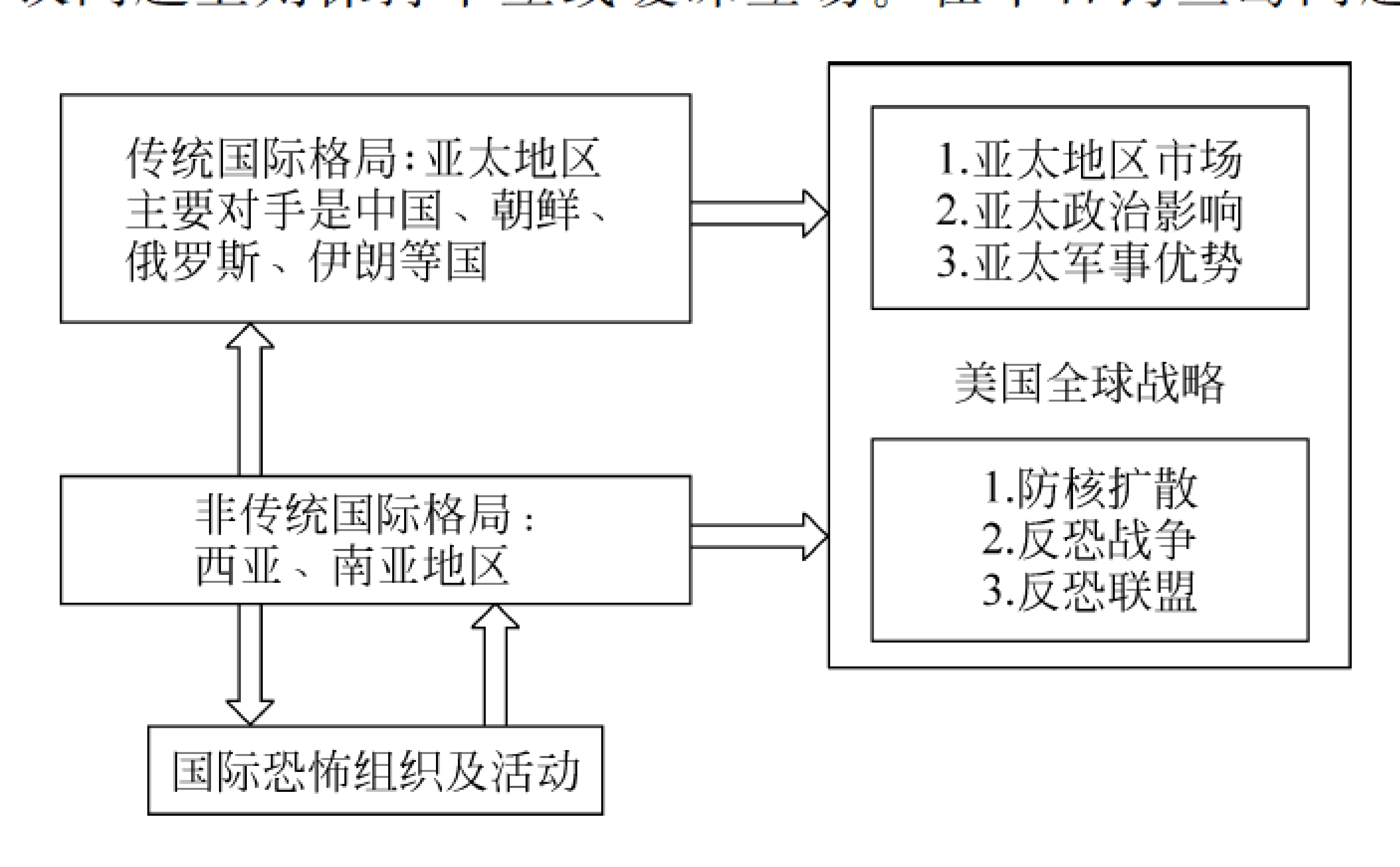


图3-4 美国重返亚太面临的战略困境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要造成中日不和不武的局面，以便以最小的风险利用中日岛屿之争达到确保美国主宰东亚的目的。

从总体上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后，美国盟国对美国在亚太地位下降的担忧所引起的。其本身未必会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但是，日本等国则产生战略误判，企图利用美国重返亚太之机在领土及海洋权益问题上捞便宜，趁中国将强未强之际建立威慑和控制中国的战略格局。2010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中日“撞船事件”、2012年4月菲律宾制造黄岩岛挑衅事件，背后都有美国重返亚洲的影子。希拉里·克林顿多次向日方承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以及在南海问题上谴责中国，都是造成其盟国误判的重要原因。因此，奥巴马政府要确保其重返亚太而不陷入地区军事争端，最重要的是改变以往容易造成误判的言行，对日本右翼政客的挑衅与好斗明确说“不”。

（二）国际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将对中国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认定对其国家安全带来最大威胁的是“暴力的极端主义”，于是美国动员其盟国以打击“暴力的极端主义”为名，发动了反恐战争。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有三点不同：其一，奥巴马政府反对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主张集中力量在阿富汗打赢反恐战争；其二，奥巴马政府反对小布什政府推行美国单边黩武，而主张北约为主导，实际上是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其三，奥巴马政府反对小布什政府大量增加军费开支，而主张尽量削减美国的国防费开支。

如此一来，未来国际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很可能是以“基地”组织网络为首的“暴力的极端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暴力的多边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迄今并未卷入这一主要矛盾的旋涡中心，但同时面临来自这两方面的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一方面，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北方向，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不时威胁中国西北边陲的安宁。2008—2010年，在中国举行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上海世界博览会等重大活动期间，“暴力的极端势力”尤其活跃，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然而，这却受到一些对中国图谋不轨的国际势力的支持，其政治用心相当险恶。

另一方面，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是“暴力的多边主义”。所谓“暴力的多边主义”，就是多个国家或军事集团对别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国际群殴”现象，它以所谓的“为价值观而战”、推行世界民主化等做包装。它与单边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特定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使用暴力，不同点只是由一国独断专行改为多国联合行动，本质未变而后果可能更严重。

21世纪初，在世界力量格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但是，物极必反。美国单边黩武不仅导

致本国硬实力下降,也造成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力下降。2009年度,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创"二战"后以来最高纪录,比美国建国头200年所有国债加在一起还多,超过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全国每人负债4700多美元。[①] 其直接原因之一是2009年度美国军费开支达创纪录的7057亿美元。2011年度美国军费开支虽然减少到6490亿美元,但其中1190亿美元用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②],当年美国财政赤字仍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5%,远高于3%的国际安全水平。[③] 结果,2011年8月5日,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标准普尔国际信用机构从AAA级下调至AA+。

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决定未来十年内,美国军费开支将减少4870亿美元,2012年度军费削减了大约32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做法,主张积极参与多边主义。一方面,美国的确更多地参与各种国际多边机制,没有再单边发动战争;但另一方面,美国仍然在参与、推行甚至主导"暴力的多边主义"。利比亚战争就是个典型案例,美国发动军事打击后不久即把战争指挥权交给北约。结果,在摧毁卡扎菲政府、结束战争后,奥巴马政府得意地称:这次美国只出资20亿美元,而且"零伤亡"。这可能增大美国推行"暴力多边主义"的诱惑力。

如今,在中国周边地区,"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幽灵还在徘徊。在东北亚,朝鲜半岛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平的多边主义与"暴力的多边主义"这两股潮流之间的较量。如图3-5所示,和平的多边主义是指通过六方会谈等方式进行外交斡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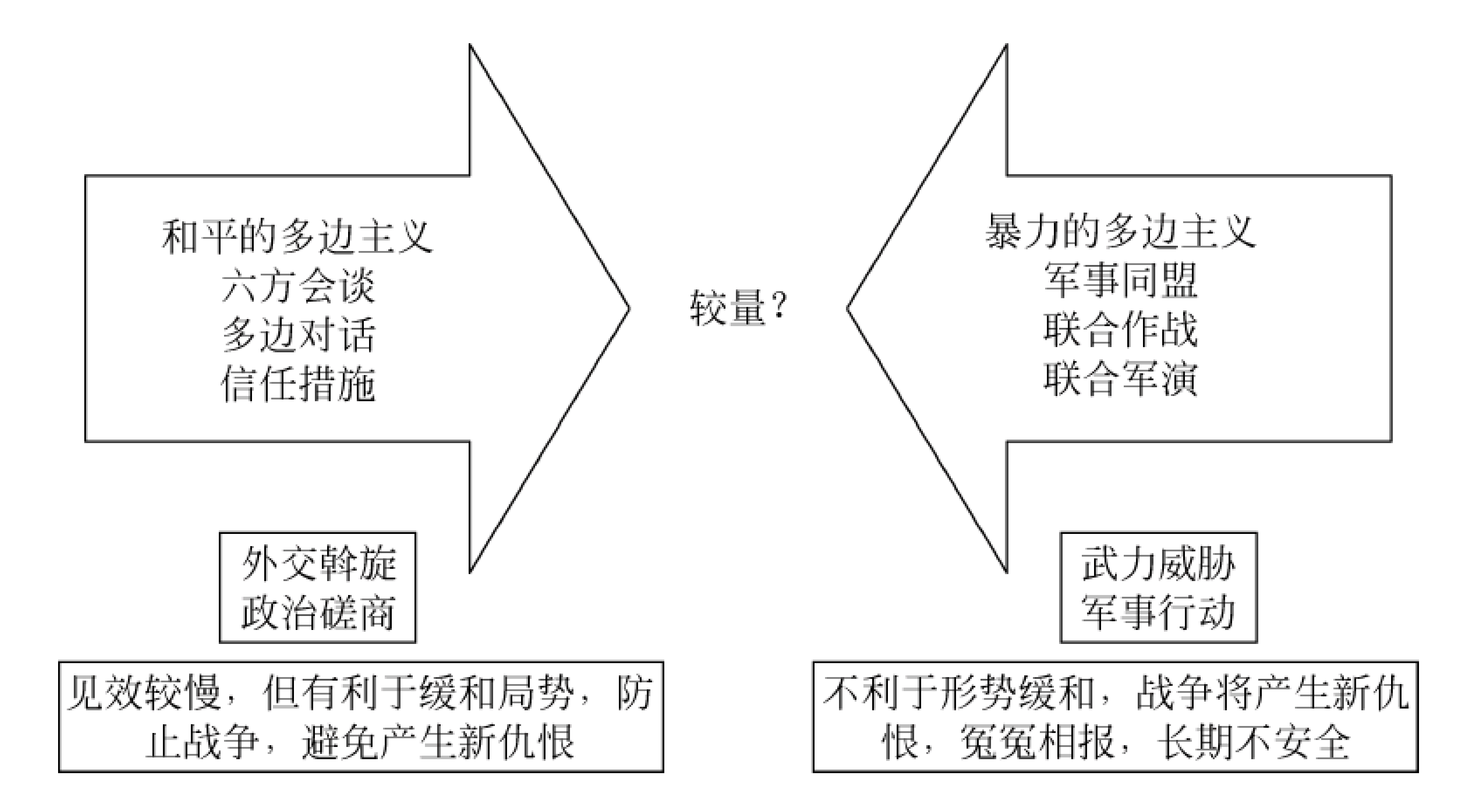


图3-5 朝鲜半岛形势:和平的多边主义与暴力的多边主义的较量

① 《美国财政赤字创纪录达到1.42万亿》,新华网,2009年10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18/content_12258651.htm。

② 《美国国防部长声称削减军费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网,2011年8月5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5340705.html。

③ 《美国经济求解:刺激经济复苏与削减财政赤字》,中国网,2011年9月16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1-09/16/content_10190816.htm。

双边或多边的政治对话与磋商，缓和局势，确保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无核化进程，有利于可持续安全的实现。“暴力的多边主义”则主要是仰仗军事同盟、联合作战、联合军演等武力威胁甚至军事行动，确保单方所谓的绝对安全。中国积极推动和平的多边主义，抵制“暴力的多边主义”。

（三）未来十年中日矛盾可能上升为东亚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在亚太地区，“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另一个策源地可能来自日本。日本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日本同中国在历史问题、领土争议、地缘战略方面有深刻的矛盾，而美国则不然；第二，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日本与中国合作的动力较小；第三，美日两国虽然在制约中国方面相互利用，但在领土争议问题和军事对抗方面，日本更积极主动地利用美国；第四，日本似乎正在扮演冷战时期美国在中国周边所扮演的角色，而美国曾失败过，不愿再冒战略对抗的风险；第五，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及民族主义情绪比美国严重。

战后迄今，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难以复活军国主义。但是，安倍晋三内阁的政策倾向于修改日本宪法，利用朝鲜核危机和导弹危机增强日本军事力量与导弹防御系统的实战部署，并积极拉拢和利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形成对抗中国的战略态势。日本未来将争取把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写入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并与美国协商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在钓鱼岛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日美联合作战样态具体化。围绕钓鱼岛争端，不排除中日擦枪走火的可能。

安倍晋三主张建立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构成一个钳制中国的“菱形”战略格局。安倍首先称：“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①]同时，日本还迈出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第一步。2013 年 4 月 15 日，安倍晋三与北约秘书长安德斯·拉斯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签署了一份旨在加强日本与北约军事安保合作的政治宣言。双方就加强军事情报交流、共同打击国际海盗组织、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维护海洋权益等问题达成共识。日本与一个区域军事组织单独签署军事合作宣言，是战后以来的第一次，表明日本企图扩展日美同盟的范围，借助北约在全球范围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日本还新设“北约日本代表”，由日本驻比利时大使坂场三男兼任。这意味着日本和北约将由此建立起新的合作关系。

目前，北约并不认为中国是威胁，甚至希望和中国展开对话，但根据《北大西洋

---

① 《安倍吁组“民主安全菱形”抗衡中国》，新华网，2013 年 1 月 1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12/c_124222063.htm。

公约》第五条规定，美欧各成员国享有集体自卫权。即，当其成员国遇到别国攻击时，北约其他成员国都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予以应对。包括朝鲜向美国发出的挑战，北约都十分介意。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北约介入针对朝鲜的战争的可能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2013年4月15日在东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再三挑衅并出现发射新型弹道导弹等动向的朝鲜对美国进行攻击，北约将视之为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并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他“不认为将对北约造成直接威胁”，但“长远来看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力量均衡”。[①] 未来十年，日本一旦修改宪法第九条，加入北约，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日本与北约有可能彼此卷入对方进行的战争。日本一方面拉美军介入钓鱼岛问题，一方面与北约加强战略联手，阻止欧盟恢复对中国武器出口。这些都会增大北约军事介入中日之间冲突的危险性以及日本极右势力有恃无恐地挑战中国国家安全底线的战略风险。发展下去，这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与军事格局，甚至导致“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战略威胁。

日本2013年出版的外交蓝皮书、防卫白皮书都可能借所谓“火控雷达照射事件”、中国潜艇在日本附近海域游弋等，把中国说成是海上和空中“威胁”，为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做铺垫。这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将从以往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转向不惜进行军事对抗。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若与主张修宪的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联合，日本修宪便将被提上日程。今后，日本在中国周边布局的同时，还可能继续利用中国的社会矛盾、民族分裂势力，介入台湾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示强。这样，一个不确定性极大的日本很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严重的损害，从而导致中日矛盾演变为未来十年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

然而，安倍再度上任后推行的“战略外交”开局不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在岛屿争端问题上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矛盾同时凸显，反而使日本更加孤立，甚至美国都没有无保留地支持它。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曾对野田内阁“购岛”持强烈疑问和反对态度，向日方提出了放弃国有化的“非常强烈的忠告”。但是，野田内阁未听劝阻。[②] 这充分说明，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只是在利用美国对付中国，而并非单纯地追随美国。安倍首相为留下改善中日关系的余地，暂时未去直接参拜靖国神社，而采取献上贡品的变相参拜方式。但安倍内阁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却于2013年4月21日参拜靖国神社。这表明，日本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而且很可能在损害中日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在日本宪法尚未修订之前，中日之间虽不至于发生战争冲突，但中国需

---

① 《北约秘书长称如朝鲜攻击美国或行使集体自卫权》，[日]共同网，2013年4月15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4/50454.html。

② 共同网，2013年4月10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4/50071.html。

居安思危，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在坚持钓鱼岛海域执法巡航常态化的同时，要继续把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依据向日本及国际社会做详细的说明。着眼长远和中日两国人民，中国有必要继续推进中日世代友好事业，实现钓鱼岛局部利益之争与中日友好的再平衡，防止日本右翼势力借题发挥，继续破坏中日关系大局。

（四）安倍内阁加紧突破战后日本国内自我约束和国际秩序将影响亚太格局

2013年5月2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参观波茨坦会议旧址时发表讲话称："《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等岛屿归还中国"；"任何否认或企图美化那段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言行，不仅中国人民不能答应，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都不能接受"。[①] 这番讲话切中当前中日关系倒退的实质和要害。然而，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却对此表示"绝不接受"。

这场较量的实质正是关于维护还是颠覆"二战"后日本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一场斗争。在国内秩序方面，安倍内阁要通过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建立国防军，恢复天皇"国家元首"地位，打破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我约束。"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是日本的自我约束，确保了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而日本右翼势力很可能彻底突破这些自我约束而使日本走上危险的道路。在国际秩序方面，以所谓《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及《联合国宪章》，打破战后国际体系和东亚秩序。可以预见，日本未来一旦突破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规则和国际秩序，必将进一步危害亚洲邻国，成为21世纪亚洲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并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新的灾难。

美国一些分析人士曾认为，美日同盟就如同一个瓶塞，可以阻止日本成为军国主义或军事大国。但实际上，美日同盟更像是一个蛋壳，日本右翼势力和军事力量就像蛋壳里不断成长的一只怪鸟，一旦温度适宜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可能破壳而出。例如，石原慎太郎等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宣称对美国"日本可以说不"。他之所以挑起购买钓鱼岛事件，并主张日本自卫队登岛，目的之一就是要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联合对日作战的中美两国发生战争，以利日本再度坐大。石原慎太郎曾主张，对于中国渔船，日本"可以出动自卫队驱赶。如果发生战争并进一步扩大，美军就不能不介入"。[②] 据此，日本一位学者指出，对于石原来说，钓鱼岛问题就是"恣意恶化同中国的关系，引发军事冲突的'导火线'"。[③] 2013年4月4日，石原慎太郎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接受采访时又宣称，日本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军事国家、技术国家。为使经济复苏，防卫产业最有效。日本可以开发远距离飞跃宇

① 共同网，2013年4月10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3/04/50071.html。

② ［日］丰下楢彦：《何为"尖阁问题"》，东京，岩波书店，2012年，第94～95页。

③ ［日］丰下楢彦：《何为"尖阁问题"》，东京，岩波书店，2012年，第94～95页。

宙空间再下落的兵器。现在到认真考虑的时候了。议论核武装也是一个选项。日本拥核有许多障碍。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只要没有核武器就没有发言权。①

与此相比,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美国,则似乎正越来越丧失对日本的实际控制与影响力。可以预见,无论美国意向如何,由于自民党在众议院联合其他政党已经拥有修宪所需的2/3以上多数议席,所以只要今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等主张修宪的政党获得日本参议院2/3以上多数议席,日本修宪就将势在必行。

日本素有与强者为伍的结盟习惯。1902年曾结成日英同盟,1940年结成德日意同盟,结果在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下,分别对俄、中、美发动了战争。"二战"后,日本在与美国结盟以来没有侵略别国,其原因之一是日本战后宪法发挥着制约作用。然而,一旦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被修订,实现"国防军"入宪,日本为所谓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自由"而使用武力,同时恢复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不仅中日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日美同盟关系也将面临新的选择:美国要么被日本牵着鼻子走,与日本一道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结果中美相争、日本右翼得利;要么被日本右翼不断打出"拥核牌"而不得不在重大问题上迁就或偏袒日本,从而丧失对美日同盟的主导权;要么受制于美国社会与良知对日本右翼政权容忍的底线,对日本政治右翼化予以牵制,导致美日同盟的政治裂痕与围绕历史观、战争观的价值观摩擦将难以避免。

四、结　论

2013年世界主要国家政权交接完成后,新一轮国际交往对塑造未来的国际格局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十分清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营造和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便选择了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013年6月初,习近平主席又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共同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构筑新型大国关系。

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则企图动员所有外交能量针对中国构筑国际牵制,但实际上不仅丢掉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遇,而且在某些方面造成自我孤立。在东北亚,"冷战"时期"中苏朝"与"美日韩"尖锐对抗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在岛屿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企图联手越南、菲律宾同中国对抗,但同时又与中、韩、俄三国对立;在历史观、战争观等价值观问题上,日本陷入严重孤立,进一步促成韩国、美

① 『石原氏「参院選の争点、憲法改正据える」復帰後初会見』,《朝日新闻》数据电子版,2013年4月5日,http://www.asahi.com/politics/update/0404/TKY201304040453.html。

国、中国站在一起；在朝核问题上，朝鲜同“六方会谈”其他各方立场相左，但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问题上则不同程度地存在共同利益。因此，未来的亚太格局充满变数，如何趋利避害，争取实现可持续安全，仍然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未来 20 年，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将来自内忧外患的复合型挑战及“暴力的多边主义”，即依靠军事集团对主权国家发动的军事打击。因此，中国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同时，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争取实现可持续安全。中国外交要避免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在韬光养晦时要坚持原则，自强不息；在有所作为时要谦虚包容，广结善缘。在塑造国际战略新格局的进程中，中国应注意关照各国利益，努力做好负责任大国和受别国信任与尊敬的大国。这样才能确保本国的可持续安全。

未来国际格局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从目前的“一极多元”格局发展为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的“多元共存”格局，再和平过渡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而建立一个“后霸权”的国际体系。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探索可持续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为此做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节　甲午战争以来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及启示

——兼论 120 年来的中日关系及未来①

2014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也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120 周年和日本首次入侵中国台湾 140 周年。近代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省，都与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发动的甲午战争直接相关。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钓鱼岛问题的产生也始于甲午战争。此时，抚今思昔、回顾历史，对认识现实、展望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提供一个“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史”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范式，即从 1894 年甲午战争以来 120 年历史的纵轴线与不同时期东亚战略格局的横切面，探讨中日关系，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未来的努力方向。本文所述“东亚战略格局”，是指由东亚地区国际力量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相互关系、主要矛盾等所构成的国际战略态势。

一、120 年来两个甲子提出的问题

从甲午战争至今，如果用关键词来概括，这 120 年来东亚地区经历了“殖民、战乱、革命”与“和平、冷战、竞争”两个不同的甲子②。前 60 年（1894—1953）充满了残酷的战争并引起革命，但也出现过间歇的和平时期；后 60 年（1954—2014）总体上是和平发展，但也存在冷战与局部热战。这两个甲子如此不同，其产生的原因值得思考。

未来的 60 年应该是一个走向“安全、合作、统合（国家统一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甲子。然而，如果未来有关各国的决策者不能汲取 120 年来历史演变的经验教训，共同消除历史遗留给东亚国际关系的危险种子，下一个 60 年的东亚未必不会陷入“对抗、冲突、内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十字路口，“东亚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可供未来三代人思考与回答。

对东亚地区战略格局影响最大的，是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的关系，东亚战略格局变化主要表现在四国之间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性质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了解东亚战略格局演变的

① 本文发表于《日本学刊》，2014 年第 1 期。

② 《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勿躬》载云：甲子，干支纪年或记岁时六十组干支轮一周，称一个甲子，共 60 年。

历史轨迹和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当前东亚国际政治的现实和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的战略背景，从而找到一把打开预测未来大门的钥匙。

19 世纪 20 年代，即大约 200 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据英国权威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测算的数据显示，1820 年世界经济总量（GDP）为 6944.42 亿美元，中国当年经济总量为 2286 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占全球经济的 32.9%。[①] 笔者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测算，1820 年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印度的 2.1 倍、法国的 5.9 倍、俄国的 6.1 倍、英国的 6.3 倍、德国的 8.7 倍、日本的 11 倍和美国的 18.2 倍。当时，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的大量出口，造成“1830 年以前，中国人在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②]。

但是，正如卡尔·马克思当年所指出的，“从 1833 年，特别是 1840 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元有枯竭的危险。”当时中国对印度出口从未超过 100 万英镑，而从印度的进口则近 1000 万英镑。其后，白银大量流入欧洲。马克思明确指出：这是由于英国“强迫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融货币的流通才发生这样一个明显突出的转折”。[③] 总之，“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④]这说明，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无论经济多么强大、贸易多么兴隆，盲目自大、科技和国防落后就会遭受外侮，甚至濒临亡国。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之间较量的结果。

俄国经济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提出的经济科技“长波周期”理论，似乎也可从一个侧面佐证这一点。1783 年至 1842 年，欧洲列强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凭借大炮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1840 年至 1842 年以武力撬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市场大门。1842 年至 1897 年，欧美进入蒸汽和钢铁业发展的时代。中国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首当其冲地在陆地成为俄、英等国竞相入侵的对象，在海上成为英、法、日等国肆意进攻的目标。1868 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脱亚入欧”，其统治者继承了丰臣秀吉（1537—1598）、佐藤信渊（1769—1850）、吉田松阴（1830—1859）等人对外扩张思想的衣钵。日本 1897 年彻底霸占琉球后便把侵略扩张矛头对准中国和朝鲜半岛，于 1894 年发动了甲午战争，霸占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台湾。1897 年至 1945 年，

① アンガス・マディソン『經濟統計で見る世界經濟 2000 年史』、金森久雄監訳、政治經濟研究所訳、柏書房、2004 年、308 頁。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 年 6 月 14 日。

③ 马克思：《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纽约每日论坛报》，1856 年 11 月 1 日。

④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 年 6 月 14 日。

欧美列强进入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发起日俄战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企图最终灭亡中国。中国在封建统治末期生产力水平落后,特别是国内军阀混战及各种矛盾,被当时日本的帝国充分利用。

"二战"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伴随着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后起强国通过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引起世界大战的历史必然性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导致主要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出现经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大趋势。在科技领域,电子信息技术开始问世,并取得了划时代的空前发展。日本、德国等战败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掀起了战后国家和平崛起的第一波。新中国成立,一直努力改变经济科技落后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头十年,掀起了战后国家和平崛起的第二波。中国在航天等领域开始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从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东亚战略格局演变史来看,中、美、俄、日四大国的关系大体上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化,从而影响着包括朝鲜半岛、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回眸120年来的两个甲子、12个十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寻国际关系演变的规律,的确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本文将1894年甲午战争至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和新中国诞生以来至今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演变分为两部分进行梳理,并加以分析,进而对未来十年东亚战略格局的前景做些理论思考与前瞻,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感悟与启迪。

二、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的东亚战略格局演变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的20年,中国面临的东亚战略格局十分险恶。"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①],而当时的中国则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1871年沙俄入侵中国新疆伊犁地区;1874年英国开始入侵中国西藏;1872年日本把琉球国吞并为琉球藩,1874年首次入侵中国台湾。十年后,1883年至1885年,法国入侵越南和中国台湾,日本开始觊觎中国的钓鱼岛,1885年日本首次秘密调查钓鱼岛。其后十年,日本针对中国大力搜集情报、扩军备战。因而,甲午战争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1894年至1904年第一个十年

日本1894年7月25日不宣而战,根本上以武力改变了东亚战略格局,同时埋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

下日俄争霸中国东北的祸根。

明治睦仁天皇(1852—1912) 1868 年登基后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动员对外侵略扩张。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大力扩军,而清政府官员则把以扩充海军为名募得的捐款用于翻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庆贺 60 大寿献礼。结果,中日军事装备差距必然拉大。这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甲午战争时,中方陆军枪炮的射程、命中率逊于日军,海军差距更大。虽然中方舰只数量较多,但能作战的舰只有限。据记载,当时日本海军有 2000 吨以上的主力舰 11 艘,排水量 3.72 万吨;北洋舰队只有 7 艘,排水量 2.7 万吨。在黄海海战中,日军参战军舰 12 艘,中方 10 艘。日军参战军舰总吨位比中方多 30%,总马力强 63%,总兵力多 69%,参战总炮数多 51%,鱼雷发射管多 38%,舰只平均航速快 52.7%。日舰有口径 12 厘米的速射炮 81 门,而中方一门也没有;日方拥有小口径速射炮 111 门,而中方只有 27 门。[①] 总体上看,日舰快、灵、准,而北洋舰队舰只慢、笨、差,日方火力强于中国三倍,战争胜利的天平自然倒向日本。

甲午战争的结果大长了日本的威风,也拉开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不幸时代的帷幕。1895 年 4 月 17 日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而且使清政府元气再次大伤,只能靠向俄、英等列强借债来赔偿日本。日本从中国获得巨额赔款白银 2 亿两[②],并立即用于扩充军备。甲午战争彻底结束了自 14 世纪中国明朝起所建立的以中国册封、周边邻国朝贡为特征的东亚国际秩序,日本则企图通过武力征服建立以天皇统治为中心的所谓“八纮一宇”的“大东亚新秩序”。

然而,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被迫把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却从中国勒索了白银 3000 万两。[③]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得到的款项总数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充满怨愤。这成为日本与英国结盟,同俄国在中国辽东、同德国在中国山东先后交战的重要背景之一。于是,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从中日对抗转变为日俄对抗。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阻止沙俄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只能容忍日俄在中国辽东摆下争霸的战场。

(二) 1904 年至 1914 年第二个十年

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表明,帝国主义时代列强之间的多极争霸必然导致战争。

---

① 参见关捷等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三卷“战争篇”(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683～686 页。

② 同上书,第 613 页。

③ 同上书,第 107 页。

1904年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驻扎在旅顺的俄军，中国辽东半岛爆发了日俄战争。中国饱受其害而无能为力，日本于1905年7月险胜，美国成为日俄临时的“调停者”。日本由此控制了中国东北的经济、交通命脉，而失去中国保护的朝鲜半岛于1910年被日本吞并，在历史上首次沦为殖民地。日本在东北亚陆上争霸获得优势后，日美在太平洋海上争霸矛盾的端倪显现。在日本，拉拢中国共同对抗欧美列强的所谓“亚洲主义”出笼。在这种背景下，1911年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获日本不少人支持，而袁世凯作为曾与日军在朝鲜半岛作战并平息了“开化党”政变的清军将领，必遭日本憎恨。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支持孙中山另有图谋。然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曾经对日本战胜沙俄感到鼓舞的一些中国人，最初并未认清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曾出现过学习日本、借助日本、联合日本的政治倾向。为讨伐袁世凯，1914年5月孙中山曾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835—1924）等人写信求助，“以救东亚危局”。[①] 然而，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1914年至1924年第三个十年

1917年10月苏俄红色政权的诞生、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战”后的国际战略格局。日、美对抗苏联，争夺中国，成为东亚角逐的主轴。

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13年世界经济总量为2.7万亿美元，美国为5173.8亿美元，经济规模跃居世界首位[②]，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9%，分别是中国的2.1倍，德国、俄国的2.2倍，英国的2.3倍，法国的3.6倍，日本的7.2倍。当时在大国之间已经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的3.4倍，但日本统治者却伙同英国等对华态度蛮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借口与德国开战而出兵山东。大隈重信内阁于1915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等，独享在华殖民特权，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

“一战”后，世界列强确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缓解了大国之间的争斗，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并暗藏着新的危机。1919年1月至1920年8月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山东主权，但遭否决。巴黎和会的结果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在北京爆发了意义深远的“五四运动”。美、英、日、法、意等国于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会议缔结的《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缔约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国、英国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国和意大利

① 孙中山：《致大限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913—191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② アンガス・マデイソン『經濟統計で見る世界經濟2000年史』，308頁。

各17.5万吨[①],从而确立起美国对日本的海上优势地位,这令日本耿耿于怀。经中国代表力争,日本被迫废除“二十一条”,从山东撤军,但仍保留一些特权并维持在中国台湾、澎湖的殖民统治。

俄国建立世界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立即于1918年遭到日、美、英等列强武装干涉。尽管干涉以失败告终,但直到1920年日本仍以所谓“保护侨民”等为借口占据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这遭到担心日本独占这一地区的美国的抵制。另外,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内忧外患深重的中国开始有了希望。此时,孙中山开始对日本抱有警惕,要求废除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苏俄政府也于1919年7月首次发表了对华宣言,表示放弃沙俄与中国、沙俄与第三国缔结的旨在奴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等。[②] 1924年5月中苏建交,中日矛盾开始上升。

(四)1924年至1934年第四个十年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东亚战略格局演变节奏加快,十年一变的起始之年提前到1931年。这期间,对世界局势影响最大的是德、日、意法西斯上台和中日矛盾开始激化。

1925年日本进入昭和时代,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帝国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右翼军人对裁军限制极度不满,开始制造危机,图谋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在中国东北建立统治地位。1927年6月至7月,日本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后主持的“东方会议”,提出《对华政策纲领》,决定把中国的东三省作为“与日本国防和国民生存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会议还决定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武力干预,镇压革命,扶植亲日派。[③]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同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火车爆炸事件。1929年10月美国纽约股市暴跌,引起世界经济大萧条。其后,在德国和日本,纳粹势力和军国主义迅速抬头。至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被打破,帝国主义列强争霸战又起,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另一方面,1928年12月拒绝日本要挟的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与蒋介石联手。1929年底,张学良为收回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结果,东北军大败,中苏断交。1930年11月,对侵华态度慎重并批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滨口幸雄(1870—1931)首相被法西斯右翼刺伤。从

---

①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570页。

② 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1917—192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31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此，日本军部越发肆无忌惮。中国再度处于同苏日同时交恶、腹背受敌的东亚战略格局之中。

（五）1931年至1941年第五个十年

从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形成两极对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柳条湖的中国守军，迅速攻占沈阳及东北全境。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仪上台，在中国东北建立起所谓“满洲国”。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当时，苏联在舆论上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提供了一定支援，促成中苏1933年5月的复交。同时，苏联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避免被过早地拖入战争。苏联甚至在1933年同伪满洲国建立了所谓领事关系，以保住其在中东铁路的权益。[①] 美国虽然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采取“不承认主义”，但同时偏安一隅，采取孤立主义。胡佛政府反对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实质上采取了绥靖政策。1941年4月，日美达成谅解方案，其中包括“承认满洲国”。[②] 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③]。

这一时期，日本国内逐步法西斯化。1931年底上任的犬养毅首相因反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于1932年5月15日遭右翼军人枪杀身亡，史称“五一五”事件。其后，曾担任海军大臣和首相的斋藤实，也因坚持遵守华盛顿海军裁军协议而于1936年2月26日被法西斯军人发动兵变所杀，史称“二二六”事件。

日本建立起法西斯军人政权后，对中国更加虎视眈眈。与此同时，国际上形成了德日意法西斯同盟和反法西斯阵营。1933年3月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上台，1936年日本建立了广田弘毅(1878—1948)军部独裁政权。同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从而形成德、意、日反共轴心。近卫文麿(1891—1945)内阁于1937年6月上台后，日军于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13日起制造了南京大屠杀。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为避免欧、亚两线作战，于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6卷，莫斯科，1970年，第192页。转引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②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国际关系史资料选中》(17世纪中叶—1945年)，第823～826页。

③ 毛泽东：《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62页。

月缔结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同年 6 月苏联便遭到德国大举进攻。日本与苏联缔约后,一方面扩大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决定南进,并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发动偷袭珍珠港事件,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宣战,形成中美共同抗日的新格局。

(六)1941 年至 1951 年第六个十年

1943 年的《开罗宣言》和 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奠定了战后东亚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基础。然而,“二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球范围却形成了美苏两极对抗体制。

1942 年 6 月《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美苏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使用原则的协定》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1943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中、美、英《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驱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①]。1945 年 7 月 26 日发表的《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②]

1945 年 2 月美、苏、英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对于加速德、日、意法西斯的灭亡和形成战后美苏两极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雅尔塔秘密协定维持外蒙独立,为恢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而直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45 年 8 月,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战胜纳粹德国后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寇。同年 8 月 15 日,日本裕仁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同年 9 月 2 日《日本投降书》签署。然而,此期间美苏围绕斯大林要求占领北海道北半部、杜鲁门要求占有千岛群岛中部一个岛屿等问题,业已通过密信展开较量。[③] 朝鲜半岛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却又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北南双方对立充满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台湾等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被归还中国。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东亚国际格局,在东北亚形成中、苏、朝与美、日、韩抗衡的战略格局。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使战火危及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义无反顾。朝鲜战争期间,美、英、法等国

① 《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载《日本概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第 361 页。

②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 世纪中叶—1945 年),第 875～876 页。

③ 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 世纪中叶—1945 年),第 899～902 页。

同日本于 1951 年 9 月 8 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制造了“台湾归属未定论”，遭到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在此后的 20 年，日本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建交，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同新中国处于没有外交关系的不正常状态。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东亚战略格局的演变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冷战时期与“冷战”结束后两大时期。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东亚地区国际战略格局与中日关系都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原有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因此仍以十年为单位继续分析似乎才能叙述得比较清楚。

（一）1951 年至 1961 年第七个十年

东亚战略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中苏结盟对抗美日同盟。中国、苏联同美国从抗日战争时期的盟友变为“冷战”的敌手。

美国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扶植日本重整军备。不过，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和苏联虽然分别站在美国和中国一边，但未直接参战，而是借机迅速恢复了本国经济。美国虽然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甚至扬言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但最终只能于 1953 年在板门店与中朝两军代表停战议和。同年，斯大林去世，中苏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全面否定斯大林，加剧了中苏两党的矛盾。1960 年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合同，撤走在华专家，使新中国经济建设蒙受巨大损失，面临严重困难。1960 年日、美修订安全条约，把中国台湾列入《日美安全条约》中的所谓“远东”地区，引起中国同美、日关系紧张，而美、日、韩三角联盟则依然如故。这一时期，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南越扶植吴庭艳政权上台，越南战争爆发，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再度恶化。

（二）1961 年至 1971 年第八个十年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同时处于与苏、美、日对抗局面。1966 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与中苏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这种局面直到 1971 年中美两国做出重要战略调整后才有所改善。

这一时期，从全球角度看，美苏两极对抗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在东亚地区则出现了中苏矛盾取代中美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特点。当时，中苏之间既有历史上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新疆等大片领土的旧怨，有苏联对外称霸扩张造成的现实威胁；既有“二战”后雅尔塔秘密协定造成的中苏民族矛盾，有不同国家发展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陈兵百万，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甚至于 1969 年在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围绕对待苏

联的态度，中国与朝鲜、越南的关系复杂化。尽管如此，中国仍给予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力所能及的支持。

在当时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战略格局中，美国从其全球战略角度看到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中国政府则决心摆脱极其不利的国际战略处境，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1 年，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同年 7 月 9 日基辛格秘密访华，表示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同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三）1971 年至 1981 年第九个十年

中国同美日两国改善关系并同时对抗苏联威胁，而中日搁置钓鱼岛争议与这一时期的东亚战略格局有关。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越顶外交”给日本造成了冲击。但是，美国在归还冲绳协定谈判中却擅自把钓鱼岛划入归还日本的范围之中。这引起中国海峡两岸强烈反对，美方只好表示交给日本的是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权，而有关主权则交由相关各方对话协商解决。

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双方基本上解决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并就搁置钓鱼岛领土争议达成政治默契与共识。在同年 9 月 29 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报第八条的立场”，即履行《开罗宣言》，把包括台湾在内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归还中国。其后，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两国根据邓小平的主张再度搁置钓鱼岛争议，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强调，中日“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不仅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与法律基础，而且为“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基础上，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使中国初步具备了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外部国际环境。然而，当时的苏联支持统一后的越南于 1978 年入侵柬埔寨，进犯中国边境。中国被迫于 1979 年进行了对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同年 12 月苏军入侵阿富汗，陷入十年战争泥潭，遭到中美日等国共同抵制。

当时，日本政府之所以默认搁置钓鱼岛争议，并决定对中国提供政府日元贷款，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以下背景和原因：一是那些经历过侵略战争、有良心的日本人对中国有负罪感，愿意致力于日中友好；二是当时有苏联威胁，日中两国都有从东亚战略全局出发、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愿；三是日本

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石油、煤炭等，中国需要进口日本的成套设备，彼此在政治、经贸方面互有所求；四是当时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尚未生效；五是日中搁置岛争、缔结和约，得到美国认可。其后，伴随上述条件逐步消失，日本对华政策也开始发生倒退和改变。

（四）1981年至1991年第十个十年

中、美、日三国关系保持相对友好，对苏联对外扩张形成一定制约。但是，伴随1989年下半年东欧剧变、1991年末苏联解体，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并波及中日关系。

1979年末，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宣布日本政府从1980年起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通过政府日元贷款支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以1984年日本3000名青年应邀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出现罕见的所谓“蜜月期”。当时，中曾根康弘首相一方面考虑日中友好，另一方面是将日元贷款作为把中国拉到日美一边、形成对苏抗衡力量的外交战略工具。[①] 然而，在此期间，1982年日本文部省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建设灯塔等，都曾对中日关系造成冲击。当时，日本国内进步势力尚能对右翼保守势力形成制约，加之两国政府的妥善应对，中日关系保持了总体稳定并取得长足进展。

然而，1989年下半年发生东欧剧变，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性质。美国针对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予以制裁，造成中美关系严重倒退。日本政府则根据竹下登首相1988年访华时达成的政府资金合作意向，维持两国合作关系，但日本媒体对中国批评增多。

中苏关系于1989年4月实现正常化，但不再结盟。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彻底瓦解，国际政治出现对美国“一超”有利的严重失衡。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1月17日打响的海湾战争拉开了“冷战胜利者”以武力改变中东政治版图和国际秩序的序幕。以美国和北约为主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开始横行，日本则以和平宪法为盾牌加以抵制，而来自美国强硬派的压力和国内右翼修宪的主张也在上升。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总体上好于中美关系。

（五）1991年到2001年第十一个十年

苏联解体引起全球战略格局的震动和突变。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变化。

---

① 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康弘が語る「戰後日本外交史」』、新潮社、2012年、356～357頁。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俄罗斯与中、美、日关系改善，而美日、中美之间的矛盾显现。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后，美日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改善，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中美战略矛盾尖锐、围绕历史观的中日政治摩擦开始抬头，中俄则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同意搁置钓鱼岛争议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苏联威胁消失后，日美开始为维系同盟关系，强调“中国威胁”。战后出生的一代日本政客缺乏正确的历史教育，且没有老一辈的战争负罪感，反而对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批评持有逆反心理。1993 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对日本出口能源大幅减少。1996 年日本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首次以钓鱼岛为基线划定日本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并宣称不存在同中国的领土争议。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登岛，建设灯塔，破坏搁置争议的现状。这遭到中方强烈反对。中国台湾岛内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倾向发展。1997 年日本与美国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台湾海峡被不成文地暗中列为日美联合应对的所谓“周边事态”范围。1998 年江泽民访日，中日两国发表了联合宣言。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日经贸交往出现新势头。然而，伴随冷战后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日本出现政治右倾化，导致中日关系开始出现“政冷经热”现象。

（六）2001 年至 2012 年第十二个十年

美日两国同中国的经贸相互依存关系加深，但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东亚国际战略格局再度发生变化。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抬头，中日政治关系恶化，中俄关系强化，中美关系在起伏中趋于改善。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同中、俄地缘战略矛盾增多，但美国陷入“反恐战争”，难以全面对抗中俄。中俄通过长期谈判解决了彼此之间全部边界划界问题，两国关系显著增强。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导致其对华战略调整。日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渲染“中国威胁论”，客观上成为这种政策调整的舆论准备。美国的小布什政府 2001 年、2003 年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急需日本出兵相助，开始公开承诺《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于是，小泉纯一郎内阁追随美国，向印度洋派出海上自卫队，向伊拉克象征性地派出陆上自卫队。与此同时，小泉首相不顾中韩等国反对而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从 2001 年起决定以政府每年出资租用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管控。中日关系开始严重恶化。2004 年日本制定了冷战后第一个《防卫计划大纲》，其防范的主要对象转向朝鲜和中国。日本误认为，只要同美国搞好关系，中日关系自然就可搞好。

然而，小布什政府单边黩武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最终导致了 2008 年美国金融海啸的爆发。美国鼓吹的软实力和所谓美国的民主模式影响力

大为衰落。同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本应顺利发展，但又受到日本政局动荡和来自美国的影响。2010年日本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在冲绳基地问题上改变自民党政府的承诺，并着力加强同中韩的关系，推动东亚共同体。美国对此不满，开始推进重返亚太的所谓再平衡战略。继鸠山后出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重返自民党的政策，并利用美国重返亚洲，反复要求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并对中国示强。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9月，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同年12月日本出台《防卫计划大纲》，战略矛头直指中国。2012年9月10日，野田佳彦内阁宣布"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国有化"。这遭到中方有效的反制措施。中国公务船首次实现在钓鱼岛领海的执法巡航常态化。中日之间长期搁置的钓鱼岛争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日对立再度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海域或空域"擦枪走火"，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必将交织在一起，中日对抗的程度有可能比"二战"后的中美冷战、中苏对抗更为严重，后遗症也更难治愈。

四、关于未来的展望与历史的启示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以来的两个甲子之所以大不相同，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1894年至1953年的第一个甲子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53年至今的第二个甲子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列强之间没有发生以武力争夺领土的争霸战争。

第二，中国的历史命运不同。在第一个甲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科技、国防落后，内忧外患深重，必然成为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和解放。第二个甲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发展壮大，为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不断受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扰，在曲折中前进。

第三，日本的国家模式不同。第一个甲子，如果从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上溯60年，正好是明治政府1885年觊觎钓鱼岛之年。日本从那时起针对中国扩军备战，形成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直至彻底失败。第二个甲子，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转向贸易立国、议会民主、言论学术自由、非军事大国。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残余依然存在，伴随国内外形势变化，政治右倾化开始影响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

未来60年，东亚能否迎来一个"安全、合作、统合"的新甲子，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日本国家模式的演变方向，以及中、美、俄、日四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中国海峡两岸、朝鲜半岛的未来局势走向。其中，作为目前东亚战略格局中主要矛盾的中日关系尤其关键。下面根据安倍内阁对华战略与中日关系现状，对未来十年的趋势做初步预测。

（一）安倍内阁政策倾向与中日关系新变化

2012 年底安倍再度执政后本来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他不仅没有珍惜，反而变本加厉。结果，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不少类似甲午战争前十年发生的现象，这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对此，中方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如何防止安倍内阁进一步把中日关系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第一，2013 年 12 月，日本首次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在国会强行通过《特定保密法》，把中国、朝鲜作为首要防范对象。自民党新宪法草案也曾提出建立国防军，谋求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无独有偶，甲午战争前，在伊藤博文首相主导下，日本曾于 1886 年主要针对中国和朝鲜组建了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参谋本部；1889 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起天皇独揽军政大权的绝对统治，并分别成立陆军和海军参谋本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广岛建立了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坐镇，在军事、外交、情报和舆论等方面统一指挥。

第二，安倍首相在国会就设立 NSC 作说明时称："朝鲜开发核武器和导弹的威胁、中国缺乏透明性的军事力量增长以及在周边海域活动的急速扩大，导致围绕着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恶化。"[①]日本已开始议论拥有打击敌方基地、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日本相关部门还制定各种夺岛作战预案。[②] 这也与甲午战争前山县有朋（1838—1922）、伊藤博文等日本统治者的战略思维及针对中朝两国的态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代背景、中日两国国情和力量对比以及国际环境等均今非昔比。安倍内阁的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广大日本人民的反对，只能以失败告终。

第三，安倍内阁 2013 年 12 月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和未来五年的扩军计划，将增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与此同时，日本首次提出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宣称："为了维护和发展开放而稳定的海洋，日本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对于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将冷静且毅然应对"，意在制衡

① 据日本 NHK 电视台 2013 年 11 月 8 日报道。

② 参见刘江永：《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16～20 页。

中国在钓鱼岛的执法维权行为。[1] 一旦日本认为准备充分、时机成熟，就可能丧失“冷静”而“毅然应对”。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曾制定侵略中国的《征讨清国策案》，提出五年扩军计划。在这期间，日本暂时没有窃占钓鱼岛，不失为“冷静”，但一旦完成扩军计划并通过战争获得优势后便“毅然应对”，认为“今昔形势已殊”而秘密举行内阁会议决定把钓鱼岛划入日本范围。目前，安倍内阁虽然还难以像伊藤博文内阁走得那么远，但其战略倾向颇为相似，十分危险。

第四，2013 年 11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自卫队法》修正案，允许在海外撤侨时派遣自卫队执行陆上运输任务，并可携带重武器装备。这是对日本现行宪法的实质性突破。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1894 年日军进入朝鲜半岛、1918 年武装干涉苏维埃、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其借口之一都是“保护日本侨民安全”。另外，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实行公务员减薪 10％以上，2014 年日本将把消费税率提高 3％。如果这些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就会使人联想起甲午战争前日本曾为造舰而减薪 10％，以及天皇动员全国募捐的历史。

第五，安倍首相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专程到石垣岛和宫古岛为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鼓舞士气，对抗中国。此举与 1887 年时任首相伊藤博文乘军舰到冲绳巡视颇为相似。在安倍看来，其山口县同乡伊藤博文是日本的“伟人”。[2] 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把刺杀伊藤博文的朝鲜义士安重根称为“罪犯”[3]。关于谁是伟人、谁是罪人，日本政府与中韩两国看法相反。这反映出日本政府对甲午战争非但毫无反省，反而歪曲历史，可能误导未来。

第六，自 2010 年 9 月发生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以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伴随钓鱼岛之争及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在 2013 年的调查中，对中国无好感的受访者超过 90％。[4] 这与钓鱼岛争议、东海问题和媒体报道相关。1969 年 8 月 29 日，日本设定“防空识别圈”；1972 年 5 月 10 日，日本扩大“防空识别圈”，把钓鱼岛上空划入其中，范围远远超过东海中间线，离中国沿海约 130 公里。近年来，每当中国公务机飞入日本所谓“防空识别圈”，甚至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春晓油气田上空巡视，日本战机也会紧急升空应对。这些在国际空域威胁中国飞行自由与安全的行为，经日本媒体报道，反倒像是中国军机要进入日本领空。这必然引

---

① 《日本拟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方案强调海洋安全》，共同网，2013 年 12 月 3 日，http://china kyodonews. jp/news/2013/12/64786. html。

② 《朝鲜日报》2013 年 7 月 8 日，转引自《安倍反对中国建安重根纪念碑　要韩敬伊藤博文》，《环球时报》2013 年 7 月 10 日。

③ 《日本政府批评韩国推进为安重根立碑计划》，共同网，2013 年 11 月 19 日，http://china kyodonews. jp/news/2013/11/63891. html。

④ 日本言论 NPO 与《中国日报》于 2013 年 5 月至 7 月的调查结果，http://tokyo-beijingforum. net index php/survey/9th-survey。

起日本公众反感。在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撤销，并动员国内外舆论对华施压。类似现象在甲午战争前也曾经出现。例如，1886 年中国军舰到访长崎发生械斗事件，日本便出现举国强烈的反华民族情绪。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

第七，安倍内阁正把中国作为类似原苏联的主要对手制定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安倍内阁似乎已摘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看板”，摆出一副战略对抗的架势。安倍内阁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在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拉拢一些国家在中国周边甚至全球形成牵制中国的战略格局，争取国际社会认可日本行使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冷战”时期，日本追随美国对抗苏联和中国，如今则是安倍内阁要求美国追随日本对抗中国。这在近年来历次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的议题设定及内容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类似情形在甲午战争前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出现过。当时，日本就曾主动拉拢英、美等国站在自己一边，以利对抗、入侵中国。

第八，安倍内阁面对来自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与岛争问题上的反对立场，采取拉拢韩国、集中对付中国的战略。日本对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反应强烈，而对韩国扩大防空识别区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目的就是要利用中韩矛盾，拉近同韩国的关系，陷中国于不利。这与当年伊藤博文内阁的战略思路更为相似。甲午战争前，日本就竭力通过派遣军事教官等方式向朝鲜半岛渗透，扶植韩国亲日派政治势力，甚至以武力为背景制造宫廷政变。最终，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得手，变朝鲜半岛为其殖民地，伊藤博文任第一任韩国统监。

第九，安倍晋三首相在他执政一周年的 2013 年 12 月 26 日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不仅导致中日关系雪上加霜，而且立即激起日本国内外一片谴责之声。这不仅严重违反日本现行宪法有关政教分离的规定，而且践踏了国际公法。根据日本 1945 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然而，安倍首相竟然前往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参拜并汇报工作。这无异于向人类良知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挑战。因而必然遭到包括联合国、亚洲各国、美国、俄罗斯、欧盟的谴责，造成日本在战后以来空前的孤立。

综上所述，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华政策，不仅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的立场，而且有向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内阁对华政策方向演变的危险。尽管日本目前还难以复活战前那种军国主义，在现行《日本国宪法》框架制约下也难以主动对中国开战，但上述现象表明，安倍内阁正在利用钓鱼岛争端，通过任意解释宪法，摆脱战后的自我束缚。这不仅导致钓鱼岛争议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必然导致中日矛盾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矛盾。一旦中日

因钓鱼岛而发生擦枪走火，安倍内阁很可能借机造势，争取一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届时，中日关系将在危险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二）国家兴衰、国际格局与国际潮流的前瞻

第一，未来十年的国家兴衰，关键要看国家走什么道路，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与世界潮流。国家道路通常包括国家的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在社会形态，即社会制度（日文为“社会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决定国家兴衰与国家战略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的转型与变更。成功的国家模式会使国家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而失败的国家模式则会导致国家由兴转衰。① 另外，任何国家都难免犯错误，关键在于国家的自我纠偏能力如何。相比之下，中国和美国自我纠偏能力较强，而苏联和日本则自我纠偏能力较差。

日本自1868年至今，其社会形态，即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改变，但其国家形态，即国家模式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在明治帝国宪法下建立起军国主义国家模式，不断对外发动战争。1945年日本战败后才开始在外力作用下完成国家模式转型，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并通过时任首相吉田茂推行的“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曾根康弘等日本当政者又开始谋求国家模式的转型，对内谋求修改宪法，放弃经济优先，对外开始利用美国支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改变战后秩序。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付出的代价是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萧条，传统企业集团及终身雇佣制度解体，政局动荡，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同亚洲邻国的矛盾不断。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加快了国际格局演变的步伐。这是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一些日本人很不适应、不自在，认为再不抑制中国今后恐将更加被动，而美国重返亚太及再平衡战略则可以利用。日本对华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合作为主，已转向目前安倍内阁的以安全领域抗衡为主。日本国家发展模式正朝更“右”的方向转型。这必然使日本丧失同中国合作可能带来的成长机遇，增加同中国对抗的战略风险。

第二，未来十年，非传统国际格局对传统国际格局的影响将增大，大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有可能增强，但传统国际格局仍然是国家模式竞争的主要舞台。

2001年“9·11”事件以来，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主要是国家与国家、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较量与力量对比的变化。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则是国家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

① 参见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12～15页。

间的较量与非对称战争。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是：社会信息化与恐怖活动网络化、全球化有可能形成隐形的“一极”，其与传统的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之间的非对称战争将持续。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两极热战”对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将趋于增大。由于核威慑对隐形的“一极”不起作用，美国既要维系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主宰地位，又将面临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苏联不同，不仅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反而与美国有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美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反恐、防扩散领域必须借助的合作伙伴。因此，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日本无视美国的安全利益而一味企图把美国拖入同中国军事对抗的深渊，不仅将使美国在传统国际格局中付出极高的战略成本，而且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也将陷入更大被动。

第三，未来十年的国际潮流，是追求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安全。21 世纪国际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是国际恐怖主义；二是“暴力的多边主义”。

所谓“暴力的多边主义”，就是通过军事集团、军事优势、军事打击，武力入侵主权国家。它堪称是 1900 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的现代版。“冷战”后世界发生的所有局部战争和对主权国家的外部军事入侵，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集团或多国部队所为。其结果不仅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造成大量人员生命财产损失，酿成局部战乱与浩劫，并导致参与国陷入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制造了大量的战争碳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之一。“暴力的多边主义”造成的是高成本、低安全的不可持续的安全。

中国是和平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参与者，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2013 年，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暴力的多边主义”受到抑制，叙政府同意交出化学武器。这是“冷战”后 20 多年来的第一次，对维护国际秩序与国际法准则意义重大。除了俄罗斯、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外，英国议会、德国政府的态度也很明智。美国党派之争与财务危机不允许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更何况，叙利亚反对派内有国际恐怖组织的武装集团，美欧深悉这个浑水蹚不得。

然而，在东亚则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方面，针对朝鲜半岛的多边联合军演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竭力谋求突破战后禁区，行使“集体自卫权”，最终目的是以所谓“自卫”为名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与美国等国联合作战。安倍内阁一面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一面仰仗美国，与菲律宾相互利用，试图形成联手抗衡中国的东亚战略格局，甚至企图与北约建立安全合作关系，实质上是准备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为在东亚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做铺垫。这种有违世界潮流的做法没有出路，而依靠和平的多边主义实现低成本、高安全才是可持续的国家安全模式。

第四，未来十年，东亚的大国关系是：中俄合作将继续加强，但只要不发生外敌入侵，中俄仍不会结成军事同盟；日俄领土矛盾难以解决，缔结和约并非易事；美国在与日本保持同盟关系的同时，将避免同中俄形成全面战略对抗；中美战略竞争恐怕在所避免，但只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便不会构成中国的现实威胁；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国家模式转型，中日矛盾可能更为突出，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仍会困扰中日两国。日本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可能还会受到国内外某种制约，但其后日本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可能增大。只有日本国内和平进步势力增强，政治右倾化受到抑制，中日关系才有望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历史上，东亚战略格局从未出现中、美、俄、日四国同时保持友好的局面，今后能否创造奇迹关键看所有当政者能否正确决策。

（三）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

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

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是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

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

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第五,日本民族历来争胜好强,危机意识强、情报意识强、细致调研能力强、集团合作精神强。但日本一些领导人缺乏哲学思维和正确的战略思考,遇到障碍会做策略调整,但不遭彻底失败便很难改弦更张。历史上,日本对俄国、美国都是在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以先发制人的偷袭方式发动战争,而非在拥有绝对优势时才开战。因此,21 世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是否保持自我约束,以及能否受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有效约束。日本历来与强者为伍,但是否对外使用武力,关键要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能否继续得到遵守。日本在《明治帝国宪法》下建立的日英同盟、德意日反共同盟,都曾是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日本在战后和平宪法下的日美同盟则没有对外侵略。今后,日本宪法如何修改将决定日本国家模式如何转型,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日美关系、中日关系走向。

第六,武器、情报、协调、指挥、意志等方面的差距,会成为决定战场胜负或伤亡多寡的重要因素。甲午战争前,日本制定对华作战方案,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刺探中国的情报。自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开创近代日本外交以来,日本尤其重视舆论战、情报战与外交战相结合。如今,NSC 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搜集和研判关于中国的各种情报。2013 年,日本一方面不断要求中国增大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特定保密法》等减少本国的透明度限制本国公民的知情权。这很不正常,反而似乎泄露了日本开始全面加紧对中国备战的天机。对中国来说,要力避自大轻敌、有患无备,丢掉不切实际的预期或幻想,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为中心,加强经济、科技与国防建设。这才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捍卫东亚和平的关键。

第七,正确看待日本人民的作用。在日本国家决策过程中,日本人民实际上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日本对外政策由内阁决定,日本立法与国家财政预算由国会决定。日本人民在这一决策过程中没有直接发言权,也没有直接责任。例

如，在《特定保密法》问题上，日本民众通过媒体舆论、集会游行等渠道也难以改变自民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决策权。日本人民的政治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众参两院选举和地方选举的投票选择权。问题在于，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的情况下，各政党对华态度趋同，日本选民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但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对政府的错误决定未必支持，甚至会强烈反对。因此，中方更需把握日本政情脉络和社会思潮变化，重视并加强同日本各政党、各大媒体、各智库、各友好团体之间高质量、有成效的交往，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善于团结日本人民。即便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把日本广大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魁区别开，对日本战俘教育改造取得良好效果。战后，日本之所以“服美、亲美”，不只是原子弹的威力，而有赖于美国扶植、保护日本所形成的利益纽带，以及“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文化渗透所形成的精神纽带。在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大发展的时代，中国应更加重视国际媒体与对日公共外交，多摆事实讲道理，在解疑释惑的细节与针对性上多下功夫。同时要避免过犹不及地说过头话、做过头事，客观上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第八，日本决策者习惯于盯着局部想全局，而不习惯从全局思考局部。因此，日本往往是盯着中国看世界，总想着如何利用各种力量对付中国，而不善于从世界全局和时代潮流看中国，选择顺势而为。这是导致日本战略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促使日本决策层转变思维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至关重要。例如，应该促使日方正确理解在传统国际格局以外出现的非传统国际格局及其对中美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正确看待和平的多边主义与暴力的多边主义两种世界潮流的较量、影响与变化及日本可取的国际战略选择。这样，日本或许才会认识到，企图诱导、利用美国在军事上抗衡中国根本行不通；企图利用行使集体自卫权，联合多国对中国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也注定会失败。日本应该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基本方向应该是：积极参与和平的多边主义，抵制暴力的多边主义，促进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同时谋求改善关系，在加强日美传统关系的同时推动中日韩合作、“10＋3”合作等，从而使日本成为在亚太地区受尊重、受欢迎的和平发展力量。

面对120年前甲午战争造成的中日历史创伤，总结上述12个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展望未来60年新的甲子，中华民族争取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安全与祖国完全统一，才是“中国梦”的核心与真谛。即便中国有朝一日再度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不能忘记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国梦”的核心与真谛。而当下，我们必须认清，120年来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标志是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而不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地位的变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这一地位至今未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意在对

外侵略扩张过程中，企图以武力挑战美国的主宰地位，结果惨遭失败。“二战”后，苏联与美国全球争霸、大搞军备竞赛，结果和平解体。“冷战”后，日本作为战后第二个“世界老二”，被美国视为经济的“威胁”，结果在追求“政治大国”的自鸣得意之中和平衰落。未来 10～20 年，中国如何避免成为战后第三个失败的“世界老二”，而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而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搅局或拖入战乱，是实现“中国梦”所难以回避的重要战略课题。

第四章
国家大战略与可持续安全

第一节　中国未来的主要战略风险与规避之策

——如何避免成为战后第三个失败的“老二”[①]

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在分析国际战略格局变动时，往往习惯于盯住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衰。然而，战后迄今，引起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版图深刻变化的，与其说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兴衰，不如说是不同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易位。这说明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上升中的大国、后起大国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下滑、衰落的，是有可逆性的。对中国来说，未来30年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如何不做战后以来第三个失败的“世界老二”？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在和平条件下，新兴的世界“老二”为什么会半途而衰？

一、决定战后国际格局变化的关键在于世界“老二”的兴衰

远的不用说，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引起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和标志性事件，其实都是世界第二大国或第二大经济体的兴衰与移位。例如，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瓦解，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失败导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解体”，日本继而取代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欧、日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国际事务与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又如，持续了约20年的美、欧、日主导的世界格局，经历了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的冲击而萧条，日本经济因20年低迷而“和平衰落”，而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于2010年取代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伴随着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国际格局因此而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

① 本文发表于《学术前沿》，2012年08期（下）。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两次世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中，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在未来30年也未必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即便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或许仍将在美国的1/5以下，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况且未来中国必然会面临国内外新的风险与挑战，特别是来自“老大”美国的战略打压与牵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未来30年最重要的战略课题之一，就是防止重蹈苏联和日本的覆辙，不做第三个失败的“老二”。

战后，苏联和日本作为两个曾经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和世界经济主宰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在成为世界“老二”之时起便成为美国打压、牵制、耗损的对象。而这一过程，在客观上也使一些与美国原来处于对立的国家得到美国的青睐，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甚至成为美国的潜在“盟友”。

战后，无论苏联对美国采取军备竞赛、军事结盟、军事对抗或军事扩张，还是日本与美国结成盟友、唯美国马首是瞻，只要是世界“老二”，都会成为美国坚决敲打、制衡和弱化的对象。

战后，无论苏联或日本，国家经济规模都没有达到美国的85%便开始下滑。结果，苏联“和平解体”，日本“和平衰落”。世界第二大国的兴衰与移位必然带来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组。

这是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美国的战略本能使然，美国的战略本领使然。美国军产复合体的国家模式、国家安全战略本能、国家安全利益观决定了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美国历来把有可能对其全球霸主和世界一超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只要这一点不改变，美国就必然对战后第三个“老二”——中国采取同样的路数。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四项长期国家利益：第一，安全：美国及美国人民和盟友的安全；第二，繁荣：处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能提供良机、促进繁荣的强大、创新和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第三，价值观：美国及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得到尊重；第四，国际秩序：在美国领导下，通过加强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并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美国的长期安全利益中不包括盟友的人民和非盟友国家的安全，为了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甚至可能不惜损害别国和盟友人民的安全利益。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开始了两个重点转移：一是战略布局重点转向传统的大国战略格局较量；二是军事部署重点转向从朝鲜半岛到印度的海上弧形地带，针对中国的一面明显上升。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必然会遇到霸权国美国越来越多的打压。根本问题并非中国要搞“零和局”，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美国的国家模式与战略本能要为创造互利共赢的新兴大国关系而作出根本调整。

另外，许多“诱惑”也使美国不由自主地把矛头指向中国。这些“诱惑”包括：第一，中国国内客观上存在一些矛盾，某些反社会、反体制、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不断“诱惑”、投靠美国；第二，中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领土、海洋权益争议，这些国家本能地要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第三，中国在经济、科技、国防等综合国力发展迅速，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在增大，树大易招风。

二、战后两个世界“老二”失败的教训

苏联的兴衰与解体。从战后发展历程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第一个挑战者是苏联。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决定的，相当复杂。从理论根源上讲，苏联解体正是国家模式竞争的结果，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破产，而绝非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失败。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 1922 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从 1946 年到 1980 年，苏联实行了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据公开数据，1982 年与 1950 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了 8 倍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 12 倍和 13 倍，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 1950 年的 12.6％升至 1982 年的 20％。这期间，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7.4％，总量从相当于美国的 31％上升到 67％，[①]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苏联则开始走下坡路。

从理论角度看，当时苏联只强调其社会形态同资本主义对立，而没有国家模式的概念，因而从理论上不可能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把自己的观点作为真理的标准，“而不许离开半步”。[②] 当时的苏联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世界出现“两个平行与对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日趋衰落，活动范围日趋缩小，“并必然要遭到彻底失败”。[③]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一方面不断通过僵化的计划经济加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一方面企图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附或服从其所谓的国际分工。然而，这种斯大林模式不仅造成苏联的畸形发展，而且导致其与东欧国家、中国等国家关系恶化，最终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解体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作区分，没有做到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扬弃苏联模式的历史垃圾，

---

① 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年，第 8、24～25、30 页。

② ［苏］罗·亚·麦德维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赵洵、林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877～888 页。

③ 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年，第 8、24～25、30 页。

而是把这两者统统抛弃。

1988年苏共十九大时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全人类价值优先”、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决议称，“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损失”。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称：“我们已经抛弃了斯大林集权官僚体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被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所取代”。实际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被画上等号，并一起被抛弃掉。当时的苏共领导层不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改变斯大林模式，因此也不可能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同时实现国家形态模式的成功转型。

从实践方面看，苏联国家模式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由于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做必要的理论区分，对于何谓苏联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苏联模式，应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形式，其特点是高度集中”[①]。其实，所谓苏联模式，是以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推行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国家模式。其虽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示人，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模式方面则与美国的国家模式没有多少区别。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度高达14%，而轻工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却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特权阶层则作威作福。

美国对苏联实施的遏制、分化、弱化战略，是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争夺，导致苏联采取了与美国相似的对外战略模式和国家军产复合体，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国曾经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即所谓美苏“G2”，成功地利用了中苏矛盾，通过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等瓦解苏联阵营的东欧伙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美国又加紧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与全球霸权。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走下坡路的助推器。

尽管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优先发展军事，与美国争霸世界，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调、资源能源空耗，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模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国又推行所谓“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主张的所谓新思维，开启了全面否定苏联的“公开化”，在展开有效经济改革之前首先启动“政治改革”，结果就像按错了改革顺序的按钮，造成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②]仅搞垮

---

① 李兴：《转型时代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② 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0～851页。

了苏共,而且最终搞垮了苏联。

总之,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经验,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沙俄时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外扩张战略等,也是导致美苏冷战及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对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缺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概念的区分而陷人极大的盲目性和内耗,最终导致中苏关系分裂,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甚至苏联自身和平解体。

日本的崛起与衰落。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 1955 年的 2.2%升至 1990 年的 13%,同期美国却从 36.3%降至 26.6%。1955 年日本的人均 GDP 仅为 268.5 美元,而美国为 2422.4 美元,但到 1992 年日本已猛增至 28220 美元,超过同年美国的 23120 美元。日本从 1968 年起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苏联解体后日本晋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1994 年日本经济达到巅峰,同年美国的 GDP 为 5.3 万亿美元,按 1 美元兑换 90 日元计算,日本 GDP 已达 4.7 万亿美元,接近美国 GDP 的 88%。同年日本海外净资产高达 6889 亿美元,连续 4 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 10 大银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 9 家是日本银行,日本的大银行名列榜首,而美国则无一家。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10 年日本 GDP 将达到 7.5 万亿美元,与美国的 7.7 万亿美元基本持平,相当于中国的 4.7 倍。

然而,这一时期正是日本经济泡沫膨胀而行将破灭的时候,日本却似乎浑然不知,显得相当飘飘然。结果,近 20 年过去了,2010 年日本的 GDP 降到了美国约 35%,并被中国所超过,沦为世界第三位。这的确是日本当时连做梦都没想到的。

20 年多来,日本政局动荡,一些日本人津津乐道所谓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但由于根本没有认识到国家模式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不断在美国的诱导和自我误导下,在危急中越陷越深。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小布什政府单边黩武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向伊拉克派兵,向印度洋派舰。一方面,对不断发动战争的美国言听计从,提高了日本的国家安全成本;另一方面,在国内推行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自由竞争,导致日本稳定的雇佣体系瓦解,贫富差距拉大,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经济低迷,致使日本经济 20 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又重创日本经济,这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发展模式的失败对日本国家发展模式造成的误导与连累。在日本被“拖下水”的背后,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起作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凡是有可能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和集团,都是美国安全上的威胁,都要对其进行“敲打”和改造。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也不例外。这是美国国家发展模式本能所决定的。

目前,韩美军演、在南中国海的军演以及年内美日加强在东海的军事合作等,

虽然各有不同的主要目的，但都是对中国的战略底线和近岸防务发展的一次试探。通过军演向中国施压，并设法怂恿、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抗、牵制中国。美国《国家》杂志指出，这一举动显示美国正计划建立“全亚洲——太平洋军事联盟”来遏制中国，这正是美国“二战”结束后建立北约组织来遏制苏联的方法。

未来国际政治的现实很可能是，如果美国军产复合体的国内经济模式与全球霸权的对外军事模式不改变的话，无论哪个国家处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都难免受到美国的战略打压。对处于“世界老二”的中国来说，必须警惕美国同时运用对付苏联和日本的打压方式对付中国。即围堵、捧杀，再加上利用“三股势力”和台湾问题分裂中国，使中国发展模式的重心偏离既定轨道。

美国的得手与麻烦。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西方经济陷入混乱。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当时，美国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另一方面受到日本的经济挑战。于是，里根总统上台后确立了两项战略：第一是在军事力量方面，压倒苏联，成为超级军事大国；第二是在经济方面，阻止日本的发展势头。其谋略之一是，利用中曾根康弘首相爱讲私交、好谈国际战略的特点，促使日本放弃吉田茂时期“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鼓励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所谓的“普通国家”，通过留学美国的官僚、学者等日本社会精英传播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推动日本结构改革与自由化。

这样，美国就得以继续增强军事力量，并利用日本的电子技术实现新军事变革，在全球范围围堵、拖垮苏联；同时用日本感觉比较舒服的方式将其纳入自己的管理轨道，抑制了日本的经济强劲势头。结果，正如日本资深评论家森田实所说：“里根的这两项战略都如愿以偿。美国用 10 年搞垮了苏联，用 25 年搞垮了日本。”

美国人与中国人彼此或许并无恶感或歧视，个人之间的接触也很容易。因为美国是世界民族的熔炉，而中国又天生包容豁达。但是，一旦作为中美两国相处，情况则复杂得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国家模式所产生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如何规避这种负面影响，是中国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

三、世界“老二”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模式成败

苏联是个富有想象力和浪漫的国家，但不够精细；日本是个脚踏实地、讲究细节的国家，但缺乏仰望星空的宏观思考与哲学抽象能力。但这些都不是这两个世界“老二”衰落的根本原因。决定大国兴衰的除了国际环境以外，很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模式，即国家形态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并顺应世界潮流。中、美、日、苏(俄)的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同时期的国家模式的成败，与这些国家及民族的兴衰直接相关。

苏联模式失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被称为“转型国家”。这种“转型”实际上是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的整体转型。迄今，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国家模式)转型理论提出过现成的答案。于是，一些人不是努力根据社会实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抛弃它，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则不同，它是在维持原有社会形态的前提下成功完成了国家形态转型，并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

俄罗斯作为“转型国家”，20 年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开始重新恢复活力，与其国家模式转型成功及国际油价、金价上涨有关，而存在的一些弊端则与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结果导致油价、金价暴涨，在客观上帮了俄罗斯的大忙。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和黄金蕴藏大国的俄罗斯趁势暴富。俄罗斯已经意识到这种发展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开始把财富转向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以强化与美国为首的北约抗衡的世界第二军事大国地位。不过，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和涨价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国际经济地位互换，其实质是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的结果。从 1868 年明治维新算起，140 年来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是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即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终遭惨败。第二次是国家模式转型是 1945 年战败后，日本采取了“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连续 40 多年保持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为保持社会稳定，日本通过征收遗产继承税等手段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也颇有成效。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国家模式转型，放弃了“轻军备”路线，接受了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日本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经历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日本背离了战后“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的经济衰落和外交施压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的国内决策。例如，日元被迫升值，企业改变终身雇佣制和持股结构，通过立法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协助美军作战，为应对“中国威胁”购置大量美国武器等。这些必然使日本丧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优势。风靡一时的“日本模式”几乎成为失败与衰落的代名词。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前会长小岛明指出：“日本脱离了不断改良变革、适应变化的模式，便会面临失败与危机。过度信奉富国强兵的‘强兵’模式是失败例子。另外，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泡沫景气时，许多人误以为空洞的泡沫是实力，自我陶醉于日本经济会永远繁荣”，结果也失败了。“日本发展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应

"认清时代潮流"，建立一种"不断适应情况变化的有活力的模式"。①

日本战后以来也走了和平发展道路，但前40年(大约)和后25年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也是因为日本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提出"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贸易立国为导向、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结合、终身雇佣与企业集团经营等为特征的国家发展模式，使日本在1968年就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国民心理开始出现变化，日本决策者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强国，转而要求与经济强国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发言权，期望在国际军事领域发挥作用，成为政治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于是，日本按照美国的意图令日元升值，出巨资支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替美国承担海外责任。20世纪90年代，在美日贸易摩擦中，美国迫使日本扩大内需，放松金融监管，导致泡沫经济破灭；诱导日本改变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企业集团之间的联系，结果，日本大量非正式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随之涣散，企业技术积累、人才积累质量下降，生产力不断下滑。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随之逐渐改变。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20年经济低迷，一蹶不振，最终被迫让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实际上是日本在国家发展模式上"误入歧途"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前后30年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就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邓小平生前曾对莫桑比克领导人讲过，"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② 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③

1978年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和平发展为道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国家发展模式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赞许。中国坚持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不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干扰，不计较历史恩怨，努力营造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周边环境，坚定地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同时，不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拒绝学习别国的长处，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

---

① [日]小岛明：《日本的选择：迈向"适者"模式》，东京，日本NTT出版社，2007年，第309～3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0页。

③ 同上。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国家模式角度看，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有教训又有经验。

第一阶段，新中国的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在前30年，无论是模仿还是批判当时的苏联模式，都没能使中国走向辉煌。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十年“文革”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阶段，新中国的后30年突飞猛进，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0年不到日本的13%，2010年则达58786亿美元，超过同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3年的4.6%升值2009年的14.5%，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国。2011年，中国外贸总额达36420.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2000年至2009年，中国外贸年均增长16%，远超过同期世界贸易3%的年均增长率。

四、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战略机遇期并未消失，但战略风险可能逐渐增大。战略机遇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中国并非是在军事上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才是第二军事大国，因而美国在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的博弈中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而不会在军事上集中对付中国；第二，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美日关系不同，一方面具有较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第三，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导致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了“非传统国际格局”，其主要特点是，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的基地组织已形成针对美国的隐形网络，美国与这隐形的一极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明确提出这一点(参见图4-1)。

与此同时，伴随中国未来的发展壮大，美国将千方百计地运用外交谋略、军事威慑、地缘角逐、政治分化、思想渗透、经济制裁、金融手段等，防止世界“老二”超过自己。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只不过是这场角逐的开始。当然，美国不会、也要避免和中国迎头相撞，发生战争，但可能会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或者当面赔笑脸，而背后另搞一套，在中国周边利用代理人制造摩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中国周边的黄海、东海、南海相继(反复)有一些国家在岛屿领土及海洋权益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肆意生事。

图 4-1　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将继续制约美国称霸世界

美国模式的结构性矛盾是，以军工产业为基础的军产复合体是美国经济、科技、就业的动力源泉和政经利益集团。这种结构性矛盾在美国国内的集中反映是：一方面，美国社会矛盾、心理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校园、影院等处的枪击惨案频发；另一方面，美国难以通过禁止销售枪支的法律。在国际上，美国发动战争有利于刺激军火工业的发展，拉动美国经济，但长期过高的财政赤字到头来又难以支撑，不得不进入削减军费的周期。在这个周期，美国要维持军工产业生产线的运转，就必须扩大武器出口，使别国心甘情愿地替美国军火商埋单，从而转嫁美国的财政危机。于是，为推销美国军火而制造"中国威胁论"，为一些国家挑战中国提供武器，就成为美国战略生存的本能。

在全球军售额前 10 名企业中，有 8 家美国公司，其 2009 年武器销售总额达 1988 亿美元。根据美国宣布未来 10 年将减少 4800 亿美元的计划，未来 10 年美国军费将年均减少 480 亿美元，那么美国势必会谋求扩大武器出口。因此，美国在未来 10 年将继续制造地区紧张，挑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矛盾，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要吸取苏联和日本的教训，在充分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同时，不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更要接受日本教训，拒绝"捧杀"和所谓的"承担国际责任"。

中国虽然位居世界经济第二位，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在科技、环保领域，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未来 10 年，中国一定要认清当今时代"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的总特征，保持谦虚，争取合作，丢掉幻想，准备竞争，争取在不同国家模式的竞争与合作中取长补短，在完善本国国家模式中继续前进。

中国要继续坚持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继续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霸权；继续和包括日本、美国

等国家在内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唯有这样，中国才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重蹈苏联和日本的覆辙，在不断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成为国际社会更加强有力的和平力量。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中国未来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完善中国模式，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同时要遵循《易经》中的哲理，在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在有所作为中韬光养晦，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这样中国才能确保在未来 30 年不成为战后第三个失败的“老二”。

第二节　中国未来30年的路该怎么走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①

伴随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2008年的辉煌一定会被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模仿“苏联模式”到批判“苏联模式”，终于从1978年开始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从那时起又历经了30年的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成功地创立起本国特有的国家发展模式，并引起世界的关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便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展示。然而，未来的道路并不平坦，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思考未来30年中国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对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模式”与国家战略

（一）“多元一体”的中国国家形态

要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首先要了解中国国家模式的基本状况和时代的大潮流。

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有一种解释是：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较为协调发展的模式，是现代中国在数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科技模式、文化模式、社会发展模式等子模式的综合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各级各类组织模式的抽象和概括。②

笔者认为，国家发展形态是个大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各国的国情与历史逻辑决定了该国国家类型的结构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形成“多元一体”的国家发展模式，即“多元”组成“一体”，“主体”汇聚“多元”，相辅相成。它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1)经济制度和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制形式并存；(2)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的

---

① 本文发表于《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11月，第16卷第6期，有删减。

② “中国模式”网，http://www.zhongguomoshi.com/index.html。

分配方式与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3)经济体制运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采取法制、规划、行政、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进行国家的宏观调控；(4)国家政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权力主体，政府各部门分工合作，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5)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多党合作制；(6)民族人口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团结统一，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7)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国两制"；(8)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主体，借鉴世界上的所有进步文明；(9)文化艺术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中的精华为主体，吸收全人类所有健康、卓越的文化艺术成果；(10)中国外交是以政府总体外交为主体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党、议会、民间、经济、科技、环境、军队、公共外交等与之相互配合，相辅相成。

近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交往增多，美国的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例如，最早是 2004 年 5 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指出中国模式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号召力，而美国模式却正在失去吸引力。同年 5 月 11 日，他又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产生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②]

（二）未来 30 年中国的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通常是指国家具有全局性的通盘长远规划。中国的国家战略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站在时代高度，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国家利益及世界的共同利益。这种战略应该明确地告诉世界自己的目标：未来 30 年的中国将是文明的中国、环保的中国、科技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平安的中国、繁荣的中国、诚信

① 《"北京共识"的潜台词》，载《瞭望新闻周刊》，2007 年 10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10/17/con-tent_6894093.htm。

② 《全球舆论热议"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启示世界》，http://www.china.com.cn /international / txt / 2008-03/27 / con-ten_13713417.htm。

的中国、和谐的中国。这些也堪称“中国模式”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1. 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可取的国家战略选择

鉴于上述时代判断，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应确定为一项“多元一体”的“和平发展战略”。它有两大支柱体系：一是和平与安全战略系统（即国家安全战略系统）；二是发展与繁荣战略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前者应当是在科学安全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后者应该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复兴。

2. 创造性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所决定的，既是保障中国长治久安的需要，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是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其具体内涵也需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充实。例如，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狭隘地理解为只要GDP增长速度快、只要能赚钱就好，而要富国有道，强国有德，实现科学发展。未来30年，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节能省能、循环经济等领域，将成为科技创新的新天地和增加就业的新途径；成功企业的标准不再是经济效益和利润，社会责任感、诚信度、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等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也可以丰富发展。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在1982年中国修改宪法时就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同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僵化，而要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迄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今后仍将具有生命力。同样，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原理也有待创新。

在这方面，系统唯物主义便是最需要进行理论探讨并用于指导实践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和人民的力量，指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大趋势。辩证唯物主义重点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系统唯物主义则是在此基础上揭示事物

的结构法则，通过对事物系统层次的科学研究，把纷繁复杂的事物条理化、简单化。辩证唯物主义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即“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的特点则在于，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它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可以相互协调配合、彼此连接的系统，即“一分为多”或“多合为一”的。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系统唯物主义强调针对矛盾的多样性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加以解决，例如综合治理等。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具体运用系统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尝试论述未来30年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及其哲学基础。

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矛盾对立和斗争的一面比较突出。两种社会制度本身都是“一分为多”的，有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本身在发展阶段上也是“一分为多”的，目前中国给自己的历史定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同时也应向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益的经验。

二、未来30年中国的和平与安全战略

未来30年中国的和平与安全战略，即“可持续安全战略”，可以设定三大目标：一是长期确保我国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长期确保我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长期确保在传统安全领域相对平衡的战略环境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谋求共赢的国际合作环境。未来30年，只要这三大目标能够实现，中国就有可能在经济科技实力方面进一步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可持续安全战略”作为一大系统可分为以下几个彼此相关的子系统。

1. 国防安全战略系统

这一分支系统至少可分为四个子系统：兵种兵力的配置；武器系统的改进；情报指挥系统的完善；后勤系统的保障。中国采取不结盟的对外战略模式，必须拥有独立而强大的国防力量，用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中国应将继续通过科技强军提高国防装备质量。

但是，中国不能重蹈苏联牺牲经济建设而过度增强军备的覆辙，更不会谋求美国那样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对外使用武力，因为那不仅不能确保本国安全，反而会使本国安全程度下降。即便能凭借绝对军事优势而获得一时的战争胜利，也会因损害别国的安全利益而付出巨大军事和政治成本，难以确保持久安全，会出现“安全异化”的困境。

未来30年，如果中国能继续长期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国防安全战略将被国

家安全战略所取代。确保“可持续安全”对中国来说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持续安全”与“持久和平”是交叉概念，但不是同一概念。其主要特点是，更加重视在和平条件下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确保公共和公民安全；通过本国努力和国际合作，以较低的安全成本换取各领域较高程度的持久安全。军队将更多地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抢险救灾、维护海洋通道安全，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合作。

2. 外交战略系统

以政府官方总体外交为主体，它至少包括六个子系统：民间（包括文化、艺术、体育等）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军队外交、公共外交、科技外交。

未来 30 年，伴随中国国力的壮大，世界将更加关注中国。中国将继续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同时开展“和谐外交”，尽量减少和缓解本国发展中遇到的外部误解、摩擦与阻力。中国外交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维护和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并加强合作。例如，在中国的友邦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时，中国要积极扮演“劝谈促和”的角色。特别是在中东等产油国集中的地区，防止战争爆发，力促紧张缓和，不仅涉及中国外交形象，而且直接涉及能否抑制国际油价飙升、确保石油供给安全、舒缓国内通胀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等。

同时，中国讲“和为贵”也是有条件的。《论语》称：“礼之用，和为贵。”但如果为“和”而“和”，不讲礼，在孔子看来也是不可行的，即“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时，必须展开外交斗争，必要时一定要显示我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

在处理好大国关系的同时，要继续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论语》称，“德不孤，必有邻”，即有德的国家不会孤立而会有善邻相助。《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笔者认为，有德的中国，就是强而不霸、大而无私、言而有信的中国。《管子》有言道：“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我国周边外交要努力做到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对待邻国要做到邻厌我避，邻乐我喜，邻困我帮，邻恶我防，邻好我学。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国际地缘战略理论也需要创新。历史上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斯派克曼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等传统的西方地缘战略理论，是为争霸世界服务的，已经过时。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有必要、有可能实现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和平合作，通过提倡和实践“海陆和合论”，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

3. 国内稳定战略系统

这涉及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以及两者之间的灰色领域，可以分为四个子系统：公检法机能的健全、情报与决策、保密与反间、针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危机管理。中国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反对分裂祖国是各族同胞的共同任务。它也可以分为四个子系统：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团结合作、反分裂斗争与统战工作。

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很重要的是要确保民生，顺乎民意。在管仲看来，“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管子》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对于中国来说，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就业问题、物价问题、金融市场稳定问题等，都关系到国计民生，需要长期关注，防患于未然。

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很重要的是要确保公平与正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防止经济犯罪，确保公平正义，只能通过法律保障才能得以实现。未来30年，商法、民法、税法和其他经济立法需要健全和加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应带动更多的人共同致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更应注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关键是要避免差距拉得过大，尽量缩小贫困人口及弱势群体的数量。某些发达国家征收遗产继承税等做法，有利于防止极端的两极分化，可以借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内和谐与民族团结。内陆地区城市应为少数民族地区特产的流通提供渠道和场所，在一定时期内可适当减免部分税收。

过去30年，中国重视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今后30年，中国要重视农民、网民、股民这“三民”问题。“三民”满意度也许将成为观察中国社情民意的新指标，为政者不能不察。各级政府和党组织要确保一方平安，都要及时了解民意，做好人民的公仆，努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建立良好的警民关系，防止矛盾激化。

4. 国家统一战略系统

它包括四个子系统：“一国两制”与两岸统一；港澳的繁荣与稳定；海外侨务与事务；反独促统与统一战线。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未来30年，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的梦想还要靠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即使30年统一不了，100年、200年也要统一，因为台海两岸不统一，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就可能继续受到威胁，与台

湾问题相关的国际因素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未来 30 年,中国海峡两岸的经济将进一步融合,人员往来将更加自由,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可能性将增大。在“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而且与香港、澳门不同的是,如果台湾与大陆统一,中央政府将允许台湾拥有岛内的军队。届时,台湾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共同分享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崇高地位和巨大的国际活动空间。海峡两岸的力量相加而不是相互抵消,不仅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还将使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不是必然对抗的关系,更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祖国母亲与游子的关系,是大树的根干与枝叶的关系。海峡两岸的分裂,在历史上犹如母亲被蹂躏,游子遭遗弃;在现实中犹如内外有蛀虫,根叶难相连。未来中国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制度问题,而将主要体现在代表国家主权的外交权问题上。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海峡两岸的民众、政治精英和领导人拿出智慧和勇气加以解决。目前,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在台湾追求所谓“国际空间”问题及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干涉,中国大陆不愿看到台湾越走越远。从长远看,鉴于两岸分裂状态产生的历史复杂性,中国大陆在全面发展、完善自身的基础上若能进一步对台湾同胞施以仁爱而不强求,将有利于两岸长远的和谐融合。海峡两岸真正迎来“母子团圆”、根深叶茂的那一天,才谈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未来 30 年中国的发展与繁荣战略

未来 30 年,“中国模式”的发展将令世人更加惊叹。然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不能盲目乐观,而需要制定一项全面可行的发展与繁荣战略,一项全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项战略不仅是指经济发展,更是广义上的发展,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分支系统。

1. 经济发展战略系统

它又可以分为九个子系统:经济体制和市场秩序;财政金融;生产流通和运输;粮食与能源;信息现代化;对外经贸和旅游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建设;环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专利保护与科技创新。在这些方面保持健康平稳、协调有序、平衡快速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今后 3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将深化和拓展。

在内涵方面,农村和内陆西部地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内需的扩大不仅有待城市消费水平的提高,更有待于农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科学种田、科技

务农，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之一。生物技术、环保技术、气象技术对绿色农业、牧业、渔业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北方农村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是需要长期努力解决的大问题。科学的人工增雨雪，将为中国北方干旱地区农业、牧业作出巨大贡献。我国农村的雨水下水道系统与田间灌溉系统需要统筹设计、建设和有效利用。农村生产生活供电系统建设要尽量利用太阳能、沼气、风能及其他新能源。农村污水、污物、垃圾处理系统应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城乡之间交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农民致富，也有利于中国汽车业市场的扩大。未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将使中国部分农村成为观光、旅游、度假的好去处。

在外延方面，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地位将显著提高；伴随中国制成品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原油、原材料进口成本的提高，人民币适度升值是必然趋势。今后中国要继续确保出口产业发展和企业生存，只有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附加价值、安全标准和售后服务水平，及时促使产品升级换代。应高度重视我国能源、稀有金属的开采、加工和出口管理与战略储备。伴随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多和人民币升值，对国际能源资源类海外投资应进一步增加。过去以吸引外资为主的改革开放，将向企业走出去，加强海外并购、投资的方向发展。企业确保海外利益，规避海外风险将变得越发重要。

未来 30 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旅游业、环保业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有较大提升。在股市、汇市、期货市场上，机遇与风险同在，国内与国际联动，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任重而道远。

2. 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战略系统

它至少可以分为六个子系统：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跨学科边缘科学）的理论创新；应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科研体制和科研队伍建设；产学研结合与成果转化；素质教育与人才培养；文化与精神文明发展。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未来 30 年，中国新一代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人才将充实各条战线，“80 后”“90 后”“00 后”的新一代将成为中国各行业的骨干力量。

中国重视儿童素质的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伴随社会进步和观念更新，教育首先要从娃娃的教养抓起，从家庭到社会，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优良品质。这对人的一生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贫富差距与知识差距、受教育程度差距有一定关联。因此，未来 30 年，中国教育要重视普及与提高并重，在努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要努力普及中学和大学教育，努力发展各种专业技术教育。教育与教学改革要适应人才成长规律，适应

社会发展与就业市场的需要。在国内教育普及化、规范化的同时。针对外国人的国际教育可以搞产业化、多样化。

文化与精神文明发展战略涉及四个子系统：以德治国（树立和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军风、警风和民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学艺术及大众传媒的净化与繁荣；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其核心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建立中华民族21世纪先进的核心价值与文明体系，提高国人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中国作为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对国学的研究需要深入，而不能囿于某些阻碍人们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固定之说。中国不仅要鼓励科学技术创新，而且要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以及交叉学科的创新，尤其要重视原创性、原理性创新，使其在社会进步和政府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产业也会得到较大发展，中国文化对世界将充满新的魅力。

3. 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系统

它可以包括四个子系统：民主与法制；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干部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未来30年，中国越是强大，市场机制越发达，中国共产党人就越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思想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法律法规建设应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廉洁勤政，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例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加强对干部廉洁敬业、部门廉政勤政的社会监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系统，应进一步发挥在国家政治生活和联系群众方面的重要作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不仅要在每年的会议期间开会议政，而且要在平时发挥了解民情、反映民意、积极建言的作用。

软国力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无形的力量。它是建立在文化软实力基础之上的，其核心是国家的情报获取与正确决策能力，加上对国内外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是纵向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执行能力，而欠缺的是各部门横向沟通、协调与整合能力，以及从社会角度由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和民主参与习惯。下面找上面的个人举动，通常是本人遇到不公正待遇而为个人“讨说法”的上访行为。

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利用信息化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增强，进行决策机制的改革。首先，要努力构建不同层级的横向协调机制。例如，城市地铁与国家铁道车站枢纽的建设就需要第三者从中协调，使不同的交通工具可以互通，方便乘客，提高效率。不同单位在马路上埋挖管线等，也需要有统一的规划、组织与施工。其次，要努力建立公民个人随时可以民主参与国家或地方政治、社会及公共事务决策的机制。例如，重大问题可事前进行民意调查，作为决策参考。有关部门可

以利用互联网、可视电话等进行公开办公，听取民众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并具体落实且有所反馈。最后，中国民主政治应建立在公众爱国热情与民主渠道畅通的基础之上，应建立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与公众研究能力培养的基础之上。学校和社会要大力培养人的研究能力与习惯。这样，更多的人就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地参与社会发展，从而使社会整体充满生机与活力。

4. 社会保障和人口发展战略系统

它涉及四个子系统：医疗卫生体制；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老龄化社会对策；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这些都是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在思考中国国家战略时不能忽略。

《管子》治国之道中提出“德有六兴”。所谓“六兴”是指政府在六个方面要为百姓办实事：一是“厚其生”即开辟田野，修建住宅，讲求种植，鼓励士民，勉励耕作，修缮房舍；二是“输之以财”，即开发潜在资源，输运积压物资，修筑道路，便利集市贸易；三是“遗之以利”，即疏导积水，修通沟渠，决通江诸溢水，溃决泥沙淤滞，打通河道阻塞，维护渡口桥梁；四是“宽其政”，即薄收税捐，轻征租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过错改正后既往不咎；五是“匡其急”，即奉养老人，慈爱幼孤，抚恤鳏寡，慰问病人，吊问祸丧；六是“振其穷”，即给受冻寒的人衣穿，给受饥渴的人饮食，救助贫陋，赈济衰败，资助乏绝。

上述2600多年前的中国古人提出的六德，对未来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也具有参考价值。未来30年，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将步入老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养老对独生子女来说，精力和心理的负担可能增大。“1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社会挑战可能出现。因而国家和社会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方面需加大力度。

如果以百年为单位从未来长远考虑人口控制战略，比较受社会认可的方式是“可选择的1.5胎化”模式，即，在坚持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基础上，对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允许选择生两个孩子；对两位或其中一位不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原则上仍维持“1胎化”的生育政策。这样长期下去，社会将在个人自愿选择与政策规定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客观上将形成总体“1.5胎化”的动态自组织结构，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5. 环境、生态、气候改良战略系统

包括中国在内，目前世界面临五大全球治理方面的难题：一是沙尘暴，被有关单位称为“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二是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三是水资源

短缺或遭污染，引起农业歉收、粮荒、冲突与战争；四是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冰川消失，疾病传播，令世界各国忧心忡忡，苦无良策；五是粮食危机，引发粮价上涨，一些国家发生骚乱。这五大难题彼此相关，有出现恶性循环之虞。

迄今，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传统思路和做法难以解决上述难题，人类还在苦苦地探索。例如，对于防治沙尘暴、荒漠化，传统的方法是依靠植树种草，但在持续干旱情况下，既无法阻止尘暴或扬尘的出现，又难以有效阻止荒漠化。又如，有关全球普遍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国际社会迄今一直试图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来减缓或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但不仅难以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响应，而且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制约，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所有减排措施如何验证其持久的功效。具体到我国未来 30 年的生态改良战略，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解决现存的难题。

(1)利用人工增雨防治北方沙尘暴

传统思维认为，沙尘天气和荒漠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风使地面沙尘产生了横向运动。所以，治理沙尘暴的关键是通过种植防风林、灌木、草场等阻挡风沙和扬尘前行，重点要采取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措施。这是一种传统的“平面横向”思维的治理模式。

然而，2000 年以来我国荒漠化增加面积呈下降趋势，而沙尘暴却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中国北方地区持续干旱，地表干土层加厚，大风把较深的地下粉尘卷上高空。沙尘随风飘浮高度可达 3000 米，再高的树也挡不住，所以光靠植树造林种草是不可能抑制沙尘暴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平面横向”思维治理模式，从立体空间的大系统出发，引入通过人工增雨雪防沙治尘的“立体纵向”思维模式。

它具有五大功效：第一，可以增加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地下水和土地墒情，从根本上确保农作物和林草的生长；第二，可以保持北方河流、湖泊、湿地的良好自然生态，防止土地沙化、盐碱化，而地表水面和湿地面积的扩大又可使蒸发到空中的水分增加，从而较易形成新的积雨云等人工增雨条件；第三，可以降低地表干土层的厚度，减少强风低层垂直对流所卷起的沙尘总量，从而有效降低沙尘暴的强度；第四，可以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子，起到从高空到地表全面拦截沙尘的功能，从而缩小沙尘暴危害的范围，立竿见影地收到防治沙尘危害的效果；第五，可以有效防止森林火灾和增加植被，为缓解气候变暖作出直接的重要贡献。只有风调雨顺，农牧业才能有较大发展，农民才能增收。而只有农民以农为主，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污染企业排放对中国内陆水系和土地的污染，确保中国的食品安全。

今后 30 年，要有效防治中国的荒漠化和沙尘危害，最佳选择是采取“纵横交

错”思维的治理模式，即“纵向立体”的人工增雨雪与“横向平面”的植树种草相结合。中国北方的森林、牧场、农田等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都应建立人工增雨雪作业点。与此同时，我国仍需加强防风林、防沙林建设，扩大森林面积。人工增雨可以和飞播造林同时作业。人工增雨雪具有森林防火作用，是林业发展的“保护神”与“增长剂”，两者相辅相成，合作是必然趋势。

由于季风的变化，要防止冬春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沙尘暴或扬尘天，就须做好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和东北地区的人工增雨雪；要防止春夏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扬尘和阴霾，就要加强在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的人工增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之所以得到保障，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从 2007 年以来的人工增雨作业，有效地减少了空气中的扬尘等可吸入颗粒物。今后，在完善机制的基础上，还需提高人工增雨雪的技术水平与实效。我国北方土壤偏碱性，不易形成酸雨，而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之工业污染会促进酸雨生成，故需加强这方面的治理，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

从长远考虑，我国政府应制定 21 世纪人工增雨雪战略，并把它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我国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三江源头已有枯水之虞，只在每年 6 月至 9 月人工增雨效用有限。我国应在三江源头实施全年人工增雨雪，冬春人工增雪尤其重要。此外，还应在大小兴安岭、天山、昆仑山等三山地带实行全年人工增雨雪作业。这有利于森林防火和扩大再生林。我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应制定百年人工增雨雪长远战略规划。从理论上讲，中国北方人工增雨有利于减少南方的降雨量及水灾的形成。

(2)城市雨水排水系统与“绿色工地”革命

人工增雨雪可以解决大范围的高空扬尘，但未必能保证城市空气质量，有时反而还会加剧局部扬尘，因此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还需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发展与环境改善的要求。

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和加强城市雨水排水系统的功能。中国城市建设应修改原有下水道设计，缩小入水口的间距，全面加强城市徘水防洪防尘功能。在这方面，日本城市的设计、理念、材料、功能等值得借鉴。缩小雨水下水道入水口间距，不仅可以防止中国夏季城市道路积水、冬季南方雪灾造成路面冰冻，而且可以在平时起到城市“地下吸尘器”的作用，是城市文明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空气清新，全民的体育健身活动才能普遍展开，对增强人民体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城市修建完善而到位的雨水下水道系统，还可以使地下建筑得到充分发展，提高国土利用面积，在未来的我国城乡建设规划中应认真研究考虑这个问题。

今后 30 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要确保城市减少局部扬尘，有

必要提倡“绿色工地”革命。首先要通过建章立制，解决建筑工程程序倒置问题，凡新开工的土木工程，无论甲方是否有要求，都必须事先修好通往工地的道路和施工现场的柏油路或水泥路才能动工。凡北京城市建筑、地铁等工地出入口必须修下水道入水口，以利清洗车辆轮胎，确保路面清洁。凡裸露的工地地面都必须用苫网覆盖。就此，可由国家环保部设定具体标准，对达标单位发“绿色工地”标志。

第五章
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

第一节　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

——再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①]

一、对可持续安全战略概念的再认识

21 世纪的全球治理须重视“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问题。[②] 这是因为,只要世界上存在仇恨,人类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2011 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 10 周年。2011 年 5 月 1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宣称,美军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地区发起了针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定点”行动并将其击毙。正当一些美国民众为此欢呼雀跃时,美国政府则向美国人发出了海外旅游安全警报。这说明美国十分清楚,此举可能刺激对手,而这个对手已经在全球形成看不见的恐怖活动网络。[③] 美国在“后拉登时代”仍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安全挑战。

2011 年 3 月在日本发生了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引发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对核泄漏的恐慌。2011 年 1 月,俄罗斯首都机场发生爆炸;同年 4 月,白俄罗斯的首都地铁发生了爆炸。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一些

---

①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8 期。

② 关于“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是笔者于 2004 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提出的一个命题,具体参见刘江永:《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 21 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7 期,第 45～49 页。

③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本·拉登参加了美国支持的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建立起“圣战者服务中心”。1988 年,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起“基地”组织的军事大本营及训练营地。20 多年过去了,伴随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国际恐怖组织已遍布全球。

国家相继发生了街头政治，进而演变为流血冲突与社会政治动荡，普通民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利比亚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北约对其实施军事打击将导致利比亚的未来后患无穷。事实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这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也会缺乏必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安宁的国内秩序，一国根本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即使有发展机遇也会丧失。利比亚战争与日本福岛核事故告诫世人：可持续安全有时比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通过和平与国际合作方式，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长时期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客观状态。"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是以低成本方式获得高安全状态，而且这种安全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近年来，国际社会维护安全的成本升高与安全感下降的矛盾日显突出。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曾经从安全成本的角度出发，明确反对伊拉克战争。他指出，这种成本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作为'志愿者联合'一员的盟国参与进攻的直接成本；第二是波及世界经济和特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成本"；第三是引起"文明冲突"，中东民众普遍认为，西方世界正在对伊斯兰世界发起新的十字军远征。[①] 美国为了本国的绝对安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并没有获得可持续的安全，反而增大了安全的风险。因此，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成本角度研究安全的可持续性及其科学性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有人认为，持久和平就是"可持续安全"。笔者认为，即便在长期的和平条件下，国家与公民仍然会受到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仍可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也就是说，持久和平并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即便在和平的条件下，人们仍会受到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而缺乏安全感，因此，持久和平只是维持可持续安全的必要前提。可持续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比持久和平的概念要宽泛得多。一般意义上的安全观通常是针对国际安全而言的，并未包含国内安全。可持续安全作为一项国家安全战略，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包括国内长治久安与不受外部入侵威胁两大方面。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如果能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在科学安全观的基础上形成更为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系统。

有人认为，可持续安全是难以实现的理想，但笔者认为，可持续安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它是可以实现的，并非单纯的理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

---

① Joseph E.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日］楡井浩一译：『世界を不幸にするァメリカの戦争經濟』，東京，德間書店 2008 年版，第 186 頁。

了迅速发展,其关键因素之一是得益于中国自 1979 年以来没有卷入对外战争,自 1989 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国内动乱。这就是一种可持续安全的状态。未来 30 年,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必然出现新的跃升。正因如此,一些别有用心的国际势力千方百计地制造和利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企图破坏和干扰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包含了中国必须维护的实实在在的核心利益,而不是一种单纯的理念。

可持续安全注重以人为本,它不仅重视国家的安全,而且重视人的安全,强调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要求一国政府对内重视改善民生、防止腐败、尊重人权、健全法制;对外必须营造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尤其反对单边黩武的行为或以“暴力的多边主义”侵犯他国的战争行为。

自 2011 年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例如,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前领导人或是受到街头政治的冲击而下台,或是因国内矛盾激化越过和平的红线而爆发冲突和内战,甚至遭到外来军事打击。如图 5-1 所示,这些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虽然外因不可忽视,但内因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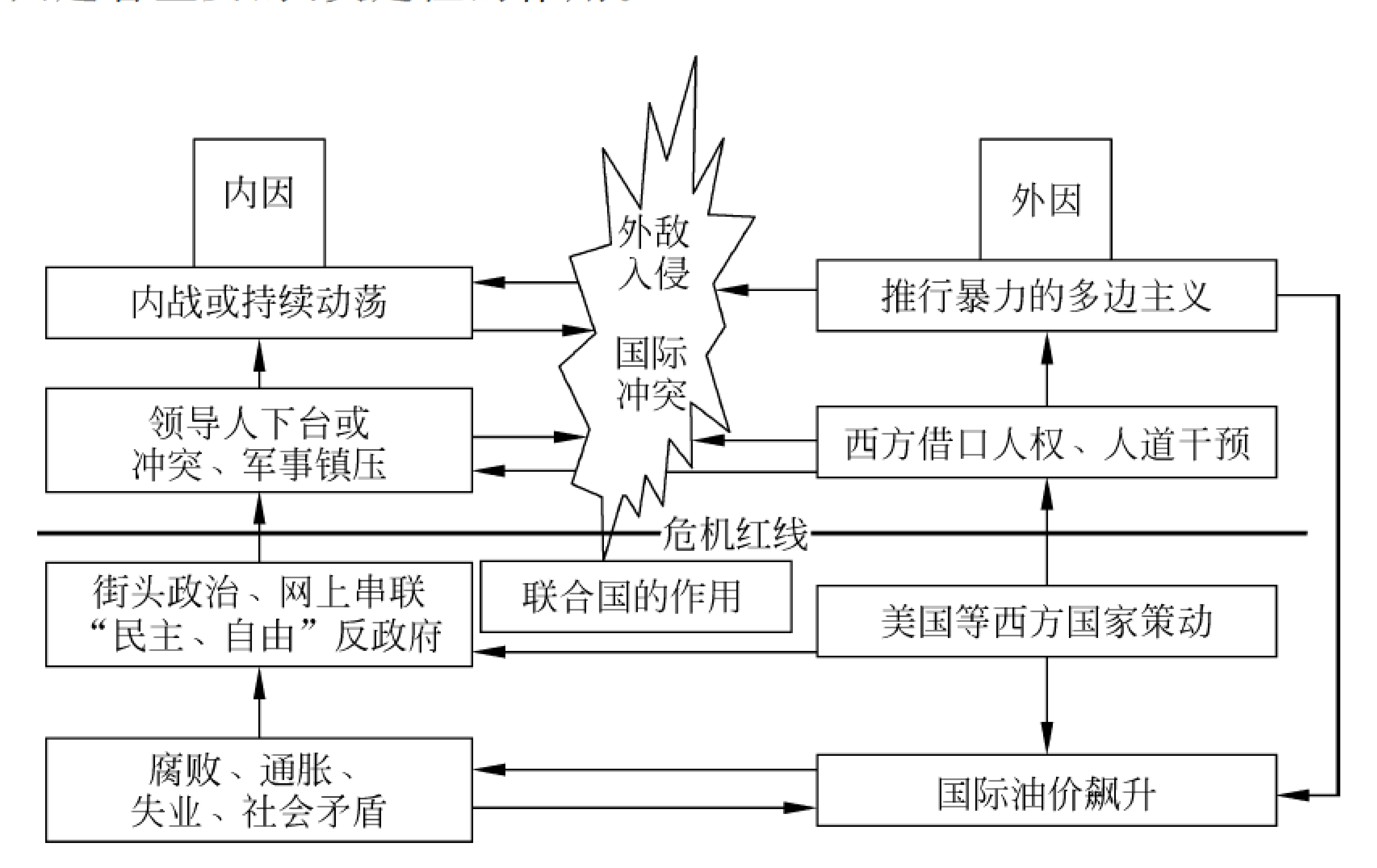


图 5-1 部分发展中国家安全危机形成的系统图

在图 5-1 中,左侧内容表示引发外敌入侵和国际冲突的国内社会与政治因素;右侧内容表示导致和加剧国内冲突的外部国际因素;箭头所指方向表明的是事物发展的顺序及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当危机的状态还处于红线以下时,联合国尚可发挥一定作用。然而,一旦矛盾激化,国内发生的动荡突破危机红线,则可能演

化成流血冲突与战争等失控状态。

自 2011 年以来，西亚、北非等地区发生的动荡表明，当产油国发生内乱而又孤立无援且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时，西方多国的军事介入就可能出现。而产油国的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势必会导致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炒家采取投机行为大举购入石油、黄金，大量抛出美元，从而引发油价、金价暴涨和美元的大幅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将在所难免。高通胀率、高失业率、高腐败发生率等，又会造成一些国家国内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并成为社会政治动荡的直接原因之一。这种国内外因素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形成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外交主张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在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搞单边黩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正确的。相比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虽然放弃了单边主义，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利比亚打出的则是多边主义旗号，采取多国联合“打群架”的方式。尽管北约在出动地面部队问题上仍态度慎重，但其针对利比亚的空袭看上去则很像 1999 年科索沃战争的“北非版”。这种“暴力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看上去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多国军事干预取代一国军事干预而已。事实上，针对军事打击的对象，美国一直企图形成以本国为主导的多国军事优势和军事介入，而单边黩武只不过是在不得已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美国入侵伊拉克“对和平与安全的恶劣影响超出中东，传遍世界”，国际上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被调查国都认为，美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程度超过被美国小布什总统点名的所谓“邪恶轴心”国家。[①] 笔者认为，目前和今后对国际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恰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暴力的多边主义”行径。

可持续安全要求不得以战争方式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或某一国家集团的片面安全利益。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多么先进的武器系统，依靠强权政治、军事打击，不仅不能获得可持续安全，反而可能造成高成本、低安全的安全异化现象。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无内乱则外患难至。中国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国内事情解决好，同时需要着眼战略全局，提出新的战略理念和外交主张，引领世界潮流，防患于未然。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能只是停留在笼统地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原则上，而是要对多边主义的情况加以新的界定和区分，倡导国际社会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对立冲突，反对实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损害。

---

① Joseph E.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日]楡井浩一译：『世界を不幸にするァメリカの戰争經濟』，東京，德間書店 2008 年版，第 205 頁。

二、“和平的多边主义”与可持续安全

自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后，美国开始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支持和参与的多边主义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这两者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如表5-1所示，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内，中国参与的多边主义是“和平的多边主义”，而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则是包括依靠军事优势针对主权国家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暴力的多边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如果它能更多地参与或支持“和平的多边主义”，放弃“暴力的多边主义”，美国自身及世界的可持续安全就会多增加一些希望。

表5-1 “和平的多边主义”与“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全球及地区的不同范式

全球(和平的多边主义)	地区(和平的多边主义)	全球(暴力的多边主义)	地区(暴力的多边主义)
中国、美国共同参与	中国参与、美国部分参与	美国主导、中国并不参与	美国主导、中国并不参与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	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	多国部队、“志愿国联合”、美国为首的欧亚军事集团	北约、军事同盟、“美日同盟＋1”(如美日韩、美日澳等)
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金融、文化	经济合作、政治对话与地区一体化	多国军事打击	同盟军事行动

“和平的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规定了联合国宗旨为：第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第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第三，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①]《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普遍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即除了对宪章所允许的针对武力攻击的自卫以外，任何国家都不再享有使用武力的一般权利。[②] 因此，“和平的多边主义”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国际道义的追求，而且应该被作为一项国际法准则来理解。

《联合国宪章》之所以倡导“和平的多边主义”，主要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社会对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彻底否定。“暴力的多边主义”是帝国

① 《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之宗旨及原则，参见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19/content_787113_2.htm。

② 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论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4页。

主义列强的传统做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深知，只有促使世界各国推行“和平的多边主义”，摈弃和抵制“暴力的多边主义”，可持续安全才有希望。中国作为和平发展的大国，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强调通过对话协商的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来，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局部战乱频发，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并没有实现可持续的安全。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类社会付出了极高的安全成本和代价，但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可持续安全的价值与真谛，大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军备竞赛、战争冲突导致的“战争碳排放”等问题把地球搞得满目疮痍，即便如此，一些发动军事打击的国家还在以防止气候变暖为“道义制高点”和“话语议题”，对主张和平的国家发号施令，竭力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碳排放”。这些问题都使人类在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困扰与挑战。

世界各国决策者应该认清的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世界上出现了两大潮流：一是“暴力的多边主义”的潮流；二是“和平的多边主义”的潮流。这两大潮流相互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安全。自“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爆发了五次高科技的局部战争，除了美国单边黩武发动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外，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都与“暴力的多边主义”有关，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或北约部队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军事行动。事实证明，无论它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暴力的多边主义”不仅难以形成，甚至会直接破坏可持续安全，这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以来，“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影子开始在东亚游荡。一些国家分别与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发生争议和摩擦的重要背景是，伴随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与日本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同时，开始针对中国谋划建立“美日同盟＋1”的三角军事网络。美日两国在2010年6月举行的外长和防长（“2＋2”）会议上提出的亚太共同战略目标就包括关注中国的海洋活动，强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东盟等方面的防务合作。不过，由于日本受到其和平宪法的制约，尚难与美国采取类似北约的联合军事行动，但美日两国企图联手介入中国南海问题的倾向则越发明显。2011年7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海域举行了具有试探性质的联合军演。美国企图利用其亚太盟国以及中国与邻国在岛屿、海洋权益方面的矛盾，对中国实施战略牵制、打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开始在涉海权益问题上有恃无恐地对中国示强，甚至炫耀武力。

在东北亚地区，上述两股潮流的较量表现为：一股潮流是以美日、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为标志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另一股潮流是以六方会谈为象征的“和平的多边主义”。遗憾的是，自2010年以来，“暴力的多边主义”倾向有明显抬头的趋

势，而“和平的多边主义”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2010 年先后发生的“天安号事件”以及“延坪岛交火事件”曾造成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2011 年以来，由于日本发生了特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美日、美韩联合军演暂时被迫推迟或取消。各国出现了支援日本抗震救灾及谋求重开“六方会谈”的努力，“和平的多边主义”似乎春风又起。但是，“暴力的多边主义”仍阴霾未散，并可能再度带来局势紧张与冲突的恶果。2010 年以来，日本政府开始把钓鱼岛问题与防卫战略挂钩，并积极呼应美国，介入南海问题，企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牵制。

在东南亚地区，这两股潮流的较量表现为：一股潮流是某些得到美国支持的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潜在域外强权及“暴力的多边主义”介入之虞，其表现形式有可能是美国的“代理人冲突”，而非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对美国来说，只有东亚国家之间出现“鹬蚌相争”而又不失控的情况时，美国才可坐收“渔翁之利”，进而主宰东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了全球性对核电安全的质疑与非议，世界各国将更加重视拥有石化能源的战略意义。另外，国际互联网已被用来制造反华民族情绪。据报道，在 2011 年 6—7 月间，越南连续几周出现了反华游行；在美国境内的菲律宾人也首次通过互联网组织全球反华示威。这些都是越南、菲律宾等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的动因之一。另一股潮流是 2002 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发表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体现出的“和平的多边主义”。该宣言首先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该宣言要求“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①] 美国和日本并非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中国反对美日等国介入中国的南海问题。东南亚地区能否维持可持续安全，关键在于上述哪一种潮流占据主导地位。就“和平的多边主义”而言，我们应在全球范围倡导联合国（UN）、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非洲联盟（AU）、不结盟运动等多边体制发挥更大作用。在亚太地区，应鼓励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盟“10＋3”机制、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发挥积极作用。

可持续安全所涉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仅靠双边关系互动则很难解决。“和平的多边主义”能够为缓和双边关系提供某种接触、对话的政治平台，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与此同时，“和平的多边主义”也需要良好的双边关系来提供保障。例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有利于促成朝美之间的直接对话与朝韩关系的

① 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政府在柬埔寨王国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http://www.chinamil.com.cn/sitel/2009zt/2009-03/17/content_1692028.htm。

改善。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双边关系上都得到了普遍改善，进而推动了中国同东盟“10＋1”等多边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反的是，泰国与柬埔寨在边界发生的冲突恶化了双边关系，这将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另外，如果越南、菲律宾等国误判形势，不仅将损害中越、中菲双边关系，而且可能损害本地区多边合作气氛。因此，在推行“和平的多边主义”的进程中，妥善处理领土及海洋权益争议、防止外部势力介入，努力缓和与改善双边关系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三、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与美国的战略困境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能否放弃“暴力的多边主义”、更多地参与“和平的多边主义”，这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安全密切相关。美国采取何种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面临的国际格局有关。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乃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重要成员。因而可以认为美国是“和平的多边主义”的重要参与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放弃单边黩武后会放弃“暴力的多边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直接影响美国安全战略决策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进行梳理。

2011年是海湾战争爆发20周年、“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爆发的10周年。20年来，国际社会至少发生了突出的五大变化：一是信息化社会既带来了便利又带来了麻烦；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又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三是多边主义的兴起一方面限制了单边主义的横行，另一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四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美、日、欧则相对衰落；五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导致非传统国际格局渐显雏形。

所谓“非传统国际格局”是指在以主权国家及国际组织等为行为主体的传统国际关系框架之外，出现了非国家、非政府、非国际组织行为体与特定国家形成对抗并对传统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全新的国际格局。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国际恐怖主义。2010年5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发表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近几十年来，自由国家、开放市场和社会进步成功地使全球化进程前所未有地加速发展，在全球开启了机会之门，为亿万民众带来了民主，并使大国间和平共处成为可能。然而，全球化也加剧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危险，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等。”①随后，该报告

---

① 白宫网站公布奥巴马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文（中译本，上），参见网址：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iDocumentAction；jsessionid＝FD720A3DA179859B56AB5BFC96360FB2？baseid＝1&docno＝423145。

又强调："在过去近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国家与遍布各地的暴力和仇恨网络处于战争状态。伊拉克战争虽已结束，我们的军队又奉命再次以阿富汗为重点，完成瓦解、摧毁和击败'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的承诺。这是一个广泛的多国正义行动的一部分。我们保卫人民、盟友和伙伴安全的承诺坚定不移。此外，面对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失败国家等构成的多样化威胁，我们将保持军事优势。"①

上述局面是近10年来逐渐形成的。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足以影响大国安全战略的新变量——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主权国家之间权力结构与相互关系变化为特征的传统国际格局之外，事实上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自2011年以来，发生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多米诺骨牌式的政治动荡与街头流血，进一步增添了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旦这些地区的局势恶化，可能会导致该地区处于长期的失控状态。

对美国的"一超"地位而言，实际上受到了来自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中各种因素的双重挑战，而非传统国际格局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在不断增大。"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蔓延，正逐步形成松散的、网络化的"隐形一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一种跨国的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的行动网络。在21世纪的前10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以"隐形一极"与"霸权一极"相互对抗为主要特征的非传统国际格局，如表5-2所示。这个"隐形一极"正在全球范围向美国发起挑战，美国也可能会因此而陷入长期的战争状态。美国被缠绕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而不得不向其盟友求援，甚至向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对手呼吁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国际格局中大国关系的对抗性。出于"反恐"目的，

表5-2　一极多元的传统国际格局与两极对抗的非传统国际格局

格局 特点	传统国际关系格局	非传统国际关系格局
主要国际行为体	国家 VS 国家	国家 VS 非国家、非政府、个人
国际行为体	国际集团 VS 国际集团	国际集团 VS 非政府集团、个体集团
国际行为方式	战争、冲突、冷战、合作	非对称战争、恐怖袭击
对手特点	对手比较明确，相互竞争中有相互依存	以宗教极端主义为背景的"隐形一极"VS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格局结构特点	一极多元、多元并存	两极对抗、难以调和

① 白宫网站公布奥巴马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文（中译本，上），参见网址：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iDocumentAction；jsessionid=FD720A3DA179859B56AB5BFC96360FB2？baseid=1&docno=423145。

美俄之间、中美之间也展开了合作。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对企图维护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它全面驾驭和掌控这两个格局的难度将增大，其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将上升。中国在传统国际格局中受到来自美国直接和间接战略打压的风险在增大，但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并未处于尖锐对立的旋涡中心。

2011 年 2 月 5 日，美俄两国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开始生效。新条约规定，美俄双方各自拥有的战略核弹头数量不能超过 1550 枚。美国还有意与俄罗斯进行更多谈判，旨在削减包括非战略武器在内的更多的核武器以及进一步削减核战略武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击毙本·拉登一事进行评价时，认为这是国际反恐的重要进展，但中俄两国都对美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对北约轰炸利比亚等军事行动表示不满或反对，避免在传统国际格局中陷入对抗或被卷入非传统国际格局内对抗的旋涡之中，这显然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

美国政府认定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现实威胁。美国需要通过多边主义，强化其全球领导地位。为此，美国首先要巩固同欧洲、亚洲同盟国的关系。其次要与 21 世纪的“影响力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与印度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务实、多维的关系。最后，美国认为它还需要提高促进和平、安全与把握机遇的能力和多边协调的能力，在联合国、地区组织、国际金融机构、专业机构中“发挥全球领导力量”。[①] 奥巴马政府虽然强调美国将奉行多边主义，但遗憾的是，美国所谓的多边主义仍然是为维护其主宰世界的政策服务的。由于这种所谓多边主义并没有排除使用武力，所以很可能产生“暴力的多边主义”倾向。它与小布什政府时期推行的单边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同样也难以缔造美国的可持续安全。

四、可持续安全不能靠“霸道”而要靠“王道”

“暴力的多边主义”与“和平的多边主义”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是“霸道”与“王道”之争。西方权力政治理论中基本上没有王权的概念和王道的思想，而只推崇“霸权”思想。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创始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国际政治的目标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权力斗争在国家之间表现为一国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而外交就是为谋求、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的。摩根索虽然也主张通过势力均衡、国际道义、外交手段、多边机制等维持世界

① 白宫网站公布奥巴马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文（中译本，上），参见网址：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iDocumentAction；jsessionid＝FD720A3DA179859B56AB5BFC96360FB2？baseid＝1&docno＝423145。

和平，但其局限性在于，有关国家利益理论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性恶说”基础之上的，其描述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的实质是利己的，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和维护霸权，在权力斗争中不存在“共赢”或“无私”等王道的概念。就权力斗争中的道义而言，也只是限制和控制他国的手段，而不是对霸权国家本身的自律。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难以回答霸权国家获得霸主地位后新的国家目标问题，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管子》一书中，中国的先哲就把霸业视为获取王权的基础，在霸权之上又提出了建立王权的国家更高目标。国家要获得王权就必须既有实力又有道德，而不是一味追逐控制别国的权力。《管子》首先就“霸”和“王”两个不同的概念做出界定和区分：“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①]也就是说，能使国家强盛者称为“霸”，而能匡正天下者称为“王”。《管子》强调：“爱民无私曰德”，“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无德而欲王者危”。[②] 德被视为一种无形的巨大感召力和成就王业的必备条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有德，外交才能有德，只有对内“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才能对外“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③] 管子这句话的大意是，要使民众喜悦就要乐于施仁政；要获得民众拥戴就要除去私心；要使远方宾客前来就要修好近邻；要避免灾祸就要消除别人之怨恨；要谋求长治久安就要任用贤才；要安然处于高位就要与民同利。

对内，《管子》主张“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④]《管子》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⑤] 也就是说，要确保国内长治久安，就必须以人为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清廉，推行民主，正确决策。对外，《管子》强调，“兵不义不可”，“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⑥]这句话的意思是，非正义的战争必败。出兵而不能战胜，围城而不能攻取，占地而不能充实自己，这三者当中只要见到一项就意味着自取灭亡。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成为超级大国，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战争没有发生在美国本土，美国得以利用战争促进本国经济、科技的发展，而且也在于美国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正义性。虽然21世纪初的美国是唯一的“霸”者，但它也逃不出管子所说的“兵不义不可”的定律。尽管对于何为“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所谓“错误情报”为依据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显然是不义之战。结果，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没有

①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② 《管子·正第四十三》。
③ 《管子·版法第七》。
④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⑤ 《管子·牧民第一》。
⑥ 《管子·版法第七》。

转化成国家安全利益，单边黩武的政策反而导致“安全异化”现象的出现。美军虽然凭借高科技武器能顺利攻占阿富汗、伊拉克，但这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多现实利益，反而使该地区成为美军的“坟场”和美国军费财政支出的“无底洞”，国际恐怖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多。

美国发动的上述战争使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迅速下滑，2008 年美国的金融海啸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战争政策造成的大量财政赤字又大大削弱了美国政府运用财政手段缓解金融危机的能力。美国今天的境况不幸被 2000 多年前的《管子》所言中。《管子》认为，要想建立王权首先必须有霸权的实力，既重视实力的重要性又强调不能滥用实力，而要用“德”约束“霸”，通过对霸权国家决策者、统治者进行教化，让它们形成自我约束。遗憾的是，迄今美欧国家的决策者似乎尚不了解也更未接受王道的思想，缺乏王者必备的修身养性。正因如此，当今世界“暴力的多边主义”所体现的霸道仍在横行，而“和平的多边主义”还难以作为王道而引领世界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中国要推行王道，争取可持续安全，就必须和所有坚持“和平的多边主义”的国家一道，继续增强综合国力并加强合作，彻底打破“暴力的多边主义”横行的霸权体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 1924 年曾提出奉行王道，反对霸道，济弱扶倾，谋求和平的“大亚洲主义”。他于 1924 年在日本神户发表演讲时指出，“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①] 孙中山认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②]

与此同时；孙中山十分清楚，“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③] 因此，孙中山强调：“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

---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05 页。

②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07 页。

③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08 页。

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①]他在广州发表演讲时就曾激励告诫国人：“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但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比日本多，如果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道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重蹈它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上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②]

面对日本，孙中山曾发出肺腑之言：“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③]这些话对应到今天的日本，难道不是也同样适用吗？80多年过去了，看看当今世界，美国在伊拉克的进退两难、英法等国在利比亚的所作所为、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彷徨，更令我们对孙中山当年的深邃思想与远见卓识肃然起敬。

五、结　论

2011年是中国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近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未来的中国就是要在实现富强、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和奉行“王道”而永不称霸。这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内在需要，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文化决定的，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只有王道才能济弱扶倾，化解民族与宗教仇恨，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中山的上述理想正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付诸实践。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表示：“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

①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7页。

② 孙中山于1924年1月27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3页。

③ 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9页。

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①2011 年 4 月，温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庄严承诺，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国家，也永远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中国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世世代代走和平发展道路。② 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确保可持续安全的必由之路。

21 世纪世界能否实现广泛的可持续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暴力的多边主义”能否让位于“和平的多边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未来不能只靠良好的王道理念，而要学习美国，拥有不逊于霸主的超强实力。对于美国来说，目前其实力地位比中国更具备推行王道的条件，故美国不能只谋求确保超强的实力地位，而要学习中国，懂得王道的精髓，超越霸权，放弃暴力，大行王道。展望未来，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相互竞争、合作与学习中，一道成长，同行王道，必将为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安全做出贡献。这种奉行王道的中美合作或许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关系的一种全新模式。

---

① 温家宝总理于 2009 年 2 月 2 日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9-02/03/content_10754383.htm。

② 温家宝总理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在印度尼西亚卡尔蒂妮宫的演讲：《加强睦邻友好　深化互利合作》，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819231,htm。

第二节　国际形势前景与中国外交理念[①]

一、“一超多元”世界格局基本形成

世界多极化的提法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流行起来的。当时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官方文件在概述国际形势时都曾提到过“多极化”。1971年7月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便指出，从经济的角度讲，“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如果从经济上看，世界的确呈现不平衡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然而，这里的悖论是：谈论国际格局显然不能只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而要从包括军事、政治等因素的综合国力来考虑，但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世界多极化的提法便值得商榷。因为，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美国堪称是综合国力意义上的“一极”，不大可能出现若干个与美国相匹敌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中心。进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综合意义上的世界多极化是必然趋势吗？如果不是，那么对当前和未来20年的国际格局应如何判断呢？

在研究世界格局问题时，首先不应从主观愿望或特定说法出发，而应从客观现实和事物的发展规律出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的时期。“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制解体后，在全球范围取而代之的世界新格局实际上是一种“一极多元”状态，也可以称为“一超多元”格局。这也是中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尤需考虑的一个基本判断。迄今，中国外交是建立在世界多极化将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其基本含义之一是反对搞美国独霸世界的单极世界。这一判断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相关。即中美关系对抗的一面上升时，中国推动多极化的倾向就明显些。这一方面使美国在国际上受到一定制约，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反感；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同美国以外世界主要力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国处理同美国以外其他大国之间矛盾的决心。而当中美双边关系改善时，中国政策研究者也会思考所谓多极力量之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相互依存关系加深情况下，是否存在合作大于对抗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甚至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对美国的“一超”地位也能予以实际上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也倾向于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实际上，“冷战”后大国关系对抗性因素下降的趋势表明：世界格局不是走向多极对抗，而是出现“一极多元”结构。这就是未来20年内相对

① 本文为2006年7月8日～7月9日召开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中国外交与和谐世界”会议论文。

稳定的世界格局的基本状况，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世界格局的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对立统一。所谓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一极”与“多元”之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大趋势是“一极”下降、“多元”上升，但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形。

有些学者把世界格局说成“一超多强”，这不够确切。因为如果仅从大国力量对比看，的确可以把大国关系格局称为“一超多强”结构，但如果把世界格局视为“一超多强”，则等于用大国关系格局概念取代世界格局概念，所以是不成立的。由于国际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存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NGO 等）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所以与其把世界格局视为“一超多强”，不如视为“一极多元”更接近国际现实，也能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

从世界力量对比看，对世界经济、政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美国，其综合国力居世界之首，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中小国家联合自强，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亚太地区，这种“一极多元”结构尤其明显，除美国一极外，中、日、俄、东盟、澳新、朝鲜半岛等多元力量同时并存。很多事情并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但也不是多种力量完全与美国对抗或彼此对抗的。

“冷战”后，国际关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伙伴化”的趋势。“9·11”之后，各国之间反恐合作的需要在加强。虽然国际社会仍面临强权政治、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主权国家之间全面对抗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谋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才是世界各国的人心所向。因此，国际关系中以对立为本质特征的“极”的元素，更多地被相互依存的多元化的国际结构所融化。在这种“一极多元”国际体系下，国际安全模式并未完全摆脱同盟的形式，但两大军事集团对抗业已消失，联合国与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作用增大。大国竞争的目的是提高本国综合国力。对国际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角色是多元化的国际力量与国际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多元力量。世界经济体系的区域化与全球化趋势加强。国际关系的性质是相互依存方面的因素上升，而权力政治的因素相对下降。国际秩序的特点是倾斜型准平等协商，即超级大国主宰地位下降，但国际决策权的大小仍与国家经济、政治实力成正比，尚难做到完全平等。国际间竞争的主要形式是经济竞争，而战争形态则主要是内战与局部战争。未来 20 年世界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

其一，多极对抗格局。国际间以军事为背景的多种国际力量崛起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冷战”时期遗留的对立因素上升，将会导致多极对抗。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单方面经贸制裁引起的贸易战，以及排他性经济集团的出现。在政治与安全方面，欧洲可能因处理北约东扩引起新的对立。在亚洲，如果所谓“中国威胁论”得势，有可能刺激军事方面的相互戒备与敌对意识。核扩散导致国际军事力量

的多极化。布什政府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发动伊拉克战争，推行大中东民主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单极霸权。但是，战争已导致美国的霸权在三个重要领域发生“异化”：第一，在安全领域，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制造出“隐性一极”——跨国反美恐怖活动的基地组织；第二，在经济领域，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金价上涨，最大的赢家是油气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一黄金大国俄罗斯；第三，在政治领域，中东、拉美等国家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反美倾向明显，美国推动的民主化出现“异化”。再过 20 年，美国虽然仍可能保持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的地位，但综合国力将相对衰落，难以像目前这样承担对亚太的“安全义务”。美国一些人为继续主宰亚太，有可能企图更多地利用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亚制亚”或要求盟国增强军事力量。结果，日本有可能逐步发展为军事上独立的一极，东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将大为增强，从而导致本地区的军事力量多极化、国际关系对抗化。中日关系潜在的对抗性矛盾将公开化，出现“经冷政冷”的“冷和平”状态，甚至发展为中日“冷战”、局部冲突导致军事对抗。这种局面是应该并可以避免的。

其二，多元共存格局。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向多元共存、和谐相处的方向过渡。这一进程并不意味着美国绝对衰落，而是其他各大力量和平发展所导致的美国“一超”地位的相对下降。这一点在亚太地区表现得将比较明显。多元共存，反映亚太地区的多样性与亚太力量的多元化，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亚太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与意识形态国家间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潮流。在经济领域，多元共存主要表现在本地区提倡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合作机制的存在。它有利于缓解欧美等世界其他地区经济集团的排他性。在政治领域，多元共存主要表现为本地区采取“和平的多边主义”，主权国家之间不采取单边或多边军事行动。中日都不谋求成为美苏那样的一极，不谋求地区霸权，而是作为多元力量之一发挥本国特长来为世界做出贡献。中、美、欧、日、俄等各大力量不可能完全拥有同样的实力地位，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将由于共同利益的增多而不得不谋求和平共处。中小国家更不可能单独与任何大国抗衡，但以地区组织为核心形成的中小国家群，则有可能对国际秩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驱使一些大国按这些规则参与地区事务。东盟 10 国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便是个典型的范例。

其三，多元一体格局。它是多元共存体系的延伸，将摆脱单极独霸、两极或多极争霸的传统模式，而朝“多元一体”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以联合国为主体，多元力量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既相互协调又彼此制约；在世界经济领域，以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主体，多元力量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东盟地区论坛（ARF）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好比是亚太和平与发展的两大车

轮。在21世纪，亚太地区将以APEC为主体实现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多元化与网络化，实现开放的地区合作，并以ARF为主体构成多元化、网络化的地区政治、安全协调机制，最终形成东亚安全共同体。各国军队将主要用于维护本国国内稳定和抢险救灾，亚太各国军事力量将成为维护各国共同安全利益的“国际公共财产”，双边及多边的相互信赖措施的普遍建立，将使各国间彼此的戒备性相对减少，而在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面将扩大。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这种历史进程似乎已经开始了。谋求和平、发展与合作是人心所向。世界各大力量彼此减少对抗，共建和谐国际社会将是明智的战略选择。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避免第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第二种前景既对我国有利，又是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实现的，经过这种过渡，可最终实现第三种前景。未来20年国际格局的目标模式可以选择“多元共存的和谐格局”。

二、“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格局相对稳定

目前世界的大国力量格局是“一超多强”，即美国作为“一超”将长期存在，而中、日、俄、英、法、德，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将保持或增强自身实力。全球性国际规范表面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实际上这种世界秩序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和军事联盟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一个客观存在。

从大国关系看，除日、英外，“多强”都不愿接受美国的霸权领导，因此美国无力联合多数强国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法、德、俄都有意推动多极化发展以保持或提高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是，“多强”之间的矛盾，给“一超”分化多强留下战略空间，特别是日本要借助日美同盟提高自己的大国地位，英国想借助美英特殊关系保持其大国地位，因此难以出现“多强”联合约束“一超”的局面。

今后的大国关系格局的发展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维持现有“一超多强”的大国力量对比格局。没有任何政治实体的实力达到美国等级，欧、俄、中、日等多强之间不能建立有效联盟，美国利用多强的不和保持现有的世界主导地位。第二，“四极鼎立”格局，即欧盟实现政治一体化，中国、日本参与东亚共同体，俄罗斯与欧亚联手，重新崛起，与美国形成鼎立之势。第三，“海陆两极、多国共治”格局。即形成以中、俄、法、德为核心的大陆国家联盟和以美、日、英为轴心的海洋国家联盟，这两大地缘战略联盟之间相互制约，竞争与协调合作。第四，“一超”弱化与多强分散格局。即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使美国面对更多的力量中心而难以单独主宰世界，大国关系的组合更加复杂化。

美国一些人认为，在世界史上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发生战争的，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能否采取和平的方式表示怀疑。其实，只要读一下列宁的“帝国

主义论”就会十分清楚，在历史上传统的权力转移为什么必然爆发战争。这是因为，当时世界处在殖民主义时代，当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时就必然爆发战争。而当今是非殖民主义的时代，全球性原有的殖民体系早已瓦解。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大国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的必然性。何况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曾经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决不会通过战争谋求世界霸权或挑战任何国家，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国家战略。

今后20年，国际规范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三个不同领域的变化趋势差别较大。政治上，主权平等仍是最基本的国际规范，但国家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区域组织规则的约束。世界性国际组织对国家行为约束作用难有较大提升，而地区性组织的作用将增大，其规则将成为国家行为的重要准则。安全上，反恐可能成为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最“合法”的国际规范，以军事手段争取独立和政权的合法性则将进一步下降。非政府组织将失去使用武力争取政治权力或实现政治目标的合法性。经济上，区域内经济自由主义和区域外保护主义的规范将同步发展。地区组织的成员们支持扩大区域内自由经济规则，在制定区域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政策的同时，谋求制定共同抵制外部经济竞争的规则。

三、世界秩序需要“可持续安全”的新理念和新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新秩序最重要的发展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人们普遍接受“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以及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便自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

如同经济增长一样，国际安全也有其“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就会发生“安全异化”。这是伊拉克战争给人类带来的重要启示。伊拉克战争表明，军事打击不仅难以确保美国持久而稳定的安全，还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许多努力付诸东流。人类将继续面对一种极其荒唐和不公平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众多国家在虔诚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而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甚至要忍受限制自身发展之苦；而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却既不受限制地享用能源资源又任意发动战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如果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现实威胁，对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势必大为下降。

因此，要建立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新秩序，首先需要树立“可持续安全”这样一种科学安全观，以此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普世性理念。迄今，人们往往把争取持久和平作为最神圣的安全目标。其实，和平不等于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

是指不受威胁。它们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交叉概念。和平是安全的基本要求，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条件下就必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多年来，虽然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人类“可持续安全”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威胁迅速上升，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这就使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凸显。如何实现“可持续安全”，是摆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可持续安全”的概念超出了争取持久和平这一传统安全理念的框架，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是谋求摆脱安全战略困境的一种全方位的理性思考。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事领域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一般是指军事领域以外对公共安全、国家综合安全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或威胁的安全领域及相关问题。它涉及经济、金融、能源、资源、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它具有明显的跨国性，而且难以单凭军事手段加以解决。21世纪初“安全异化”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决策的必然结果。要避免这种倾向的发展，甚至波及东亚安全，必须首先树立指导正确决策的战略思想，充分认识到21世纪人类需要“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理念应该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新的安全观——“可持续安全观”。东亚“可持续安全”的目标是，在保证成员国生存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协调成员国安全利益的规则与制度，避免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现象，摆脱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共同体应建立在“可持续安全”理念和目标追求之上，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参与、协调合作、持久安全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协调本国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延续东亚地区的和平，加强东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可持续安全观”是涵盖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观。如同和平不等于安全一样，持久和平也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传统安全领域中所涉及的国际关系通常具有“零和局”的性质和所谓“安全困境”，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情况则相反，各国甚至处于某种敌对关系的国家之间也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安全利益的汇合点与彼此合作的结合点。由于国际恐怖主义、艾滋病、生态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上升，即便在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公众、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也可能会受到威胁。

“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实现，需要制定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要确保传统安全领域的持久和平，而且要努力解决非传统领域的持久安全问题；它不仅有利于中日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可以形成未来东亚共同体多边安全合作强有力的“黏合剂”。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的是缔造和保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它的建构绝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战略问题。联合国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也需要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它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以较低的成本保持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努力通过双边及多边国际合作，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保持世界和平，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长期合作。“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争取使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维护人类安全。东亚安全共同体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最重要的是确保本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以人为本，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它要求不得用战争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通过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争取使东亚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

“可持续安全战略”所采取的措施应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上述威胁的挑战。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联合国应发挥重要作用。东亚虽然实现了10多年的和平，但仍面临引发战争的危险和大量不安全因素。因此，减少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隐患是“可持续安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鉴于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其中包括分离主义、领土争端、武器扩散、海洋资源分配、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既有传统安全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因素，需要各国之间在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共同致力于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它主张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未来20年，世界格局将是一极多元结构，即美国“一超”与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的“一极多元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推行单边主义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东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及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尽相同，妨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深入。“可持续安全”尤其强调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协调与互补，鼓励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感，增强共同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使命感，通过渐进积累方式逐步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实现有关各国的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国家之间恪守

《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前提。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全球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就好似一部双轮车的两个轮子，缺少哪一个都会变成独轮车而不稳定，甚至难以前行。为实现“可持续安全”，发达国家应高度重视南北问题的解决，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以确立“可持续安全”经济基础。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可以为此发挥巨大作用。中日也可通过友好合作，化解政治矛盾，走出安全困境。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避免陷入“高成本、低安全”战略困境的唯一选择。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疆域面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强国防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盲目依靠增强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到头来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或陷入一种“高成本、低安全”的战略困境。国家之间的战争、军备竞赛往往后患无穷，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军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不仅会对不可再生能源造成极大浪费，其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许不亚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损害。与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一样，暂时的和平也不等于安全。要使和平长期延续，要摆脱安全困境，仅靠增强一国或同盟国的军事力量是做不到的。部分国家谋求所谓“绝对安全”或盲目追求“对等安全”，其最终结果都可能增加其对他国安全的威胁，使国际安全形势趋于紧张，引发军备竞赛，甚至破坏已有的和平。

四、“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要靠“海陆和合”

所谓“海陆和合”，主要是提倡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要保持和平、合作，防止人为制造“海陆对抗”大国关系格局的出现。它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周边外交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同海陆邻国的双边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好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问题；三是如何增加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利益的扩大，如何从建立和谐世界的视角出发，提出有利于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地缘战略理论框架，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美国和日本既是大国又不同程度地分布在我国周边。因而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至关重要。近年来，美日一些人从现实主义理论和传统地缘战略思想出发，煽动“中国威胁论”，提出形形色色牵制中国发展壮大的主张。其中之一便是制造“海洋

国家”与“大陆国家”地缘战略利益冲突的“海陆对立论”。如果美日依据这种地缘战略思想制定对华地缘牵制和围堵战略，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就很难和谐，甚至会发生严重对立。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提出既有针对性又有说服力的地缘战略新概念，确实值得研究。

“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基本内容和追求的目标：(1)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2)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3)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4)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画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5)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仅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

“海陆和合论”不是空想，它既具有现实可能性、战略指导性，也具有政策可行性；“海陆和合”是21世纪世界形势发展之必然；“海陆和合”是亚洲地缘经济关系决定的，“海陆和合”体现着陆海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互补性；“海陆和合”是确保海陆能源通道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和挑战的需要；“海陆和合”的必由之路是，“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平的多边主义”。

在亚太地区实现“海陆和合”的关键是处理好中美日关系。“海陆和合”是避免“海陆对立”、实现“海陆共赢”的必然选择，也是中美、中日关系的应取方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和平、合作才对各方都有利，而以海陆画线树敌立友，人为制造“威胁”与“对抗”，到头来只能对本国不利。中美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可以为“海陆和合”作出较大贡献。美国是面临东西两洋的世界超级大国，本来可以成为“海陆和合”的主导力量，但妨碍美国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是传统的地缘战略观念。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仍把中、俄作为地缘战略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9·11”事件以来，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增大的压力等迫使美国开始鼓励中、俄“在解决共同安全挑战方面充当美国的伙伴”。最近，美国军方也认同“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为经济伙伴，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关于台湾问题，美国也是把它放在美中关系的战略框架内加以权衡的。尽管中美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美互不对抗，加强合作，将特别有利于促进大国间的“海陆和合”。

中日两国只有谋求“海陆和合”才能充分发挥亚洲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在优势，造福于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近年来，日本领导人不顾对邻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而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制造并加深了日本同邻国的历史观冲突，也给日本的未来

带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目前包括中国香港在内,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其能源、资源、市场离不开包括中国、俄罗斯、中东国家等在内的陆地国家或海陆兼备的国家。因此,实现“海陆和合”最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日两国如能通过谈判,实现东海有争议地区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两国政府应遵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通过公平原则,化对立为合作,在有争议地区实现共同开发。从相反意义上讲,这也是检验中日能否真正实现“海陆和合”的一块试金石。

中国奉行“海陆和合”的地缘战略,将有利于减少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目前,美日一些人持有“中国威胁论”,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中国强大后会不会搞地缘战略扩张不放心,而“海陆和合论”则可增加中国战略发展前景的透明度和能见度,使有关各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的未来。“海陆和合”不仅不会冲击日美关系,损害日美的利益,反而可能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协调发展的一条出路。因为“海陆和合论”也提倡日美之间的“海海和合”。21 世纪,中美、中日之间能否长期和平共处,扩大合作,将成为东亚能否实现和保持“海陆和合”的关键。

第三节　可持续安全与“海陆和合”地缘战略①

认为只有海洋国家才需要共同维护海上交通安全利益的假设是19世纪以前的事情,现在根本不存在。因为现代造船业的发展使所有拥有海港、出海口的国家都大量利用海运从事国际贸易,它们都需要维护海上运输安全。另外,除了海洋岛国以外,还有半岛国家(韩国等)、陆海兼备国家(中国、印度等),它们往往地处重要的海上要冲,从对马海峡、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波斯湾大体皆如此。今后只有海洋和陆地国家保持和平、合作,才能真正确保海洋交通的持久安全。

一、中国地缘战略观念的变迁

早在中国古代就曾出现地缘战略的思想,但伴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例如,战国时期出现“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思想。《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地形篇”“九地篇”中提出:“地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强调“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中国古代的地缘战略思想大多是从用兵角度出发提出的,也有些则侧重于外交谋略。中国虽有通过贸易、册封、结亲等方式维护同周边邻国关系及同国内少数民族关系稳定的做法,但立足于同周边邻国谋求和平与合作的地缘战略理论则不多见。这或许是由于中国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虽曾经有过汉唐盛世,但在古代也曾遭受过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和南侵的缘故。自明朝起,中国又开始受到葡萄牙、荷兰、日本的海上入侵和骚扰。面对诸多陆海列强,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十分险恶,迫使清朝大员左宗棠提出“东则防海,西则防陆,二者并重”的战略主张,但因清末朝廷腐败,内忧外患,中国又先后受到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海上入侵和俄罗斯的陆地入侵,海陆腹背受敌,丧失了约30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疆土。始建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能完全抵御住外敌的入侵,海岸的炮台没能抵挡敌舰的进犯,有边无防,任人宰割,国家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践踏。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根据世界上存在“两大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判断,采取对苏联“一边倒”,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制定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侧重防御来自西北的陆上威胁。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国才改变了所谓“一条线,一大片”的方针。邓小平于

① 本节内容摘自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泰华孙、王顺柱、谷源洋主编:《亚洲区域合作路线图》,2006年8月,第258～288页。笔者执笔该书的第六章《亚洲区域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1985 年提出“东西南北”问题，指出当今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20 世纪 90 年代，江泽民同志特别注重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和我国良好周边环境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中国维护了国内稳定，打破了西方制裁；中俄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除中印边界外，中国同所有邻国的陆地边界均已划定；中国参与了周边地区所有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尽管“台独”势力活动、日美加强军事同盟等仍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挑战，但目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仍堪称是处在历史上比较好的时期。我们必须立足于此，从理论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我国海陆兼备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有利条件，促进亚洲的和平、安全、发展与合作。

进入 21 世纪，亚洲兴起区域合作新潮流，中国外交更加重视周边与多边，并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 年 9 月 15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如下三点。

“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因此，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我们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应该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联合国应该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特别是要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使 21 世纪真正成为‘人人享有发展的世纪’。”

“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5 页。

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①

2006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时表示：“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民主公正，推进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维护共同安全；坚持平等互利，促进共同繁荣；坚持开放包容，推动文明对话，积极促进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全方位外交。巩固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推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把务实合作上升到新水平。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推进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和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扩大和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保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二、地缘政治经济新概念：“海陆和合论”

西方传统的地缘战略思维已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不能为亚洲合作提供理论参考，反而在起严重的干扰作用。伴随中国的崛起，国际上所谓“中国威胁论”也重新抬头。“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往往有西方传统地缘战略思维的影子。因此，亚洲国家要推进地区合作向纵深发展，就必须颠覆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纠正错误的战略思考方向。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有必要从理论上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本国海陆兼备的地缘经济优势，为促进亚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提倡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与合作的“海陆和合论”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②

（一）“海陆和合论”的基本内涵

“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

① 《人民日报》，2005年9月17日。

② 新华网，http://www.news.xinhuanet.com-video-2006-03-05_content_4259443.htm。

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第一，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

第三，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共建跨海地缘通道与能源网络；

第四，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画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共同发展；

第五，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仅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

（二）“海陆和合论”的理论基础

从中国角度提出“海陆和合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理论基础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孙中山当年倡导的“王道论”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发展观”。

1. 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

早在中国古代，孟子就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①]孟子主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②] 他认为，交邻国有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③]。另外，主张非攻的墨子认为：“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④]他提倡：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则天下治。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非患勿讨的睦邻政策，可圈可点。公元 1371 年，明太祖告谕群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他认为，耗费人力、物力出兵外国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强调，“吾恐后世

---

① 《孟子·公孙丑上》，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405 页。

② 《孟子·公孙丑上》，载《四书全译》，第 415 页。

③ 《孟子·梁惠王下》，载《四书全译》，第 367 页。

④ 《墨子·兼爱下》，载焦国成：《中国古代人我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174 页。

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外国非侵中国不得用兵”。这一告谕载入朱元璋自编的《皇明祖训》，成为明代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①] 明成祖即位后，主张“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华夷一家”“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倡导“四海一家”“共享太平之福”，准许各国私商来华贸易，频频派遣使臣出访。1405 年至 1433 年，郑和使团七次下西洋，访问了近 40 个国家，“外交盛况虽汉唐盛世所不及也”。

2. 孙中山继承了儒家文化，提倡“王道”，反“霸道”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指出：“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便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就是亚洲，也有好几个国家的道德，也是很退步。近来欧美学者稍为留心东洋文化，也渐渐知道东洋的物质文明，虽然不如西方，但是东洋的道德，便比西方高得多。”

为说明这一点，孙中山说：“从五百年以前以至两千年以前，当中有一千多年，中国在世界上是顶强的国家。国家的地位，好像现在的英国、美国一样。英国、美国现在的强盛，还是列强。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中国当独强的时候，对于各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是怎么样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对于中国又是怎么样呢？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国来朝贡，要中国收他们为藩属，以能够到中国来朝贡的为荣耀，不能到中国朝贡的是耻辱。当时来朝贡中国的，不但是亚洲各国，就是欧洲西方各国，也有不怕远路而来的。中国从前能够要那样多的国家和那样远的民族来朝贡，是用什么方法呢？是不是用海陆军的霸道，强迫他们来朝贡呢？不是的。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怀中国的德，心甘情愿，自己来朝贡的。他们一受了中国王道的感化，不只是到中国来朝贡一次，并且子子孙孙都要到中国来朝贡。”

孙中山进一步阐明：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

① 转引自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223～225 页。

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受了感化的人，就是上国衰了几百年，还是不能忘记，还像尼泊尔至今是心甘情愿要拜中国为上邦；受了压迫的人，就是上国当时很强盛，还是时时想脱离。像英国征服了埃及，灭了印度，就是英国极强盛，埃及、印度还是时时刻刻要脱离英国，时时刻刻做独立的运动。不过处于英国大武力压制之下，所以一时不能成功。假若英国一时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到五年，他们马上就要推翻英国政府，来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诸君听到这里，当然可以知道东西文化的优劣。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什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这是因为对于欧洲殖民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

孙中山最后苦口婆心奉劝日本：“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臣，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①

孙中山在演讲中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给予了不恰当的肯定，这并非由于他对日本的争霸野心全无察觉，而是由于当时他仍寄希望于日本人民并想争取日本工商界。然而，历史证明，一旦日本政府的政策脱轨，日本国民便会像列车里的乘客那样一起坠入战争的深渊。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帝国已踏上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执意对亚洲行霸道，自取毁灭。历史虽然不会原原本本地重演，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以史为鉴”才不会误导未来。今天，为行霸道而提出的“海权论”“陆权论”“大陆边缘地带论”等，仍在潜移默化地支配着美国某些战略家的头脑；当年佐藤信渊的“吞亚论”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日本的影响亦未消弭，一些人不仅没有接受历史教训，反而在美化侵略历史，甚至继续以中国为对手而甘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因此，“海陆和合论”能否真正顺利实行尚不容乐观。

①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5～407，409页。

但从长远看，伴随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海洋霸主很难再通过侵略内陆国家来建立殖民地统治，内陆国家也难以通过扩张的方式谋求本国利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实践证明，只有和平、合作才对各方都有利，而人为制造“威胁”与“对立”，到头来只能对本国不利。那些陈腐的国际政治观念和地缘战略学说，已远不适应21世纪全球化与地缘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出自“王道”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利于各国和平与合作的国际政治学原理，才能充分发挥上述亚洲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在优势，造福于人类。

3.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决策为“海陆和合论”提供了指导方针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为新中国开创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睦邻政策，同时又有新发展。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首先纠正了关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他在1977年便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①]1985年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987年进一步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②]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中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邓小平指出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1984年5月，邓小平首次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③]同年10月，他重申：“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7，2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

1985 年他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1988 年他认为：“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3]1990 年他指出：“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 年他仍然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4]

关于中国如何才能争取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提出过许多有创意的重要思想和务实的主张。在总体上，他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

他首次调整了过去处理国际关系时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画线的做法，主张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长期战略利益出发，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管其他国家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要学会同主要对手打交道。要同谁都友好，同谁都搞往来。[6]

他提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通过“一国两制”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他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7]邓小平同时强调，“我们坚持谋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81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53，383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6 页。
⑥ 刘华秋：《国际风云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10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6～97 页。

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①

针对中国与陆地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根据"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八个字，1989 年中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他强调，结束过去，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但是，"过去的事总得有个交代"。"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他指出，"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他建议，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②

同时，邓小平认为，"结束过去"必须讲原则，"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因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针对1989 年美国对华制裁，邓小平坚定地说："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③同时，他希望中美关系总会好起来的。

针对中国同海上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他强调："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共同开发设想，"最早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6～8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92～29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31～332 页。

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①

对隔海相望的日本，邓小平表示，“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② 他主张，“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第一步放到 21 世纪，还要发展到 22 世纪、23 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是由于“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③

对陆地相连的印度，邓小平表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他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④ “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 30 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 11 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49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3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9～20 页。

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①]“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②]

对自己的同胞,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言是:“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③]“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④]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为“海陆和合论”提供的重要启示是:第一,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海陆和合”是有希望的;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全球性战略问题,“海陆和合论”既符合全球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战略需要,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第三,“海陆和合论”不是谋求某一国的单方面利益,而是谋求各国共同的安全与发展利益;第四,要实现“海陆和合”,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五,推进“海陆和合”战略,要有创新精神和务实精神;第六,亚洲区域合作所遵循的“海陆和合论”,要重视南北问题和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第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建设性主张,有利于亚洲实现“海陆和合”“陆陆和合”“海海和合”的目标。

邓小平的确是有远见卓识的。他20多年前作出的许多重要战略判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前人原有正确判断的基础上,还要与时俱进地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看法。与20多年前相比,国际社会发生了五大突出的变化:一是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三是多边主义的兴起;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五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在新形势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已提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建立和谐世界等新主张。在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方面,也必须根据新变化促进“海陆和合”,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新方略。

三、“海陆和合论”的现实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对抗的事实都说明,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地缘战略争夺和建立势力范围上,是一种高成本、高风险、靠不住的安全。无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是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中的崩溃，还是苏联及华约的"和平解体"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谁能争取到"海陆和合""陆陆和合"，谁就能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实现低成本、低风险和可持续安全。无论是"二战"后德国、日本的经济复兴，还是韩国、东盟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印度的发展引人瞩目，除了信息技术给印度带来的福音外，它与巴基斯坦、中国、美国等国关系的改善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亚洲区域各种合作机制的兴起，充分说明在亚洲实现"海陆和合"具有现实基础。可以预言，如果"海陆和合论"能够成为亚洲各国共同的地缘价值观，不仅有利于避免海洋大国与欧亚大陆国家的战略对抗，减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争夺与冲突，还有利于发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缘经济优势和桥梁作用，对亚洲合作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

（一）"海陆和合"是亚洲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决定的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既有海洋岛国，如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又有内陆国家，如中亚国家蒙古；还有海陆兼备的国家，如中国、越南、泰国、印度等。它们之间完全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海运、空运和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连接，形成若干次区域经济圈彼此相通的亚洲广域经济圈。2005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马来西亚时，建议中国和东盟在深化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基础上，将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双方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探讨建设中国—东盟信息高速公路的可行性。在交通方面，只有海陆国家和平与合作，才能变亘古天堑为国际通途。据报道，中韩两国地方政府计划在山东烟台和韩国仁川之间建立跨海列车轮渡。由于韩国釜山和日本下关之间轮渡业已开通，所以中韩列车轮渡如能开通，将使从欧洲鹿特丹经欧亚大陆桥开来的火车直接跨海开到日本的东京。中、日、韩的大型专用汽车也可乘轮渡跨海，奔驰在其他国家的高速公路上。[①] 要保证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没有"海陆和合"的国际环境是不可想象的。

亚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亚洲目前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实现合作共赢是亚洲国家的共同愿望。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合作进步加深了亚洲国家一体化与相互依赖程度。亚洲互利、合作、共赢意识不断上升，各种形式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区域贸易安排不断涌现，为亚洲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亚洲实现"海陆和合"的范例之一是东盟的成功实践，以及东盟与中国（"10＋1"）、东盟

① 李攻：《让火车从鹿特丹直达东京中韩推进烟台、仁川跨海轮渡》，载《第一财经日报》，2006 年 1 月 6 日。

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的发展。这些都证明了海陆国家之间具有和平与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只有通过和平的、共赢的多边主义才能为发挥这种潜力提供必要的国际平台。

马来西亚总理巴拉维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合作应该成为亚洲的共同价值观。他强调：“我们必须建设一个立足于双赢思维、造福全体、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建设一个以带动所有成员国和人民经济发展、丰富其文化为首要宗旨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培育一个以促进和平与合作为共同价值观和准则的区域共同体。我们必须推动一种有利于弥合本地区各国和人民之间的分歧、建立互信的区域进程。我们要确保本地区的和平是一种暖意融融、蓬勃向上的和平，而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毫无意义的和平。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宗旨应该始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友好的，而绝不应该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和不友好的。”①当前，俄罗斯的拉夫罗夫也认为，俄外交“最有前景的努力方向是参与大型多边组织的活动，致力于建立对亚洲、美洲和欧洲都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②

（二）只有“海陆和合”才能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种挑战

根据“海陆对立”观念制定国家战略，根本无法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如今，国家安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安全的概念，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增长，国际恐怖活动、跨国犯罪、全球及地区性金融风险、战略性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与大规模自然灾害、新的流行性传染病、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都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共同面临着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的新的风险。美国也不能不承认和重视这一点。

2005 年 11 月 16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日本京都演讲说了这样一些话：“在一个国际交流和通商频繁的时代，新疾病会迅速蔓延。三年前，当一种前所未知的萨斯（SARS）病毒在中国出现时，我们认识到国际合作和透明度的必要性。一名受感染的医生携带病毒从中国出境后，萨斯病毒在一个月内传播到越南、新加坡和加拿大。不久，萨斯病毒传播到几乎各大洲，导致数百人死亡。据一项统计，萨斯疫情给亚太地区造成的损失大约 400 亿美元。这里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努力合作控制新的致命病毒暴发以保护太平洋两岸人民的生命关系到我们的全体共同利益。”“我们如今面临着一种新的、有可能更致命的禽流感威胁，禽流感病毒已使亚洲的禽类动物受感染。我欣慰地看到这个地区的各个政府正采取措施防止禽流感暴发

---

① ［马］巴拉维：《双赢思维和东亚共同体》，载《来到博鳌的领导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 页。

② ［俄］拉夫罗夫：《2005 年的对外政策总结：思考与结论》，俄新社 2006 年 2 月 5 日。

成大规模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协调全球的应对行动。推进这一努力需要更多的开放、更高的透明度、更多的合作。我期盼着在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讨论如何帮助这一地区预防和应对流感疫情的威胁。在疫情扩散之前协助发现和控制疫情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有关。在国内，我国正在采取重要措施，为预防疫情暴发作准备。在亚洲国家努力防止疫情暴发和保护其人民不受禽流感肆虐的过程中，美国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在我们对付公共健康面临的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应对需求量不断增加的紧张的世界市场对能源保障构成的挑战。亚洲国家认识到，创造机遇和减少贫困的最佳手段是发展经济。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增长，他们使用的能源也在增多。过去三年中，美国已发起一系列行动计划，以帮助这些国家在缓解全球市场需求、减少污染和解决长期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满足能源需求。”2005 年，美国“为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了重要措施，成立了‘亚太清洁发展合作计划’（Asia-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我们将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及韩国共同努力，重点谋求使各国分享最佳方法和最新能源技术的实际途径。随着这个地区所有国家采用这些措施和技术，工厂和发电厂将更清洁、更有效率。我准备借这次亚洲之行进一步推动我们正取得的进展。通过共同合作，我们将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排放，并且帮助建设一个更美好、更清洁的世界”。① 布什总统的这些表态显然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地缘战略观念毫不相干，在这方面强调国际合作是美国的政策基调。

2006 年 1 月 18 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演讲中又提出美国的“转型”外交。她说：“我们还将把新的重点放在我们的地区和跨国战略上。在 21 世纪，地理概念上的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更趋于一体化。产生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特别是诸如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贩卖人口和疾病等国际性威胁。建立地区伙伴关系是我们当前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基础。”②赖斯提出“转型”外交的动因，似乎并非出于传统的大国地缘战略对抗，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大的形势所迫。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共同合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非传统安全领域内各国的国家安全目标。

（三）“海陆和合”体现着陆海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互补性

亚洲地区既有中、日、韩等油气资源进口国，也有中东、中亚、俄罗斯等诸多产油国，可以通过海运和铺设管道运送能源，建立比较稳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网络。

---

①　“布什总统在日本京都演讲”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005 年 11 月 16 日，中国事务 http://www.chinaaffairs.org。

②　康多莉扎·赖斯 2006 年 1 月 18 日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基调演讲：《布局调整——美国的“转型”外交》，转引自新加坡《海峡时报》，2006 年 1 月 21 日。

维护海路和陆路石油通道的安全,也是不分海、陆的有关国家的共同任务。

2003 年,在世界能源消费量中,亚洲占 33%,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占 21%。但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油气资源十分有限。日本能源需求方面仅次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四位。然而,日本自 1870 年发现第一个油田以来,总共探明 200 余个小型油气田,剩余可开采石油储量仅 800 万吨,天然气储量 400 亿立方米。日本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很低,石油需求的 99.7%靠进口,其中 87%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韩国油气资源也很匮乏,迄今陆海油气资源勘探都无重大进展,能源主要靠煤炭,油气主要靠进口,来自中东的石油进口占 79.8%。朝鲜能源主要以煤和水力发电为主,目前 650 多座中小水电站,年发电量约为 1450 亿千瓦小时,煤年产量约 4600 万吨,年进口原油约 650 万吨。

目前,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中国和韩国经济在 21 世纪前 10 年仍将保持 7%左右的发展速度。日本经济增长率可恢复到 2%。1987 年至 1997 年,东亚石油需求增长了 3.16 亿吨,占同期全球石油增量的 70.6%,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的主要增长地区。其中,仅中、日、韩三国 10 年间年平均增长达到约 5%,占全球同期石油增量的 48%。预计东北亚石油消费量 2010 年将达到 8 亿吨,其中,中国的消费量将达 3 亿吨,日本将达 2.7 亿吨,韩国将达约 2 亿吨,朝鲜将达 1380 万吨,合计需要进口约为 8 亿多吨。随着天然气管网建设加快,天然气消费也高速增长。预计 2010 年,东北亚天然气需求量将要超过 2400 亿立方米,其中,中国天然气需求量约 1000 亿立方米,日本约 950 亿立方米,韩国约 450 亿立方米,朝鲜约 100 亿立方米。

俄罗斯是亚洲重要的地缘经济合作伙伴,油气资源十分丰富,已探明石油可采储量为 100 亿吨、天然气储量约为 46 万亿立方米,其油气主要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而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潜在油气出口地区。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明确地指出:“在 21 世纪,把国家竞争力提高到首位的地缘经济将会取代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市场的容量、在市场上的地位、商品、资本、服务、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经济一体化和协作关系。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学会有效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教育资源、一些技术水平高的部门和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他还强调:“我们把东方视为一个战略方向。因为从外部环境来讲,这里有走在世界经济前列的日本和韩国,有市场庞大、工业化潜力巨大的中国和印度,有雄心勃勃的东亚国家。从内部环境来讲,这里有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这两个地方依靠西方极为困难,光运输费用就吃不消。”①

据俄罗斯官方统计,目前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储量达 64.3 万亿立方

① [俄]维克托·赫里斯坚科:《奔向东方》,载俄罗斯《导报》,2006 年 2 月 6 日。

米。《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提出，2020年俄罗斯东部石油年开采量将达1亿吨，天然气达1050亿立方米。俄罗斯正计划通过输气管网，向中国、韩国和日本输送天然气。据推测，2020年，亚洲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增至30%；天然气将从5%增至25%。[①] 据预测，2010年日本天然气最大缺口将为1500万吨，不仅要把视野投向萨哈林、伊尔库茨克等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而且进而扩展到中亚。在日本通过输气管进口天然气时，除来自萨哈林的渠道外，来自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中亚的渠道，也要途径中国、韩国、朝鲜。但从现在的经济力量考虑，朝鲜自己扩充国内的输气管是困难的。如果通过国际合作，以连结韩国国内输气管的形式建设纵贯朝鲜的天然气输气管，那么朝鲜就可以收取过境费，得到获取外汇的手段。以欧洲为例，若韩国和日本分别进口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话，朝鲜每年得到的过境费可达9000万美元。[②] 这不仅有利于东北亚能源供给，也有利于解决朝鲜核问题。

（四）“海陆和合”是中日关系应取的历史大方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海陆和合”的历史，也有前后约80年血雨腥风的不幸时期。正所谓“岁月两千玉帛，春秋八十干戈”。

从总体上看，除蒙古族军队在灭宋建元的过程中于1274年和1281年侵犯日本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给日本带去的是文明、知识与长期友好。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多次发动过侵略战争，前后相加达到70年以上，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长达8年之久。即便如此，中日关系史上95%以上的时间是两国和睦相处。因此可以说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中国现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日两国如能通过谈判，实现东海有争议地区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将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新的创举。从相反意义上讲，中日两国能否通过共同开发解决东海争议问题，也是检验中日能否实现“海陆和合”目标的一块试金石。近年来，日方给中国油气田“命名”并派军机侦察，企图立法授权军事干预等，挑衅行为逐步升级。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上任后情况有所好转，日方表示希望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同中国友好协商。无论是按中方坚持的“大陆自然延伸”原则还是按日方所谓“中间线”主张，中国都是在行使本国的经济主权，油气资源开发都是在双方没有争议的中国大陆架上进行的。对于日方提出的东海“中间线”，中方从未承认。因而客观上看，所谓“中间线”只不过是东海无争议地区和有争议地区的分界标志而

---

① [俄]弗拉基米尔·萨彦科：《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石油天然气发展纲要》，载俄罗斯《分析论丛》月刊2005年12月特刊；维克托·赫里斯坚科：《奔向东方》，载俄罗斯《导报》，2006年2月6日。

② [日]盐谷隆英〔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PA）理事长〕：《建立东北亚能源、环境共同体的途径》，载《现代日本》，2001年第3期，第32页。

已，而绝不是两国大陆架及海上专属经济区的界限。“中间线”以西是没有争议的中方一侧，以东则是中日之间有争议地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日双方首先在有争议地区通过资金、人员、技术合作等，实现共同勘探、共同开发、共同管理、共同分享。另外，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在没有争议的中方一侧海域展开中日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日双方就签署了《中日两国有关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石油及天然气勘探开发合作意向书》，翌年中国渤海石油公司与日本“日中石油开发”公司签约，共同开发渤海海域25500平方公里的海底石油。其后，日本7家石油公司在中国珠江近海海域、渤海埕北油田、海南岛西部海域进行了共同开发合作。在能源安全方面中日双方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通过合作来谋求共同安全；二是对抗升级导致两败俱伤。前者合作领域宽广；后者则是绝路一条。中国现有约3万家日本企业，中国通过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确保能源供应绝非中方单独受益，对于这些日资企业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鉴此，中日两国可采取先易后难的务实做法，把共同开发与海洋划界分开处理。今后在共同开发有争议地区取得进展后，中日双方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平等协商，创造性地展开大陆架和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最后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及海洋划界分歧。此前应避免在有争议地区采取单方面措施激化矛盾。从长远看，中日两国若能形成“能源安全共同体”，共同开发东海能源，开展石油储备合作，联合进行海上巡逻等，不仅将对两国安全关系的全局作出贡献，而且有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五）“海陆和合”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中国同14个国家陆地接壤，同8个国家隔海相邻，周边环境比较复杂。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提倡的治国之道是：“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他指出：“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①]这些古训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非常重要。为保持本国长治久安，中国政府应加强法治下的民主；为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以及陆地和海上安全，必须拥有坚实可靠的国防力量；为促进亚洲和平与发展，可以把“海陆和合论”作为地缘外交战略的理论支撑。中国是陆海兼备的亚洲大国，可以在“海陆和合”方面发挥桥梁作用。无论是对海洋国家还是对陆地国家，都一视同仁地采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的方针政策，以诚待人，以利惠人，以理服

---

① 《管子·形势解》，载赵守正撰：《管子通解》，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

人，以德和人。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王道文化和21世纪中国国家的总战略——和平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中国无意与美国为敌或所谓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只反对美国搞霸权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搞强权政治。2004年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2005年中美贸易达211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8%，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9%。中国不仅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而且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库券……使美国利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鼓励消费并最终减轻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①]

美国是面临东西两洋的世界超级大国，本来可以成为“海陆和合”的主导力量，但妨碍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之一有时恰恰是传统的地缘战略观念。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为称霸世界，仍把中、俄作为地缘战略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又决定了它仍将避免同中、俄等大国发生战争或冲突。大国无战事，且存在需要彼此合作的共同利益，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之一。“9·11”事件以来，非传统安全领域增大的压力迫使美国开始鼓励中、俄“在解决共同安全挑战方面充当美国的伙伴”。最近，美国军方也认同“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为经济伙伴，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②] 至于台湾问题，目前美国也是把它放在美中关系的战略框架内加以权衡的。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实现亚洲“海陆和合”的重要保障。

（六）“海陆和合”促进亚洲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

亚洲各国之间在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丰富多彩的多样性。为增加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和取长补短，亚洲国家开展文化、艺术、学术、教育、医疗、宗教等方面的友好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各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第二轨道，共同研究如何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发展，在各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就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探讨和创新性研究，使学者的知识转化为实际政策；有关各国还可以就历史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共同制定历史教科书，以利广大青少年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正确对待历史；为增进各国友好，提高对彼此价值的认知，可举办国际电影节、艺术节、文化年、文化周、体育赛事等活动；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合作能力的人才，推动相互之间的留学、进修，不断为此创造条件，完善体制；大力促进国际旅游观光事业，通过身临其境的方式增长相关知识；鼓励新闻媒体组织国际对话、研讨会、报告会等，为亚洲各国民众的思想沟通创造条件，尽量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通过交往，努力形成亚洲认同和文化意义上共同的价值观。

---

① 弗雷德里克博班：《中美关系进入相互依存时代》，法国《世界报》，2006年6月16日。

② 美国国防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06年2月3日。

2004 年 6 月 22 日亚洲合作对话外长会议在青岛通过的《亚洲合作宣言》提出“携手合作，共建亚洲美好家园”的口号。宣言涉及亚洲区域政治对话与文化交流的内容是，第一条：“加强政治对话，增进相互信任。亚洲国家应坚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和争端，通过合作维护和平与安全。我们将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合作与协调，营造和睦、稳定的地区环境。”第七条：“促进文化交流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充分发挥亚洲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的优势。我们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亚洲国家间加强文化交流，并以此为基石，扩大亚洲文化的世界影响。进一步开展亚洲文化与艺术节等活动，加深亚洲人对彼此文化的理解。”第八条：“加强旅游合作，我们将充分利用亚洲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推动亚洲旅游业以可持续和有利于环境的方式发展，同时使进入亚洲和亚洲内部的旅游更为便捷。我们将促进各国旅游业和旅游设施的发展，鼓励国民到彼此旅游目的地观光，并共同把亚洲多姿多彩的旅游资源推向世界。”第十一条：“加强传媒合作。为加深亚洲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我们将倡导亚洲媒体业者间定期接触与交流，并鼓励公正、客观和全面地报道彼此的新闻或其他事件。我们将促进媒体产业合作，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亚洲的声音。”第十二条：“加强亚洲公共、私人部门及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鼓励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合作对话成员国其他学术机构开展活动，共同规划未来亚洲合作蓝图。”第十三条：“增强亚洲人民的大家庭观念。我们将通过知识界、文化及国民间交流等方式加强对话和理解。我们坚信，是亚洲人民在本地区播散着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的种子。”①

四、中国是亚洲“海陆和合”的促进力量

今天，中国国内政通人和，对外重视通过参与多边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保持了年均 9%以上的增长率。1978 年至 2005 年，中国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1473 亿美元达到 2.2 万亿美元，增加 14 倍；中国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206 亿美元达到 14221.2 亿美元，增加 68 倍；中国外汇储备从 1.67 亿美元达到 8470 亿美元，增加 5070 倍。2005 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达到 4 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000 美元。中国的发展给亚洲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1978 年以来，中国年均进口增速达到 15%以上，已成为世界第

① 《亚洲合作宣言》是 2004 年 6 月 22 日在青岛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CD)第三次外长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与会的有巴林、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缅甸、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的 22 国外交部部长或代表团团长。

三大进口市场和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2005年，中国从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达到4415.4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在当年中国进口总额中，欧洲占14.6%，北美占8.5%，亚洲则占66.9%。近年来，中国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2003年，中国出境人数突破2000万人次，大量中国游客把亚洲国家和地区作为出游首选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防费用有所增加。2006年国防预算为2838亿元人民币，约合351亿美元，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14.7%。国防经费支出预算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的7.4%。与其他大国相比较，中国军费仍处于较低的水平。2005年中国军费是302亿美元，美国是4017亿美元，英国是488亿美元，日本是453亿美元，法国是365亿美元。2005年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是1.36%，美国是3.6%，英国是2.59%，法国是1.98%。2005年中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7.43%，美国是17.8%，法国是11.4%，德国是9.25%。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也没有能力大力发展军备。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市场规模、对外投资等必将进一步扩大，会有更多中国人到亚洲旅游、经商、访问，中国经济也将进一步同亚洲经济走向融合，形成互利、互补、互助的新型合作关系。"未来，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海陆和合"的有力推动者，与周边邻国一道建起亚洲的共同家园，实现共同发展。

第六章
可持续安全与东亚安全合作

第一节　关于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战略设想[①]

2004 年是东盟地区论坛成立 10 周年。近 10 年来，欧洲、中东、南亚、非洲等地相继爆发战争或冲突，东亚则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这在东亚近百年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东盟地区论坛作为有史以来东亚地区第一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其中发挥了特有的积极作用。随着东亚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得到本地区各国的普遍认同。2003 年 10 月举行的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签署了 2020 年之前建立“东盟共同体”的宣言，其中包括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这反映出 21 世纪初东亚地区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新潮流，以及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领域谋求全面合作、联合自强的新趋势。

然而，东亚安全形势也有严峻的一面。超级大国推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在东亚地区调整军事部署，加强军事同盟。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前景备受关注，爆发战争或冲突的导火线依然存在。东亚国家之间安全利益不尽相同，一些矛盾在发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依然猖獗。跨国犯罪有上升之势。东盟地区论坛作为有史以来东亚各国首次建立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现有东亚安全合作机制仍处于比较松散的初级阶段，建立更加有效的东亚安全合作体系是东亚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为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东亚安全，兹提出一套关于东亚安全合作的建议，供东亚各国政府和安全问题专家参考，并希望引起读者对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East Asian Security Community，EASC)的关注和探讨。

---

① 本文作者为刘江永、阎学通，发表于《亚非纵横》，2004 年第 1 期。

一、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与战略意义

今后10年东亚国家可考虑将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作为谋求共同安全的总目标。这一进程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努力在东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防止东亚国家间发生战争，减少东亚地区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避免东亚国家的内部冲突，缔造和维护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①]。

东亚安全共同体要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在东亚现有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东亚各国的地区认同感，培育共同的安全理念，遵守共同的安全合作原则，建立维护集体安全的机制。

关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具体形式，可考虑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框架，以“东盟安全共同体”为核心，建立“东亚安全合作组织”(East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EASCO)。它与北约不同，不是军事集团，不具有排他性，不预设假想敌，而是针对不同安全领域的问题或威胁开展东亚各国之间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东亚国家不存在共同的外部军事威胁，传统的军事集团模式不适合东亚地区的整体安全需要。东亚安全共同体也难以照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即OSCE)模式[②]，但可以从东亚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欧安组织的某些经验，也可参照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做法。

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成员，主要是本地区的主权国家，但不排除美国等本地区以外国家参与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因地理上接近中亚，所以如果有意愿，更适合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东亚安全合作组织”一旦建立，便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桥梁”作用，使亚洲和欧洲的多边地区合作组织彼此呼应，相互贯通，从而为中国周边地区和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发挥具有战略意义的积极作用。

二、树立“可持续安全”的共同理念

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在谋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为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③]。

---

① “可持续安全”是一个新的安全概念，它吸收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传统安全概念中引入社会环境因素，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

②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前身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95年1月欧安会改名为欧安组织，现有55个成员方。每两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日本从1992年起开始列席欧安会(现欧安组织)的各种会议。

③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小组提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决定于第47届联大审议建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现在，国际社会有必要从共同安全的高度提出“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和“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构想。

持久和平并不等于持久安全。由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上升，即便在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公众、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也可能会受到威胁。“可持续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要确保传统安全领域的持久和平，而且要努力解决非传统领域的持久安全问题。

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疆域面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强国防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盲目依靠增强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到头来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或陷入一种“高成本、低安全”的战略困境。国家之间的战争、军备竞赛往往后患无穷，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与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一样，暂时的和平也不等于安全。要使和平长期延续，要摆脱安全困境，仅靠增强一国或同盟国的军事力量是做不到的。部分国家谋求所谓“绝对安全”或盲目追求“对等安全”，其最终结果都可能增加其对他国安全的威胁，使国际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或复杂化。

有鉴于此，东亚国家在谋求本国安全和考虑地区安全合作时，应该树立“可持续安全”的观念。“可持续安全”的目标是在保证成员国生存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协调成员国安全利益的规则与制度，避免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现象，摆脱安全困境。

东亚安全共同体应建立在“可持续安全”的理念之上，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参与、协调合作、持久安全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协调本国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延续东亚地区的和平，加强东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1）“可持续安全”从时间上讲是指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迄今，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永久和平，但通过努力有可能使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相对延长。对东亚来讲，可持续安全的含义首先是长期保持东亚现有的和平状态。

（2）“可持续安全”从理念上讲是强调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的理念要求不得以战争方式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安全利益。“可持续安全”就是要通过地区安全合作，争取使东亚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

（3）“可持续安全”从内容上讲具有预防性和综合性。目的是防止和减少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东亚虽然实现了10多年的和平，但仍面临引发战争的危险和大量不安全因素。因此，减少引发战争的隐患是“可持续安全”的首要任务。同时，鉴于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其中包括分离主义、领土争端、武器扩散、海洋资源分配、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既有传统安全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因素，需

要各国之间在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以利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

（4）“可持续安全”从范围上讲应谋求和维护地区安全的整体性。东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及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尽相同，妨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深入。“可持续安全”尤其强调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协调与互补，鼓励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感，增强共同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使命感，通过渐进积累方式逐步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

（5）“可持续安全”从策略上讲要体现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实行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必由之路。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多边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协调国家的个体安全利益与地区的整体安全利益。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只能通过多边安全合作，任何双边同盟或安全合作都不可能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体。

“可持续安全”不仅应成为东亚国家安全的目标，也应成为全球安全的目标。东亚国家可在本地区安全合作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国呼吁实现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安全”，使“可持续安全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辅相成，使和平、发展与文明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安全、文明与进步做出东亚人的贡献。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必须考虑本地区的特殊性。东亚是多样性较强的地区，因而尊重和平衡各国的安全利益就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东亚国家的多样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如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经济水平、军事实力、战略关系、国家规模、种族血缘、国际利益等。然而，东亚国家就是在这种多方面不一致的情况下维持了“冷战”后的和平状态。这一事实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国家的多样性并不一定不如相似性有利于安全合作；二是在多样性情况下的安全合作原则与相似性下的合作规则有所不同；三是东亚现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规则需要巩固和加强。目前，东亚安全合作的一些原则，有些体现在双边关系条约中，有些被载入联合国文件等多边文件，成为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了促进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我们提出以下安全合作原则供东亚的战略家及政策制定者们参考。

（1）尊重地区多样性的原则。东亚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本地区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应允许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宗教彼此共存，互不强加于对方，以和平的方式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东亚安全共同体应为一个民主的国际安全体系。各成员方在地区安全事务的决策上拥有平等权力；一般问题尊重绝大多数国

家的意见，重要问题和事项应继续采取协商一致原则[①]；当事国的意愿应得到尊重，并以当事国的意见作为协调安全利益冲突的基础；单边主义的海外军事行动应受到制约；维和行动需要共同体的授权并得到当事国的同意。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把平等协商、和平谈判、外交斡旋作为解决各种国家间冲突的基本方法。反对主权国家之间相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②]；反对以武力改变现存边界现状或推行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对为别国国内或跨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4）地区安全与国家生存安全相一致的原则。地区安全的前提是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因此，东亚安全共同体成员国的安全防御政策不应对其他成员国的生存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各成员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

四、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本框架

构筑东亚安全共同体是一个相对长远的目标，但并非一个空洞的理想，其构筑过程本身就能对维护东亚地区安全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关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本框架设想如下。

（1）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础。东亚地区现已形成多个不同层次的多边安全合作渠道，如东盟地区论坛、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唯一的东亚所有主权国家都参加的政府间的多边安全论坛。其作用较强、级别较高、覆盖面较大，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容易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支持。因此可以考虑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东亚安全合作组织，并对现有其他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以“东亚安全合作组织”为主体的复合型地区安全共同体。

（2）加强东盟地区论坛内部的机制化建设。首先东盟国家可考虑设立东盟地区论坛理事会之类的常设机构，以东盟国家外长为主，设立轮值主席制度。根据不

① 1992年1月欧安会部长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布拉格文件》，把欧安会决议需协商一致通过的原则修改为“一致减一”原则，即在某一成员国发生所谓严重违背欧安会有关精神的事件时，可在不征得该国同意的情况下做出有关决定。这为其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埋下了伏笔和隐患，东亚国家应引以为戒。

东盟首脑2003年10月7日签署的“巴厘第二协约宣言”，提出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它包括：只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东盟国家之间的分歧；不许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尊重国家主权，各国有权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措施，这一共同体不是军事同盟；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以及东盟所确定的互不干涉内政、以协调一致为基础的决策等。

② 1976年2月通过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友好谈判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同性质的安全问题，在东盟地区论坛内部可设立不同领域的部长会议，例如国防及公安部长会议。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也可设立专项分组会议或召开临时会议，有针对性地讨论本地区最突出、最紧迫的安全问题。

（3）适时举行东盟地区论坛非正式首脑会议。2004 年是东盟地区论坛成立 10 周年。各成员国应在总结地区安全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努力方向。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召开东亚国家领导人峰会，努力就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理念、规则和途径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可制定“东亚安全合作宪章”或发表“缔造东亚可持续安全联合宣言”，促使东亚安全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4）东盟地区论坛与其他地区合作组织建立联系机制。除东盟地区论坛之外，东亚地区还有一些官方对话合作机制。例如，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机制、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亚太地区防卫当局论坛、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与太平洋区域中心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渠道。它们都可根据实际需要，就有关地区安全问题与东盟地区论坛建立联系通报制度。

（5）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为基础建立东亚第二轨道安全对话联系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作为较有代表性的民间常设机构，与各种二轨机制之间可以建立联系通报制度，将所有二轨安全对话机制及临时性合作项目中有建设性的相关建议收集、汇总到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备案，经过讨论和筛选提交东盟地区论坛做参考，从而形成连通官方、半官方、民间等各层次的东亚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网络。

（6）妥善处理东亚安全共同体与双边军事同盟的关系。东盟国家大多奉行不结盟政策。美国同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既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也是有关国家的自主选择。如同东盟地区论坛不排斥结盟国家一样，未来的东亚安全共同体也可以是不结盟国家与结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届时双边同盟的性质、功能和作用应和参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进程相吻合，而不应相抵触。

（7）推动实现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化。要争取六方会谈的续会，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使其升格为部长级会谈，从而使东亚安全共同体在“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发展。六方会谈可以独立存在，最终实现朝鲜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形成包括六国在内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也可考虑并入东盟地区论坛，成为未来东亚安全合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8）建立中美日俄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四大国关系的改善与稳定是东亚安全合作的关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首次为中美日俄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对话平台。今后若能实现六方会谈的机制化，可以在会议期间增加中美日俄四方会谈的议程，内

容不局限于朝鲜半岛问题。东亚四大国安全对话可主要集中于讨论四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问题，就地区重要安全问题协调四方立场，以确保四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为提高地区安全合作的效力，今后还可考虑举行四国外交及国防部长会议。中美日俄安全战略对话应向东盟地区论坛通报其讨论的要点和共同立场，并争取东盟地区论坛给予支持。

五、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安全管理措施

东亚安全共同体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东盟地区论坛就不能停留在论坛的水平上。东盟地区论坛不仅要务虚，也要务实，切实加强地区的危机管理和日常的安全管理；不仅要防止和解决突发性危机事件，而且要重点加强维持地区安全现状的管理。东盟地区论坛的安全管理可包括如下一些措施。

（1）强化东亚国家相互信任措施机制。提倡各国以对话谋理解，以行动增互信，以合作促安全。各国可加强军队对话交往、观摩及参与多边联合演习、开展人员培训、学术交流与专业技术合作等。有关各方应恪守承诺，认真执行对有争议地区科考活动的事先通报制度和规定，完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商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切实预防危险军事活动。核国家之间相互承诺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对无核国家承诺不使用核武器，提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承诺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无核国家承诺不谋求核武器。

（2）建立军事突发事件管理机制。可借鉴欧安组织的做法，成立预防冲突中心。成员国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通报和澄清其所卷入的军事性突发事件，减少有关国家的误会。受影响的国家有权要求当事国和平解决冲突并做好善后处理。危机结束后，当事国应将事件发生的详细情况过程上报预防冲突中心备案。

（3）建立解决边界及海洋权益争端机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平等协商，谈判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边界及相关问题。时机和条件成熟后，有关各国可展开大陆架和海上专属经济区的谈判。为减少对有争议且不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岛屿、岩礁的争夺，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有关规定，将其永远排除在划定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法定依据之外①。有关各国在领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争议尚未解决前，应避免采取单方面措施激化矛盾。必要时可在东亚地区建立和

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岛屿制度”第三项明确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见赵理海：《海洋法的新发展》附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94 页。

平解决争端和调节与仲裁机制，体现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公平与法治精神①。

（4）建立东亚非战斗军事救援机制。根据联合国决议及当事国请求，适当开展东亚国家军队参与本地区维持和平的合作行动、国际抢险救灾合作。随着东亚国家及安全合作的加强，可建立地区维和机构，统一组织具体的维和行动，体现东亚安全共同体自愿互助而不强行干预的精神。

（5）建立东亚裁军、军控和防扩散机制。东亚各国要努力谋求低成本、高安全。要继续防止东亚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注重解决造成扩散的经济结构及国际环境方面的问题和原因。努力促使东盟地区论坛全体成员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东盟地区论坛可对成员国加入、批准、执行上述条约的情况进行年度确认和敦促，并将其作为是否是本地区负责任一员的衡量标准之一。在防止核、生、化污染方面加强区域合作。东南亚无核区业已建立。东北亚也应为建立无核区做出努力。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日本应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减少东北亚的核扩散危险。

（6）建立东亚打击跨国犯罪协调合作机制。鼓励东亚所有国家批准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加强本地区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拐卖人口、海盗、洗钱等跨国犯罪。东亚各国反恐机关加强对跨国犯罪的情报合作和案件侦破合作。针对跨国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建立区域监控系统和通报制度。通过国际合作提高预防高科技犯罪的能力，维护金融安全。

（7）建立东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有关各国要加强维护海上石油通道安全和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安全的合作。在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方面，尽量避免恶性竞争，避免由此引发的海洋权益争端，努力探索东亚国家之间联合开发有争议地区能源的途径。如在有关国家政府协议的基础上，成立股权平等的跨国公司，联合勘探、开采海底能源资源，逐步形成东亚各国互利的集体石油储备体制。

---

① 欧安会和平解决争端机制亦称“瓦莱塔机制”。因 1991 年 2 月欧安会瓦莱塔专家会议制定的和平解决争端措施而得名。这些措施包括：争端当事国应通过直接磋商谈判来解决争端，可由当事国提交高官委员会；若当事国在一定时间内无法通过直接磋商谈判解决争端或就争端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可提出启用解决争端机制的要求；解决争端机制由 4 名非当事国的资深专家组成；若当事国从解决争端机制启动 3 个月内仍未平息争端，高官委员会将再次派出不超过 6 人的专家使团；专家使团可与当事国单独或共同接触，提供总体的或具体的评估与建议，以非正式和灵活的姿态运用多种工作方法来帮助当事国取得实际效果；若当事各国同意，解决争端机制可引用常设仲裁法院（海牙）国际局的条款与设施。

关于欧安组织调解与仲裁机制：1992 年 7 月，欧安会在布达佩斯举行首届议会成立大会，通过和签署了《欧洲解决争端公约》，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欧洲调解与仲裁法院，用以解决欧安会成员国之间的争执与冲突；1994 年 12 月，《欧洲解决争端公约》生效；1995 年 5 月，欧安组织调解与仲裁法院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法庭庭长、两名调解人和两名法庭候补成员。

六、关于中国参与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几点建议

今后10年，为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有必要奉行“远交近和”的地缘安全政策，在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我们认为，下列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在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安全保障。

(1) 以睦邻友好作为地区安全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同东亚邻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合作潜力大于矛盾。如果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保持较好的战略协作关系，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外部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因此，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应立足于周边，特别是东亚地区，把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努力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协邻共富，睦邻同安。在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多边合作机制中，要继续尊重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主动精神；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前提下，为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开创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局面[①]；从加强“10＋1”合作入手，带动“10＋3”，建立以东亚国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逐步酌情吸收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中的非东亚国家参与，最终形成名为“东亚安全合作组织”的亚太安全共同体。

(2) 争取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四大国之间战略利益各不相同，历史上四国进行真正的战略合作也很少，甚至几度爆发战争。四国间的双边关系性质各有不同，发展也不平衡，但目前四国关系有了进入以磋商、协调、合作为主的新阶段的可能性。中国应努力发展同俄、日、美的关系，在加强双边安全对话与信任措施的同时，适时推动中美日俄的四国战略对话。这将有助于减少大国之间的误解和安全威胁，有助于增强四大国对共同安全利益的共识，有助于促进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和东亚“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迄今，中国已分别同俄罗斯、日本建立起不同的伙伴关系并有双边条约做保障，然而中美两国之间既未建立起稳定的伙伴关系又无双边条约做保障。有鉴于此，争取形成有条约保障的稳定而富建设性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应成为中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一项具体任务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目标。

(3) 坚持多边主义的地区安全合作策略。历史昭示，双边同盟不能有效地保障中国的安全，也难以实现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多边主义不仅不排斥双边合作，反而有赖于全方位正常的双边关系做基础，同时可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多

① 2003年10月8日，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从“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发展到一个经济、政治、安全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边主义重视集体性国际协调，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与和平威胁增大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在联合国多边合作中发挥作用外，还要顺应东亚业已出现的多边主义潮流，把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作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目标，发挥负责任地区大国的作用，树立遵守共同规则的典范，成为东亚各国的平等合作伙伴。为促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还可根据需要申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欧安组织的活动，了解并借鉴欧洲安全合作的经验。

（4）努力在东亚营造抑制中国台湾分离主义的国际环境。台湾的分离主义倾向既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是破坏东亚地区安全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阻止台湾的分离主义图谋，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国在执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要继续针对“台独”的危险倾向，增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及民族凝聚力。要继续警惕台湾当局的所谓“务实外交”。要继续把反对中国的台湾挤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作为中国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反对或至少不支持“台独”，作为双边及多边安全互信互利措施的前提条件。地区安全合作议程中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都必须以反对“台独”为基本前提。绝不允许无原则地把台湾问题纳入多边安全对话的议程。同时，可通过双边交往，争取东亚国家就分离主义是对本地区安全的威胁达成共识，以利进一步形成有利于阻止“台独”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是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需要东亚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相信，无论这个目标需要多久才能实现，只要东亚国家能以此为目标，就将给东亚安全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就有了迈出第一步的希望。

在亚洲跨区域的洲际合作机制和全球合作机制中，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成为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第二节　通向东亚共同体之路：合作与创新[①]

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要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还要考虑如何建立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安全保障共同体，共同塑造安全、繁荣、和谐、友爱的新东亚。

今年第三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在韩国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日本举行。据报道，根据鸠山首相的指示，日本政府各有关部门将在5月末就实现“东亚共同体设想”提出具体政策。日本将根据“友爱”与“开放”精神，推进自由贸易等区域经济合作，在人员往来、大学交流、环境保护、减灾防灾等领域加强同亚洲各国的合作。2009年11月美国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2010年3月与澳大利亚等其他七国在墨尔本首次举行了旨在实现自由贸易的多边磋商。去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继续倡导“亚太共同体”（Asia Pacific Community）设想，建议在2020年前建成包括美国、中国、印度的跨太平洋组织，讨论政治、经济、安全等广泛议题。但该设想由于涉及台湾参与和东盟地位问题，恐难顺利得到中国和东盟的支持。东盟则计划在未来5年至10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在新形势下，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如何规划，具体推进，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拟就此提出笔者的设想，与大家共同探讨。笔者认为，未来10年至20年东亚共同体建设可考虑推动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升级，努力把“10＋3”建成“东亚核心共同体”（East Asia Core Community，EACC），并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具体设想是，中日韩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可与东盟的三个共同体相呼应，以“10＋3”为框架共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和“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从而形成“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在这一进程中，要努力妥善处理好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中日韩与东盟的关系、“10＋3”与“东亚峰会”之间的关系、美国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东亚共同体建设与借鉴欧洲经验的关系这五大关系问题。

一、“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与中日韩合作

2010年堪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元年。其主要标志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

① 本文发表于《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

正式启动。[①] 东盟国家有人担心，中国的产品会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为照顾东盟利益，中国对东盟国家实行了“早期收获计划”，提前单方面降低关税。2010 年 1 月份，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增长了 80%，达 214.8 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 10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8%；自东盟进口 10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7.3%。结果，当月东盟超过日本，成为排在欧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亚经济共同体能否建成，关键在于中日韩能否形成自由贸易区（FTA），进而形成纵贯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东亚地区在地理上是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组成的，而中国大陆使这两部分连接在一起。如果“10＋3”合作框架未来能全面实现自由贸易区，就意味着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东亚峰会、APEC 机制也可以与其相互补充。长期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以东南亚为先导。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成自由贸易区。中日韩如果能建成自由贸易区，其经济、贸易规模将分别占世界的近 20%和 30%。如果再加上东盟，就会使东北亚与东南亚经济连成一片，其经济规模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大体相当。

迄今，中日韩三国分别同其他国家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FTA）或经济合作伙伴协议（EPA），但彼此之间仍处于研究阶段。这项研究从 2003 年起开始，据民间机构测算，如果中日韩实现自由贸易，将大大促进彼此之间的人员、货物和资金流动，对中日韩三国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分别为：中国 0.4%，日本 0.3%，韩国 2.8%。

但是，中日韩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立场不同，彼此都有一些弱势产业需要保护。另外，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与中、韩政治关系冷淡，其对外政策重点在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及日本与东盟的关系，中日韩 FTA 谈判进展并不顺利。日本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对美国的顾虑和对中国的戒心，处于矛盾、彷徨之中。[②] 这种局面在 2009 年 9 月鸠山由纪夫执政后才开始有所改变。据报道，2010 年 5 月，中日韩三国将就缔结 FTA 启动由政府、产业界、学界人士参加的共同研究，预定 2～3 年内提交研究成果。

伴随东亚经济的发展，东亚各国之间互为市场、互为客源、互通有无的巨大动力势将催生区域经济一体化。笔者认为，未来中日韩可以在以下八个方面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

①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 年至 2010 年），启动并大幅下调关税阶段。在 2010 年前中国对东盟 93%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第二阶段（2011 年至 2015 年），全面建成自贸区阶段，即东盟越、老、柬、缅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亦实现零关税，双方更广泛深入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第三阶段（2016 年之后），自贸区巩固完善阶段。

② 刘江永：《日本谋划东亚共同体进程中的对华战略考虑》，载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07 页。

（1）通过缔结投资协定，实现相互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加深节能环保、信息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循环经济领域的产业合作，带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各方条件成熟后争取缔结中日韩FTA。

（2）中日韩展开城市交流合作网建设，进行大型项目合作开发。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日本和韩国可以在建设可循环经济、绿色环保、科技研发城市，特别是在城乡下水道排水系统建设方面，选择样板，参与合作，如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唐山曹妃甸园区开发等。

（3）观光旅游业将有力促进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人员的自由往来。日本可对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提供签证便利化。例如，日本的冲绳可以仿效韩国的济州岛对中国游客采取免签证的做法。①

（4）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可与东盟各国、中亚国家、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实现放射型的海陆空互联互通。云南昆明、广西南宁的铁路、公路可直通越南。如果越南的胡志明市与柬埔寨的金边市之间建成高铁，中国的铁路网就可能连通泰国、马来西亚直达新加坡。中国大连、天津至香港的大陆沿海港口与日本冲绳之间可开辟相互放射的海上客运“金三角航线”。着眼未来中韩与日韩之间海底隧道建设，需要考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化、便利化、一体化、人性化，为东亚人员往来和物流提供高质量的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

（5）伴随图们江开发区和环黄渤海经济圈的进展，在中韩FTA谈判过程中，中方可考虑对来自朝韩开城工业园区的进口商品优先减免关税。这既有利于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利于未来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交通运输的一体化。

（6）俄罗斯是本地区的能源大国，中日韩可与其建立原油、天然气管道网络，有关各国可优势互补，在能源开发、节能、环保、气候变化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其中，科学的人工增雨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

（7）中日韩应携手合作，发挥各自长处，加强同东盟的经贸、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缔结FTA的基础上，推动“10＋3”成为“东亚核心共同体”。

（8）中国对日本等国提出的务实建议应积极回应，争取落实。例如，东亚各国可以通过具体领域的功能性合作，逐步建立政治互信与合作机制，包括“稳定地区货币机制”“东亚能源、环境合作机制”“东亚多边文化交流机制”“东亚传染病防治

① 从2008年2月29日起，中国公民前往韩国济州岛地区旅游，无须办理任何签证手续，可在济州岛停留30天。韩国实行的“个人赴韩国济州岛旅游免签证”政策，促进了韩国旅游的升温。

合作机制”“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等。[①] 在各种不同的功能性合作机制中，可以根据各国的长处采取分工负责制，实行分散型“集体领导”。

二、“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共同体”与中美日关系

（一）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框架内逐步形成东亚安全共同体

“冷战”后，东亚建立了第一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鉴于未来 20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仍难以囊括地区安全议题，因此东亚安全共同体可以在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在 ARF 的框架内逐步形成。

但是，这绝非易事，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东盟如期建立政治安全共同体，东盟国家之间保持和平与稳定；第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促使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得以建立；第三，东亚安全共同体需要制定相应的国家行为准则、相互信任措施和国际危机管理机制；第四，东亚安全共同体参与者主权一律平等，都必须遵守未来东亚共同体制定的行为规则，而不得将本国或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凌驾于本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之上；第五，东亚安全共同体必须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维护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难以完全排除美国参与，但也不能无条件欢迎美国介入

迄今美国不仅直接参与六方会谈，未来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也必须有美国参与，而且美国一直是东盟地区论坛的重要成员。中国并不反对美国参与东亚安全事务，反对的只是美国及其盟国干涉台湾问题，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介入中国与亚洲邻国的领土及海洋权益之争。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安排与军事存在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必然坚决反对。由于迄今美日两国从未表示日本的所谓“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海峡，对于中国来说，努力减小和防止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就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售台武器，协防台湾，为干预台海局势而加强美日同盟等，都会造成中美关系紧张。因此，中国对美国介入东亚安全事务不能不持有相当大的保留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目前，台海两岸出现和解，美日原本可以表示日本的“周边事态”没有必要包括台湾海峡，但遗憾的是迄今并未看到这种迹象。其原因之一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与大陆缓和关系的同时，仍然把美日安全体系作为台湾安全的靠山。台湾

① ［日］“东亚共同体评议会”2005 年报告《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参见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00～407 页。

"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台湾大学教授杨永明就表示:"《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周边事态法》等条约和法律是实现台海两岸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主张保留驻日美军基地。[①] 这表明,尽管台湾岛内政权更迭,两岸关系走向和解,但台湾当局依据"威胁均衡理论"的安全战略思维并未改变,目前台湾当局对日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希望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协同美国对台提供军事保护方面继续贯彻"冷战"时期以来自民党政府的原有政策。其结果,不仅使台湾自我"矮化",而且在中美、中日关系中制造了不稳定、不信任因素,从而使台湾问题成为中国大陆在考虑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时必须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

东亚多边安全机制要超越和克服这些障碍,就要加强安全对话,增强政治互信。最近,日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大胆建议:改变日美安全条约所构成的日本安全保障框架,谋求缔结包括中国在内的"日美中安全保障条约"。为此,可先设立"日美中安全保障对话框架"作为三国定期进行安全问题对话的平台。[②] 笔者认为,这是个富有远见的设想,但现阶段会遇到较大阻力。为减少阻力,有关各国需要共同树立新的地区安全合作理念。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的是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各国共同的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这一概念是笔者 2004 年提出的。[③] 所谓可持续安全,目的就是争取以较低的安全成本确保国家与公众可持续的全面持久安全。它涉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其内涵包括:谋求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可持续性;以人为本,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强调所采取的措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与协作性,通过非暴力的多边国际合作获得共同安全。事实证明,巨大的核武库、北约军事集团、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都没能给美国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带来可持续安全。美国巨大的军事安全成本反而造成"安全的异化",使美国陷入严重的安全困境。由此可见,所谓"威胁均衡理论"早已过时,可持续安全绝不是单靠军事力量、军事手段、军事集团就能够获取的,而是需要通过综合安全、合作安全才可能实现。

在传统安全领域,东亚可通过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本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和平的多边主义从根本上有别于北约军事集团,不仅相关各国之间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同时也不对外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坚持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国际争端。

---

① 杨永明:《新台日关系与东亚新局面》,[日]《世界》月刊,2010 年 3 月号。

② [日]天儿慧:《相互依存与对立并存——中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真意》,[日]《经济学人》周刊,2010 年 3 月 2 日。

③ 刘江永:《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 21 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7 期,第 45~49 页。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鸠山首相提出的“非战共同体”的理念相吻合。而要做到这一点，未来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成员就应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提出了“无核世界”倡议。2010 年 4 月，美俄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美国最新的《核态势报告》宣布，不对签署与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美国并未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没有把伊朗、朝鲜等国排除在核打击目标之外，引起这些国家的反对。2010 年 4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讨论了全球核安全问题，以及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这些主张如何在东亚落实也值得研究。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之一，可考虑建立东南亚和东北亚无核区，在反对核扩散的同时，现有核大国应承诺不对本地区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彼此之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东亚国家可以在反恐、反走私贩毒、反海盗、防治跨国传染病、维护生态环境等跨国安全问题上加强合作。这有利于东亚地区增强相互信任，防止军备竞赛，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

（四）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需要确立新的地缘战略概念——“海陆和合论”

本文所指“海陆和合论”，意谓提倡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促进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由于东亚地区由内陆国家、海洋国家、半岛国家、群岛国家、海陆兼备国家等组成，尽管是山水相连、隔海相望的近邻，但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存在复杂的相互制衡。

因此，如果没有东亚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的和平与合作，就根本不可能有东亚共同体。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是东亚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这就不仅需要海洋国家之间保持和平合作，更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鸠山首相提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不应使日本周边海域成为“争夺之海”，而要使其成为友好和团结的“收获之海”，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新型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建立，也需要从上述“可持续安全观”和“海陆和合论”的角度加以思考。只有这样，也许才能摆脱“威胁均衡论”和“海陆对抗论”的束缚，使矛盾对立的各方找到最大的战略公约数。

三、“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与欧洲经验

未来东亚共同体的特色之一是建立“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倡建立和谐社会，与世界各国共建和谐世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倡建立友爱社会，开展友爱外交。这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一词的大意最早可能出自中国的《管子》一书，是指和睦相处，相互合作。[①] 鸠山首相强调的友爱，是指超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相互尊重，彼此关爱。这与欧美那些侧重强调竞争与自身利益的理念不同。面向未来，东亚应该努力谋求建立“和谐友爱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人类创造新的文明。人的精神文明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东亚实现人员自由往来的重要条件。

欧洲区域合作有三大机制：欧盟（EU）、北约（NATO）及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虽然欧安组织包括俄罗斯，但是由于北约东扩并可以在全球使用军事力量，仍引起俄罗斯的高度警惕，因此欧洲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种“冷战”时期遗留的军事集团与集团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在东亚地区也必须注意防止。

未来东亚共同体有别于欧洲的特色应该是，以“开放的地区主义”谋求可持续发展；以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当然，“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和平的多边主义”都是有条件的。没有缔结 FTA 的国家便不能单方面享受自由贸易的利益；面对外来侵略和武装干涉的国家也有自卫的权利。在这一进程中，东亚虽然难以照搬欧盟模式，但有些经验可以借鉴。

2009 年年末，笔者曾请教法国驻华大使苏和有关欧洲一体化的经验。他告诉笔者有五条重要经验：第一是法德和解，德国对纳粹的历史予以彻底清算；第二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即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和德国总理阿登纳这两位被两国公认的杰出领袖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他们都曾受到考登霍夫·卡莱吉思想的影响）；第三是在做法上从易到难，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外长舒曼的建议，从法德煤钢联营开始逐步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第四是欧洲各国之间人员的自由往来，相互交往的日常化、频繁化增进了民众之间彼此的了解；第五是在安全保障领域形成共同的政策和地区机制，加强了战略互信。我想这些经验都值得亚洲参考。其中之一是，日本要像德国在欧洲那样，彻底放下历史包袱，真正融入亚洲；同时也可像英国那样成为美亚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中日两国应该全面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成为“海陆和合”的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鸠山首相“友爱”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欧洲一体化启蒙思想家、奥地利人考登霍夫·卡莱吉。“友爱”其原意是“博爱”，与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仁爱”有相通之处。另外，卡莱吉生前既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也反对苏联的“集权模式”，主张欧洲走向大同。实际上，战后的日本否定了军国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否定了“苏联模式”，坚持和平发展。现实说明，中日两国正越走

① 《管子·兵法第十七》：“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这句话的意思是，和睦合作就能和谐，和谐就能齐心协力。做到这些，就可成功而不受伤害。

越近，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有可能越来越多。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观越来越多。只不过由于人们往往更多地被一些眼前利益和矛盾束缚着思想而没能发现而已。东亚共同体或许正是中日两国殊途同归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既然我们难以照搬欧洲模式，那就只有在借鉴欧洲经验的同时，依靠合作与创新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例如，在社会生活方面，东亚各国人民之间可以确立彼此认同的国际行为习惯与规范。例如，邻厌我避；邻乐我喜；邻困我帮；邻好我学；邻恶我防（包括汲取邻国失败的教训，即《论语》中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之”），使东亚各国能够分享彼此的长处，以亲情般的相互关爱彼此相待。在文化方面，可以本着求同存异、求同尊异、求同纳异、求同化异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共享东亚及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

综上所述，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就好比是一栋房子——东亚共同家园。如图 6-1 所示，这栋房子的地基是经济、货币、能源、环境合作所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屋顶是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四大支柱分别是东盟与中日韩的三个“10＋1”合作，以及中日韩合作伙伴关系；四面的墙壁和门窗是多样包容的“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的这几个部分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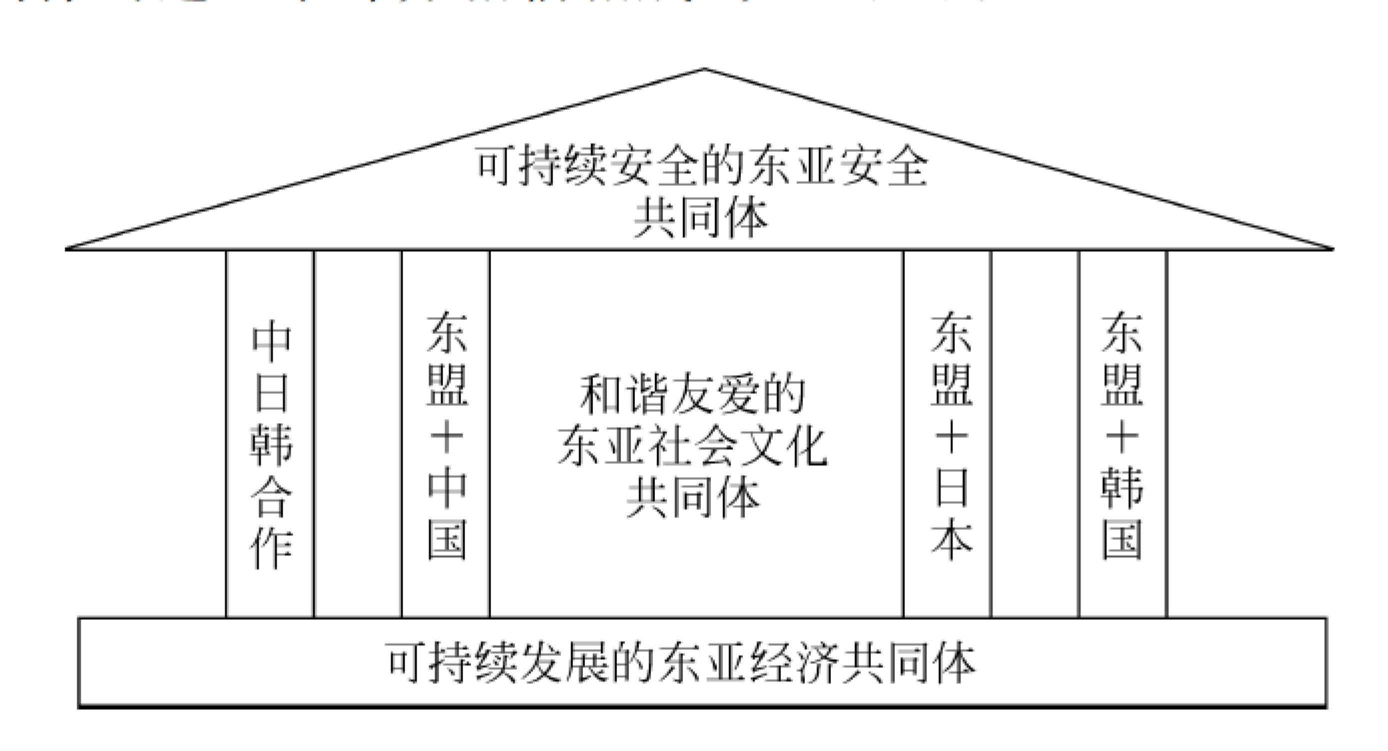


图 6-1　“10＋3”前景：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蓝图

中国可以利用本国在亚洲有利的地缘经济地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文化软实力，以“开放的地区主义”谋求可持续发展，以“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可持续安全，以“和谐友爱精神”谋求共建和谐东亚。

四、东亚核心共同体与东盟的作用

中日韩三国在加强相互合作的同时，可继续共同支持东盟发挥主动精神，建立以“10＋3”为主体的“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形成向整个亚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放射形的多元共存、相互补充的多边区域合作体系。

历史的教训证明，任何一个大国企图主宰东亚地区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

最终必然失败。“二战”期间，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惨遭失败；“冷战”时期，美国企图在亚洲构筑遏制中国的同盟网同样宣告失败。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提出建立亚洲安全体系，也遭到各国反对而夭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有两条基本经验：第一，多边合作体系的建立需要较为健全的双边关系做基础；第二，由中小国家联合发挥主动精神，而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导，最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取得进展。

在东亚乃至亚太区域合作中，东盟都发挥了先导作用。《东盟宪章》确立的在 2015 年至 2020 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三大目标，为东亚共同体的愿景提供了参照目标。迄今，东盟在亚太及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大国之间黏合剂的重要作用。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合作机制，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圈与基础链。今后，也许可以把实现自由贸易区的“10＋3”称为“东亚核心共同体”。

如图 6-2 所示，这一“东亚核心共同体”可以在东盟三大共同体的基础上，扩大延伸到“10＋3”的范围，从而形成包括中日韩的东亚三大共同体，即上述“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和谐友爱的东亚社会文化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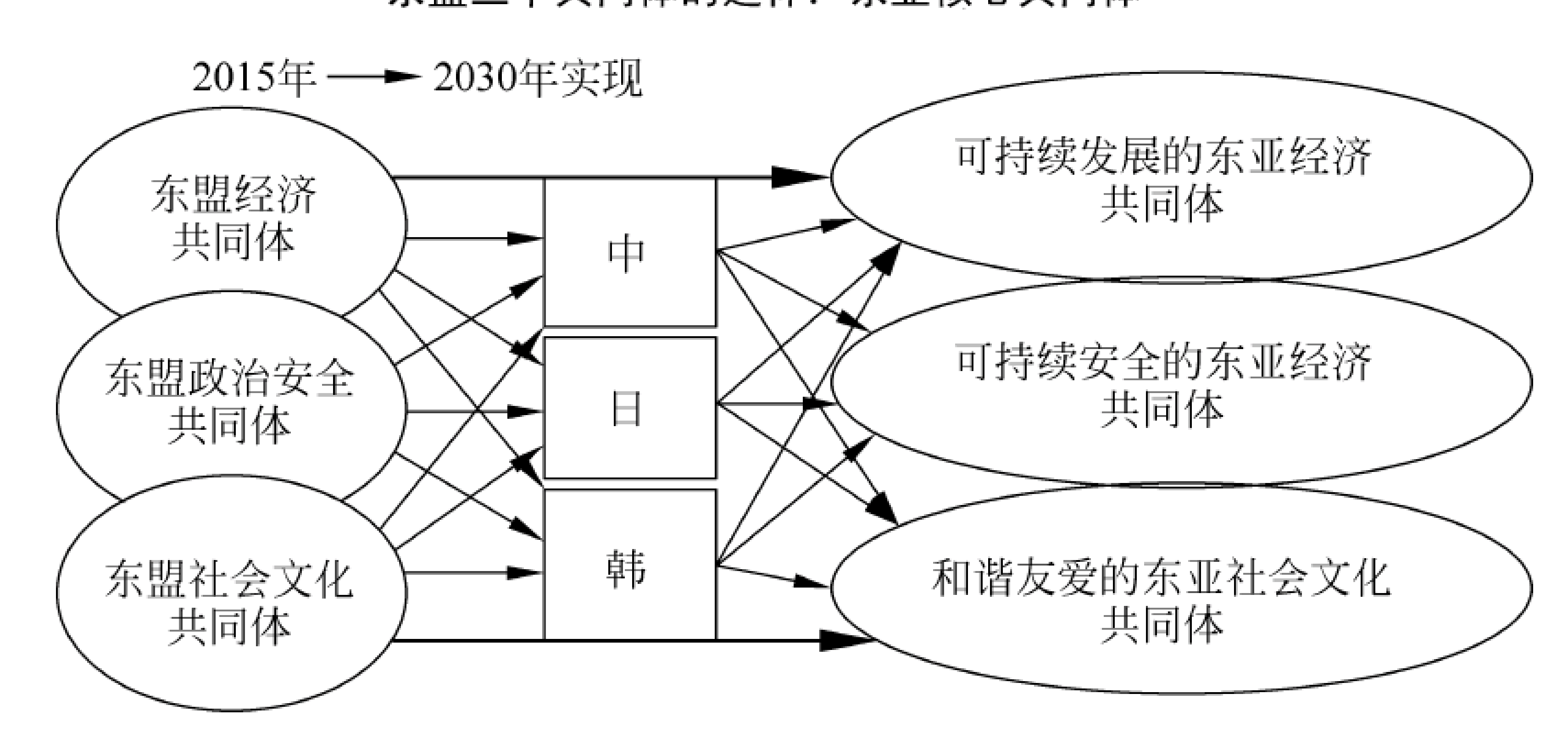


图 6-2　东亚核心共同体(EACC)路线图

东盟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10＋6”东亚峰会的成员也是以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前提的，需要经过东盟同意才行。1990 年，美国曾反对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st Asia Economic Group，EAEG)设想，而今却不得不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可见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目前东亚地区合作并不存在中日主导权之争，因为东盟一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今后中日应继续鼓励东盟发挥主动精神，在湄公河区域开发方面加强协调、

积极合作，但在具体合作项目上首先应考虑东盟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经说过："上善若水。"老子认为，水给万物带来利益却不与万物相争，默然流向人们都不喜欢的低处。有像水这样美德的人，就接近于"道"了。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中，"上善若水"对所有相关大国也许都有启迪作用。正因为中日韩在东亚具有最强的经济实力，反而需要更加尊重东盟的存在，与东盟携手共进。

不过，未来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则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东盟国家内部的稳定；二是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三是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合作。三者缺一，东盟的主导地位都可能受到制约或影响。例如，泰国局势动荡便造成2009年东盟系列峰会会场受到冲击。今后中日韩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应共同促进东盟的稳定与发展。

"10＋6"虽然称作"东亚峰会"，实则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亚和大洋洲等东亚地区以外国家。与"10＋3"相比，"10＋6"东亚峰会机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难以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核心，而只能是它的补充和外延式发展，未来的前景有几种可能性。

其一，如果印度、澳大利亚与东亚国家缔结FTA，就将形成"亚洲—大洋洲经济共同体"（Asia Oceania Economic Community，AOEC）。

其二，如果美国、俄罗斯等国也加入"10＋6"东亚峰会，最终可能与APEC没有多少区别，或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或全面取代APEC。

其三，美国、澳大利亚、秘鲁于2008年加入了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四国2006年发起签署的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将来如果TPP成员与东亚接轨，有可能起到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作用。这或许比较接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提出的亚太共同体目标，但难以包揽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以上便是一种多元共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地区一体化进程。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需要改变"只要没有我参加我就反对"的老大心态。其实，欧盟就没有美国参与，而美国从来没有反对过欧盟的存在，因此也毫无理由反对东亚国家实现不包括美国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与美国有着巨大的贸易纽带，没有必要排除美国。但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愿意加入东亚共同体，就要做好包括与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缔结FTA的准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动辄对中国等东亚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从长远看，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就现阶段比较现实可行的目标而言，中日韩还是应首先考虑如何缔结FTA，进而和东盟一道把"10＋3"建成"东亚核心共同体"。

第三节　中日共同参与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①]

一、中日改善关系需加强东亚安全合作

当前，在中日两国首脑互访遇到政治障碍时，两国领导人可以利用共同出席亚欧会议、“10＋3”、APEC东亚峰会等多边会议的机会保持一定接触。两国首脑直接沟通想法，对缓解中日双边关系紧张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东亚地区任何有效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都离不开中日两国的积极参与。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要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并得到有关各国的普遍认同。同样，今后在本地区安全合作方面要想取得新的进展，也需要形成“国家间非暴力多边主义”的普遍共识。这一过程与建构主义学派所提出的“共有知识”或“集体共识”的创建与认同过程十分相似。鉴于中日两国在APEC和“10＋3”机制等经济领域多边对话与合作进展得相对顺利，现在与未来的问题主要将出在安全领域，故本章仅就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以及中日两国可取的理念、原则和做法等进行探讨。

近10年来，在欧洲、中东、南亚、非洲等地相继爆发战争或冲突，而东亚则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这在东亚近百年的历史上是少有的现象。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有史以来东亚地区第一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其中发挥了特有的积极作用。随着东亚经济向一体化方向发展，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得到本地区各国的普遍认同。2003年10月举行的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签署了2020年之前建立“东盟共同体”的宣言，其中包括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社会与文化共同体”。这反映出21世纪初东亚地区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新潮流，以及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领域谋求全面合作、联合自强的新趋势。

同时，东亚安全形势也有严峻的一面。超级大国推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在东亚地区调整军事部署，加强军事同盟。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前景备受关注，爆发战争或冲突的导火线依然存在。东亚国家之间安全利益不尽相同，一些矛盾在发展。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主义依然猖獗。跨国犯罪在增加。生态环境安全、传染疾病等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因素相互交织，明显上升，而这些只有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安全合作，才能得到有效应对。东盟地区论坛作为有史以来东亚各国首次建立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现有东亚安全

① 本节内容摘自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3～778页。

合作机制仍处于比较松散的初级阶段,建立更加有效的东亚安全合作体系是东亚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为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东亚安全,东亚各国在未来 10 年至 20 年,可以谋求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East Asian Security Community,EASC)。

二、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与意义

今后 20 年,中日可把共同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作为谋求共同安全的一个目标。这一进程与"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其主要目的是,在东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地区安全合作体系,防止东亚国家间发生战争,减少东亚地区面临的外部威胁,避免东亚国家的内部冲突,缔造和维护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①。

东亚安全共同体要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在东亚现有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东亚地区的认同感,培育共同的安全理念,遵守共同的安全合作原则,建立维护集体安全的机制,从而摆脱一方安全成为另一方威胁的安全困境。

关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可考虑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框架,以"东盟安全共同体"为核心,建立"东亚安全合作组织"(East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EASCO)。它与北约不同,不是军事集团,不具有排他性,不预设假想敌,而是针对不同安全领域的问题或威胁开展东亚各国之间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东亚国家不存在共同的外部军事威胁,传统的军事集团模式不适合东亚地区的整体安全需要。东亚安全共同体难以照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即 OSCE)模式②,但可以从东亚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欧安组织的某些经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做法也可参照。

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成员,主要是本地区的主权国家,但不排除美国等本地区以外国家参与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因地理上接近中亚,所以如果有意愿,更适合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东亚安全合作组织"一旦建立,便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桥梁"作用,使亚洲和欧洲的多边地区合作组织彼此呼应,相互贯通,从而为中国周边地区和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发挥具有战略意义的积极作用。

---

① "可持续安全"是一个新的安全概念,它吸收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传统安全概念中引入社会环境因素,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

②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前身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95 年 1 月欧安会改名为欧安组织,现有 55 个成员方。每两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日本为 1992 年起开始列席欧安会(现欧安组织)的各种会议。

三、树立“可持续安全”的共同理念

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决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如同经济增长一样，安全也有其“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就会发生“安全异化”。因此，人们普遍接受“可持续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需树立“可持续安全”这样一种科学安全观，以此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普世性理念。联合国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同时，也需要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这是伊拉克战争给人类带来的重要启示。伊拉克战争表明，军事打击不仅难以确保美国持久而稳定的安全，还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许多努力付诸东流。人类将继续面对一种极其荒唐和不公平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众多国家在虔诚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而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甚至要忍受限制自身发展之苦；而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却既不受限制地享用能源资源又任意发动战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且，如果人的安全受到严重现实威胁，对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关切势必大为下降。

迄今，人们往往把争取持久和平作为最神圣的安全目标。其实，和平不等于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它们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交叉概念。和平是安全的基本要求，但并不等于在和平条件下就必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0 年来，虽然没有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但人类“可持续安全”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威胁迅速上升，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这就使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因素进一步凸显。如何实现“可持续安全”，是摆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的战略课题。

“可持续安全”的概念超出了争取持久和平这一传统安全理念的框架，涵盖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是谋求摆脱安全战略困境的一种全方位的理性思考。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军事领域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一般是指军事领域以外对公共安全、国家综合安全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或威胁的安全领域及相关问题。它涉及经济、金融、能源、资源、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它具有明显的跨国性，而且难以单凭军事手段加以解决。

四、中日需要探索“可持续安全”之路

21 世纪初“安全异化”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决策的必然结果。要避免这种倾向的发展，甚至波及东亚安全，必须首先树立指导正确决策的战略思想，充分认识到 21 世纪人类需要“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的思想与中日誓不再战的决心是彼此相通的。中日之间“可持续安全”的源头在于两点：一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新中国采取了对日本不记仇、不报复而是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在中国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突出。因为中国政府历来认为，战胜国要求战败国赔偿、割地，最终还可能冤冤相报，不利于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与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避免陷入“高成本、低安全”战略困境的唯一选择。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疆域面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强国防建设是理所当然的。但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盲目依靠增强军事力量谋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到头来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或陷入一种“高成本、低安全”的战略困境。国家之间的战争、军备竞赛往往后患无穷，不仅难以确保本国安全，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军事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不仅会对不可再生能源造成极大浪费，其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许不亚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损害。与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一样，暂时的和平也不等于安全。要使和平长期延续，要摆脱安全困境，仅靠增强一国或同盟国的军事力量是做不到的。部分国家谋求所谓“绝对安全”或盲目追求“对等安全”，其最终结果都可能增加其对他国安全的威胁，使国际安全形势趋于紧张，引发军备竞赛，甚至破坏已有的和平。

“可持续安全”理念应该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新的安全观——“可持续安全观”。东亚“可持续安全”的目标是，在保证成员国生存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协调成员国安全利益的规则与制度，避免武力解决利益冲突的现象，摆脱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共同体应建立在“可持续安全”理念和目标追求之上，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参与、协调合作、持久安全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协调本国安全利益与地区安全利益，延续东亚地区的和平，加强东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关系。

“可持续安全观”是涵盖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安全观。如同和平不等于安全一样，持久和平也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传统安全领域中所涉及的国际关系通常往往具有“零”和局的性质和所谓“安全困境”，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情况则相反，各国甚至处于某种敌对关系的国家之间也可以找到彼此的共同安全利益的汇合点与彼此合作的结合点。由于国际恐怖主义、艾滋病、生态环境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的上升，即便在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公众、国家或地区的安全也可能会受到威胁。“可持续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要确保传统安全领域的持久和平，而且要努力解决非传统领域的持久安全问题；它不仅有利于中日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可以形成未来东亚共同体多边安全合作强有力的“黏合剂”。

五、“可持续安全”战略与东亚安全合作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的是缔造和保持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这对中日两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决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战略问题。它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以较低的成本保持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努力通过双边及多边国际合作,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保持世界和平,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长期合作。“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争取使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维护人类安全。东亚安全共同体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最重要的是确保本地区的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以人为本,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它要求不得用战争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可持续安全”战略就是要通过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争取使东亚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

——“可持续安全战略”所采取的措施应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上述威胁的挑战。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联合国应发挥重要作用。俗话说,“上医治未病”。东亚虽然实现了十多年的和平,但仍面临引发战争的危险和大量不安全因素。因此,减少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隐患是“可持续安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鉴于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其中包括分离主义、领土争端、武器扩散、海洋资源分配、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既有传统安全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因素,需要各国之间在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共同致力于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

——“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国家间实行“和平的多边主义”。由于美国单边主义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冲击,多边主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多边主义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必由之路。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多边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协调国家的个体安全利益与地区的整体安全利益。但是,自古以来,多边主义也有诸多表现形式,例如“八国联军”、北约军事集团、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或“志愿者主体联合”等。它们同样会对别的主权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必须实行“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所谓“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最早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各种努力之中,1928年缔结的“非战公约”就是其早期的一种尝试。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法西斯军事集团所代表的“军事多边主义”导致国联的尝试归于失败,从而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联合

国的诞生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再度充分体现了“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的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亚洲国家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各国共同提出的“万隆精神”、《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都体现出“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的精神；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及做法，都实践着“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的原则。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它主张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未来 20 年，世界格局将是一极多元结构，即美国“一超”与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的“一极多元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推行单边主义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东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及面临的安全威胁不尽相同，妨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深入。“可持续安全”尤其强调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协调与互补，鼓励东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感，增强共同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使命感，通过渐进积累方式逐步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实现有关各国的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国家之间恪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前提。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全球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就好似一部双轮车的两个轮子，缺少哪一个，就会变成独轮车而不稳定，甚至难以前行。为实现“可持续安全”，发达国家应高度重视南北问题的解决，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以确立“可持续安全”经济基础。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可以为此发挥巨大作用。中日两国也可通过友好合作，化解政治矛盾，走出安全困境。

——“可持续安全”不仅应成为东亚国家的目标，也应成为全球安全的目标。中日两国可在本地区安全合作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国呼吁实现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安全”，使“可持续安全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辅相成，使和平、发展与文明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安全、文明与进步做出中日两国的贡献。

六、“可持续安全”需要“海陆和合论”

尽管中国提出和平发展战略，但日本一些人仍半信半疑。因为他们的灵魂或多或少仍然受到传统地缘战略思想的束缚，担心中国未来向海洋发展的过程中与

日本发生战略冲突。因此，中日两国要实现“可持续安全”，就有必要顺应时代潮流，提出21世纪的地缘战略新概念——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合作的“海陆和合论”。

（一）传统的地缘战略思想已经过时

19世纪末，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提出“海权论”；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提出“陆权论”。他们都把人类历史视为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斗争史。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斯派克曼提出“大陆边缘地带论”，并对“海陆对立论”提出质疑。因为后者显然不符合后来的历史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既有陆地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有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的结盟现象。战争的起源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战争的结果是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地缘政治因素只不过是被利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例如希特勒便提出过所谓“生存空间论”。战后，在和平主义占上风的日本，传统的地缘战略理论在国际政治学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然而，至今，传统地缘战略学说仍然是美国制定全球战略的重要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之一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挑战美国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战略部署的重点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即从东北亚到中东的弧形地带。美国一些人仍在主张，美国应与日本、澳大利亚等海洋国家联手遏制中国。日本也有人学美国，强调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的国家战略应该是强化日美同盟，促使亚洲海洋国家组成的松散的“海洋联邦”，牵制中国，并使日本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这些过时的“海陆对立论”、不具备普适性的谬论只能误导国家决策，错误导致中美、中日之间产生地缘战略对抗，有害无益。即便是中国，如果接受所谓“海权论”或“陆权论”的地缘战略思想去制定政策，同样可能搞霸权，损害美国或日本的利益。

传统地缘战略学说大多是在总结17世纪到19世纪殖民主义战争史的基础上形成的，都是从地理的角度论述如何称霸世界的。然而，对战后60年来人类通过地缘经济合作争取和平发展的经验，还缺乏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滞后的状况亟待改变。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提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的“海陆和合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首先，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正确的地缘战略必须摆脱殖民主义时代思维方式的束缚；其次，东亚是由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组成的，没有“海陆和合”，建立所谓“东亚共同体”就将是一句空话；最后，“海陆和合”不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和理念，而且符合海陆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地缘经济互补性。在21世纪，只有和平与合作，才能为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带来可持续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当前，提出“海陆和合论”，对中国及其亚洲邻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地处亚洲中部，是陆海兼备的亚洲大国，同 14 国陆地接壤，同 8 国隔海相邻。这既是好事，也有弊端。关键看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妥善处理。处理不好，可能受到来自周边邻国或霸权主义的海陆威胁，影响我国的长治久安；处理得好，中国可以利用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对外开放与合作获取生存发展的更大空间，并可在“海陆和合”方面发挥桥梁作用。

中国自古对周边推行“亲仁善邻”的政策，但古代却饱受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近代又遭海陆列强霸道入侵。因此，为实现“海陆和合”，维护本国海陆安全，中国必须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要拥有坚实可靠的国防力量，同时应以“海陆和合论”作为周边外交战略的理论基础，对邻国不分海陆、大小、强弱，都一视同仁地采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的政策，以诚待人，以利惠人，以理服人，以德和人。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战略文化、国家利益，以及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所决定的。邓小平生前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建设性主张，有利于亚洲实现“海陆和合”“陆陆和合”“海海和合”。未来，中国将通过争取“海陆和合”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海陆和合”。

（二）“海陆和合论”的要旨与根据

“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基本内容和追求的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画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仅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

“海陆和合”是形势发展之必然。与 20 多年前相比，国际社会至少发生了突出的五大变化：一是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三是多边主义的兴起；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五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全面改善。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响亮地提出和平发

展的国家战略及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

“海陆和合”是亚洲地缘经济关系决定的。亚洲各国山水相连，既有海洋岛国，又有内陆国家和海陆兼备的国家。有关各国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海运、空运和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连接，形成若干次区域经济圈彼此相通的亚洲广域经济圈。据报道，中韩两国地方政府计划在山东烟台和韩国仁川之间建立跨海列车轮渡，使从欧洲鹿特丹开来的火车直接跨海开到日本的东京。中国还将利用地缘经济便利修建经缅甸从波斯湾、印度洋运输石油的进口大通道。要实现这些美好远景，没有“海陆和合”“陆陆和合”的国际环境是不可想象的。

“海陆和合”体现着陆海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互补性。亚洲既有中、日、韩等油气资源进口国，也有俄罗斯和位于中东、中亚的诸多产油国，可以通过海运和铺设管道运送能源，建立比较稳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网络。俄罗斯预计，目前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储量达 64.3 万亿立方米。2020 年俄东部石油年开采量将达 1 亿吨，天然气达 1050 亿立方米。俄罗斯正计划通过输气管网，向中日韩输送天然气。2020 年，俄对亚洲石油出口的比重有可能从目前的 3％增至 30％；天然气出口将从目前的 5％增至 25％。

“海陆和合”是确保海陆能源通道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种威胁和挑战的需要。如今，亚洲陆地国家也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波斯湾进口原油，以及利用海运从事国际贸易，海上通道安全已成为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现已超出传统安全的概念范围。实际上，“二战”后，世界上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海上通道而发生的战争几乎没有过，而 2004 年一年，世界就发生了海盗事件 325 起，其中马六甲海峡 45 起，印尼 93 起，马来西亚 9 起。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陆地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恐怖主义、海盗、跨国犯罪、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只有通过跨国合作才能有效防范这些问题。

“海陆和合”的必由之路是，“良好的双边关系＋和平的多边主义”。亚洲“海陆和合”的范例之一是东盟 10 国的成功实践，以及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的发展。“六方会谈”是通过和平对话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唯一途径。2006 年 4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柬埔寨，并出席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开创了“海陆和合”的新篇章。继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又增进了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的“海陆和合”。上海合作组织是亚洲“陆陆和合”的重要地区多边组织，它是以良好双边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具有对抗第三国的性质，而对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联合反恐、经济及能源合作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海陆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600 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

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远涉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是茶叶、瓷器、丝绸、工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带给世界的是和平与文明，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与有关国家和人民加强交流的诚意。

总之，"海陆和合"不是空想，它既具有战略指导性，也具有政策可行性。这是因为，从战略高度看，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海陆和合"是有希望的；和平与发展是全球性战略问题，"海陆和合论"既符合全球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战略需要，也符合多数国家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海陆和合论"不是谋求某一国的单方面利益，而是鼓励各国谋求共同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具有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适性价值；"海陆和合论"不是强加于人的教条，而是人类社会有可能通过最低成本共同获得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理智的、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本能所终将难以拒绝的战略选项。

（三）"海陆和合论"与中日关系

"海陆和合"是避免"海陆对立"、实现"海陆共赢"的必然选择，也是中日关系应取的方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和平、合作才对各方都有利，而那种以海陆画线树敌立友，人为制造"威胁"与"对抗"，到头来只能对本国不利。

中日两国只有谋求"海陆和合"，才能充分发挥亚洲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在优势，造福于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近年来，日本领导人不顾对邻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而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向后看"的表现，制造并加深了日本同邻国的历史观冲突，也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目前包括中国香港在内，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其能源、资源、市场离不开包括中国、俄罗斯、中东国家等在内的陆地国家或海陆兼备的国家。因此，实现"海陆和合"最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日两国如能通过谈判，实现东海有争议地区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两国政府应遵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通过公平原则，化对立为合作，在有争议地区实现共同开发。从相反意义上讲，这也是检验中日能否实现"海陆和合"目标的一块试金石。

中国奉行"海陆和合"的地缘战略，将有利于减少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目前，美日一些人持有"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于对中国强大后会不会搞地缘战略扩张不放心，而"海陆和合论"则可增加中国战略发展前景的透明度和能见度，使有关各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的未来。

"海陆和合"不仅不会冲击日美关系，损害日美的利益，反而可能成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协调发展的一条出路。因为"海陆和合论"也提倡日美之间的"海海和合"。从中国的地缘环境看，如能实现持久的"海陆和合"，将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和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如果中美实现"海陆和合"，把台湾作为美国"不沉

航空母舰”的神话就不复存在。如果中日实现“海陆和合”，把台湾海峡比作所谓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假设就毫无意义。21世纪，中美、中日之间能否长期和平共处，扩大合作，将成为东亚地区能否实现“海陆和合”的关键。

中日两国在争取东亚地区海陆和合，推进东亚安全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本地区的特殊性。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东亚是多样性较强的地区，因而尊重和平衡各国的安全利益就成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本出发点之一。目前，东亚安全合作的一些原则，有些体现在双边关系条约中，有些被载入联合国等多边文件，成为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了促进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应确立和遵循以下安全合作原则。

（1）尊重地区多样性的原则。东亚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本地区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应允许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宗教彼此共存，互不强加于对方，以和平的方式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东亚安全共同体应为一个民主的国际安全体系。成员国在地区安全事务的决策上拥有平等权利；一般问题尊重绝大多数国家的意见；重要问题和事项应继续采取协商一致原则；当事国的意愿应得到尊重，并以当事国的意见作为协调安全利益冲突的基础；单边主义的海外军事行动应受到制约；维和行动需要共同体的授权并得到当事国的同意。

（3）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把平等协商、和平谈判、外交斡旋作为解决各种国家间冲突的基本方法。反对主权国家之间相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①]；反对以武力改变现存边界现状或推行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反对为别国国内或跨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4）地区安全与国家生存安全相一致的原则。地区安全的前提是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因此，东亚安全共同体成员国的安全防御政策不应对其他成员国的生存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各成员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

七、包括中日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基本框架

构筑东亚安全共同体是一个相对长远的目标，但并非一个空洞的理想，其过程本身就能对维护东亚地区安全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关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基本框架设想如下。

① 1976年2月通过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各方“友好谈判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一）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基础

东亚地区经济、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形成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中小国家发挥主动精神，而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导。其中，东盟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首相中曾根1985年提出亚太合作的原则之一就是："尊重东盟的主动精神，以东盟为主导进行合作。"[①]今后中日两国应继续支持东盟国家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动精神。

东亚地区现已形成多个不同层次的多边安全合作渠道，如东盟地区论坛、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其中，东盟地区论坛是唯一的东亚所有主权国家都参加的政府间的多边安全论坛。其作用较强、级别较高、覆盖面较大，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容易得到东亚国家的广泛支持。因而可以考虑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东亚安全合作组织，并对现有其他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以"东亚安全合作组织"为主体的复合型地区安全共同体。

加强东盟地区论坛内部的机制化建设。首先可考虑在东盟国家设立东盟地区论坛理事会之类的常设机构，以东盟国家外长为主，设立轮值主席制度。根据不同性质的安全问题，可在东盟地区论坛内部设立不同领域的部长会议，例如国防及公安部长会议。也可在东盟地区论坛框架内设立专项分组会或召开临时会议，有针对性地讨论本地区最突出、最紧迫的安全问题。

适时举行东盟地区论坛非正式首脑会议。各成员国应在总结地区安全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努力方向。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召开东亚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努力就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目标、理念、规则和途径达成共识，并可在此基础上发表"东亚安全合作宪章"或"缔造东亚可持续安全联合宣言"，促使东亚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

（二）东亚安全共同体包容双边同盟

东盟国家大多奉行不结盟政策。美国同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既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也是有关国家的自主选择。如同东盟地区论坛不排斥结盟国家一样，未来的东亚安全共同体也可能是不结盟国家与结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届时双边同盟的性质、功能和作用应与参与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进程相吻合，而不应相抵触。

---

① 《简明日本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09页。

（三）推动实现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化

要争取六方会谈的续会，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使其升格为部长级会谈，从而使东亚安全共同体在“东盟地区论坛＋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发展。六方会谈可以独立存在，最终实现朝鲜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形成包括六国在内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也可考虑并入东盟地区论坛，成为未来东亚安全合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建立中美日俄四国战略对话机制

四大国关系的改善与稳定是东亚安全合作的关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首次为中美日俄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对话平台。今后若能实现六方会谈的机制化，可以在会议期间增加中美日俄四方会谈的日程，内容不局限于朝鲜半岛问题。东亚四大国安全对话可主要集中于讨论四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问题，就地区重要安全问题协调四方立场，以确保四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为提高地区安全合作的效力，今后还可考虑举行四国外交及国防部长会议。中美日俄安全战略对话应向东盟地区论坛通报其讨论的要点和共同立场，并争取东盟地区论坛给予支持。

东亚四大国之间战略利益各不相同，历史上四国进行真正的战略合作也很少，甚至几度爆发战争。四国间的双边关系性质各有不同，发展也不平衡，但目前四国关系有了进入以磋商、协调、合作为主的新阶段的可能性。中国应努力发展同俄、日、美的关系，在加强双边安全对话与信任措施的同时，适时推动中美日俄的四国战略对话。这将有助于减少大国之间的误解和安全威胁，有助于增强四大国对共同安全利益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和东亚“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迄今，中国已分别同俄罗斯、日本建立起不同的伙伴关系并有双边条约作保障，然而中美两国之间既未建立起稳定的伙伴关系又无双边条约作保障。有鉴于此，争取形成有条约保障的稳定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应成为中国地区安全合作战略中的一项具体任务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ARF框架内的双边与多边安全对话及合作，特别要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同日本的合作。

八、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安全管理措施

东亚安全共同体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东盟地区论坛就不能停留在论坛的水平上。东盟地区论坛不仅要务虚，也要务实，切实加强地区的危机管理和日常的安全管理。不仅要防止和解决突发性危机事件，而且要重点加强维持地区安全现状的管理。日常安全管理越有效，发生危机的概率就越低，从而减少和防止危机的发生。东盟地区论坛的安全管理可包括如下一些措施。

（一）强化东亚相互信任措施机制

提倡各国以对话谋理解，以行动增互信，以合作促安全。各国军队可加强对话交往、观摩及参与多边联合演习、开展人员培训、学术交流与专业技术合作等。有关各方应恪守承诺，认真执行对有争议地区科考活动的事先通报制度和规定，完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办商裁减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切实预防危险军事活动。核国家之间相互承诺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对无核国家承诺不使用核武器，提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承诺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无核国家承诺不谋求核武器。

（二）建立军事突发事件防止管理机制

可借鉴欧安组织的做法，成立预防冲突中心。成员国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通报和澄清其所卷入的军事性突发事件，减少有关国家的误会。受影响的国家有权要求当事国和平解决冲突并做好善后处理。危机结束后，当事国应将事件发生的详细情况和过程报预防冲突中心备案。

（三）建立解决边界及海洋权益争端机制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平等协商，谈判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领海边界及相关问题。时机和条件成熟后，有关各国可展开大陆架和海上专属经济区的谈判。为缩小对有争议且不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岛屿、岩礁的争夺，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有关规定，将其永远排除在划定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法定依据之外。[①] 有关各国在领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争议尚未解决前，应避免采取单方面措施激化矛盾。必要时可在东亚地区建立和平解决争端机制和调节与仲裁机制，体现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公平与法治精神。[②]

---

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岛屿制度”第三项明确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见赵理海：《海洋法的新发展》附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294 页。

② 欧安会和平解决争端机制亦称“瓦莱塔机制”。因 1991 年 2 月欧安会瓦莱塔专家会议制定的和平解决争端措施而得名。这些措施包括，争端当事国应通过直接磋商谈判来解决争端，可由当事国提交高官委员会；若当事国在一定时间内无法通过直接磋商谈判解决争端或就争端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可提出启用解决争端机制的要求；解决争端机制由 4 名非当事国的资深专家组成；若当事国从解决争端机制启动 3 个月内仍未平息争端，高官委员会将再次派出不超过 6 人的专家使团；专家使团可与当事国单独或共同接触，提供总体的或具体的评估与建议，以非正式和灵活的姿态运用多种工作方法来帮助当事国取得实际效果；若当事各国同意，解决争端机制可引用常设仲裁法院（海牙）国际局的条款与设施。关于欧安组织调解与仲裁机制：1992 年 7 月，欧安会在布达佩斯举行首届议会成立大会，通过和签署了《欧洲解决争端公约》，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欧洲调解与仲裁法院，用以解决欧安会成员国之间的争执与冲突；1994 年 12 月，《欧洲解决争端公约》生效；1995 年 5 月，欧安组织调解与仲裁法院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法庭庭长、两名调解人和两名法庭候补成员。

（四）建立东亚非战斗军事救援机制

中日两国可共同参与本地区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预警防灾和国际救援机制的建设，进一步加强预防传染疾病蔓延的机制建设。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决议及当事国请求，适当开展东亚国家军队参与本地区维持和平的合作及国际抢险救灾合作。随着东亚国家彼此敌意下降及安全合作的加强，可建立地区维和、抢险机构，统一组织具体行动，体现东亚安全共同体自愿互助而不强行干预的精神。

（五）建立东亚裁军、军控和防扩散机制

东亚各国要努力谋求低成本、高安全。要继续防止东亚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注重解决造成扩散的经济结构及国际环境方面的问题和原因。努力促使东盟地区论坛全体成员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东盟地区论坛可对成员国加入、批准、执行上述条约的情况进行年度确认和敦促，并将其作为是否是本地区负责任一员的衡量标准之一。在防止核、生、化污染方面加强区域合作。东南亚无核区业已建立。东北亚也应为建立无核区做出努力。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日本应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减少东北亚的核扩散危险。

（六）建立东亚打击跨国犯罪协调合作机制

鼓励东亚所有国家批准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加强本地区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拐卖人口、海盗、洗钱等跨国犯罪。东亚各国反恐机关加强对跨国犯罪的情报合作和案件侦破合作。针对跨国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建立区域监控系统和通报制度。通过国际合作提高预防高科技犯罪的能力，维护金融安全。

（七）中日共同建立东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

有关各国要加强维护海上石油通道安全和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安全的合作。在石油、天然气开发利用方面，尽量避免恶性竞争，避免由此引发的海洋权益争端，努力摸索东亚国家之间联合开发有争议地区能源的途径。在有关国家政府协议的基础上，成立股权平等、固定的跨国公司，联合勘探、开采海底能源资源。逐步摸索形成东亚各国互利的集体石油储备体制。

九、中日应携手共建东亚安全共同体

（一）以睦邻友好作为地区安全政策的出发点

中日两国的安全利益相互交叉，都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从长远看，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冲突，合作潜力大于矛盾。中日两国如果能保持较好的旨在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两国的安全成本，从而提高安全保障的系数，并有利于东亚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应立足于周边，特别是东亚地区，把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努力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协邻共富，睦邻同安。中日两国都要把世代友好作为两国的基本国策不动摇。同时，中日双方在东亚安全多边合作中，要继续尊重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主动精神；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前提下，为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发挥建设性作用；通过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10＋3”、ARF 等，逐步建立以东亚国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逐步酌情吸收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中的非东亚国家参与，最终形成名为“东亚安全合作组织”的亚太安全共同体。

（二）提倡实行“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

提倡“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并以此形成“国际共有知识”，符合中日两国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昭示，军事集团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而经验证实，一些双边关系中的僵局或危机可以通过多边对话机制得到转圜和缓解。“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不仅不排斥双边合作，而且有赖于全方位正常的双边关系作基础，同时还可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这种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协调，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其与日本和平宪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相吻合。中日两国应把“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原则作为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原则，共同发挥负责任地区大国的作用。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如果能成为“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定将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三）努力在东亚营造抑制“台独”分裂活动的国际环境

“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既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是破坏东亚地区安全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阻止“台独”分裂活动，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国将根据 2005 年 3 月 14 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推进反独促统，针对“台独”危险倾向增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及民族凝聚力。要继续警惕台湾当局所谓的“务实外交”，把反

对台湾挤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作为中国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以反对或至少不支持“台独”，作为双边及多边安全互信互利措施的基本前提。地区安全合作议程中任何有关台湾问题的讨论，都必须以反对“台独”为基本前提。坚决反对美日将台湾海峡问题纳入双边同盟的所谓“共同战略目标”，绝不允许无原则地把台湾问题纳入多边安全对话的议程。同时，可通过双边交往，争取东亚国家就台湾分裂势力是对本地区安全的威胁这一观点达成共识，进一步形成有利于阻止“台独”的国际环境。

中日两国政府及专家学者需要就中日关系和东亚安全加强战略对话，对一些人的不轨图谋要予以坚决抵制。在东亚安全合作问题上要继续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慎防台湾在日本右翼亲台势力协助下加入联合国机构及东亚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中国反对把台湾海峡问题说成“国际关心事项”，为日本今后介入台海危机开路。因为这既有违《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①]，又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精神，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①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第四节　金正恩接班后的朝鲜半岛局势①

2011 年 12 月 17 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突然去世，金正恩领导体制迅速建立。朝鲜局势明朗化并保持了政权交接的稳定。

一、关于当前朝鲜局势的总体判断

朝鲜政权顺利交接对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有利。2012 年 2 月 23 日，朝美高级别会谈取得进展，受到各方的肯定。它预示着朝鲜在金正恩领导下，将继承金日成的遗愿，首先努力突破同美国的关系。2013 年韩国新领导人上任后，朝韩关系也可能大幅改善。

关于朝鲜未来的发展，估计金正恩将在确保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如何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金正恩是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领导人，尽管目前缺乏像金正日那样的领导经验，但他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存在着领导朝鲜图存、创新、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和朝鲜人民认可的正统性与权威性。最近，朝鲜向尚未建交的法国派出艺术团，并请韩国人做乐队指挥，表明金正恩对欧洲外交已经伸出新的触角。

朝鲜近期内难以放弃“先军政治”的国家发展模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朝鲜的社会结构中，军队的作用不仅是保卫国防，而且从事国家经济建设，是重要的就业、干部升迁、甚至免考上大学的渠道。金正恩领导地位的巩固也必须从“先军政治”做起。他频繁视察朝鲜各地的军事单位的行为就是例证。这与其说是针对韩美的军事斗争需要，不如说是国内政治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正恩接班后韩美两国针对朝鲜的例行联合军演，在客观上恰恰配合了朝鲜领导人在国内迅速巩固政权基础的需要，增强了朝鲜国内的凝聚力。

朝鲜这种“寓民于军”社会结构的产生，与朝鲜内部的计划经济和外部的美、韩长期遏制有关。美韩彻底改变敌视、遏制朝鲜的政策，将有利于朝鲜国内结构调整。近期内即便朝鲜不放弃“先军政治”的口号，但如果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改善，军队的重点有可能进一步转向经济建设，并在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未来的朝鲜能否实现“军转民”或“寓军于民”的模式转型，还有待金正恩在未来 5 年至 10 年真正确立起不可动摇的国内领导地位与国际环境的突破性改善。

---

① 本文发表于《外交季刊》，2012 年春季刊。

二、朝鲜同韩、美关系的不平衡进展

（1）关于韩朝关系。2010年朝鲜与韩国之间发生延坪岛炮击事件，局势非常危险。与此相比，2012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尽管在韩国大选前朝鲜对李明博总统谴责的声浪还可能高涨，但这并非针对整个韩国。虽然美韩进行了常规军事演习，但朝韩双方都不愿发动战争。朝美高级别会谈取得进展，可避免朝韩关系进一步紧张升级。只要朝韩双方军队保持克制，朝鲜半岛局势就不会发生冲突与战争。

目前朝鲜对李明博政府的态度及朝韩关系，与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执政期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1998年金大中总统执政后，朝鲜对韩国的态度及北南双方的关系则立即出现转机。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今年末韩国大选结果令朝方比较放心，2013年韩国新领导人上任后能积极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朝政策，朝鲜半岛很可能迎来北南双方大幅改善关系的新局面。

（2）关于朝美关系。2012年2月23日，朝美第三次高级别会谈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这是金正恩接班后，朝美举行的第一次高级别会谈，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双方认真深入讨论了旨在改善朝美关系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重启六方会谈等相关问题。双方确认履行“9·19共同声明”，认为在签订和平协定之前，停战协定是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基石。朝方同意暂停核试验、核活动和导弹试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美方同意向朝方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表示不再以朝鲜为敌，愿意扩大美朝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的人员交往。这与其说是朝鲜和美国彼此让步，不如说是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共同进步，也是相向而行的共同进步。

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甚至还可能出现反复，但美朝高级别会谈所展示的方向是正确的。它标志着，金正恩执政后朝美关系的航船已经驶离危险水域。事实上，朝美双方正在试探重新回归1994年10月朝美核框架协议所确立的轨道。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中断对外交往，朝韩关系僵冷；2001年共和党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朝美关系紧张，导致朝美核框架协议夭折。如今，金正日之后的朝鲜政权交接业已完成，美国必须重新面对朝鲜，而不能再把“政权变更”作为对朝政策的出发点。朝鲜也要在美国今年总统选举之前，谋求与民主党政府打破僵局，并对韩国、日本产生间接影响。

然而，朝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朝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依然存在。朝美业已达成的协议或共识只是彼此的初步试探，尚未涉及根本性的难题。美国是因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缠身，不久将迎来大选而暂时缓和同朝鲜的关系，还是根本改变对朝敌对政策？朝鲜方面仍难免心存狐疑。

（3）关于六方会谈。确保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是有关各国的共同利益；实现半岛无核化是确保朝鲜半岛稳定的重要条件；而六方会谈是实现这两个目的的方式与手段之一。实际上，朝鲜参与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直接与美国对话，缓解外部安全威胁。如今，朝美高级别会谈已经在六方会谈框架之外取得了积极进展。朝鲜分别同中俄两国保持外交关系与政策沟通。对朝鲜来说，是否恢复、何时恢复六方会谈并不着急。相反，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说，由于目前缺乏与朝方高层直接沟通、对话的渠道，离开六方会谈则难以发挥本国的作用。如果2013年之后朝韩关系出现重大改善，而日本态度继续僵硬，日本很可能被“边缘化”。

但是，不能就此认为，朝美双边关系改善可以取代恢复六方会谈的作用。六方会谈所达成的“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应该得到遵守。对于朝鲜来说，重开六方会谈的吸引力在于推动解除对朝制裁，争取提供轻水反应堆。对美国来说，利比亚战争后如何使朝鲜相信放弃核武器计划同样能确保本国安全，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如果六方会谈未来能发展为确保可持续安全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构，这或许是一条出路。

三、大选后的美、韩对朝政策至关重要

关于韩国、美国的对朝政策选择：是“北风”还是“阳光”？这个问题在韩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韩国一些人抱怨，对朝阳光政策并未从朝鲜得到应有的回报。从实际效果看，上述两种政策似乎都没有达到韩国的目的。现阶段美国对朝政策基本上是制裁加接触、以制裁为主的两手政策，其基调仍然是北风政策。这种政策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增加了朝方对美的不信任。今后，对韩国、美国而言，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实现美韩两国对朝阳光政策的同步性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韩国一度对朝同时展现出“阳光”的一面，并取得积极进展。美国1992年曾取消针对朝鲜的“协作精神演习”，并宣布从韩国撤走战术核武器。这期间，韩国总统卢泰愚执政，提出了“北方政策”，缓和同朝鲜的关系，韩国先后实现了同俄、中两国建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1年9月南北总理级会谈签署了《南北和解、互不侵犯暨交流合作协议书》。1992年1月南北发表了《朝鲜半岛非核化共同宣言》。

遗憾的是，其后朝美围绕宁边核设施的核查问题发生严重分歧。1993年金泳三总统上台，美韩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重新对朝刮起北风。朝鲜宣布进入“准战争状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国随即宣布制裁朝鲜，朝鲜试射导弹，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朝核危机发生以来，韩国和美国的对朝政策节奏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美国与韩国这种政策不吻合，与两国总统选举结果及领导人

的政策偏好的不同有关。

1993 年至 2000 年美国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执政。美对朝政策曾以“阳光”为主。这一时期，韩国是金泳三执政，对朝政策则以“北风”为主。尤其是金泳三总统在 1994 年金日成去世问题上得罪了朝鲜，朝鲜对金泳三态度严厉，朝韩双方持续对立。

然而，2001 年至 2008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Bush)执政期间，否定了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对朝采取“冷风”政策，结果发生第二次朝核危机。这一时期，韩国总统金大中 1998 年执政后对朝积极推行阳光政策，2000 年 6 月首次实现了韩朝南北首脑会谈，发表了《6·15 北南联合宣言》，实现离散家属会面，奠定了南北经济合作的基础。2003 年卢武铉总统执政，继续对朝鲜采取包容政策，但 2006 年 10 月朝鲜针对美国进行的核武器研发和导弹试射，在韩国一部分人看来则是阳光政策的失败。其实，在美国强大北风政策的作用下，韩国的阳光政策只不过是冬日北风中的阳光，看上去灿烂，其实仍然很冷。

2008 年至今，美国民主党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执政，调整了共和党的北风政策，有回归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迹象。但是，同时上台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则对朝鲜实行以“北风”为主的政策。结果，朝鲜于 2009 年再度进行了核试验，美国对朝鲜难以充分展现“阳光”，转而采取制裁的北风政策。其后，奥巴马政府对朝鲜政策目标首先是防止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其次是利用朝韩紧张关系向韩大量出口美国武器。当第二个目的达到后，美国便会为达到第一个目标而与朝鲜进一步加强接触。否则，如果真的爆发朝鲜战争，美国政府就不能不为国内军火商埋单，这只会加剧本国的财政危机和战略风险，美国当然要竭力避免。但是，一旦韩国减少美国的武器订单，美国便很可能再度鼓励韩国对朝强硬，以制造有利于对韩出口武器的紧张局势。这是美国军产复合体国家发展模式与朝鲜半岛分裂现状决定的。类似情况在台湾海峡也可以看到。

2008 年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利用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紧张局势出口武器，转嫁金融与财政危机，维持美国的军工产业生产线。据韩国《朝鲜日报》等报道，韩国从 2006 年至 2010 年共购买了 74.03 亿美元外国武器，居世界第三位。2009 年韩国进口美国武器为 8 亿美元，超过当年日本进口美国武器的 1 倍，排名世界第五。2010 年美国武器出口的 39％在亚太地区，韩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武器采购国。“天安舰事件”及延坪岛炮击事件后，2011 年李明博总统访美期间签订的军火合同相当于美国一年军火出口额的 30％。韩国列入 2012 年国防预算的外购武器计划高达 14 万亿韩元(约 124 亿美元)，创历年之最。

2011 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战略重心移至亚太，同时将大幅削减美国的军费开支。这预示着美国军工生产线仍需依靠韩国等亚太盟国埋单。从这个意义上讲，

2013年之后如果出现朝韩关系大幅度改善趋势，韩国减少武器进口，美国势必在朝核问题上抬高对朝要价，甚至再度制造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未来的关键问题在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人们不仅要关注朝鲜国家模式转型的可能性及其影响，而且要关注美国国家模式转型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防止美国为转嫁财政金融危机而制造地区危机。

综上所述，从根本上看，朝鲜半岛局势是由南北双方长期分裂的“冷战”结构，以及朝鲜“先军政治”与美国“军产复合体”这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对立所决定的。从近期看，今年美国和韩国的总统选举结果，对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未来美国和韩国同时对朝采取阳光政策，六方会谈达成的共识就可能得到遵守，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有可能重返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但是，如果这一进程再度出现反复，韩美同时对朝采取北风政策，就不排除未来朝鲜再度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局势又会充满危险。如果是这样，将意味着朝鲜再次失去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而难以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经济建设也会受到影响。这显然不符合有关各方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正恩执政后的朝鲜半岛局势，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十字路口。

四、朝鲜半岛出现缓和的新局面、新机遇

2013年东北亚局势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各国政权交替结束，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执政。未来5年到10年的东北亚局势的发展前景，将取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与朝鲜等国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与决策。东北亚也将因此而显现缓和的机遇或严峻的挑战。

2013年第一季度高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在韩朝双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两国领导人正确决策与领导下，在下半年出现明显缓和的趋势。除了韩朝双方就离散亲人家属团聚问题达成共识以外，9月10日又就恢复开城工业园区项目达成一致。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积极进展，为未来韩朝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创造了新的机遇。

朝鲜半岛今年以来的这种变化具有必然性。首先，2013年4月30日美韩大规模军事演习结束之前，朝鲜必然要对美韩显示强硬立场。尽管美韩联合军演是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演习，但是对于刚接班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说，则是第一次面临的重大外部威胁。尽管朴槿惠总统对朝鲜并无恶意，只不过是李明博执政期间韩国军方与美国军方早已预定的军事演习，但是对朝鲜来说，毕竟是在朴槿惠总统执政后举行的军演，朝鲜必然要对韩方显示超强硬立场。对于经济、军事实力处于相对劣势的朝鲜来说，也必然要通过增强军事力量与对外示强，来凝聚国内向心力与民族自信心。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能否正确理解朝鲜释放的信息，是否有诚意与

朝鲜改善关系。

值得庆幸的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做出了清楚、准确的判断，没有感情用事，而是耐心地展现诚意。例如，2014 年 4 月 11 日，在朝韩关系紧张之际，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将与朝鲜举行南北对话，并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不管局势多么严峻，“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必须要加以推进。韩国各界也纷纷呼吁政府向朝鲜派遣特使，开展韩朝对话，以挽救开城工业园区，防止战争爆发。因此，笔者当时曾作出预测，只要韩国能坚持这一姿态，2013 年 4 月底美韩联合军演结束后，朝鲜有可能改变一味对韩国显示强硬立场的态度。而只要韩国方面能作出积极的反应，8 月以后即使美韩还会举行例行军演，但也不足以导致韩朝关系再次高度紧张。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既符合南北双方共同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东北亚整体的地区利益。

中国有句俗话：“吃一堑，长一智”。2014 年朝鲜半岛局势如何发展，会否出现反复，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 2013 年下半年韩朝两国领导人的决策是否正确。如果从 2015 年起，韩美针对朝鲜的联合军事演习能够缩小规模，避开朝鲜认定的敏感地区，朝鲜也会降低反美、反韩的调门。朝核问题也会形成容易对话的气氛和条件。

关于朝鲜未来的发展，估计金正恩将在确保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如何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日韩加强区域合作，将对朝鲜产生吸引力。朝鲜以某种形式加入这一进程是合理的选择，也是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贡献。开城工业园区和罗津-先锋自由贸易区将发挥重要作用。

朝鲜发展核武器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且未必能确保本国安全。每个主权国家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朝鲜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已迫使一些国家放弃使用核能，转而通过科技创新和新能源开发谋求“脱核式”发展。朝鲜的地缘经济条件有利于其未来利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而要获得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源方面的资金、技术，则需要与中、日、韩合作。在中日韩自贸区形成过程中，如果中国能对朝鲜的特定区域采取类似过去对东盟国家的做法，给予优惠，将有利于朝鲜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进一步激活朝鲜国内的经济活力。韩国希望朝鲜“改革开放”，但这需要具备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说世界也必须对朝鲜保持开放。

五、韩美同时对朝“包容”可减少朝鲜政策的摇摆性

韩国有一种看法认为，即便对朝鲜实行阳光政策，朝鲜仍然会出尔反尔。我认为，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规律。例如，每当韩国和美国同时对朝鲜实

施“阳光政策”的时期，就是朝鲜在放弃核武器问题上态度比较认真的时期。否则，便相反。20年来，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韩国领导人对朝鲜的态度是不同的，因此朝鲜不可能不改变自己的提法及做法。

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朝鲜中断对外交往，朝韩关系僵冷；2001年共和党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朝美关系紧张，导致朝美核框架协议夭折。如今，金正日之后的朝鲜政权交接业已完成，美国必须重新面对朝鲜，而不能再把“政权变更”作为对朝政策的出发点。

然而，朝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朝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依然存在。朝美业已达成的协议或共识只是彼此的初步试探，尚未涉及根本性的难题。美国是因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缠身，连任的奥巴马政府是暂时缓和同朝鲜的关系，还是根本改变对朝敌对政策？朝鲜方面仍难免心存狐疑。

确保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有关各国的共同利益；实现半岛无核化是确保朝鲜半岛稳定的重要条件；而六方会谈是实现这两个目的的方式与手段之一。也就是说，恢复六方会谈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一点对于朝鲜来说更是如此。实际上，朝鲜参与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直接与美国对话，缓解外部安全威胁。朝鲜分别同中俄两国保持外交关系与政策沟通。对朝鲜来说，是否恢复、何时恢复六方会谈并不着急。相反，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说，由于目前缺乏与朝方高层直接沟通、对话的渠道，离开六方会谈则难以发挥本国的作用。如果2013年之后朝韩关系出现重大改善，而日本态度继续僵硬，很可能被“边缘化”。

六方会谈所达成的“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应该得到遵守。对于朝鲜来说，重开六方会谈的吸引力在于推动解除对朝制裁，争取提供轻水反应堆。对美国来说，利比亚战争后如何使朝鲜相信放弃核武器计划同样能确保本国安全，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如果六方会谈未来能发展为确保可持续安全的东北亚多边安全机构，或许是一条出路。中国愿为六方会谈尽早复会继续做出积极的努力。

未来10年，东北亚最大的安全问题，将取决于日本的发展及演变，而并非朝鲜核问题。日本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权后，未来7年有可能对外显示“和平国家”的形象，但如果日本政治右倾化继续抬头，奥运会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军事力量则可能迅速膨胀。日本为确保奥运会的成功将投入大量精力控制福岛核事故造成的核污染，但高浓度的核废水已经流入深海，形成大面积的海洋核污染。这必然严重污染日本近海渔场，并造成海洋生物链的严重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面临的是世纪难题，东京奥运会后仍难以彻底解决。

第五节　安倍政治走向与中日韩关系[①]

一、中日韩关系的现状

战后70年来，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关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并呈现出政治与经贸关系互动中的某些规律性。目前，中韩关系是全面增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是不稳定的“战略互惠关系”；韩日关系是有矛盾的“合作伙伴关系”。21世纪以来，中韩、中日、韩日关系发展得不平衡，日本处于不利地位并妨碍了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其根源在于安倍政治走向，即日本政治右倾化带来的影响。其发展下去可能干扰未来东亚的可持续安全。

（一）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三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日两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韩国排名世界经济的第十三位，中日韩三国经济约占世界经济的20％、亚洲的70％，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0年中国GDP突破1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GDP达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相当于两个日本，占世界的12％以上。中国的发展壮大，改变着东北亚及世界的经济格局。

21世纪以来，中日韩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中升、日降、韩稳”的态势。据世界银行统计测算，2000年至2013年，中国的GDP从1.08万亿美元升至9.24万亿美元，增加7.6倍；日本的GDP从4.8万亿美元增至4.9万亿美元，基本原地踏步，相对下降；韩国的GDP从0.56万亿美元升值1.4万亿美元，增加1.5倍。这13年中，中国在中日韩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18.5％升值60.0％，日本从73％降至32％，韩国从8.3％降至8.0％。[②] 日本没能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而韩国则后来居上。伴随日元大幅贬值和中国继续保持7％的较高增长，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相当于三个日本，日韩经济规模的差距也将趋于缩小。

（二）中日韩政治关系发展失衡，势必导致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要使本国产品赢得其他国家及其消费者的青睐，除了性价比之外，树立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政治上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跨过直接投资也涉及国际政治关系、投资环境、利润与风险的平衡考

① 本文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原文标题《“安倍政治学”与中日韩关系》（有所删节）。

② 江瑞平：《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2014年9月28日清华大学、高丽大学、东京大学合办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于未来——第四次东亚共同体论坛”会议论文集，第211页。

虑等因素。因此，中日、中韩、韩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贸关系潜力的发挥。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中韩建交晚于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但由于中韩政治关系发展顺利，不断跨上新的台阶，中韩经贸关系也随之出现快速的正比发展。2000年至2013年，韩国对中国出口占韩国出口的比重从10.7%升至26.1%。中国成为韩国最大海外市场。[①] 2014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加29.8%，达到39.7亿美元。2015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有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甚至不久便会超过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届时，日本在中国对外贸中的地位将下降到第六位乎，排在韩国之后。中韩关系出现政经互促、"政热经热"的良性循环。

与此相反，同一时期内，中日政治关系则一波三折，出现"政冷经冷"的恶性循环，中日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出现双双下滑趋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4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92万亿元人民币，约为3100亿美元，同比下降1%，中国对日出口下降1.4%；进口下降0.5%。1993年至2003年，日本曾经连续10年是中国最大外贸伙伴。目前，日本仅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日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为7.3%，[②]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8%。同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比上年减少38.8%，为43.3亿美元。这是继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4%之后的持续下滑，跌幅是25年来最大的。[③] 尽管2015年1月中日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但若未来中日企业之间的贸易减少，加之中韩自贸区的形成，中韩贸易的增幅仍可能高于中日贸易。

（三）中韩、中日、韩日政治互信关系发展不平衡，影响东北亚全面实现FTA的进程，安倍内阁亟需摆脱自我孤立

2013年朴槿惠总统执政后正式访华；2014年习近平主席专程访问了韩国。两国根据《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各项合作。然而，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同中韩之间的首脑没有互访，甚至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合的短暂会晤也没有给彼此关系的改善带来多大效果。从首脑交往看，中韩之间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中日、韩日之间则好像"话不投机半句多"。目前，中韩政治互信有所加深，而中、韩同日本之间则尚无政治互信可言。

① 江瑞平：《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2014年9月28日清华大学、高丽大学、东京大学合办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于未来——第四次东亚共同体论坛"会议论文集，第208页。

② 中国海关总署2015年1月1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③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2015年2月16日发布的数据，http://news.xnnews.com.cn/gnxw2/201502/t20150219_2158391.htm。

尽管中韩已签署FTA协议，但受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韩日FTA谈判则比较困难。按照中韩达成的协议，韩国将立即开放58.9%的工业品，在10年内开放90%的工业品；中国将立即开放的工业品大概占20.3%，在10年内开放71.7%的工业品。同时，韩国将立即开放的农产品为9.96%，在10年内达31.3%；中国立即开放的农产品达19.3%，10年内达69.8%。据预测，中韩自贸区一旦建成，将拉动中国GDP增长1%～2%，韩国增长2%～3%。[①]

尽管目前日本在中日韩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安倍政治学”主导下的“安倍经济学”似乎并无改弦更张之意，而再走另一条道路。安倍内阁在国内首先是把民众最不满的增加消费税决定推迟到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后的2017年5月，尽量减少增税对未来自民党选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利用国际油价走低而继续推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鼓励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扬。对外则开始放宽日本企业出口武器的限制，甚至通过提供官方开发援助（ODA）予以支持。例如，以此带动向菲律宾提供海上巡逻艇。

自鸠山由纪夫辞职后，日本在同中国缔结FTA问题上态度一直颇为消极。安倍首相2015年4月末访美，无论是否兑现，还会表示优先考虑同美国完成TPP谈判。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问题上，日本态度消极。然而，2015年3月，继英国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纷纷决定加入AIIB。这自然会令日本决策者感到十分尴尬和纠结。中国采取开放态度，而如何摆脱自我孤立则是安倍内阁面临的现实问题。

伴随“安倍政治学”允许海外派兵的法律出台和推进修宪，“安倍经济学”有可能对日本产业结构和国家发展模式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2016年将是美国、俄罗斯、日本的选举年。加之中东局势动荡，一旦国际油价反弹，日元必定进入升值周期，日本股市将随之下跌，出口阻力也将增大。若按安倍内阁承诺，2017年5月日本消费税提升至10%，其后日本国内消费必将受到抑制。届时，日本经济可能内外交困，尝到“安倍政治学”和“安倍经济学”种下的双重苦果。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表明，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就会恶化或倒退，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受到影响

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受到抑制，中日政治关系就会得到改善，两国民间感情也会好转。韩日关系的变化也有同样的规律。在日本，有些媒体有意无意地把“日本政治右倾化”说成“日本右倾化”，偷换概念之后再表示日本没有右倾化，而是保守化，目的是否认“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客观事实和问题的本质。正确的概念

① 中国《国际商报》，2015年3月16日。

和结论应该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出现多数选民认同保守政党政策的保守化社会思潮，日本政界出现保守政党占绝对多数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但这并不等于日本整个社会右倾化。

作者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中曾经指出：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逐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它是以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各种右翼政治势力为核心，企图通过修改教科书，恢复靖国神社战前的传统地位，美化日本侵略历史，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股政治思潮。它是对“二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潮的反动，与保守政党中相对温和的自由派相比，具有强烈的右翼民族主义色彩。它与战前日本的国家观、战争观有相通之处，一些人继承了战前日本的“皇国史观”“靖国史观”的衣钵。[①] 安倍再度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发展，但还会受到一定制约。现阶段，日本要重新复活战前那种军国主义不太可能，但政治右倾化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以一种新的形式给亚洲邻国和东亚局势制造麻烦和事端，成为未来亚洲最不稳定的因素。届时，美国的绥靖政策将难辞其咎。

（五）历史认知与现实问题直接相关，中日韩三国需以史为鉴，立足现实，共创未来

自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即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率领日军入侵朝鲜半岛，图谋占领中国，均惨遭失败。伊藤博文内阁日本于1894年7月发动甲午战争后，殖民统治中国的台湾50年。1910年8月，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在朝鲜半岛推行殖民统治。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暴力犯罪给中、韩等亚洲邻国造成巨大民族灾难。因此，历史因素对中日、韩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二战”后，中国同韩、日的社会制度不同，经历了朝鲜战争和美国冷战政策造成的严重隔阂，战后27年中日两国才于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又过了20年中韩两国才于1992年建交。此后，伴随“冷战”时代结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未构成中国同日、韩发展关系的主要障碍，共同的汉字文化与儒学思想为三国人民带来的发自内心的亲近感。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及某些当政者同中、韩的历史观、战争观矛盾，由于涉及人类良知、价值观底线和战后日本曾经做出的国际承诺而势必成为影响中日、韩日政治关系与民族和解的主要因素，造成中日韩之间政治互信关系发展的不平衡。

战后70年来，中国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南双方一直没能实现祖国的统一，这造成今天中日韩关系特殊的复杂性。中国与朝鲜保持传统友好关系，2008年以来中

---

①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韩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的盟国韩国、日本则处于没有外交关系的对立状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中国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符合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而朝核问题、“台湾独立”的主张，则可能带来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

韩日、中日之间都存在岛屿主权认知争议及海上划界问题，问题的实质与历史认知问题密切相关，并涉及相关国际法、海洋法等法律问题，需要保持外交磋商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危机防控机制。中韩之间围绕位于水下的苏岩礁归属争议，与其说是领土问题不如说是海洋划界问题。目前，中韩开始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中韩在海洋合作方面有巨大潜力。2015 年 3 月，中日高级别海洋安全对话时隔 4 年重开，如何规避冲突是摆在中日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面前的突出课题。时隔 3 年，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议重启，旨在推进三国务实合作。

中日韩外长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外长王毅、韩国外长尹炳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均表示，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中国和日本外长对韩国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表示高度赞赏和欢迎。三国外长决定进一步加强三国在东北亚的核能安全合作，扩大在核安全、灾害管理、环境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继续举办三国网络政策磋商、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下的空气污染防治对话会以及东亚文化之都、亚洲校园、人文交流论坛、媒体交流等活动。三国外长还决定推进青年峰会、三国外交培训机构合作、智库网络和三国中东事务政策磋商等新项目，愿探讨首都圈、老龄化领域的合作。①

但是，这次外长会议并未能就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议达成共识。若战后 70 年“安倍谈话”偏离村山谈话并直接或间接参拜靖国神社，都可能再度破坏三国首脑会晤的气氛。中日、韩日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政治局势和政治思潮的变化。

有人把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强大后东亚权力转移造成的，但这种观点不能解释在同样情况下为何中韩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而日韩关系却同样遇到障碍。中日韩经贸关系的发展，虽然主要由市场决定，但民间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购物的偏好，政治关系的性质与亲疏也会影响经济、贸易、科技、人员往来等方面合作的质量。例如，21 世纪以来，在日本政治右倾化背景下，小泉纯一郎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首相再度执政后也于 2013 年 12 月再度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期间，麻生太郎内阁推出所谓“价值观外交”。民主党执政期间，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相互配合，导致中日钓鱼岛争议加剧。野田佳彦内阁宣布“购岛”遭到中方强烈反对和有力抵制。日方政治右倾化及对华政

① 新华社网首尔 3 月 22 日电，第七次中日韩外长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新闻稿，http://japan.xinhuanet.com/2015-03/22/c_134086647.htm。

策的倒退，导致中日、韩日关系“政冷经冷”“官冷民冷”。

在这期间也有例外，即在中国发展壮大等其他因素基本未变的情况下，自民党首相福田康夫和民主党首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抵制，中日、日韩关系便明显改善，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和官方常设办事机构的建立。而这一进程受阻，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回潮，以及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影响。

（六）日本、韩国均为美国的盟国，但对中国的态度及对中美关系的期待有所不同

2013年9月日本同韩国各自16名一流学者完成的一份联合研究项目报告，题为《新时代的日韩合作——七个核心议题》。其中包括加强人文、媒体交流；人脉网路形成；构筑东亚安保秩序；核安全与能源合作；环境伙伴关系；构筑东亚共生经济秩序；复合共生技术合作。其中指出，韩日两国对中国实力、意图及应对都出现差异。报告建议，日韩要在加深同美国战略合作的同时，关注中美关系，推进日中韩三国合作。[①] 由此可见，美国影响的因素不容忽视。

韩国不存在联合美国对抗中国的战略图谋，乐见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日本现行政策则相反。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至关重要。美国希望日韩关系改善，不愿看到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把中韩进一步推到一起，而希望在东北亚加强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美国既不希望中日关系接近又要防止中日冲突，以确保美国在东亚的主宰地位。美国为保持对韩国的有效控制，需要利用对朝例行军演及朝鲜半岛的适度紧张。朝方言行的过激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美国相关决策者来说，即使预料之中的也是期待发生的。对于中韩关系的加强和发展，美国没有太多手段牵制，而在韩国部署“萨德”(THAAD)导弹系统，与其说是为了防范朝鲜的导弹袭击，不如说是在中韩、韩俄之间打进一个楔子，起到削弱中韩战略互信的作用，使韩俄关系遇到麻烦。这在客观上对日本右翼势力有利，间接鼓励了安培政权。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还会受到美国因素的较大影响。2014年12月安倍再次组阁后，在外交上首先会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完成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利用美国在钓鱼岛共同对抗中国。防卫省2015年度拟采购6架美国F35战机和3架长时间滞空的无人侦察机，总金额达1769亿日元。其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国，加强所谓“西南诸岛”的防卫。美国政府一方面希望日本购买美国军火，早日完成TPP谈判，日本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后能协助美国对抗“伊斯兰国”(IS)；另一方面又不愿看到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或否认强征“慰安妇”而

---

① 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委员会：《新时代的日韩合作——七个核心议题》(日文版)，HANULBOOKS，Printed in Korea，2013年9月，第64～65、68页。

再度激化同韩国、中国的矛盾,更不愿被卷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之中。从中长期看,安倍内阁可能更加期待 2016 年美国共和党上台执政、韩国出现与朴槿惠对日政策不同的新总统,以利继续推行鹰派的政治右倾化大国路线。从这一视角看,中日关系还可能面临新的考验。

2009 年美国刚度过金融危机便开始把战略竞争的对手锁定为中国,截至 2014 年上半年,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及中日韩合作的加强,曾明里暗里进行牵制。这成为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鸠山由纪夫内阁垮台的重要外部因素。这在客观上支持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反过来又必然会加深美日之间的历史观冲突。从 2014 年下半年起,奥巴马政府明显意识到,美国面临的真正安全威胁和战略挑战并非中国,而是“伊斯兰国”(IS)和在乌克兰问题上出手的俄罗斯。因此,2014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有所调整,开始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压力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稳定同中国的关系上,以利集中精力对付在中东和欧洲遇到的麻烦。日本媒体特别注意到,2014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安倍内阁也开始随之调整对中韩两国的态度,把实现与中韩两国的首脑会谈,作为近期外交目标和迫不得已的策略调整。但 2015 年 4 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日、日本首相安倍访美则表明,美日对华战略总体上似乎并未改变。

二、中日韩关系既有改善机遇也将面临新的考验

安倍在 2014 年 12 月 24 日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组建新内阁,基本上将维持原有的内外政策,但也会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做出调整。中韩两国都希望日本能在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基础上,共同开创中日韩三国的未来,关键在日方。

(一)在外交方面,安倍面临同中国、韩国改善关系的机遇,但其政治右倾化的本质或许难以根本改变

2015 年,日本将再度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推行针对中国的所谓“地球仪外交”。在北京 APEC 前夕的 2014 年 11 月 7 日,日本国安局长谷内正太郎访华,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达成中日关系四项原则共识。其中包括两国就钓鱼岛及东海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对话。中方希望日方恪守双方达成的四项原则共识,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安倍晋三首相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但是,安倍首相不愿就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明确表态,表明其不愿被中方束缚,而要给自己留下较大回旋余地。在战后 70 周年,一旦安倍首相的言行再度

① 《日本经济新闻》网(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编辑委员秋田浩之(HIROYUKI AKITA):《中美有不为日本所知的默契?》2015/03/27,http://cn.nikkei.com/。

有违中日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中日政治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

2015 年安倍内阁重点利用日韩建交 50 周年,松动日韩关系,然后再对中国形成压力。但是,开创未来日韩关系的关键是解决慰安妇问题。过去遭受欺凌的一些韩国女性,现年事已高。她们心底一生的怨愤带有一种绝望感。而日本右翼政客却公然否认"慰安妇"具有强制性,称其为"商业行为"。2015 年 4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追加了日本政府的观点,即"并未发现直接证明有强行抓走的资料"。[①] 这种毫无反省的态度,对韩国受害者再度造成精神伤害,必然激起韩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二)中国的对日政策方针未变,战后 70 周年纪念活动并非针对日本人民,而是为维护持久和平

2014 年 12 月 13 日,中国首次举行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公祭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举行国家公祭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习近平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②]

2015 年 3 月 15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回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目的是要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不能让历史再重演,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及一系列国际法,以维护人类持久和平。当前,中日关系的确比较困难,根子还是在于对那场战争、对历史的认识和能否始终保持正确的认识。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日本民众也是受害者。在 2015 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并且保持一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契机,也自然会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良

---

① 《检定教科书加写进政府见解》,《朝日新闻》,2015 年 4 月 7 日。

② 习近平主席在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2 月 14 日。

好的条件。[①] 这些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

（三）改善中日、日韩民间感情的关键在于中日、韩日政治关系的改善

从中日两国民众彼此印象变化的一般规律看，中日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民众感情的变化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关系越恶化，两国民众彼此印象就越不好；而政治关系越改善，两国民众的印象也会随之趋于改善。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而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产生变化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包括“中国军事威胁论”“外交强硬论”“经济崩溃论”“政治独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大气污染威胁论”等。

这些复杂的因素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在日本的形象，而一旦形成负面印象便不易改变。加之日元兑人民币贬值，结果导致2012年以来日本来华人员明显减少。尽管中国赴日旅游者明显增加，但2013年中日人员往来则比上年减少了14％，从2012年的548万人次回落到471万人次。类似现象也发生在韩日两国之间。

中日人文交流面临新的复杂因素和困难。例如，战后日本年轻一代对近代历史缺乏学习和了解，容易受国内右翼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另外，日本官方对中日人文交流的控制和利用力度在加大，重点在于改变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看法，而日本一些媒体则往往把中国的历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说成是“反日教育”。因此，中国在改善两国民间感情方面还需作出更多努力。

“二战”后，日本国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根据《日本国宪法》，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不断扩大，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却出现严重倒退。有些分析认为，这是迅速崛起的中国与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日本之间的矛盾。这种判断只不过是从“权力转移理论”出发观察中日关系，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不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

当前中日、韩日围绕历史认知的矛盾，实质上是中日韩三国爱好和平、主张友好的人民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观、战争观之间的矛盾。战后70年来，中国、对日本宽容与和解，是法国对德国态度所不能比拟的。例如，中国人收养了许多日本人的战后遗孤，并送回日本。中国政府为中日两国的友谊而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造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某些当政者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远不如德国，一再超越良知底线，对历史上的受害者反复造成精神伤害。值得关注的是，除了政治选举之外，日本民众是不能左右日本政治的，更不能决定日本政府的政策。一旦政权落入右翼势力之手，日本的国策就会发生偏差，中日、日韩政治关系就必然发生

① 李克强总理在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6年3月16日。

危机，从而又会影响民众的感情。历史证明，这种右倾化政策长期化、极端化，就会向一辆急速滑向悬崖的车子，而日本国民则是这辆车上的牺牲品。除非日本国内外形势迫使日本政府改弦更张。

（四）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观冲突，主要是由于某些日本领导人错误历史观、战争观指导下的言行造成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地域、家族背景因素

安倍晋三等日本领导人既没有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与学习，又缺乏与邻国民众就历史问题交流的机会，而是从小受到自己特定家族、身边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是在右翼史观染缸中浸泡出来的。他们出生在日本特殊的家庭和故乡，年轻时一直加入的是日本政界右翼团体。

例如，安倍晋三的故乡是有史以来诞生日本首相最多的山口县（长州藩），他是山口县诞生的第八位日本首相。在不同历史时期，山口县出身的日本首相参与了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战争。例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东条英机内阁成员、甲级战犯嫌疑犯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在自民党内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后台、前首相森喜朗曾宣称日本是“神之国”，任文部大臣时积极推动修改日本教科书。其父森喜茂 1937 年曾作为日军小队长参与攻占南京。[①] 日本右翼头目田母神俊雄借助其所谓“证言”，否认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历史事实。[②]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源头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 1592 年、1597 年动员萨摩藩（鹿儿岛）军事力量入侵朝鲜半岛，其目标是侵吞中国，但以失败告终。1609 年萨摩藩首次入侵琉球国，从此不断向琉球国渗透，最终于 1879 年将琉球吞并。这期间，继承了丰臣秀吉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扩张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是 1830 年生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其核心思想之一是推崇天皇，对外扩张。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讲解兵法谋略。发起明治维新及发动甲午战争的一些骨干受其影响。例如，其后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乃木希典等日本明治时期的将领也是吉田松阴的崇拜者。

安倍晋三对故乡长州藩（山口县）的历史人物充满崇拜之情，而缺乏批判性分析，是其偏狭而扭曲的历史观产生的根源之一。安倍晋三与其父安倍晋太郎的名字中之所以有一个“晋”字，是由于吉田松阴创办的“松下村塾”的有名弟子高杉晋作是安倍家族十分崇敬的人。2015 年 2 月，安倍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还引用吉田松阴的“知与行合二为一”阳明学之说，强调“在国会追求的不只是应对批判，而是‘行

---

① 森喜朗（YOSHIRO MORI）：《我的履历书 森喜朗回忆录》，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3 年 6 月，第 19 页。

② 田母神俊雄：《田母神塾》，双叶社，2009 年 3 月，第 53，54 页。

动'"[①]。日本媒体认为，安倍赞美吉田松阴的"行动"，实在危险。[②] 吉田松阴的弟子伊藤博文执政期间曾发动甲午战争，窃占钓鱼岛，迫使清政府签署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殖民统治中国台湾，完成吞并朝鲜半岛。1909 年于中国的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义士安重根击毙。但在安倍看来，伊藤博文是伟人和"长州五杰"之一[③]，而安重根则是"罪人"。这种日本首相对历史人物评价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必然影响日本同中、韩的关系。

（五）中日韩历史观矛盾并非文化宗教矛盾而是大是大非问题

安倍首相不仅尚未承认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而直接或间接参拜靖国神社，把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奉为所谓"英灵"，表示崇敬，甚至向其汇报执政的历程。[④] 这不能不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担忧。

靖国神社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支柱，隶属日本军部管辖。"二战"后，虽然其名义上改为民间宗教设施，但其宣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没有改变。日本右翼势力就是企图通过日本领导人参拜，重新恢复靖国神社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功能。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就是彻底否定《波茨坦公告》和东京审判的结果，挑战和颠覆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这必然导致中日关系发生危机。

日本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所谓日本文化宗教认为"人亡不究魂之过"，"人亡结成佛"，所以靖国神社供奉的亡灵没有罪过了，可以参拜，中韩不必反对。其实，这并不是日本传统神道教的概念，而与靖国神社建立后日本推崇国家神道的思想体系有关。日本传统神道信奉自然神，对人的亡灵是有善恶之分的。例如，善神（NIGIMI KUMA）、恶神（ARAMI KUMA）、和魂（NIGIMI TAMA）、荒魂（ARAMI TAMA）是日本传统神道原有的基本概念。[⑤] 对善神与和魂要慰灵，对恶神与荒魂则要镇魂。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为天皇效忠、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的所谓"英灵"，日本领导人前往参拜、慰灵是一种有明显价值判断和政治目的行为。一些反战日本人的亡灵是不可能供奉到靖国神社的。因此，以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人亡结成佛"的说法难以掩盖靖国神社在历史上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实质。[⑥]

在 2014 年 12 月大选期间，日本"次世代"党的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时宣称，历

---

① 安倍晋三首相 2015 年 2 月 12 日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朝日新闻》，2015 年 2 月 13 日。

② 小岛毅（TUYOSHI KOJIMA）：《对松阴（SHYOYIN）"行动"的赞美实在危险》，《朝日新闻》，2015 年 3 月 19 日，第 13 版。

③ 安倍晋三：《日本的决心》，新潮社，2014 年 4 月出版，第 60 页。

④ 安倍晋三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参拜靖国神社后的谈话。安倍晋三：《日本的决心》，新潮社，2014 年 4 月，第 230 页。

⑤ 日本宗教事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日本宗教事典》，弘文堂（HIROFUMIDO），1985 年，第 612，616，618 页。

⑥ 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77～278 页。

史上正因为天皇去参拜靖国神社，士兵才勇敢走上战场“保卫日本”，今天如果日本领导人不去参拜，以后有谁来“保卫日本”呢？这一语道破了日本右翼鼓吹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日本再次发动战争，重新把靖国神社作为日本的战争软实力。这不仅会遭到亚洲邻国反对，也会遭到日本人民唾弃。

（六）安倍内阁在日本教科书问题上严重倒退，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一种表现

日本的教科书编撰和审定制度是日本的内政，但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同邻国的近代史等表述已超出日本内政范围，必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15 年 4 月 6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 2016 年 4 月起日本初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这是安倍内阁修改日本教科书审定标准后对教科书的首次审定。其中，关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等内容，既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政治诉求，又显示了日本政府对邻国的强硬立场。这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最新表现，有可能给日本及东亚的未来埋下危险的隐患。

日本政府以教科书淡化日本侵略罪行，无助于培养良知。关于侵华日军 1937 年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修改前的日本教科书称为“南京事件”，其表述为日军“ 杀害了许多俘虏和居民，受到国际谴责”，但被审定修改后的教科书则改为“卷入了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①]；有些教科书还删除了“日军的暴行遭到谴责”的内容。所谓“卷入”，其意为并非日军有组织、有指挥的大屠杀，而只不过是战争波及俘虏和平民，把他们卷入而已，从而淡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事实上，无论在 1894 年甲午战争的旅顺，还是在 1937 年的南京，残暴屠杀战俘和平民，是日本侵略军的一贯做法。日军在南京就曾接到“不留俘虏”的命令，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其暴行罄竹难书，岂能以“卷入”二字淡化。

安倍内阁以教科书美化殖民统治，只能加剧历史观冲突。今年是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日韩合并条约》105 周年，从此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 35 年的殖民统治。关于日本吞并韩国期间实施的土地调查，日本教科书曾指出这是日本“打着近代化的名义”所实施，而这次则被修改为“以近代化为目的”。这是要把美化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传授给日本下一代而毫无反省之意。

日本以教科书强化领土及“受害”意识，将灌输与中、韩对抗的思想。这次被审定的日本社会类学科的全部教科书(包括地理、历史、公民)和今春启用的小学社会类学科全部教科书。其中都把中国的钓鱼岛列岛写成日本的所谓“尖阁诸岛”及“固有领土”。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时期民的殖民开发行为，居然被作为日本拥有钓鱼岛的所谓“根据”。这些教科书是日本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的，在钓鱼岛问题

① 日本《朝日新闻》，2015 年 4 月 7 日，第 1、2 版。

上均按日本政府的立场编撰。这必然造成日本全体学生从小就接受错误概念的教育。其中,关于独岛(日称竹岛)则表述为“韩国非法占领”。这不仅会直接损害当前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而且具有长远的危害。例如,为日本右翼势力培养未来的选民群体,奠定右翼势力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

安倍内阁以教科书审定新规则固化教科书的政治右倾化导向,后患无穷。1982 年 8 月 26 日,为妥善处理日本教科书问题,时任铃木善幸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表示:“作为我国,在推进与亚洲近邻诸国的友好、亲善方面,将充分倾听这些批评,由政府负责纠正。”①日本文部省也规定,审定教科书“在对日本与亚洲邻国间的近现代历史问题的处理上进行必要的考虑”。这被称为“近邻诸国条款”。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颠覆这一规则。安倍晋三第一次就任日本首相时,就曾对《教育基本法》做出修改。其后,他认为,1982 年以来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没有体现出修改版《教育基本法》所提出的“尊重日本传统与文化、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的精神”。于是,安倍晋三 2012 年 12 月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立即于 2013 年 4 月推动修改教科书审定制度,以反映其历史观、战争观和政治目标为目的,制定新的教科书审定标准,取代原有的“近邻诸国条款”。在安倍内阁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的直接领导下,2014 年 1 月,日本教科书审定新标准出台,要求涉及近现代史要尊重所谓政府见解和表述。另外,根据初高中教科书编写“学习指导要领”,必须把钓鱼岛作为日本“固有领土”写入教科书,否则在审定时将被认定不合格而不予批准。

2015 年 4 月宣布初衷教科书审定结果后,日本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表示:“就本国领土进行正确教育是理所应当的。明确写入教科书是一大进步。”②下村博文所说的“正确教育”,其实恰恰相反,某些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错误教育无疑是日本教科书的一大退步。

下村博文似乎并不想了解钓鱼岛问什么属于中国及历史真相,而只关心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中小学教育,把他们的政治意志灌输给日本未来的全体学生。下村博文本人是日本最大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在日本国会内的组织“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干事长、安倍晋三的心腹。该会会长是日本甲级战犯、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的养子平沼赳夫、顾问是麻生太郎,安倍晋三曾任该会副会长。该组织一贯主张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和日本现行宪法,现有 200 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参与。正是在这股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在教科书问题上,从相关规则到具体内容的全面倒退,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① 《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有关“历史教科书”的谈话》,日本外务省中国课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70 年至 1992 年)》,日本霞山会,1993 年 11 月,第 266~267 页。

② 日本共同网,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4/95149.html。

（七）中日、韩日矛盾并非权力之争，而是两种战后国际秩序观的较量

2015 年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为和平国家 70 周年。《波茨坦公告》是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其中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须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十条规定："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①]《开罗宣言》规定了朝鲜自由独立。

2015 年是韩国光复 70 周年。"二战"后韩国光复最初的国际法渊源有赖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对于没有参与《旧金山和约》的中、韩两国来说，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只能是《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

然而，安倍首相的政治目标似乎就是要打破这种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政府一些人也企图以《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作为战后东亚秩序的依据，这在日本同亚洲邻国之间是行不通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一些人就以《旧金山和约》第二条为由，主张日本放弃了对中国台湾的统治，没有资格表示台湾是否归还中国，实际上是制造"台湾归属未定论"。这种无视《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规定的主张，必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如今，日本政府又以《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规定美国托管琉球诸岛强调，其中包括钓鱼岛，并把这作为日本拥有这些岛屿的法律依据。其实，其中连冲之鸟都列举了，却根本没有列出钓鱼岛或"尖阁诸岛"，客观上看，事实上等于将这些岛屿排除在外。

1951 年 9 月 18 日，时任中国外长周恩来便发表声明重申："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不能承认的。"[②]这对于俄罗斯、朝鲜半岛来说，也同样如此。1972 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确认，日本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遵守《开罗宣言》，把从中国窃占的领土，例如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钓鱼岛是中国台湾附属岛屿，只不过在 1895 年 1 月甲午战争中曾被日本窃占，当属归还之列。

（八）中日两国不同的战略发展方向反映出当今世界两股相互对立的潮流，安倍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令人担忧

从世界潮流看，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倾向。一

① 中国《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876 页。

②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的声明，《人民日报》，1951 年 9 月 19 日。

是中国积极参与的“和平的多边主义”；二是日本安倍内阁热衷加入的“暴力的多边主义”。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结伴不结盟”，实现了国际关系的伙伴化。这代表着以和平发展为宗旨的“和平的多边主义”潮流。然而，安倍内阁则对此态度消极，热衷的是“暴力的多边主义”。例如，安倍内阁正竭力摆脱现行宪法制约，行使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联合作战的“集体自卫权”；废除“禁止出口武器三原则”，展开军品出口和国际武器研发合作；把政府开发援助（ODA）用于武器装备出口，通过出口巡逻艇支持菲律宾、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抗衡，在东海、南海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利联手遏制中国；以日美同盟为中心，加强同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等“准盟国”关系；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也将被修改为日本在全球对美国提供军事支援。

“冷战”后25年来的历史证明，当今世界，“和平的多边主义”占上风的地区相对稳定、繁荣；而“暴力的多边主义”横行的地区则战乱、贫困。未来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必须顺应“和平的多边主义”潮流，防止“暴力的多边主义”祸水从欧洲、中东泛滥到亚洲。安倍推行的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实质上正是日本参与“暴力的多边主义”的一种掩人耳目的托词。

2013年9月25日，安倍首相发表了题为《成为积极的和平主义国家》的演讲。安倍在其中露骨地指出，日本推进“积极的和平主义”之所以要增加防卫费，就是因为邻国是拥有“军事支出至少为日本2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国家。该国的军费开支本来就既不透明，从1989年以来还每年增长10%以上，并持续了20年。而我的政府防卫预算只增加了0.8%。因此，如果大家想称我为右翼军国主义就敬请那么称呼吧”。[①] 日本财政困难限制了防卫费增加是事实。但是，安倍这种傲慢的态度和明确宣布增加防卫费是针对中国的日本首相，战后以来还是第一位。其实质是，在“积极地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旗号下，使日本成为可在国际上使用军事力量的国家。这增加了未来日本针对中国直接或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潜在危险性。

2014年9月安倍首相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在安全保障领域则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突破宪法制约。安倍内阁无论是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推进为期五年的军事装备计划，还是修改“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都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安倍政治学”给世人带来很大问号：未来日本是否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是与邻为伴还是与邻为敌？

日本自民党制定的新宪法草案包括建立“国防军”，为所谓保卫日本国民的生

① 安倍晋三：《日本的决心》（NIHON NO KETUYI），新潮社（SHINCHOSHA），2014年4月，第26页。

命和自由可以向海外派兵。安倍首相在解释为何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谈话中，列举了日本侨民可能受袭，以及盟友受到攻击的场景。必须指出的是，早在 1902 年缔结的日英同盟条约中也曾规定，为在中国和韩国保卫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可进行联合干预。日本近代几乎所有侵略行为，大都是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其中包括 120 年前日本在朝鲜半岛针对中国发动的甲午战争。当时，日本曾通过外交游说而获得美英的默许或支持，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又仰仗日英同盟获得 1904 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接下来，就是日本肆无忌惮地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并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三、中日韩关系的历史回眸与未来合作

中日韩在 2000 多年交往的历史大部分是和平共处的，但 13 世纪蒙古封建王朝统治者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朝后，曾于 1274 年、1281 年两次通过朝鲜半岛发兵入侵日本，在日本九州博多（福冈）一带登陆，但均遭台风袭击和日本抵抗而失败。此后，不再畏惧中国的倭寇开始骚扰宁波等中国沿海及朝鲜半岛。

（一）从 14 世纪中国明朝起 600 多年来的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与日本九州及附近地区的长州藩（山口县）与萨摩藩（鹿儿岛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中国统一、强大、睦邻、封闭，而日本分裂、混乱、敌视中国，中日不和。例如，1368 年中国明朝政府建立后，曾两次派使臣赴日诏谕，均遭拒绝。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怀良亲王对中国不敬，放任倭寇，导致明太祖实行海禁政策。

（2）中国统一、强大、睦邻、开放，日本国内稳定、相对落后而重商，中日关系比较融洽。例如，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起），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全国，被明朝封为“日本国王”。中日开展所谓堪合贸易。九州地区的长崎、博多等港口同中国的宁波等港口贸易往来频繁。

（3）中国繁盛，日本内乱，以萨摩藩（鹿儿岛）为首的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大举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对马岛成为倭寇入侵朝鲜半岛的跳板和基地。伴随季风的变化，朝鲜、琉球国、中国台湾、福建、江浙等地，首当其冲地沦为倭寇来犯的“重灾区”。例如，明朝嘉靖年间（1522 年起 45 年），中国第 11 次册封使陈侃、12 次郭儒林册封琉球时，倭寇便很猖獗，以至于中国册封使曾被迫在福建滞留。

（4）中国相对强大，但伴随改朝换代，国内矛盾上升，而日本统一、好战示强，试图改变东亚朝贡体系，侵吞中国的藩属国，彻底压倒中国而成为东亚盟主。例如，明朝万历年间（1573 年起 48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 1592 年、1597 年动员萨摩藩（鹿儿岛）军事力量入侵朝鲜半岛并图侵吞中国。日本政府首开向亚洲邻国

武力扩张的先河，但以失败告终。1609年萨摩藩首次入侵琉球国，从此不断向琉球国渗透，最终于1879年将琉球吞并。这期间，继承了丰臣秀吉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扩张思想的重要人物之一是1830年生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

（5）中国衰落、内乱、海陆受敌，而日本崛起、强大，中国的邻国首先遭殃，受到日本的入侵或吞并，琉球国首当其冲。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日本得寸进尺，发动甲午战争。日本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和海军将领主要是长州藩（山口县）、萨摩藩（鹿儿岛）人。例如，积极主张向朝鲜半岛扩张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义等日本首相均为长州藩人，1874年积极主张侵台的大久保利通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舰长主要是萨摩藩人，而发动甲午战争并秘密决定吞并钓鱼岛的则是伊藤博文内阁。他们有些则是吉田松阴的弟子。

（6）中国军阀混战、实力衰落，日本国内极右势力建立起天皇制法西斯集权体制，迅速走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道路，结成纳粹德国结成反共军事同盟。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执政期间，日本开始策动侵华战争。

（7）中国分裂、相对落后，日本战败而转向重商，中日两弱，受制于国际环境，难有正常发展。例如，“二战”后至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前，山口县（长州藩）出身的日本首相岸信介、佐藤荣作执政期间，都曾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战后钓鱼岛管辖权之争始于佐藤荣作内阁与美国谈判归还冲绳协定。

（8）相对落后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活跃、重商并以民品贸易立国。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日关系相对稳定，搁置领土争议，友好合作是主流。这一阶段的日本首相无一是山口县（长州藩）或鹿儿岛县（萨摩藩）出身的。

（9）中国发展壮大，日本政局动荡、经济低迷。“中国威胁论”抬头，中日结构性矛盾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各种矛盾此伏彼起，从“政冷经热”转向“政冷经冷”。如今，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是山口县（长州藩）人、麻生太郎的外高祖父大久保利通是鹿儿岛县（萨摩藩）人。目前正是这些人握日本的政治大权。中日、韩日关系恶化容易、改善难的症结或许就在这里。

纵观历史长河，中国的统一、强大、开放与睦邻，日本国内稳定，重视发展经济而不对朝鲜半岛及中国武力扩张，中日韩关系就会稳定发展。

（二）安倍首相提出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但仍难以减少中、韩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

从日本明治天皇发布甲午战争的宣战诏书，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都曾打出过所谓为了“永久和平”，以及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等旗号。1940年缔结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也曾把他们谋求所谓“生存空间”作为“任

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安倍内阁虽然不是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统治者，但其标榜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仍然是只不过是铠甲上覆盖的袈裟。

与日本未来走向直接相关的是，日本如何处理同邻国之间彼此关联的历史问题和领土矛盾。在这方面，“安倍政治学”的做法是，2014 年 4 月，诱导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损害，遭到中方反对。2015 年，日方又进一步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通过在全球配合美国作战，换取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威慑中国。这些都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

战后 70 年，日本结盟美国而没有对外发动战争，根本原因是日美同盟受制于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然而，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一旦日本国现行宪法被颠覆，日本会否再度利用军事同盟对中国和朝鲜半岛造成威胁。这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对中日韩关系来说，美国对东亚政策及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仍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韩两国只要把日本右翼当政者与爱好和平的一般日本民众相区别，就能够既对日本政治右倾化表明原则立场又能保持同日本各界的务实合作，从长远角度推动中日韩关系的发展。

2014 年 9 月安倍首相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但在安全保障领域则渲染“中国威胁论”，谋求突破宪法制约。安倍内阁无论是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推进为期五年的军事装备计划，还是修改“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都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安倍政治学”给世人带来很大问号：未来日本是否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是与邻为伴还是与邻为敌？

日本自民党制定的新宪法草案包括建立“国防军”，为所谓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自由可以向海外派兵。安倍首相在解释为何要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谈话中，列举了日本侨民可能受袭，以及盟友受到攻击的场景。必须指出的是，早在 1902 年缔结的日英同盟条约中也曾规定，为在中国和韩国保卫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可进行联合干预。日本近代几乎所有侵略行为，大都是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其中包括 120 年前日本在朝鲜半岛针对中国发动的甲午战争。当时，日本曾通过外交游说而获得美英的默许或支持，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又仰仗日英同盟获得 1904 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接下来，就是日本肆无忌惮地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并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直至日本战败投降。

战后 70 年过去了，国际社会希望日本永远不要重蹈覆辙。面对安倍首相提出的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世人都在关注日本究竟会做什么和怎么做。

（三）着眼长远，都要持之以恒地推进中日韩人文交流，进一步加强中韩合作，促进事物向有利于中日、韩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方向转化

未来三年安倍可能长期执政。安倍首相会继续谋求同中国、韩国领导人会面，

但如果日本政治右倾化及“安倍政治学”继续阻碍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交往，可考虑把同日本交往的重点转向以北京、首尔、东京三大首都圈为核心，首先推动可持续的地方城市交流，促进民间友好交往和地方城市的务实合作。中日韩合作可继续在防灾、减灾、环境、应对老龄化社会等低敏感度、高互利性的领域，积极推进。

必要时，中国、韩国同日本交往似乎需考虑必要的“切割”。即把日本领导人的错误言行与日本民众区别对待；把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人民相区别对待；把日本中央政府的错误政策倾向于地方政府、自治体区别对待。三国政府在首尔设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首脑外交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需适度放低合作重心，在加强北京、首尔、东京三大都市圈的人文交流、务实合作方面努力发挥更大作用。

2016 年是东亚一些国家的选举年。各国政策因领导人变更而引起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增多，但民间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不应受其影响，可进一步积极推进北京—首尔—东京三国首都圈交流与合作。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即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之年。可以举办“中日韩网络友好交流年”活动。通过中日韩跨国网络视频互动、研讨会、对话会，由三国健在的历任大使或相关专家做专题讲座等，吸引年轻人关注和参与中日韩关系的改善。还可考虑开设北京—首尔—东京伙伴关系专门网站或网页，鼓励年轻人参与，为三国交往与合作献计献策。这有利于扭转互联网上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言论刺激和损害彼此之间的民间感情。

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发表 20 周年、第四个政治文件发表 10 周年，会有更多的机遇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同年韩国将主办平昌冬奥会，中日韩可举办“东北亚冬之恋旅游年”活动，开展中日韩旅游合作，使世界其他地区的来访者可以在观赏平昌冬奥会期间访问中国或日本的旅游景点。2020 年日本将主办东京奥运会，有利于促进中日韩体育交流。中日韩还可联合举办“健康之旅年”活动，为是各地到东京的来访者提供赴韩国和中国旅游的便利条件。中国的北京——张家口市申办 2022 年世界冬奥会。最近，中国还决定大力发展足球运动。中日韩三国可以举行不同年龄级别、不同地区的足球赛事，中日韩体育界可共同设计未来 10 年三国体育大交流计划。总之，我们把握住一切有利于推动中日韩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创造出新的三国合作形式与合作项目，造福于三国人民。在广泛而友善的人文交流、青少年交流的过程中，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彼此互信。

第六节　共谋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

以可持续安全观共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十分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我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能否避免国际安全与战略风险，不可不察。

一、以可持续安全观共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①]

在迄今关于东北亚安全的讨论中，经常被各国专家议论的话题之一是，东北亚地区缺乏类似欧安会等多边安全组织。因此，有关该问题的讨论比较集中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应如何构建。然而，2015 年面临的新问题是，即便是建立了欧盟、北约、欧安会的欧洲，也没有获得可持续的安全。相反，近年来严重的欧债危机、乌克兰内战、美俄地缘战略对抗、战后欧洲最大的难民潮等，正在使一体化的欧洲出现分裂化。由此可见，只着眼于安全机制的建立并不能确保安全。与中东、欧洲局势相比，东亚地区尽管有尖锐的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等，但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局面和安全的小康状态。

上述现象与 21 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两股潮流有关：一是目前在东亚地区占据上风的“和平的多边主义”。例如，亚信峰会、东盟地区论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对话谈判缓解或解决国际争端。二是“冷战”后开始在中东、欧洲蔓延的“暴力的多边主义”。“暴力的多边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即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入侵某一个主权国家或扼杀其政权。2015 年中东、欧洲战乱与难民潮产生的根源，正是来自“颜色革命”和“暴力的多边主义”的叠加冲击。

“颜色革命”是“冷战”后以来，特别是 2011 年起在西亚北非国家接连出现的政治、社会动荡，甚至演变为内战；“暴力的多边主义”表现在“冷战”后中东（西亚北非）、欧洲、南亚爆发的五场局部地区战争。这些暴力冲突与战争不仅造成上百万和平居民无家可归，沦为难民，而且漂洋过海涌入欧洲。这使一贯标榜“民主”与“人权”的欧洲主要国家及政府面临疲于应对、进退两难的境地。欧美公众的内心可能幻想自由重于安全，而本能则肯定是在恐怖袭击中设法逃生，不可能站出来自由地牺牲。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面对北约集团的联合军演，普京总统于 2015 年 10 月下令重拳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IS），并在多轮空袭中显示了威力。这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打击在境外的恐怖组织对俄安全的威胁，提升

---

① 2015 年 10 月 13 日—15 日，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天津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东北亚和平与发展滨海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普京政府在俄国内的威望；另一方面巩固了叙利亚政府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向北约成员国展示了俄军高科技武器作战能力。今后，以俄罗斯为首，形成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的反恐、反西方新联盟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这是在乌克兰问题与北约东扩中处于守势的俄罗斯发动的又一场地缘战略防守反击，也是针对美国为首的“暴力的多边主义”的一种回应。

然而，此举将加剧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之间的地缘战略矛盾和军备竞赛；围绕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去留问题也将始终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未来俄境内外恐怖势力有可能加强相互勾连；俄罗斯与伊朗加强军事合作也可能使俄卷入未来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冲突的漩涡。

从国际战略格局角度看，传统国际格局中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仍然十分激烈，而非传统国际格局基本形成则为大国之间的反恐合作提供了机遇。所谓非传统国际格局，是指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在信息化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上，形成跨国武装集团和“隐形一极”，与美国及其盟国为主要对手展开热战，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新体系。“伊斯兰国”(IS)的出现即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使在各国猛烈打击下，其必定遭到重创，但还可能出现新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甚至出现“核恐怖主义”的更大威胁。

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则保持着相对和平与稳定。其原因在于：第一，该地区国家没有像美国为首的北约那样在“冷战”后对外发动局部地区战争，没有采取“暴力的多边主义”，而是奉行“和平的多边主义”；第二，该地区宗教信众长期和睦相处，没有大规模宗教冲突的新仇旧恨；第三，该地区重视经济发展、就业与民生，各国政府有效维持着本国的社会管理与秩序；第四，该地区都认同以和平方式处理问题；第五，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但是，东北亚仍潜伏着许多不安全因素。在中东、非洲、欧洲纷纷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确保该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在东北亚地区，美日同盟企图主宰这一地区的安全，但美国更加重视抗衡俄罗斯，而日本防务部门则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国”。与此同时，受到美日战略挤压的中俄则必然加强战略协作。为防止类似中东、欧洲的战乱在东亚地区上演，以可持续安全观共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将越发重要。可持续安全的实现，需要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树立21世纪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新概念并付诸实施。否则，即便在东北亚建立类似欧洲的多边安全机制，也难以确保东北亚安全的可持续性。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得到与会各国首脑的赞同。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

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正式提出可持续安全观，从而使这一新的安全理念具有全球意义。

事实在不断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共同安全是可持续安全的基础；综合安全即总体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大局；合作安全既包括国内各相关部门之间无缝衔接的安全合作，也包括各国之间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积极合作。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与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指导与行动规范意义。

在东北亚地区，我们要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安全的和平命运共同体、和谐与友爱的社会文化共同体。要建立东北亚这三个共同体，就要提倡和坚持和平的多边主义，抵制暴力的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安全；提倡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合作的"海陆和合论"，抵制"海权论""陆权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等服务于战争和霸权的传统地缘政治思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虽遇到严重困难，但作为和平的多边主义的一种尝试，其积极作用不容否认。有效的地区安全多边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为基础。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就是谋求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陆地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这就必须排除传统地缘政治思想的束缚与影响，发挥各自的地缘经济优势，实现全方位、多领域的和平合作，建立务实合作、互联互通、多元共存的网状命运共同体。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改变从小布什政府的"单边黩武主义"到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暴力多边主义"，至关重要。中美在谋求建立新兴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实现和确保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具有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推动通过"新安保法"，为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铺平了道路。

令人担忧的是，日本今后是否在全球范围参与"暴力的多边主义"，从而危害本国、东亚及世界的可持续安全。一旦日本修改《日本国宪法》或根据"新安保法"在中东、南亚、东亚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的安全成本就势必不断升高而安全程度则会大幅下降。因为届时，日本可能很难以再以和平宪法相关规定为盾牌，拒绝美国在全球范围支援美军作战行动的要求。日本不仅将在传统国际格局中加深同中国、韩国的战略矛盾，在美俄对抗中陷入困境，而且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也会承担

更大的国际风险，甚至遭到恐怖袭击，被卷入无休止的战争。另外，日本右翼势力与中国在海外的“疆独”势力早有勾结，今后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何种影响，值得关注。

有鉴于此，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需要以可持续安全观为指南，有关各国共同参与设计东北亚可持续安全的路线图。今后需研究的课题是：如何以可持续安全观谋求解决领土、领海争议问题；如何以可持续安全观实现战后分裂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问题；如何以可持续安全观解决朝核问题，防止东北亚核扩散；如何以可持续安全观增进东北亚外交、安全战略对话，建立和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如何以可持续安全观加强东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务实合作问题等。这一进程将有利于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巩固与发展。

二、共谋东北亚可持续安全是当务之急[①]

2015 年 11 月 1 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韩国举行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联合宣言》，为中日韩三国的和解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下面围绕“共谋东北亚可持续安全是当务之急”这一主题谈三个问题。

（一）共谋东北亚可持续安全为何是当务之急

首先，如果我们看一下最近全球国际安全形势的现实，就会一目了然。在“二战”后 70 年的中东和欧洲，乌克兰陷入分裂，叙利亚危机加剧，欧洲难民潮汹涌，巴黎恐怖袭击血腥，马里人质事件悲惨，俄土关系骤然紧张……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投入了大量安全成本，却更不安全。萨达姆·侯赛因、本·拉登、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虽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伊斯兰国”（IS）则开始横行，不断制造骇人听闻的暴力恐怖事件。继美国总统之后，近日法国总统也宣布本国进入战争状态。

如图 6-3 所示，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只有 8 至 10 岁“90 后”的儿童，生长在战乱和强烈的复仇意识之中。2010 年以来在美国推行的所谓“颜色革命”和“大中东民主化”的浪潮中，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到叙利亚，西亚北非地区成为重灾区，此时几年前的儿童已成为灵活使用网络技术的少年。2015 年，这批人有些是出生在比利时、美国、英国或法国的，他们长成 20 岁以上的青年，便成为支持 IS 的骨干。现在叙利亚危机等战乱产生的难民，以及在新一轮空袭中成长的儿童，再过十多年又会成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

相比之下，东北亚地区虽也充满不安全因素，但保持着脆弱的和平。除原有矛

① 本节内容摘自 2015 年 11 月 28 日天津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中日韩三国的和解与合作”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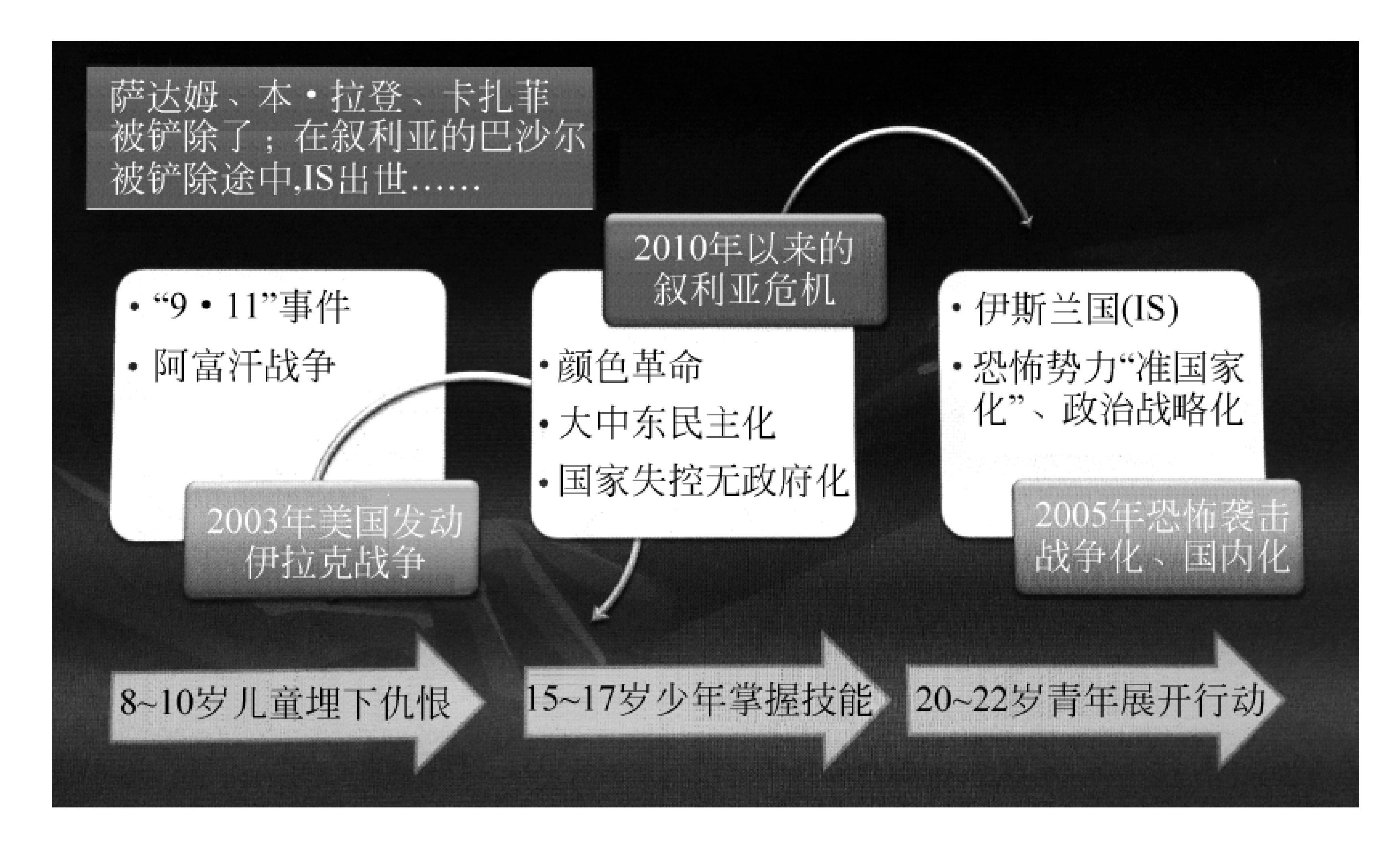


图 6-3　21 世纪以来国际恐怖势力变异的背景

盾以外，在新形势下，由于奥巴马总统在反恐战争联盟中提及亚洲盟友，日本、韩国今后所承受的安全风险可能增大；中国面临外来势力利用新疆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制造恐怖活动的风险也可能增大。《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中日韩三国来说，居安思危，共谋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既是当务之急，也是当务之本。

其次，迄今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更难以指明解决问题的思路。IS 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在以主权国家为主所构成的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国际格局之外，一个非传统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正趋形成。它的主要特点是：网络化、地区化的极端组织、恐怖势力等非主权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与美国（包括其盟国）之间相对抗，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一些极端组织发展迅速，一方面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内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汇集于出现权力真空、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似乎已形成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隐形一极”。

面对这种“非传统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似已失去解释力。以如何应对 IS 为例，西方三大国际关系理论显得难有作为。其一，最为流行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难以解释如何针对 IS 形成控制力和遏制力；理想主义理论也无法解释如何与 IS 形成相互依存，从而缓解矛盾，实现和平与安全；建构主义理论同样无法论证西方世界如何与 IS 形成共有知识与相互认同，从而维护和平与稳定。传统的核威慑理论、地缘政治理论针对 IS 也均失灵。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形成新的国际安全理论和观念，为正确决策服务。

最后，中日韩三国的和解与合作既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也要着眼未来安全与发展。值得庆幸的是，中日韩三国和东北亚地区迄今尚未被卷入“非传统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矛盾与冲突的漩涡。如何避免卷入中东、欧洲和美国所陷入的这种“非传统战争”和“非对称战争”，切实维护本国的公共安全，是中日韩三国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

（二）可持续安全的内涵是什么

1. 中国领导人提出新亚洲安全观：可持续安全四原则

2014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发表了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以“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习主席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

第一，共同安全原则。实现可持续安全，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各国应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派、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应和平共处，而不能形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冤冤相报。尽管联合国决议已经授权对“伊斯兰国”(IS)采取行动，但如何缩小打击面，确保普通伊斯兰民众的安全感，也应受到重视。

第二，综合安全原则。从总体安全出发，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着手，维护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安全大局，十分重要。世界各国应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民族宗教矛盾，通过多种手段，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重大挑战。

第三，合作安全原则。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第四，可持续安全原则。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各国来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一大关键。

2014 年 5 月亚信峰会发表的“上海宣言”也写入了可持续安全观。其中指出，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含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安全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各国应在迄今已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进一步强调："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核心作用，化干戈为玉帛。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意味着，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安全四原则的新观念，不仅局限于亚洲，而成为向世界各国发出的呼吁。

2. 可持续安全的理论内涵

可持续安全的定义是指，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长期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安全的范畴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子系统、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可持续安全就是要保持和平与安全状态的可持续性。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保持世界和平；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长期加强双边及多边国际合作。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争取使各国能以较低的安全成本保障较高水平的安全状态，维护人类安全。

可持续安全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实现本国安全与国际安全利益平衡的最大化。可持续安全的特点是具有全球性，既是某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问题，也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命运的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战略问题。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原则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注重以人为本，强调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它要求不得用战争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尤其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核扩散，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以破坏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

可持续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应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上述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在社会、文化、宗教、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利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联合国应发挥更大作用。

可持续安全提倡国家间实行和平的多边主义。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首脑峰会（简称亚信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及做法，都体现了这种国家间和平的多边主义。

可持续安全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是建立在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安全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民主与法制、廉洁与公平，是维护国内稳定的基础。国家之间恪守《联合国宪章》，保障主权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张与安排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关切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全球安全。

（三）我们怎样共同谋求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

根据中日韩三国关系的现状，在此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1. 中日韩三国的战略决策者需要树立可持续安全理念，摈弃传统国际政治思想对国家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战略决策方面，要摈弃一味追求本国权力的极端“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在双边关系和区域合作方面，要摈弃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必然对抗“海陆对抗”地缘政治思维，以及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的错误政策倾向；要倡导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合作的“海陆和合论”。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就是各国发挥各自的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和平合作、“海陆和合”，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

2. 中日韩三国可考虑以“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为基准，制定中日韩三国间共同的安全保障战略。中日韩三国与其背对背地谋划如何对付别国的安全保障政策，不如共商如何确保本地区共同的可持续安全。例如，从谋求和维护可持续安全角度，思考和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争议、朝核问题等敏感和棘手的难题。对待这类问题，显然不能采取对待恐怖分子的做法去施展硬实力，而要用软心肠（善意和诚意）、硬道理（事实与法理），触碰硬问题（领土争议等难题），通过诚恳、专业而耐心的对话，解开心结，共同探索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据2015年10月“北京东京论坛”发表的中日两国民意调查显示，认为钓鱼岛领土争议是影响两国关系改善障碍的受访者，日方占56％，中方占66.4％，均居首位。在这一问题上，那种继续采取不承认、不反省、不对话的“三不态度”，是缺乏建设性、自信心和不负责任的表现；那种企图利用领土问题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做法，更是十分危险的。

3. 中日韩三国政府和领导人需要从善意和诚意出发，正视历史和领土问题对三国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展开负责任的对话，带头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实现民族和解与合作方面，一国领导人往往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领导人的言行必须有利于中日韩三国的和解与合作，而不是相反。如果只是谋求首脑会谈而无诚意

和行动改善关系将是令人失望的。在改善中日韩关系，以及维系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4. 中日韩三国人民之间没有严重的宗教矛盾和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实现包容共生、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合作。中日韩之间有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人脉关系和共同利益，完全能够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合作。中日韩三国人民有共同的儒家文化、汉字文化和对事物的心灵感应，有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和把握自己命运的聪明才智与远见能力。日本政府应遵守 1995 年总理大臣村山富市谈话，这是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中的明文规定，希望安倍内阁能言行一致地遵守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

5. 中日韩三国需要重新确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与基础，根据双边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处理彼此间的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规定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国际法渊源呢？这个问题在战后 70 年的今天，必须予以澄清和重申，以确保未来 70 年东北亚的可持续安全。由于中国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未参与起草和加入《旧金山和约》，因此绝不能以《旧金山和约》作为中日韩共同遵守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础。只有中日韩三国都承诺遵守的《联合国宪章》，以及《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为基础形成的中日、韩日双边条约与声明，才是“二战”后中日韩三国必须遵守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础。

6. 中日韩三国从官方到民间，共同努力落实 2015 年 11 月 1 日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其中提及中日韩三国要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合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与繁荣。根据“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未来几年中日韩应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办好三大奥运盛事：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2020 年日本东京夏季奥运会和 2022 年中国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中日韩三国要共同努力培养具有仁爱、合作精神的年轻一代，使可持续安全理念首先在东北亚生根开花，然后传遍世界，为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作出我们的贡献。

三、东北亚可持续安全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①]

（一）机遇

2015 年，东北亚地区合作取得的最大进展是，李克强总理成功访问韩国，并出席了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议于 11 月 1 日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涵盖了三国几乎所有现有合作渠道和领域，可以说是集思广益的成果。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断三年半后复会，标志着三国合作的全面恢复。会议

① 在中国《世界知识》半月刊“2015 年世界形势回顾与展望座谈会发言稿”基础上改写而成。

确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应定期举行,日方将作为2016年三国合作协调国。三国将为2020年建成东亚共同体而努力。

近年来,尽管中日、韩日关系欠佳,但三国保持着合作秘书处和各领域二十多个部长级接触渠道,以及五十多个政府间协调机制。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宣言,呼应了韩国政府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朴槿惠总统顶住各种压力出席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赢得中方高度评价。近年来,中韩两国共同利益增多,双边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在东北亚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面向2020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为东北亚经贸合作与互联互通,提供新的重要机遇,起到发动机作用。俄罗斯、蒙古对参与东北亚合作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它们各自的发展战略与内在需求,同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吻合。朝鲜应当明了,只靠强大的武器难保国家安稳,而必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断取得成效。

2015年朝鲜半岛局势的特点是再度发生痉挛性的紧张,但有惊无险,年末趋缓。这其中似有一定规律:每逢春夏美韩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朝方必做强烈反应,与韩美互打口水仗,而军演结束后又会举行北南高级别会务、恢复南北离散家属团聚等活动。

目前,有关各方在东北亚最基本的共识是不能有战乱。尽管朝鲜核问题悬而未决,但和平稳定局面并未被打破。东北亚合作开始更加重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是汲取了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蔓延的教训,受到中国雾霾等环境问题的驱动,以及公共安全方面挑战增大的结果。这些领域也是中日韩加强合作的新机遇、新动力所在。

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宣言,特别强调"推动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在经济合作范畴之外单独提出的。重视和加强生态保护和绿色经济合作,意味着三国发展理念有了新的提升。

人文交流一直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支柱。这次领导人会议将这一领域的合作上升到增进三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战略、政治高度。三国加强人文交流的共识,覆盖了青年、教育、体育、艺术、旅游、地方政府、公共外交、政府官员对话等多个具体领域。2018年韩国要举行平昌冬奥会,2020年日本东京主办夏季奥运会,2022年有将迎来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三届奥运盛事接连在同一地区举办,完全可以成为中日韩加强人文交流和体育、经济合作的历史性契机。

从东北亚面临的挑战角度看,2016年将是选举之年、过渡之年,充满变数。例如,美国、中国的台湾岛内等,将举行领导人选举。日本也将举行战后以来最重要

的一次参院选举，因为选举结果可能直接影响日本能否修改宪法的问题。韩国也将举行议会选举。

（二）挑战

东北亚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实现和确保可持续安全。环顾世界，硝烟正弥漫着中东、非洲、欧洲一些国家。美俄地缘战略较量向纵深发展。“伊斯兰国”(IS)横行预示着，极端组织的“准国家化”导致恐怖活动从网络化向战争化、战略化方向发展。战后 70 年的今天，遭到“11·13”恐怖袭击的法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非传统战争，找不到媾和谈判的对手，很可能陷入无休止的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不对称战争的黑洞。

在这种形势下，保持着脆弱和平的东北亚充满不安全因素，万一发生战争冲突，就可能酿成一场特殊形式的世界大战。

朝鲜半岛局势向何处去仍有较多不确定性。朝韩关系既有改善的可能性，也存在恶化的危险性。中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可持续安全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但不等于中国可以决定一切。朝核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关键在于朝美关系。美国目前的对朝政策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新一届白宫主人将会奉行什么样的对朝政策和东亚战略尚无定论。每年春季美韩联合军演如果不能避开敏感地区或缩小规模，还会造成半岛局势的痉挛性紧张。这会否再度刺激朝鲜加快拥核步伐？六方会谈未来能否恢复？都值得密切关注。美国拟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菲律宾从韩国购买 FA50 超音速战机等，会对中韩关系带来何种影响，也不容忽视。

日本问题仍值得高度关注。安倍为摆脱在东北亚的孤立局面，确有通过首脑交往显示同中、韩改善关系的需要和意愿，但这似乎主要是一种外交策略，其政治“右倾化”大国路线要改也难。中日关系还可能出现反复。安倍的国内政治目标是，通过把国民视线转向经济，缓和同邻国的关系，抑制来自邻国的舆论压力，瓦解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对声浪，以维持国内民意支持率，争取 2016 年 7 月赢得日本参议院选举的大胜，然后着手修宪或制定新宪法。一旦战后日本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再度走上“损己害邻”道路的危险性也会随之增大。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并欢迎日本参与，而安倍内阁不仅态度冷淡，还提出扩大基础设施出口提振日本经济的战略，拟斥资 1100 亿美元，打出“质量牌”另起炉灶。其背后起作用的并非所谓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或“国家正常化”的考虑，而是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对华战略，以及根深蒂固的“海陆对抗”地缘战略旧思维作祟。在安倍内阁看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谋求海陆兼顾的地缘政治战略，必然从海陆两面与美联手抗衡。

（三）对策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的当务之本是，与有关各国共同谋求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海陆和合”的实践稳步推进，通过加强中日之间的功能性合作，防止“战略互惠关系”滑坡、变味。

与此同时，中国还可在中日韩三国合作框架内，促进“海陆和合”地缘政治经济新概念的落实。从地理上看，被夹在中国、俄罗斯与日本、美国之间的朝鲜半岛，尤其需要“海陆和合”。从历史上看，大国间海陆对抗必然导致朝鲜半岛被撕裂或发生地缘战略震荡，而海陆和平合作则不仅将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而且还可使朝鲜半岛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之间发挥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的桥梁作用，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正因如此，2014 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主要目的是缓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关系，“六方会谈”有关各方也可首先着眼于气候变化、反恐、核能安全等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进行对话，逐渐增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信任。

中国加强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推动落实 2015 年 11 月 1 日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是至关重要的。该宣言涉及东北亚可持续安全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认识到三国间有关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三国间有关双边关系发展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

我们对各种推动区域合作的努力表示赞赏，决定将共同努力实现区域互信与合作的共同目标。中、日两国领导人对韩方旨在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域内国家间建立信任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表示高度赞赏和欢迎，同意进一步推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2015 年 10 月举行的第二次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国际论坛讨论的多个合作项目，有助于加强区域互信，扩大三国合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将继续举办“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相关的高级别会议。

忆及 2011 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核安全合作》成果文件，我们就继续举办三国核安全磋商达成共识。我们对 2015 年 10 月举行的第八次三国核安全监管高官会（TRM）和第三次“TRM＋会议”（东北亚核安全合作国际论坛）有关讨论表示赞赏，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地区合作进程，强化在民用核能安全领域合作。

忆及 2011 年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的《灾害管理合作》成果文件，我们将加强三国合作，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我们对 2015 年 10 月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

中日韩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我们对秘书处主办的“三国灾害管理桌面演练”取得成功表示赞赏，并对美国、俄罗斯、蒙古国等有兴趣国家参与2015年4月的桌面演练表示欢迎。我们对2015年10月发表的三国灾害管理合作联合声明成果表示欢迎。我们了解日本已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提交了设立“世界海啸日”的决议草案，旨在通过合作提升三国关于应对海啸威胁和采取措施的意识，减少海啸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

我们重申加强三国环境合作十分重要。为此，我们欢迎2015年4月举行的第17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通过《2015—2019年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的九大优先领域。我们认识到解决地区空气污染的重要性，鼓励三国通过中日韩空气污染政策对话会交流改善空气质量的良好实践和努力。我们还认识到沙尘暴是地区严重环境挑战，敦促加强防治沙尘暴领域的合作。我们重视三国就环境污染防治技术信息交流项目开展的对话与合作，该项目旨在通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相关机制，促进环保企业污染防治技术信息共享，推动环保技术交易。

我们将加强合作，推动年内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一个具有法律效力、富有雄心、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原则和规定、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协议。我们回顾到2020年发达国家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承诺，用于在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及保持透明使用方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同时认识到，绿色气候基金应在2020年后《公约》下的资金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认识到三国就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埃博拉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开展卫生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将加强三国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为此，我们将改善血浆及血浆衍生物生产技术和供应信息交流，确保在传染病暴发或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血浆衍生物的安全供应。

我们重申，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和平稳定符合三国共同利益。我们对朝韩双方通过达成一致缓解半岛在8月出现的紧张局势表示欢迎，希望该协议为朝韩关系带来有意义的进展。我们重申，坚决反对在朝鲜半岛发展核武器，一致认为应忠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和2005年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中的国际义务和承诺。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或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行动。我们决定继续共同努力，尽早恢复有意义的六方会谈，以和平方式争取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进展。

中日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克服半岛民族分裂所做努力，为此高度赞赏为增进半岛双方信任、加强交流合作所提有关倡议。

加强在防扩散领域的三国合作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将建立“三方防扩散磋商”机制。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改善核安全，包括通过三

国核安全示范中心开展合作。

我们认识到恶意网络活动、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将密切合作，制定共同应对措施。

我们一致同意，三国合作对区域合作意义重大，将共同推进区域合作，以三国合作引领东亚合作。我们支持实施将在11月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交的第二东亚展望小组最终报告。我们重申对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支持，将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共同努力，该进程包括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的协议。我们期待领导人会议通过庆祝东亚峰会十周年的宣言，规划未来发展。①

上述宣言内容，对于共谋东北亚可持续安全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① 《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2015年11月1日于首尔发布，《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日，第7版。

第七章
可持续安全的理论、实践与法律保障

第一节　从国际战略视角解读可持续安全真谛[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基本原则。这为国际安全局势趋于恶化的世界带来希望之光。

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代表中国政府全面论述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习近平表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他指出，"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②]

继而，亚信峰会发表的《上海宣言》也吸纳了"可持续安全"的提法："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含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安全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本地区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任何一国在安全问题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应在迄今已达成共识基础上，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③]

从国际战略视角看，中国提出可持续安全战略思想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抓住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安全与发展；顺应了世界各国谋安全、求发展的普遍利益诉求；符合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客观需要；指出了人类社会在安全领域文明与进步的前进方向。

---

① 本文发表于《国际观察》，2014年第6期。

②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③ 《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一、21世纪两大时代主题：安全与发展

邓小平曾于1984年至1985年指出："国际上有两个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①"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

当时，世界上就有人疑惑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根据上述论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因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③邓小平还提出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实现祖国统一。这些清晰正确的战略判断，使一些对中国有疑虑的国家改变了看法，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了30多年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如今，30年过去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有效。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的本质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发展壮大而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与30多年前相比，世界上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则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世界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似乎很难再简单地用"和平与发展"来概括，因为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21世纪世界面临两大主题可以概括为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包括维护世界和平问题及应对和平状态下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内的可持续安全问题。"发展问题"也不只是南北问题，而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谋求可持续发展、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增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更为复杂的挑战。与30年前相比，当今世界发生以下重要变化。

第一，伴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美俄地缘战略争夺与战略武器相互威慑。第二，世界总体和平尚可维系，但21世纪以来局部战争从未停止，其规模、烈度和范围有扩大之势。第三，除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安全问题以外，国际恐怖主义、海盗猖獗、走私贩毒、能源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明显上升。第四，暴力的多边主义作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变种，与网络化的国际恐怖主义尖锐对抗，形成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新格局，并从不同角度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第五，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探索一种相互尊重、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兴大国关系，中国将坚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底线。第六，伴随中国经济、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的延展，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员在海外生命财产安全等海外涉华安全利益较前突出。第七，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严重核污染有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长远影响，核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超过核能发展的迫切性。

强调“安全问题”是世界的主题之一，丝毫也不意味着减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注，和平问题依然是安全问题的核心，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尤其如此，而发展问题仍然是安全问题的关键。上述战乱说到底是经济发展失衡、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权力之争与地缘战略角逐交织，以及外部势力介入的必然结果。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又在高歌猛进地谋求实现中国梦。世界上一些人又在问：中国强大了究竟会干什么？中国表示要和平发展，一些国家又问那为何要增强军事力量，准备打赢战争？有人心怀叵测地宣扬中国强大后会对 1840 年以来历史上的屈辱“复仇”；也有人误判形势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宣示而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挑战中国，迫使中国陷入悖论与困境。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中国自身能否做出正确的形势判断，是否拥有正确指导政策制定的战略理论。欧洲、中东的战火硝烟使我们没有根据把当今时代描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在这一并存与竞争的时代，世界面临的两大课题是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行改革，正确地实现符合时代潮流的国家模式转型，而不是相反。

从理论上讲，中国道路不能只用和平发展来概括，因为其他国家多数也是如此。中国道路的实质主要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这是中国国情与历史演进决定的。中国模式则主要是指中国谋求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形态，其中既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可以与世界各国分享、取长补短的普适性。中国未来的改革，就是要借鉴世界各国之长，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发展观与安全观，不断创新和完善国家发展模式与安全模式。中国不仅要在实践方面妥善处理好面临的各种安全挑战，而且要在理论观念方面为世界做出具有引领性的贡献。这样，世界就会看到，进一步强大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可持续安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和平进步力量。

面对国际上的某些疑问，我们需要明确回答三个“绝不”：第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意味着当国家安全和统一面临威胁时而放弃使用武力捍卫主权与安全；第二，中国增强国防力量绝不是要针对历史上对中国造成国耻的国家复仇，而是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谋求实现可持续安全；第三，中国的可持续安全绝不靠任何人恩赐或盟友保护，而只能依靠与本国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相匹配的国防力量，以及包括国际合作在内的相关对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这些权利难道不是天经

地义的吗？

对于中国来说，在外部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的情况下，维护国内安全更应受到重视。中国自2010年国内总产值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之后，又战胜国内外重重困难，取得许多可喜的新成就，但国内安全问题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不容忽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伺机破坏。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出口阻力同时增大；来华直接投资减少；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风险上升。社会腐败、丑恶现象滋生；贫富差距拉大；群体事件频发。2014年香港地区发生以所谓争民主为招牌少数人聚众“占中”闹事，严重损害了香港正常的生活、交通与工作秩序和国际形象。自然灾害与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抢速度、谋增收而忽视安全等人为疏失，造成“豆腐渣”工程的楼倒桥塌；高铁、地铁追尾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惨祸。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谋发展，导致有法不依，监管不力的食品安全、矿难事故、环境污染、生态安全等问题触目惊心。中国对外可以继续宣示和平发展，而对内则必须强调安全发展。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现实的威胁挑战值得警惕。在信息化社会，上述国内外不安全因素不断积累，久而久之就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彼此叠加，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复合型威胁。纵观中国历史，无内忧则外患难至，外患至则内忧更甚。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内忧外患同时并发，海陆两面受敌；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富而以民为本，强而与邻为善，安而有备无患；最大教训之一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弱而官僚腐败，乱而压内媚外，战而有患无备；最值得注意的规律之一是大乱后必有大治，大治后易出大乱。鉴于此，可持续安全问题必然被提上国家总体安全的议事日程。

事实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没有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也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角度思考中国的治国战略十分必要。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须继续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此同时，必须认清，如果连人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没有科学的安全观，即便科技和经济发展了也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与杀戮，制造大量的战争碳排放。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或许比可持续发展更重要。因为一旦丧失主权与安全，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所以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安全是未来一切事业发展的大前提。

二、非传统国际格局出现使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

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之外又出现了一个“非传统国际格局”①。传统国际关系格局特点是国家与国家、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的较量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特点则是国家与非国家、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较量与非对称战争。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已出现以美国为首的一极，和以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化所形成的“隐形一极”之间的长期热战状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意味着日本未来可能作为美国的帮凶被卷入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的热战之中，成为国际恐怖组织未来的打击目标。

“9·11”事件以来，社会信息化与恐怖活动全球化、网络化，已经形成“隐形一极”，其与传统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热战并没有因为伊拉克战争结束和本·拉登被击毙而终结。恰恰相反，美国的军事打击虽然捅掉一个马蜂窝，而“基地”组织等新的马蜂筑巢行动又从南亚蔓延到西亚北非地区。2014年产生于叙利亚、猖獗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即是最新的典型案例。其已迅速成为具有正规军作战能力的非政府、非国家武装集团，采取恐怖杀戮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手段，对美国及其盟国宣战。蒙面的隐形杀手未来有可能公开化。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这种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国际恐怖组织已经发生质变，转化为传统安全领域的现实威胁。

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以及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出现，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曾深感：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领土上的最致命的袭击，揭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要求我们采取强有力和持续有效的措施来保卫国家”。21世纪伊始，美国的布什政府便宣布：美国进入反恐战争。其后的奥巴马政府也认为：“冷战结束以来20年的最大特征是变化所带来的希望与危险并存。和平民主阵营有所扩大；核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除；主要大国和平共处；全球经济实现增长；商业往来把各国命运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主宰自身命运。与这些进步并存的是挥之不去的难题。意识形态战争已让位于由宗教、种族和族群认同所引发的战争；核危险在扩散；不平等与经济不稳定有所加剧；环境和食品安全遭到破坏、公共卫生遭受威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新技术既可用于建设，也可用于破坏。”②

奥巴马政府曾坚信大国间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同时认为，全球化也加剧了美国所面临的危险，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致命技术的扩散、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等。美国虽然没有使用“非传统格局”这个词汇，但明确表示，“在过去近10年时间里，

① 参见刘江永：《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再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②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5月27日向美国国会递交其上任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华社伍益祖根据白宫网站翻译。

我们的国家与遍布各地的暴力和仇恨网络处于战争状态。伊拉克战争虽已结束，我们的军队又奉命再次以阿富汗为重点，完成瓦解、摧毁和击败'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的承诺。……面对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失败国家等构成的多样化威胁，我们将保持军事优势”。[①]

美国既要维系在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主宰地位和地缘战略优势，又不能不从本国安全利益出发，应对非传统国际格局的严峻挑战。因为一旦国际恐怖组织获得针对美国的核武器、核材料，美国的核威慑理论将失灵。在这一背景下，截至2010年，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基调是：“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进一步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将鼓励其做出有利于和平、安全及繁荣的选择。我们正利用中美新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解决更广泛领域的问题，增进双方军事联系以减少猜疑。我们仍将鼓励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继续缓和紧张关系。美中两国不会在每个问题上都能达成共识。我们在人权及其他领域立场明确。但意见不同不应该妨碍美中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务实而有效的双边关系，对于应对21世纪的主要挑战不可或缺。”[②]

然而，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中，传统的现实主义、地缘战略思维，甚至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依然强大。这些陈旧的安全与战略思维方式已落后于时代和维护可持续安全的需要。但是，只要符合美国军产复合体生存发展方式的需要和美国维持世界领导地位欲念，这些思维方式便可以续存，甚在决策中取得的支配地位。

伴随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中日韩合作不断深化，美国为确保霸主地位，提出并实施所谓重返亚太战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0月在美国《外交政策》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强调美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总统再度当选后，似乎要把重点重新转移到传统国际格局的大国博弈与地缘战略争夺方面，并通过与日本、菲律宾等国的“2＋2”会谈和东盟相关论坛释放出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向。这导致日本的安倍晋三内阁有恃无恐地利用美国发动了一场围堵、制衡中国的“地球仪外交”。

2014年3月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保卫本土、营造全球安全、

---

①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5月27日向美国国会递交其上任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华社伍益祖根据白宫网站翻译。

②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5月27日向美国国会递交其上任以来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新华社伍益祖根据白宫网站翻译。

远程投送与决战制胜三大军事战略支柱。尽管美国意识到“恐怖主义依然是一个持续的、严谨的、不断蜕变中的威胁”，开始强调全球战略的“再平衡”，但维持中东地区安全被至于亚太地区之后。[①] 美国将在 2020 年之前把 60% 的战舰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认定，未来 10 年，中国是唯一能够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经济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2014 年 4 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菲律宾，在钓鱼岛及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不久便引发东亚局势紧张。安倍内阁借机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加紧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其目的一是针对中国增强威慑力；二是动员日本在全球范围支援美军行动。这些将增大日本卷入暴力多边主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性，并可能对未来的中美、中日关系蒙上阴影。

事实证明，奥巴马总统及其决策团队发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首先，正当美国忙于“重返亚洲”之际，而欧洲乌克兰分裂、内战引发美欧同俄罗斯之间的尖锐对立则是美国所始料不及的。其次，美国推行的“颜色革命”导致中东局势剧烈动荡，叙利亚内战令美国束手无策，按下葫芦浮起瓢，无意中放纵了“伊斯兰国”(IS)等极端势力的形成。最后，美国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面临的挑战才是现实的安全威胁，而美国却在亚太地区利用矛盾，把中国作为军事上的对手和威胁。时至今日，美国不能不为误判付出沉痛的代价。国际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复杂化似乎使美国高官的话锋越来越情绪化，而内心却在失去定力和章法。可持续安全的要领之一在于“化敌为友”，而美国的做法却往往是“助友为敌”，最终陷入安全异化的怪圈而难以自拔。在历史上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阿富汗的“塔利班”兴起、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反叙利亚政府的“伊斯兰国”(IS)等都是典型案例，美国老毛病迄今没改。

目前，美国并未改变重返亚洲的所谓“再平衡”战略，仍然试图利用所谓“朝鲜威胁”“中国威胁”，维系在韩国和冲绳的美军基地，重返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基地，并向韩、日、越、菲推销美国军火，转嫁本国每年削减的约 500 亿美元的军费财政负担，并继续主宰亚太安全。然而，一旦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识破这种唯利是图的战略逻辑，谋求自主外交，美国便将不得不调整战略或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川亚运带来朝鲜与韩国关系解冻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推动“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也是明智之举。未来亚洲各国人民谋求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将形成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任何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政府终将被本国人民所唾弃。

2014 年至 2015 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可能被迫面临调整，否则将直接影响美国民主党在 2016 年大选中的执政地位。首先，在国际安全局势中，明确敌友是关键，而美国的困境在于至今仍未能摆脱“助友为敌”的怪圈。2013 年，美国把

---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March 2014. p. 21.

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作为中东战略的重点。同年 9 月，美国官员曾表示，总统奥巴马已将叙利亚视为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威胁。自叙利亚爆发毒气袭击事件之后，白宫就宣布叙利亚是最大的安全威胁，为美国对叙利亚空袭制造舆论。然而，美国为避免直接出兵而陷入第二个伊拉克战争泥潭，曾默许一些盟国对反叙利亚政府的武装提供武器。结果导致基地组织等各种极端势力在叙利亚得势，并与伊拉克境内反政府武装合流，迅速形成令美国生畏的所谓“伊斯兰国”(IS)。

其次，乌克兰战乱将打乱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及政策优先顺序。围绕乌克兰战乱的美俄战略矛盾是苏联解体以来传统欧洲战略格局中地缘战略矛盾的延伸。普京已被北约东扩挤压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原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一直存在的亲俄与亲西方的权力之争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俄罗斯借机重新占领克里米亚令美国难以容忍。

这表现在奥巴马总统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番演讲中。奥巴马称：“埃博拉病毒在击溃西非公共卫生系统的同时正快速向周边蔓延；俄罗斯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回忆起某些大国为实现其领土雄心而践踏小国的历史；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肆虐的恐怖组织 IS 又把我们逼到黑暗的最深处。”他强调：“对于这种邪恶势力不可能有说理的余地，不可能有谈判的余地。这样的杀人犯能够理解的唯一语言是‘武力’。”[①]这里，美国总统把埃博拉病毒、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并列为三大威胁，而 2014 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及的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伊朗和朝鲜则不在其列。奥巴马发誓要摧毁“伊斯兰国”的“死亡网络”，同时公开号召制裁俄罗斯。这反映出美国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国际格局中，正伸出双拳应对，但又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这一切矛盾、冲突的种子，实际上早在“冷战”后和伊拉克战争时便由美国亲手埋下了。

面对这样的国际安全形势，美国未将中国作为“重点威胁”，并表示可以同中国在打击海盗、国际维和、人道救援、灾难搜救等方面加强合作，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并没有针对美扛起反霸大旗，而是实事求是地做出形势判断，倡导可持续安全观。中国不仅在加强同美国军方的沟通，而且欢迎奥巴马总统出席 2014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建立和巩固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继续努力。中国对“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造成的损害坚决反对。与此同时，中国并不赞成美国及其盟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和别国政府许可便在该国大打出手，进行军事干预，不认为军事打击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中国要维系可持续安全，就要在传统国际格局中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避免卷入对抗性矛盾的旋涡，防止“祸水东引”。

① 《环球时报》，2014 年 9 月 27 日。

三、从战略全局看可持续安全战略特征与内涵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通过和平与合作方式，以较低成本实现较长时期和平与安全的客观状态。可持续安全堪称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模式。其与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及范畴不同，更加适应当前和长远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需要。

（一）从安全观发展的角度看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特点和必要性

第一，持久和平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一般而言，持久和平是可持续安全的前提，但和平不等于安全。即便在长期和平条件下，国家与公民仍会受到来自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而可持续安全概念恰恰涵盖这两大领域。在特殊情况下，只要能做到战则必胜、胜且能保，非和平状态未必绝对不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堪称是可持续安全的终极守护神。

第二，迄今的安全观并未包含国内安全和公民个体安全。2002 年 7 月，中国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坚持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是建立在世界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然而，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内安全更显重要；本国公民、法人在境外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相对突出。可持续安全战略肩负国内长治久安与不受外部战争威胁的双重维安任务，同时必须重视中国公民在境内外的个体安全，因而堪称是新时期国内新安全观与国际新安全观总和基础的总体安全战略。

第三，迄今的综合安全观不太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最早是日本大平正芳内阁提出的，旨在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防止和应对战争冲突、能源危机、自然灾害等多种安全威胁。“冷战”后，联合国倡导“全面包容型安全”。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接受了 1972 年“罗马俱乐部”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从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人身、社区和政治安全七大领域，全面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然而，迄今联合国尚未提出可持续安全理念。中国应当在这个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议题上有所贡献。事实证明，依靠战争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必然会发生安全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碳排放增加、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

第四，迄今的安全观难以弥合主权与人权之争的对立。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观往往倾向于维护主权，但国内矛盾激化难免损及部分人权；发达国家的安全观则强调所谓人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可能被滥用。可持续安全理念不仅重视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而且重视公民安全。可持续安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强调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要求一国政府对内重视改善民生、防止腐败、尊重人权、健全法制；对外营造和平、合作、开放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尤其反对侵犯他国主权的战争行为。

第五，迄今某些大国或强国的安全观不大重视经济和社会成本。伴随经济增长、财政宽裕而适度加大国防投入是必要的，但过度军备竞赛加速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美国安全成本升高与安全程度下降的矛盾也日益突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从安全成本角度反思伊拉克战争。他指出，这种成本有三：一是作为“志愿国联合”一员的盟国参与战争的直接成本；二是波及世界经济和特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成本；三是引起“文明冲突”的成本。结果，美国付出巨大的安全成本反而增大了本国的安全风险，而不计成本的安全是难以持续的。故此，人类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综合成本角度，思考安全的可持续性与科学性问题，而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安全观。

第六，可持续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非难以实现的理想。可持续安全是相对的，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握，以宏观全局为重，但也不能忽视局部对全局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关键因素之一是得益于自1979年以来没有卷入对外战争；自1989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国内动乱，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安全状态。未来30年，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可持续安全，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必然出现新的、更大跃升。正因如此，一些敌对势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制造和利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破坏和干扰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是中国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观念。

（二）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政府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能力与艺术，旨在确保国家和平与安全状态不被迫中断。可持续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大系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子系统、国内和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以及在这个总纲下的若干细目。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通过本国努力与国际合作，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确保世界和平与本国不受侵犯；在非传统安

全领域有效维护本国自身安全与各国共同安全。所谓低成本，并不意味单纯节约安全开支，而是从综合意义上而言的安全代价、战略代价。可持续安全战略首先要确保安全状态不被破坏；其次是一旦安全状态受到难以避免的损害或被迫中断后，国家安全可持续性的自我再造与续建。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特点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协调性。为此，在增强国防力量的同时，要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巧用公共外交。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国内安全利益与国际安全利益的总体平衡。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要继续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合作与和平融合，进一步促进港澳的繁荣发展。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应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本质是和平与非暴力性。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要靠实力与王道，而非霸道。在国际上，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政治磋商、外交对话、国际协调等和平方式，缓和与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以破坏别国安全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都是和平的多边主义实践；而暴力的多边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构成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外部军事威胁。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实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与合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所有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利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原则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它强调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的情况下，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特殊的安全利益与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渗透，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任何地区安全合作都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利益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是维护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基础。《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确保各国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国际准则。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违反这些准则而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或损害。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中国在加强国内道德、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法、国际规则制定与完善的进程。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各国发展与安全的相对同步性。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应同步推进。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以利发展中国家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通过国际制裁，加剧社会动乱，颠覆别国政权，不仅无助于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可能制造“越穷越打、越打越穷”的恶性循环，到头来必定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可持续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靠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有关国家可以在反恐、反走私贩毒、反海盗、防治跨国传染病、维护生态环境等跨国安全问题上，加强长期合作。这有利于各国增强政治互信，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要确保国际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完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可持续安全方面的功能与机制建设。

可持续安全战略包括地缘战略概念的创新。迄今，无论是“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还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都是为西方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实际上，这些地缘战略学说并不具有普适性价值。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仿效，只会引起新的地缘争夺甚至冲突与战争。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要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就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创造性地妥善处理好领土与海权争议。2013 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构想，并得到相关国家积极响应。这正是新地缘战略思维“海陆和合论”的具体实践。未来东海、南海权益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以“海陆和合论”和可持续安全理念为指导，努力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四、弘扬“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意义重大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这堪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未来的中国外交与安全实践将证明，其重要意义将不亚于当年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持续安全理念符合时代潮流与世界各国的现实需要，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获得世界各国认同。它不是权宜之计或策略选择，而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持久性的根本指导方针与原则。它不是只为中国量身订制的，而对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各国都将具有普适性。

（一）习近平提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

从习近平在 2014 年 5 月上海亚信峰会讲话可以看到中国可持续安全观的政策基调，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

1. 共同安全原则，包括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与包容性。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2. 综合安全原则，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综合安全就是总体安全。通盘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使本地区人民都能在安宁祥和的土地上幸福生活。

3. 合作安全原则，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4. 可持续安全原则，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可持续安全目前已成为中国军方积极倡导的一个关键词。2014 年 6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3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做了题为《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太美好未来》的演讲，强调可持续安

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中国将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与各国共同创造地区持久繁荣和安宁的局面。[①]同年9月，出席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行的第21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发表了题为《树立新型海上安全观，共建和平发展的海洋环境》的演讲。其中首次阐述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新型海上安全观，并产生积极反响。[②] 他指出，共同安全就是各国海军都要维护安全、享受安全；综合安全就是统筹兼顾各领域安全问题；合作安全就是通过务实合作谋求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反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应作为各国海军共同的思想理念和责任担当。[③] 这为中美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注入了正能量。

可持续安全已得到上海合作组织的集体认同。201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宣布：“各成员国呼吁在考虑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和压迫的世界，发展全面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④]

（二）“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⑤]同年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同年6月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都确认并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原则。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后，新中国政府在与所有国家建交时都提及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其内容在1970年10月被第25届联大载入《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准则。

邓小平生前曾经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后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指导中国独立自主和平

① 《王冠中：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太美好未来》，中国经济网新加坡6月1日讯（记者陶杰）。2014年6月1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gjzh/201406/01/t20140601_2907167.shtml。

② 张军社：《新型海上安全观符合各国利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23日。

③ 《吴胜利：应秉持新型海上安全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民网北京9月22日电（汪国征、莫小亮）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9/23/c_127018805.htm。

④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人民日报》，2014年9月13日。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

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国际关系准则。与此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其告诫我们：如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不到有效遵守，国际安全危机就会发生。事实证明，依靠战争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必然会发生安全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碳排放增加、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时代变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难以涵盖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21 世纪的中国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也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有新发展，这就是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可以相信，可持续安全理念必将向可持续发展理念一样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也一定会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为未来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奠定基础。

（三）如何为普及可持续安理念继续发出中国的好声音

迄今，或许一些人还不太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可持续安全的重要性，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与持久和平或长治久安。这就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关键词的集中概括使用和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深入人心，好记易懂，便于传播，主要是其内容得人心，同时是由于概括得好，把一个多项概念并列的句子集中概括为一个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个关键词分散地说成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互不侵犯原则、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平共处原则，虽然意思准确，但显得松散而不易记忆和传播。同样，在习近平亚信峰会讲话中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也可以集中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即上述共同安全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安全原则与可持续安全原则。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创新，而非凭空想象。作为科学的安全观，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是个纲，纲举目张。共同安全是保障，综合安全是手段，合作安全是路径，可持续安全是目标与指针。换言之，可持续安全的基本特点就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

第二，中国人自身要认真领会和大力倡导“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加强对上海亚信峰会成果的巩固和后续行动十分必要。中国相关部门应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重要讲话的内容和精神实质，从国际关系、国际法、外交学、战略学等学科角度深化对的理论研究与探讨，结合外交与安全工作实践制定相关领域的战略规划与政策措施，把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和原则化为可持续安全的政策与实践。今后，每 10 年可就上海亚信峰会通过的《上海宣言》进行回顾总结，结合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等活动，进一步阐述和弘扬可持续安全理念。

第三，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维护国家安全与

国际安全方面要有更大作为，可以考虑在与世界各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在双边及多边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协调合作中，积极倡导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201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可以单独或联合亚信峰会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引领国际安全事务走上正确轨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智力贡献。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和战略不只是为中国国家安全提出的，不仅是亚洲的安全观，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应该成为联合国的新安全观。

第四，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或联合国大会下设“联合国可持续安全委员会”。它可作为联合国安全事务的智库、统筹协调与政策理念传播机构，发挥类似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功能与作用。1992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5 年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备受关注。在国际安全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一些新现象可能反映出未来的某种长期趋势，因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当务之急与其说是扩大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如说是更新安全观念。如果联合国改革能推动成立“可持续安全委员会”，便有可能为联合国在全球可持续安全事业中发挥智库作用和协调合作功能，并为世界各国就可持续安全交流经验、交换信息提供平台。

第五，事在人为，着眼未来培养人才至关重要。可持续安全是一个全新的安全理念，未必能马上得到某些国际政治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理解或认同。要使世界更加安全，着眼未来 30 年，需要重视培养新一代具有可续安全观的国家安全人才和外交人才。只有具备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未来安全政策的制定才能更具合理性、合作性、建设性和可持续性。可持续安全观的传播意义或许不亚于孔子学院，因为其中蕴含着中国孔子、管子等前秦时期国家间政治的王道思想精髓。可持续安全观的传播，首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传媒界的崇高使命与历史责任。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原创性理论研究方面，当代中国人应当而且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节　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理论与实践[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次提出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概念，即谋求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四项原则主张，涵盖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安全大局，意义十分重大。可持续安全战略是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与艺术的总和，旨在确保国家和平与安全状态不被中断。兼顾国内国际安全的可持续安全战略是个纲，国防战略、国际战略、海洋战略、治安战略等都是重要目的，纲举才能目张。

习近平主席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②]47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及代表发表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简称《上海宣言》），吸纳了可持续安全观的提法，表明与会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已认同这一安全理念。同年 9 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宣言也表示：“各成员国呼吁在考虑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冲突、没有暴力和压迫的世界，发展全面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③]这些共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 2014 年 11 月 29 日结束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赋予更加普遍的意义，具有全球的高度。习近平指出：我们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④]

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可持续安全观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其重要指导意义将不亚于当年周恩来总理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持续安全理念符合时代潮流与世界各国的现实需要，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

---

① 本文发表于《中国军事科学》，2014 年第 6 期。

②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2 日。

③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13 日。

④ 新华网北京 11 月 29 日电《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29/c_1113457723.htm。

获得世界各国认同。它不是权宜之计或策略选择，而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持久性的根本指导方针与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中国、亚洲，而且对人类社会与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适性。本文拟就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做一探讨。

一、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2014 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 60 周年。半个世纪过去后，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提出，同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1949 年中国大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成为当时美国“冷战”政策遏制的主要对象之一。新中国政府刚成立就经历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国内建设百废待兴，国际环境亟待改善。与此同时，亚非拉广大国家在谋求民族独立，维护本国的主权不受侵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5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处理国家关系，要遵照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同年 6 月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都确认并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原则。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后，新中国政府在与所有国家建交时都提及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其内容在 1970 年 10 月被第 25 届联合国大会载入《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准则。

邓小平生前曾经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指导当今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方针和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准则，今后也会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须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第一，中国自 2010 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遇到新的阻力。中国作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某些带有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国家看来是个“异类”，在国际上必然会又如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样再度受到来自霸权国及其部分盟友的打压与牵制。与此同时，中国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维护国家安全与谋求经济发展这两大课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正是在这一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5 月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这可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辅相成，成为 21 世纪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原则。

---

① 邓小平：《和平共处具有强大生命力》，1984 年 10 月 3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96～97 页。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而遭到严重践踏。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的行为，以强迫对方顺从我方的意志为目的。“冷战”后，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发动了多起局部地区战争，形成了“暴力的多边主义”。通常以为，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搞单边主义。其实，这种单边主义主要是指美国不顾联合国的意志而擅自决定对外发动战争，但实际上“冷战”后美国为首发动的战争没有一场是一个国家的单边行动。以 2003 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就得到 49 个国家支持，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捷克和斯洛伐克 8 国参与了全部 6 次军事行动，比利时、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 6 国参与了其中的 5 次军事行动。[①]另外，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也无一例外，都是“暴力的多边主义”行为。

第三，“暴力的多边主义”难以维系可持续安全。所谓“暴力的多边主义”，系指依靠军事集团、多国部队发动战争或军事打击，以谋求单方面的所谓绝对安全。这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安全异化现象，而且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碳排放增加、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遭到总体损毁。其埋下的仇恨的种子将延续到 22 世纪、23 世纪，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历史性灾难影响可能更为长远。

美国总统奥巴马清楚地意识到眼前面临的安全威胁，但又显得苦无良策，甚至可能使美国陷入更加危险的深渊。2011 年美国政府宣称重返亚洲，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而现实是葫芦没有按下去又浮起瓢，其全球战略陷入捉襟见肘的失衡状态。2014 年 9 月 24 日，奥巴马总统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称：“埃博拉病毒在击溃西非公共卫生系统的同时正快速向周边蔓延；俄罗斯在欧洲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回忆起某些大国为实现其领土雄心而践踏小国的历史；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肆虐的恐怖组织 IS(伊斯兰国)又把我们逼到黑暗的最深处。”他强调：“对于这种邪恶势力不可能有说理的余地，不可能有谈判的余地。这样的杀人犯能够理解的唯一语言是‘武力’。”[②]这里，美国总统把埃博拉病毒、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并列为三大威胁，而 2014 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提及的严重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伊朗和朝鲜则不在其列。奥巴马发誓要摧毁“伊斯兰国”的“死亡网络”，同时公开号召制裁俄罗斯。这些矛盾冲突的种子，实际上早在“冷战”后初期美国在欧亚和中东地区进取的地缘战略、新保守主义思想支配下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便由美国亲手埋下了。

第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联盟战略难以实现可持续安全。美国战后以来维系并不断加强的同盟体系，遇到了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困境。就其同盟体系内部而言，堪称是“共同、综合、合作”程度最高的组织形式，但问题在于这种军事联盟却

---

① 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的军事干涉》，《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31～32 页。

② 人民网：《奥巴马将俄罗斯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威胁之一》，2014 年 9 月 27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927/c1002－25748298.html。

没能确保各成员国的可持续安全状态，甚至适得其反。其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这至少由三个结构性矛盾导致：其一，联盟政治中的“共同、综合、合作”的性质具有排他性、片面性而不具备普遍性、包容性，因而会对该联盟以外的国家带来不安全感、被控制感甚至现实威胁；其二，非传统威胁因素的出现和增多，仅靠军事同盟、军事行动难以应对，而必须超越同盟内外的界限，实现全球各国普遍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其三，同盟内一些国家在本国没有受到安全威胁或入侵的情况下，也可能为了维系同盟的可靠性而被卷入其他盟友发动的战争，从而增加本国的安全成本，损害自身的安全利益。

第五，从可持续安全的角度，需要给政治和国际政治重新定义。美国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已不适应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政府迄今都没能摆脱高成本、低安全、不安全的安全困境。其根本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决策者及智库尚不了解、不理解当今时代可持续安全理念和战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美国决策者信奉传统的权力政治理论，往往导致在国内为迎合选举的政治需要而制定一些权宜之计，在国际上则企图以绝对强大的军事及联盟优势控制别国而四面树敌。美国军方与军火利益集团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学古籍《尚书》指出“道洽政治，泽润生民”①，意为正确治国，惠及民生。孙中山曾把英文中的 Politics 说成政治，即“管理众人之事”。如果从中国汉字的写法上看，“政治”中的“政”字是由正确、正当、正直的“正”字，与文明、文官的“文”字结合在一起的；“治”字，则是在三点“水”的右侧加上一个作为堤坝的“台”字，意为治理、利用好水。故此，中文里“政治”的寓意也可以理解为正确、正当、正直而文明地管理并服务于众人之事。这也可以称为德政。军事及其他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种德政。非正义的战争是德政失败后非法的暴力；而正义的战争则是德政在自卫等正当防御情况下合法而适度的暴力。

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应该是，世界各国政府要正确、正当、正直而文明地参与全球治理，管理国际关系，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可持续安全的政治理念，与那种企图通过强化以军事为后盾的政治权力，居高临下地管制、控制别国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笔者认为，旨在实现可持续安全的国际政治思维，正是未来世界大国领袖首先应该理解和遵循的德政与王道的精髓。

第六，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呼唤可持续安全观的普及与践行。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形势变化，如今仅靠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似乎难以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提出的新挑战。例如，在继续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如何有效打击跨国犯罪，处理跨境

① 《尚书·毕命》。

生态环境污染，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安全领域的合作，有时的确需要通过必要的国际协定，彼此让渡部分主权。针对一些国家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的行为，联合国也有权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予以制裁。

当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是由于其内容好，而且是由于其概括得好。它把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等多项概念并列的一个句子集中概括为一个关键词，好记易懂，便于传播。同样，习主席在亚信峰会讲话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也可以概括为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作为科学安全观，它涵盖了共同安全原则、综合安全原则、合作安全原则与可持续安全原则。共同安全是理想与保障，综合安全是领域与手段，合作安全是方式与路径，可持续安全是目的与指针。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好比是纬线，各项安全、外交工作好比是经线，只有把具体工作的经线与可持续安全观的纬线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编织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美好蓝图。

二、落实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新保障

关于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重要意义，需要从时代主题的高度加以认识。时代主题，即当今时代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邓小平 1985 年前后把世界上的两大问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并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 从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和平与发展被称为时代主题。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仍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②]

那么，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复杂变化呢？与 30 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时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原有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美国及北约以反恐为名发动了多场局部战争，和平问题不再是东西问题，但美俄军事对抗与地缘战略较量仍在继续。发展问题也不只是南北问题，而是包括世界各国共同谋求相对平衡、彼此开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各国利益相互交叉，更加错综复杂，很难再完全以“东西南北”画线来思考和制定对外战略。

今年以来，西非埃博拉病毒蔓延，中东“伊斯兰国”等恐怖极端组织出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颜色革命”对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冲击。这些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新变

①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 年 3 月 4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4～106 页。

② 2012 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化显示，世界上带全局性的两大问题与其说是“和平与发展”，不如说是“安全与发展”更为贴切、全面。不过，如果这一年来的安全形势变化并不具有长期性特点，那么从时代主题角度看，“和平与发展”或许仍然可以被习惯地称为时代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4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习主席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从概念上讲，安全问题既包括和平与战争的传统安全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平是安全最起码的要求。从国际安全的现实情况看，目前世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国家：(1)处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的国家。一是由于所谓“颜色革命”引起内乱、宗教民族冲突致内战或受到外部军事打击的国家，例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国；二是以反恐或所谓推行民主为名对别国实施军事打击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北约的参战成员国。(2)处于“亚和平”状态的国家。经常受到外部军事威胁或恐怖组织、极端势力袭击，如朝鲜半岛、伊朗、巴基斯坦、黎巴嫩、阿富汗、土耳其等国。(3)处于和平状态下而安全问题正日益突出的国家。即前两种类型以外的世界大多数国家。世界各国要确保可持续安全，首先要避免本国处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其次要防止本国陷入“亚和平”状态；最后保持本国的和平状态和长治久安，并通过增强综合国力及国际合作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经常议论的两大问题是安全与发展。例如，2014年5月22日发表的亚信峰会《上海宣言》中提到“和平”23次，而提到“安全”则多达36次；同年9月12日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15次提到“和平”，而23次提到“安全”。从重要国际文件的关键词出现频率的角度看，这或许反映出有关各国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度大约相当于对和平问题关注度的1.5倍以上。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都呈现上述这种长期趋势，而世界大战或针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又不会爆发，那么“安全与发展”就可能被视为两大时代主题。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早在1972年，欧美学者组成的所谓“罗马俱乐部”在论述经济增长的极限时便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199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立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被全球接受，而且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提醒世人，没有可持续安全则难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和平状态被破坏，超级大国不断发动战争和军事

---

① 《习近平主持国安委首次会议 阐述国家安全观》，新华网2014年4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4/16/c_126396289.htm。

打击，有其深层次的各种复杂原因。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决策者思想中缺乏可持续安全理念。

然而，依靠绝对军事优势和多国军事打击，换来的只是高成本的低安全，不仅不可持续，反而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制造了无数的战争碳排放，从而严重抵消了世界各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努力。早在 40 多年前，人们就意识到经济增长有其极限，不能无节制地消耗和浪费能源，但至今经常发动军事行动的美欧各国还没有认识和理解战争和军备也有其极限，以及物极必反的哲理。

因此，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主张的提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1 世纪，人类社会如果能够不断落实、完善可持续安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世界的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就会得到真正意义上新的保障。大量事实证明，国家一旦失去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也将受严重到干扰和损害。可以相信，可持续安全理念必将像可持续发展理念一样，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这或许是人类社会谋求未来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智慧。联合国应尽早成立可持续安全委员会，从全球层面引领设计上述可持续安全的战略规划，为联合国各成员国提供相应的可持续安全建议。

三、中国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的新方略与新举措

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5 月在上海亚信峰会提出的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主张，体现出中国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新方略。习近平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力反腐、依法治国、“一带一路”、互通互联、科技强军等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可持续安全的新举措相继出台。中国提出了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主张。

（一）共同安全原则——涵盖各国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与包容性

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同安全就是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①] 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

中国古代的孔子，即孔丘（公元前 551—前 479）主张：“夫仁者，己欲立人而立人，己欲而达人。”[②]进而言之，所谓共同安全就是要提倡己欲安而安人，本国欲安

① 习近平 2014 年 4 月在首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5 日。

② 《论语·雍也》。

而安他国。管子,即中国古代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公元前719—前645)曾在中国最早提出睦邻思想:“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①]可持续安全理念尊重世界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它强调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的情况下,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特殊的安全利益与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渗透,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任何地区安全合作都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利益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共同安全。

因此,习近平主席强调,可持续安全应具有包容性。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也无助于抵御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威胁。[②]

(二)综合安全原则——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要努力构建国家安全大系统,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各子系统融为一体,统筹兼顾。习近平主席还就总体国家安全指出: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③]

中国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本身,就是适应中国综合安全、总体协调、分工负责,确保国家安全需要的一项重大决策。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又一新举措。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统一指挥、协调军队和地方国家安全相关单位的顶层机制,未来将不断强化与完善,发挥维护中

① 《管子·兵法第七》。

②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的讲话:《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③ 新华网2014年4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04/16/c_126396289.htm。

国可持续安全的领导核心作用。

关于如何推进亚洲的综合安全，习近平在 2014 年 5 月举行的亚信峰会强调，要通盘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使本地区人民都能在安宁祥和的土地上幸福生活。①

（三）合作安全原则——通过对话合作，以和平的多边主义谋求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所需要的国际合作，与上述以美国为首多国发动战争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完全不同，它倡导实行和平的多边主义，其中也包括对话协商、务实高效的双边安全合作安排。迄今，中国没有参与任何军事集团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合作，加入的全球或地区组织与国际机制，都具有和平的多边主义性质。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20 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伊朗核问题六国会谈、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等，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指出的，中国主张各国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②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元首 2013 年就加强中国、印度尼西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致同意加强司法、执法领域合作，深化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人口贩卖、网络犯罪、经济犯罪以及禁毒、执法能力建设领域务实合作，承诺在情报信息交流、案件协查、缉捕和遣返犯罪嫌疑人、追缴犯罪资产等方面相互支持。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反恐磋商机制，推动中国公安部和印尼警察总部、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院、中国司法部和印度尼西亚司法人权部在法律事务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③

---

①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的讲话：《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2 日。

②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的讲话：《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2 日。

③ 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规划》，《人民日报》，2013 年 10 月 4 日。

中国同印度2014年达成共识认为，两军关系有利于增进互信，同意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两军领导人定期互访，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同意于双方方便的时候举行第四次陆军联合训练，适时开展海、空军联合演练，加强维和、反恐、护航、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人员培训、智库交流等合作。[①]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2014年主张进一步开展切实合作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和威胁，积极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合作纲要(2013—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打击犯罪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定》《2011—2016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禁毒战略》及其落实行动计划，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成员国愿同有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和机制通过双边或多边形式，共同协作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②]

与安全相关的国际合作也要提倡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其中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危机管理、紧急援救。为应对西非埃博拉病毒蔓延，中国政府便及时向有关国家提供药品、检测设备和医务人员援助。多边反恐军事行动不得无视和危及别国领土主权，必须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要防止“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集团成为暴力的多边主义的武装集团，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从而成为破坏国际和平的消极因素。要提倡各国共同参与的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对话协商、综合治理，缓解和解决国际争端，防止发生战端，形成恶性循环，从而破坏可持续安全。

（四）可持续安全原则——要求安全和发展并重，相辅相成

中国广大地区自古生活着农耕民族。在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便知晓国富民安的道理。例如，管子曾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③]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④]管仲认为，富国富民都要靠农业。他指出：“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盛则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⑤]

---

① 2014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3年9月20日。

② 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杜尚别宣言》，《人民日报》，2014年9月13日。

③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④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⑤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可持续安全时特别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①]

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需同步推进。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以利于发展中国家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通过国际制裁，加剧社会动乱，颠覆别国政权，不仅无助于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可能制造“越穷越打、越打越穷”的恶性循环，到头来必定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例如，阿富汗、缅甸“金三角”地区生产毒品问题，索马里海盗问题等，都与该地区经济落后、就业率低、社会管理机能差有关。2012 年中国警方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毒品 5.37 吨，占全国缴获总量的 73.7%。湄公河国际航道上 2007 年至 2011 年发生绑架、杀人、抢劫等犯罪事件 34 起，中国船员深受其害。该地区经济落后是其重要原因。2013 年人均 GDP 缅甸为 868 美元，世界排名 156 位；柬埔寨为 1015 美元，排名第 152 位；老挝为 1476 美元，排名第 139 位。[②] 因此，中国在加强与湄公河地区待机走私贩毒、抢劫暴力犯罪的同时，正积极推进大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

亚信峰会《上海宣言》强调指出：“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合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显著减少并最终根除因战争、交战行为和军事围困等导致人类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短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以提供充足的粮食，尤其是保障妇女和儿童拥有充足的食物。我们呼吁各方开放市场，增加国内外用于资助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金，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减少贫困，以实现为所有人提供食品。我们认为，一个全球性、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系统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能源安全同国家、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和各国人民福祉息息相关。我们承诺，在符合里约 20 峰会成果中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等概念的同时，适当考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益和需求，进一步促进和加

① 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发表的讲话：《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2 日。

② 黄云、张青磊：《首届“安全促发展国际论坛”会议综述》，《国际研究参考资料》，2014 年第 9 期，第 53～57 页。

强能源安全。”[①]这些共识若能得到落实，必经有力地维护亚洲安全。

为此，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亚欧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同年 10 月，习主席访问印尼讲时又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同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正式确立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沿线 26 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 63％和 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总量 23.9％。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从陆地到海上将形成跟大范围的互联互通与共同繁荣。这无疑将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地缘政治概念具有创新性，即利用各自的地缘经济优势打好共同安全的经济基础。迄今，无论是“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还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都是为西方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地缘政治理论。然而，这些地缘战略学说并不具有普世性价值，更不可能赢得可持续安全。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仿效，只会引起新的地缘争夺甚至冲突与战争。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亚太地区是由内陆国家、海洋国家、半岛国家、群岛国家、海陆兼备国家所组成，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着有利于合作的地理空间与复杂的相互制衡。要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就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将同各方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②] 中国积极推动的陆地、海洋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正是“海陆和合”地缘战略理论的具体实践。未来东海问题的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以及南海各方的行为准则的制定，也要考虑以亚信峰会通过的可持续安全理念作指导，建设性、创造性地妥善处理好领土与海权争议。

四、贯彻落实可持续安全四原则对中国军队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可持续安全与国防力量建设关系密切。从传统安全角度看，只有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确保可持续安全的底线，维护国际和平，本国免受外敌入侵。只有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中国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与国家性质不改变颜色。在对外军事关系中，中国军队捍卫国际和平，反对侵略扩张。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军队与地方相关部门相互

---

① 2014 年 5 月亚信峰会《上海宣言》，《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22 日。

② 2014 年 6 月 21 日，杨洁篪在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主旨演讲。中国网，http://www.huashengjp.com/article-87213-1.html。

配合、无缝衔接，不仅可以在维护国家安全、人民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参与打击海盗、联合国维和、抢险救灾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必要的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①]伴随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可持续安全战略还将对中国国防力量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国富兵强乃国家安全之基。早在中国古代，管子曾指出："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②]"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同样"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③]"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④] 这里的"兵"是指军队而非士兵。管子认为：评价一国之君的功过得失，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看国家是否富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国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⑤]管子还强调，"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审器而识胜"；要做到"器成教施"，"教器备利则有制也"[⑥]。因为"机械巧则伐而不费"。[⑦] 即军队必须武器精良且人会使用，兵器完备、训练有素便可掌握制敌的主动。因为武器好打胜仗就不费事。孙子，即孙武（公元前 545—前 470）虽然提出"兵众孰强、士卒孰练"以观胜负，但没有突出强调"器"，即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和重要性，而管子则看到并明确强调这一点。这对中国国防装备现代化和军队作战训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管子特别强调"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即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其次才是一战决胜负、定乾坤。这与可持续安全观本质上的非暴力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管子认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⑧] "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也。四祸其国

---

① 2012 年 11 月 8 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② 《管子·七法第六》。

③ 《管子·重令第十五》。

④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

⑤ 《管子·重令第十五》。

⑥ 《管子·兵法第十七》。

⑦ 《管子·兵法第十七》。

⑧ 《管子·法法第十六》。

而无不危矣。”[①]管子主张，“兵不义不可”[②]，“勇而不义伤兵”，“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③] 一旦发生战争则要做到“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④]管子上述“至善不战”的思想，对后来孙子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⑤]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

目前，可持续安全已成为中国军方积极倡导、努力充实其内涵的一个关键词。2014 年 6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新加坡举行的第 13 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亚太美好未来》的演讲，强调可持续安全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中国将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与各国共同创造地区持久繁荣和安宁的局面。

2014 年 9 月，中国人民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美国举行的第 21 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上，以《树立新型海上安全观，共建和平发展的海洋环境》为题发表演讲，首次阐述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新型海上安全观，并产生积极反响。[⑥] 吴胜利指出，共同安全就是各国海军都要维护安全、享受安全；综合安全就是统筹兼顾各领域安全问题；合作安全就是通过务实合作谋求安全；可持续安全就是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反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应作为各国海军共同的思想理念和责任担当。[⑦]这是中国海军把可持续安全四项原则与海洋安全实际相结合的范例，不仅为中美建立新兴大国关系注入了正能量，而且为世界各国共同维护海洋安全起到正确的领航作用。

中国自古便有依法维安的法家政治思想。管子认为：“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⑧]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

① 《管子·兵法第十七》。

②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③ 《管子·法法第十六》。

④ 《管子·枢言第十二》。

⑤ 《孙子·谋攻篇》。

⑥ 张军社：《新型海上安全观符合各国利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 年 9 月 23 日。

⑦ 《吴胜利：应秉持新型海上安全观以合作取代对抗》，人民网，北京 9 月 22 日电（汪国征、莫小亮）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9/23/c_127018805.htm。

⑧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①]

如今，中国在依法维安方面已取得许多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1993 年 2 月 22 日，中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1997 年 3 月 14 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2010 年 4 月修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自同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2005 年 3 月 14 日颁布实施《反分裂国家法》。2014 年 11 月 1 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取代了原有的国家安全法。

伴随中国依法治国方针的推进，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军，依法维护可持续安全的任务也将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中国军队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 10 月 28 日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创新发展依法治军理论和实践，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党中央要求健全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责任，完善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推动依法治军落到实处。

未来中国国防力量建设要成为可持续安全的坚强后盾，就要坚持依法治军和以德治军相结合，杜绝军中腐败。孙子提出，将帅是“国之辅”“国家安危之主”，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在今天市场经济条的环境下，还应加上“廉”这一德，将帅人才要“六德”兼备。即做到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做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②] 今后，在国内，军队与地方的法律法规建设需要衔接、完善，同步推进。可持续安全需要国际法、国际规则作保障，无论是保卫祖国还是国际维和，军队都需要学习、熟知相关国际法知识。在国际上，我军参与联合军演、远洋护航、国际维和等，需进一步制定明确的法规制度与细则。通过军队作训法制化、危机管理法制化、国际安全合作法制化建设等，逐步形成可持续安全法制化。其任重而道远，可适当借鉴国外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落实完善。

五、结　语

可持续安全理念，绝不等于只是某一个国家的永久安全，而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四位一体的新安全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努力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水平和持久性，避免出现高成本、低安全或不安全的局面。从辩证唯

① 《孙子·计篇》。

② 新华网：《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 年 11 月 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1/c_1113074055.htm。

物主义的角度看，安全是相对的，而不安全因素的存在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按照可持续安全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断创造条件化危为安、转危为机、防患未然，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局部、每一个领域的安全状态衔接起来，确保安全总体安全的可持续性，以及一旦安全遭到破坏后迅速的安全再造功能。维护可持续安全的关键在内因，但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要实现可持续安全，首先要立足国内、统筹协调，把自己的事办好，同时要知己知彼，敏锐地发现国内外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可能产生的隐患，制定好相应预案，做到常备不懈，有备无患。

第三节　可持续安全与“上海共识”

所谓“上海共识”，即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亚信峰会发表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简称《上海宣言》)。该宣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首次倡导以“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提出许多相关的具体主张。该宣言声明：“我们愿本着本次峰会达成的‘上海共识’，为促进亚洲地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2年10月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截至2014年5月，亚信会议共有26个成员国：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泰国、韩国、约旦、阿联酋、越南、伊拉克、巴林和柬埔寨、卡塔尔、孟加拉国。另外还有11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派出观察员：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乌克兰、美国、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联合国、欧安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亚信会议分为部长会议和四年一度的首脑峰会。会议秘书处设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亚信会议还设有亚信青年委员会、亚信实业家委员会和亚信商务论坛等。

一、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亚信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为“上海共识”定下基调

2014年5月21日，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凝聚会议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主旨讲话的全文(黑色字体部分系笔者所加)。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①

今天，包括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峰会客人在内的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相聚上海。大家围绕“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这一主题，共商安全合作大计，共谋长治久安良策，共襄繁荣盛举，对亚洲和世界安全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和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

---

① 中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yxfhzb/index.htm。

今天的亚洲，虽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

亚洲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今天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安全合作正在迎难而上，各种合作机制更加活跃。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亚洲多样性特点突出，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大家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否则，就会像哈萨克斯坦谚语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

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亚洲安全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

我们应该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使本地区

人民都能在安宁祥和的土地上幸福生活。

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有句谚语说得好，“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

亚洲是开放的亚洲。亚洲国家在加强自身合作的同时，要坚定致力于同其他地区和国家、国际组织合作，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可持续，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亚信是亚洲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广的地区安全论坛。20 多年来，亚信以增进互信协作、促进亚洲安全稳定为己任，秉持协商一致原则，为加深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亚洲人民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更加强烈；对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的需求，更加迫切。

中方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中方认为，可以考虑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当增加亚信外长会乃至峰会频率，以加强对亚信的政治引领、规划好亚信发展蓝图。

中方建议，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支持完善亚信秘书处职能，在亚信框架内建立成员国防务磋商机制，及各领域信任措施落实监督行动工作组，深化反恐、经贸、旅游、环保、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建议，通过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等方式，建立亚信各方民间交流网络，为广泛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提升亚信影响力、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中方建议，增强亚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要加强同本地区其他合作组织的协调和合作，也要扩大同其他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对话和沟通，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中国将履行亚信主席国职责，同各国一道进一步提升亚信的地位和作用，携手开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成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已经通过友好协商同 14 个邻国中的 12 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同有关国家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支持东盟、南盟、阿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同俄罗斯共同提出亚太安全与合作倡议，为巩固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而不懈努力。中国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中方将一步一个脚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推进地区安全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

中方愿意同地区国家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探讨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亚洲安全应急中心等，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协调地区、国家更好地应对重大的突发安全事件。中方倡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愿意支持和帮助亚洲各国人民实现各自的美好梦想。同各国一道共同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亚洲梦，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上海宣言》达成"上海共识"的全部内容

尽管《上海宣言》的落实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但其所阐明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理念，将为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提供一种新方案、新道路、新模式。以下是《上海宣言》中文版全文（黑色字体部分与实现可持续安全直接相关）。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
——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①]

我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2014年5月2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举行亚信第四次峰会，认识到当今世界正经历广泛、持续转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多边主义和民主化对国际社会日益具有重要意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备更加有利的条件，强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威胁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意识到亚洲各国面临相同的发展挑战，迫切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可长期共享的有利环境，认为成员国应团结一致，考虑到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并基于成员国在亚信框架内的对话与合作传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承担的共同责任，为加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进一步努力，重申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奉行1999年9月14日通过的《亚信成员国相互关系原则宣言》和2002年6月4日通过的《阿拉木图文件》所述的亚信宗旨和原则，决定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继续落实信任措施，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把亚洲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强调安全具有共同、不可分割、平等和全面的特性的重要意义，强调有必要鼓励亚信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建立和促进合作关系，从而加强亚洲各地区组织和论坛间的合作。

声明如下：

一

1.1　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含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安全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本地区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任何一国在安全问题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应在迄今已达成共识基础上，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1.2　我们重申，亚洲各国愿发扬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精神，尊重亚洲各国主权，寻求共同发展进步，致力于在所有国家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伙伴关系及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深入亚洲人心的安全环境。

1.3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加强自身安全。考虑到

① 中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1/c_126531149.htm。

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责任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强调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组织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都不具有特殊优先责任。

1.4 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我们重申,我们尊重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际公认的国境线不容侵犯,坚持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不应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破坏别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任何有悖《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主张的行为;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互不干涉内政;不采取、不支持任何旨在颠覆别国合法政府的行动;尊重人民基于《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尊重人权、基本自由,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信仰;就解决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我们也拒绝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双重标准。

1.5 我们重申,亚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亚信成员国合作关系具有丰富内涵的宝贵因素。我们愿推进跨文化、文明、信仰间的广泛对话,鼓励彼此包容、相互借鉴和理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通过民间交往推动地区一体化。

1.6 我们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和制定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

二

2.1 我们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合作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保护人权,维护国际法至高无上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依据有关国际文书加强合作,共同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腐败以及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其他威胁和挑战。

2.2 我们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我们也强调有必要共同限制恐怖和极端思想的传播,有必要推动国际宗教和种族包容、对话和理解。我们欢迎联合国大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起的68/127号《关于构建一个反对暴力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世界》决议,并呼吁该决议得到全面落实。

2.3 我们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重要性,承诺将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法及其他适用的国际人权文书履行相关义务。我们进一步重申,人权是普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国际社会必须公正、平等地处理全球范围内的人权问题。各国应认识到,各国与各地区皆具独特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十分重要。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责任推动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2.4 我们强调,分裂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稳定的威胁。我们不支持其他成员国领土内的任何分裂主义运动和组织。我们也重申,绝不允许任何分裂主义运动或组织利用我们的领土,不与分裂分子产生任何关系或建立联系。

2.5　我们认为，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合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显著减少并最终根除因战争、交战行为和军事围困等导致人类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短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以提供充足的粮食，尤其是保障妇女和儿童拥有充足的食物。我们呼吁各方开放市场，增加国内外用于资助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金，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减少贫困，以实现为所有人提供食品。我们认为，一个全球性、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系统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我们认为需要找到粮食价格过度波动的根本原因，包括各层级上的结构性原因。

2.6　我们承认，能源安全同国家、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和各国人民福祉息息相关。我们承诺，在符合里约＋20 峰会成果中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等概念的同时，适当考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益和需求，进一步促进和加强能源安全。我们认为，能源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样化将提升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力。国际社会应该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互利合作和多元发展，进一步促进和加强能源安全，共同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能源需求。各国应加强研发和推广包括化石能源在内的先进能源技术，采取适当措施共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确保对生产领域必要的投资水平，并大力发展经济高效的技术和环保的能源资源。

2.7　我们强调共同努力推进地区一体化，特别是综合和有竞争力的运输以及物流系统，这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机会，加快地区和国际交通运输合作，充分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　我们重申，将遵守亚信相关文件，特别是峰会和部长级会议签署和通过的文件中关于对核不扩散、裁军及和平使用核能的承诺。我们强调，核武器的持续存在和扩散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达成无核世界全球宣言的倡议。我们支持消除全球核武器的目标和全面巩固建立在所有国家非歧视、平等、不可分割和不受减损的安全原则基础上的核不扩散机制。

2.9　我们支持在地区相关国家自由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及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2.10　我们欢迎中亚无核武器区地位，这是对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贡献。在此方面，我们欢迎 2014 年 5 月 6 日五核国签署的《中亚无核区条约消极安全保证协议》。

2.11　我们欢迎蒙古与五核国 2012 年 9 月就蒙古无核武器地位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这是对核不扩散和加强地区信任和可预测性的具体贡献。

2.12　我们支持各国在遵守核不扩散义务，履行相关协议特别是国际原子能

机构保障监督协议的基础上,有开发和利用核能用于包括发电在内的和平目的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13 我们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关于在其境内建立低浓缩铀银行的倡议,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不损害其地位的情况下通过该银行向其他国家供应低浓缩铀。

2.14 我们同样赞赏在华盛顿、首尔和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为制定旨在加强核安全和辐射安全具体步骤和措施所作的贡献。

2.15 我们注意到2010年4月17日至18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共享核能,同弃核武"裁军和防扩散问题国际会议。

2.16 我们相信,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但也可用于有悖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目的。我们深信,就降低风险和加强安全而言,开展国际合作极其重要,包括研究信息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规则或原则。亚信成员国愿共同努力开展合作,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信息空间。

2.17 我们支持2009年7月成立的蒙古乌兰巴托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研究中心全面运行。我们呼吁中亚内陆发展中国家通过或加入关于建立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研究中心的多边协定。中亚内陆发展中国家曾于2010年9月首次开会讨论其运行问题。我们承认该研究中心在向成员国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方面的潜在作用,并且认为该研究中心应与地区现有网络和行动开展合作。

三

3.1 我们支持在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该地区人民的合法诉求的前提下,有序、和平地解决中东和北非地区尚在发展的事态。

3.2 考虑到相关各方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不同立场,我们持续关注并呼吁相关各方执行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通过重启谈判在该地区建立综合、持久和公正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在国际公认的法律基础和联合国决议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实现和平、安全共处的两国方案,充分维护地区其他国家的和平、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包括四方机制在内的国际社会应继续为实现该目标而努力。

3.3 我们认识到地区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及地区合作作为在东北亚建立信任手段的作用。鉴此,我们欢迎地区国家提出的相关倡议,包括蒙古总统关于举行"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倡议和韩国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倡议"。我们希望这些倡议能够与其他倡议产生协同作用,为在本地区内外建立信任措施和推动安全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3.4 我们认为阿富汗和平与和解进程应由阿人主导、阿人所有。我们呼吁阿武装反对派摈弃暴力,断绝与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的联系,尊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我们欢迎阿富汗人民和政府于近期举行总统和省议会选举,这标志着权力从一个民选政府到另一个民选政府的和平过渡。我们注意到,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将于2014年底完成与阿富汗武装力量的过渡，这也是转型十年的开始。在此背景下，我们承诺继续支持阿富汗，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推动阿富汗和亚洲地区的安全、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我们认为，联合国以及地区组织和倡议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和公正的作用。鉴此，我们支持中方于2014年8月在天津成功举办主题为“深化地区合作，促进阿富汗及地区持久安全和繁荣”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

我们认为，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毒品严重威胁阿富汗和本地区内外的安全与稳定。我们赞赏阿富汗的全国性努力，以及共同、一致的地区和国际合作，以应对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挑战，包括摧毁恐怖分子避难所，切断对恐怖主义的一切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强调应进一步开展上述合作。国际社会有必要帮助阿富汗打击非法制贩毒品，推广替代种植，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打击毒品、毒品前体及其全球消费。在此背景下，我们号召所有成员国加强行动，全面查处和切断与非法贩卖毒品及其前体有关的资金流，打击毒品贸易，防止易制毒化学品用于制毒，减少药物滥用和依赖。

3.5　我们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仍未解决并继续危及国际和地区安全表示关切。我们支持在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及其框架内通过的决议和文件基础上，和平解决该冲突。鉴此，我们呼吁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切实努力解决该冲突。

四

4.1　我们承认并赞赏亚信成立以来所有成员国为积极推动对话与合作及加强信任措施所作的努力。我们愿意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支持亚信在亚洲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愿本着本次峰会达成的“上海共识”，为促进亚洲地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4.2　我们欢迎亚信协调国和联合协调国在信任措施不同领域推动合作的努力。我们赞赏成立亚信青年委员会、亚信实业家委员会以及在曼谷、伊斯坦布尔和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三次亚信商务论坛。在此方面，我们特别赞赏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分别为推进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方面所作的贡献。我们承诺推动在各领域建立信任措施，扩大成员国间的长期对话与合作。

4.3　我们重申，根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也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根据各国国情、工作重点及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的原则，包括其第七条所阐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承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还决心加快努力，在2015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相信，根据里约+20峰会的使命所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能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目标，并为后2015年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4.4　我们强调，平衡的多边贸易系统对促进所有成员国实现其发展目标具有

重要作用。鉴此，我们支持尽早重启部分亚信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

五

5.1　我们赞赏亚信秘书处为亚信发展所做的工作，支持加强秘书处建设，以更好履行职责。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国自愿向秘书处捐款。我们欢迎秘书处迁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的计划。

5.2　我们高度评价亚信秘书处执行主任奇纳尔·阿尔代米尔大使为发展和加强亚信进程所作的贡献。

5.3　我们欢迎通过新的《亚信程序规则》。

5.4　我们强调亚信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和对外交往的重要性。为此，我们鼓励亚信秘书处继续努力同地区和国际组织及论坛建立机构层面的联系。

5.5　我们欢迎亚信秘书处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亚信上海峰会期间签署谅解备忘录。

5.6　我们呼吁尚未批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协定》的成员国能够尽快批准。同时呼吁尚未签署并批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及其人员以及成员国代表特权与豁免协定》的成员国能够尽快签署和批准。

六

6.1　我们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先生作为亚信的缔造者，为亚信机制建立、发展和壮大作出的突出贡献。

6.2　我们高度评价土耳其自2010年担任亚信主席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过去4年来，亚信在土方的引导下，在实现亚信目标和原则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6.3　我们欢迎并支持中国接任亚信主席国，相信中国将同亚信各成员国、观察员密切协作，推动亚信合作与发展迈上新台阶。

我们高兴地看到，亚信进程的吸引力正在提升。我们欢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国成为亚信新成员国。

6.4　我们商定于2016年举行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2018年举行亚信第五次峰会。

2014年5月21日于上海

第四节　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与国家安全法

可持续安全的实现，不仅需要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安全观获得广泛认同，而且需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作保障。在这方面，中国2015年7月1日颁布并开始施行的新《国家安全法》，是中国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事业法制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相关法规。其根本宗旨和特征是，维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可持续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曾通过并施行了新中国第一部《国家安全法》。该法主要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履行反间任务方面的职权和境内外人员、组织在这方面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然而，22年过去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特别是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该法已难以适应全面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该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这部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法》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安全事业不仅限于保密与反间范畴，而突出强调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该法第二条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第三条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此基础上，该法第八条提出："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这些法律规定，充分体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基本理念。可以相信，在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法》指导和保障下，可持续安全的"中国案例"，必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九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 年 7 月 1 日通过、颁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5 年 7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

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第三条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第四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

第五条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第六条　国家制定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全面评估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

第七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第八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第九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充分发挥专门机关和其他有关机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作用，广泛动员公民和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十条　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积极同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安全交流合作，履行国际安全义务，促进共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第十二条　国家对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和涉及国家安全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任何个人和组织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不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或者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每年 4 月 15 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第二章

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第十五条 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

国家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窃取、泄露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境外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第十六条 国家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人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国家加强边防、海防和空防建设,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卫和管控措施,保卫领陆、内水、领海和领空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第十八条 国家加强武装力量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设与保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需要相适应的武装力量;实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防备和抵御侵略,制止武装颠覆和分裂;开展国际军事安全合作,实施联合国维和、国际救援、海上护航和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

第十九条 国家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全预防和化解经济安全风险的制度机制,保障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经济利益安全。

第二十条 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

第二十一条 国家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能源,有效管控战略资源能源的开发,加强战略资源能源储备,完善资源能源运输战略通道建设和安全保护措施,加强国际资源能源合作,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

第二十二条 国家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和市场调控机制,健全粮食安全预警制度,保障粮食供给和质量安全。

第二十三条 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第二十四条 国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新技

术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科技保密能力建设，保障重大技术和工程的安全。

第二十五条　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二十六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民族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第二十七条　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

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八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置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报、调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暴力恐怖活动。

第二十九条　国家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积极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置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定。

第三十条　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术，加强国际合作，防止核扩散，完善防扩散机制，加强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和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对公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不断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核攻击的能力。

第三十二条　国家坚持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

第三十三条　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组织和机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

第三十四条 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利益的需要,不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

第三章

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第三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行使宪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行使宪法规定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行使宪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涉及国家安全的行政法规,规定有关行政措施,发布有关决定和命令;实施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行使宪法法律规定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予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八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军事战略和武装力量的作战方针,统一指挥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行动,制定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法规,发布有关决定和命令。

第三十九条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贯彻执行国家安全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管理指导本系统、本领域国家安全工作。

第四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安全工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第四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有关军事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相关职权。

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贯彻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和涉及国家安全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国家安全制度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四十四条　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实行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与工作机制。

第四十五条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中央有关职能部门推进相关工作。

第四十六条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工作督促检查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国家安全战略和重大部署贯彻落实。

第四十七条　各部门、各地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贯彻实施国家安全战略。

第四十八条　国家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建立跨部门会商工作机制，就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事项进行会商研判，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十九条　国家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军地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关于国家安全的协同联动机制。

第五十条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咨询机制，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开展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研判，推进国家安全的科学决策。

第二节　情报信息

第五十一条　国家健全统一归口、反应灵敏、准确高效、运转顺畅的情报信息收集、研判和使用制度，建立情报信息工作协调机制，实现情报信息的及时收集、准确研判、有效使用和共享。

第五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军事机关根据职责分工，依法搜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信息。

国家机关各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于获取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有关信息应当及时上报。

第五十三条　开展情报信息工作，应当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强对情报信息的鉴别、筛选、综合和研判分析。

第五十四条　情报信息的报送应当及时、准确、客观，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和谎报。

第三节　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

第五十五条　国家制定完善应对各领域国家安全风险预案。

第五十六条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定期开展各领域国家安全风险调查评估。

有关部门应当定期向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提交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第五十七条　国家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根据国家安全风险程度，

及时发布相应风险预警。

第五十八条 对可能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按照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第四节 审查监管

第五十九条 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第六十条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使国家安全审查职责，依法作出国家安全审查决定或者提出安全审查意见并监督执行。

第六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国家安全审查和监管工作。

第五节 危机管控

第六十二条 国家建立统一领导、协同联动、有序高效的国家安全危机管控制度。

第六十三条 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根据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的统一部署，依法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管控处置措施。

第六十四条 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特别重大事件，需要进入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者进行全国总动员、局部动员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

第六十五条 国家决定进入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者实施国防动员后，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有权采取限制公民和组织权利、增加公民和组织义务的特别措施。

第六十六条 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法采取处置国家安全危机的管控措施，应当与国家安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公民、组织权益的措施。

第六十七条 国家健全国家安全危机的信息报告和发布机制。

国家安全危机事件发生后，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准确、及时报告，并依法将有关国家安全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管控处置及善后情况统一向社会发布。

第六十八条 国家安全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管控处置措施，做好善后工作。

第五章

国家安全保障

第六十九条　国家健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第七十条　国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第七十一条　国家加大对国家安全各项建设的投入，保障国家安全工作所需经费和装备。

第七十二条　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物资储备任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国家安全物资进行收储、保管和维护，定期调整更换，保证储备物资的使用效能和安全。

第七十三条　鼓励国家安全领域科技创新，发挥科技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第七十四条　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招录、培养和管理国家安全工作专门人才和特殊人才。

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需要，国家依法保护有关机关专门从事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合法权益，加大人身保护和安置保障力度。

第七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有关军事机关开展国家安全专门工作，可以依法采取必要手段和方式，有关部门和地方应当在职责范围内提供支持和配合。

第七十六条　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第六章

公民、组织的义务和权利

第七十七条　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二）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三）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

（四）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五）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六）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

第七十八条　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对本单位的

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企业事业组织根据国家安全工作的要求，应当配合有关部门采取相关安全措施。

第八十条 公民和组织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第八十一条 公民和组织因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

第八十二条 公民和组织对国家安全工作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第八十三条 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

第七章

附则

第八十四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